



周恩来政论选

上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序

熊 复

周恩来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我们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把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宣传领导工作集于一身，长期关心和指导革命报刊活动，并且亲自执笔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些政论文章，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国内外形势及其变化，党的斗争任务和方针政策，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无论谁作为后辈，只要读到这些政论文章，都会亲切地感受到：它们是时代的镜子，是历史的跫音，是党的战斗历程的投影，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是具有理论价值和文学价值。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周恩来的革命实践活动和革命理论活动的组成部分，因而是他留给世世代代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现在，《周恩来政论选》一书，从周恩来一生中发表的数百篇政论文章和讲演辞中，选出百余篇，汇编成册，公诸于世，这是做了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好事。

周恩来的革命生涯，可以说是从报刊活动开始的，也可以说是同报刊活动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数十年如一日，始终非常重视通过报刊开展革命宣传。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在南开大学主编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杂志，发表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

1921年至1924年旅欧期间，他先是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欧洲通讯，有时每周就写两三篇，向国人报道和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危机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外交动向。接着又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刊物《少年》和《赤光》杂志上发表几十篇论文和短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1924年回国后，周恩来立即投身于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并且站在这个洪流的潮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风云变幻、戎马住傻的岁月，他仍然不断执笔写作并发表大量政治演说，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谰言，反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革命政变，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抗日战争前夕，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周恩来为建立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而大声疾呼，从理论上和政策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主张。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他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时期，在局势复杂多变、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他亲自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活动，并亲自执笔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和讲演辞，仅为《新华日报》写的代论就有18篇。这是周恩来写作政论文章的高潮时期。他在这些议论风发的政论文章和讲演辞中，分析形势，辨明是非，揭露敌人，团结朋友，教育人民，鼓舞士气，成为团结抗战的伟大号角。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内政外交集于一身，日理万机，为国操劳，他执笔写作的机会少了，但他在国务活动中所作的大量演讲、报告，包括在国际会议上所作的重要发言，也都是优秀的政论，体现了周恩来的政治风度和外交艺术，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周恩来的政论文章旗帜鲜明，论证严谨，说理透彻，见解精辟，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兼有机智和犀利的锋芒，而又有情理并重、平易近人的气度，具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即周恩来风格。他的政论，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科学的态度和战略家的眼光，是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科学分析的典范，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究政治问题这一原则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政论不仅是党在当时进行思想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今天学习无产阶级政治科学特别是战略和策略的教科书。

我是曾经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党报工作和宣传工作，亲聆过他的多年教诲的人，今天捧读他的这些名垂当世而为后世效法的政论文章，更是倍感亲切。遥想当年在重庆时期，周恩来为指导党报党刊工作，培养党报党刊工作人员，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我在《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新华日报代论集》序言（重庆出版社出版）和《周恩来和新华日报》一文（见《南方局党史资料》1988年第二期）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不在这里赘言。我只是在这里提到一点：“党的喉舌，人民的向导”这个当年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规定的方针，体现了他坚持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的立场和观点，至今仍然是指导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切报刊活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又想到全国解放以后，他在领导党和国家活动的整个时期。在他工作到凌晨四、五时的每天深夜，他都要审阅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达到他办公室的重要报道和评论。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至1975年间，他为《人民日报》审阅修改的文章就有700多篇。他在审阅稿件时，总是用毛笔，按照文法和逻辑一字一句，圈圈点点，一丝不苟，仔细认真地进行修改。他不只改内容，改提法，还改正文法，改正错字，直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所有接触到他的这一活动的人们无不为其的这种极端负责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他的言传和身教，使我们受到终生难忘的极大教益。崔奇同志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正是出于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的心愿，汇编了这本《周恩来政论选》，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并以此书的编辑出版来纪念周恩来同志诞生九十五周年。

周恩来政论选(上册)

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伦敦通信）

（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

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吾人未出国前，虽屡震夫欧战影响巨大之论，然终以为欧洲物质文明发达甚盛，数年来之摧残，待不过数部分耳，何能碍及全体之发展？比以实验证之，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吃。欧洲一切组织非如吾国散沙可比，一切工商业咸有关联。而生产力之集中厥维工厂、运输、保险、分配，又济之以密如蛛网铁路航路、互有联属之银行、公司、商店，虽曰生产贸易自由，而其关系之深，计算之周，固已趋于集中之势矣。乃至欧战一起，人力之征役，生产力之损失，生产品之耗费，商业隔断，已不可计算。一地之牺牲，乃倾全国精锐之牺牲也。一战之牺牲，乃倾全欧精锐之牺牲也。四年来影响所及，欲求其免于穷困也难矣。故游于巴黎伦敦之市，虽觉繁华远过东亚，然物质文明之享受，如煤也、电也、面包也、糖也，已不能如我国上海京津之取给均足矣，至失业者之多，固不能与我国北省饥民之数与景况相较。然即以英伦苏佑兰论之，见失业者已超过百万上矣，是固不及吾两省之大，而所得之夫业人数也。然其中有一事宜正告国人者，吾国之饥谨由于天时者半，由于人力不自振兴、不思求免于水旱之苦者亦半，故一经水旱则唯有坐以待毙。若欧洲失业之人，彼自身固非无一技一艺者，置之工厂中，波之运用机器之巧，窃恐有过于吾国之专门学校毕业生，中学生更无论矣。是验之于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厂勤工而知也。且欧洲失业之人，均怀有技能而无地可施，吾国则不但无业之人无技能之可言，即得业之人亦属技能仅见。是欧洲曰失业，在吾中国仅可名曰无业。欧洲无事之人既如此其多，则其一人（欧洲工人多无家者）一家之生活，将从何而得以维持？是固今日社会上所最为骚扰之问题也。

不仅如此也。欧洲多工业国，其工人组织之完备、与夫自谋协力之热心，在我国今日都未曾梦见，而其结果尚不能得完善之救济，则中等阶级人既无团体之协助，又受经济现状之压迫，其失业与窘困者又不知若干人矣。

推求其原，失业者之所以增多，由于商务之停滞，生货之缺乏，资财之不足，税则之重敛，物价之腾贵，工厂之倒闭，凡此种种，均互为因果，以至于产业不能振兴，而工人失业也。是种现状，不仅英法为然，欧洲各国莫不然也，而尤以战败国力尤甚。于此各国执政者求所以解决之道者，除俄罗斯已为工人苏维埃另有解决方法外，其大旨均不外农业之开拓，求所以自给之道；商业之恢复，求收回战前地位；并谋所以扩充各工业之奖励，以图外输货物之增加。凡此数事，固各国全国一致所主张者，然为谋一国百年大计诚得矣，非所以语于今日之窘困、与夫各国之交相迫也。皆若目前之救济、则欧洲联合国[1]方面有一共同目标焉，曰定德国之赔款确数，约束德国履行

一九二一年，周恩来到达英国首都伦敦。这是他给天津《益世报》写的第一篇通信，刊载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天津《益世报》。

条约，救济中欧，恢复以前商务状态，是不仅欧洲联合国方面渴欲解决，即德意志、即中欧各国，亦何莫不盼其下文作如何分解也。而英人于此犹有一独得秘方，是曰与俄通商。各国之所踌躇恐惧莫能决者，英政府乃竟于前一星期，将对俄通商协定条文与驻英俄代表决定，交莫斯科方面议复矣。舍此暂不论，前所举各国政府所视荦荦诸大端者，固已经诸国讨论二年之久，于上一星期（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巴黎联合国最高会议决定矣。此次最高会议负重大责任者，除美代表未参与外，殆莫英法若。法首相白里安[2]，新任也。登台第一声，竟将两年来法人所渴望之赔款确定。其周旋于列国间者，有足多焉。盖法主多赔，英主少赔。兹次会议英首相劳合乔治[3]亲身往法，带去代表至四十多人，亦可谓兴师动众，视为极大问题，而竟不能胜其少赔之主张。此盖证之于会议中。彼曾对外人言德国赔款总数为五十万万金镑，而结果竟不然也。然则赔款总数究若何耶？试观下列之所记：

巴黎联合国最高会议开会，讨论一星期。经星期五（二十八日）之长久讨论，于星期六定为下列之决议：“协约国相信他们的坚固联合，是必须去保持和平，为同他们换此以胜战争，并且决定不许别的事件来损害他。他们相信这个联合是世界和平、同修约实行的坚实保证，用国际间聚合同签定的忠实来证明他。”至于条文的内容，关于善后协定，德国应赔偿协约国一百一十三万万金镑，合现今金马克为二千二百六十万万。其赔偿方法，分为四十二年。头二年每年交十万万金镑，继之以交一万五千万者三年，交二万万者三年，交二万五千万者又三年，其余三十一年则年交三万万金镑。此外德国尚应每年交出其出口税百分之十二与协约国，亦继续至四十二年为止。斯项在第一年可希冀得七千五百万镑。对于别项罚款，其所谓宽待条件者，则在应引交款时期前，转将赔款交出。第一、二年可得百分之八折扣，继之四年可得百分之五折扣，又有罚约，如德至期不付赔款，由联合国取其关税偿还，并定其新税则于国内。至赔款之分配，则法得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万为最多，英得二十四万八千六百万，意得十一万三千万，比利时得九万零四百万，葡、日各得八千四百七十五万，其他各国得余数七万三千四百五十万。

关于德国履行条约之规定，德国解除武装务于本年七月一号实行完了，而重费兵器尤宜于近三月内完全交出。同时最高会议又采福煦[4]元帅等之提议，谓德国再不履行此种条约，则立行下列之四种罚约：（一）占领新德国之领土；（二）延长现今的领域；（三）设税关测算处在莱茵河的左岸；（四）非至德国能保持他的倾向去实行以前一切的条约，不许其加入国际联盟。[5]对奥问题，各国僉同劳合乔治之提议，暂缓取偿于奥，并决定将在的里亚斯特[6]有一会议讨论此事，且将遣委员团至奥调查其经济现状。因据报告云，欲创立奥国经济组合，必须助奥以八百万镑。所有决议均由巴黎最高会议于一月二十九日晚间致公文于柏林政府，征其同意，俟本月二十八日预定之伦敦会议正式决定之。

以上记录发表于前日英法各报，全欧人民足资为谈料矣，隐泣者有之，欢呼者有之，德人反对无论矣。而英国社会间不满之声亦群起，是实大可异焉。夫以多索赔款以救济国内经济现状，以陷德人于穷蹙之境，解除武装，限制兵备，以保国内和平，以减敌人危险，此法国多数人共同一致之主张也。至于英国政府或以此为救济战后之急需，而民间有识者及劳动工人，固未尝视此为良药。于此请进论赔款确定后所生之影响如何。

赔款总数为一百一十三万万金镑，此种巨大偿额在历史上既为创见，而在今日新创难复、百无一存之德国，尤无力偿此。证之德国现今国家收入，而断其不易偿还者一也。英法意等国之定此偿额，不但为一方面之主张，且多属政府派之主张。一旦内阁易人，此等条款是否能接续赞成？且偿期延长至四十二年之久，在此期内英法意等国内情之骚扰，及德国将来变化之不测，此种苛约，准能保其于社会改造时有延长之生命！此对于偿还时期而易致疑者也。至出口税扣留百分之十二，则协约国之取偿于德，无异于取偿于本国国民也。盖德既因扣其出口税，此后货物为力求广售，方得增加国家收入，以偿国债，使其货物价低，则各国货高者难与竞争，资本家受直接之害，各国工人受间接失业低薪之苦，是欲求调解战后状态，反益之以纠纷不安。此于扣税方法是否台宜而不能无疑者也。若限德高其物价，则售出不易，国家收入因之减少，偿债维艰，且欲求足其偿额，则必奖励出口，减少人口，以今日情状论，德之人口货远过于出口，而其所需又为食料原料，禁食既有所不能，断绝原料之输入，则输出又奚从其增加？是使德左右维艰，而决无法以负此巨债。夫罚在能行，而协约之所需亦在得款以济急，以调解现状，如是而曰德能应承，是犹不能不令人致疑者也。

然则结局果何如乎？是曰欧洲经济状况紊乱之起点也。若曰本月二十八日之伦敦会议，便可解决此种问题，亦犹梦呓耳。总之今日欧洲之危机在物质，换言之即经济上的面包问题也。全欧人民之生活窘困，而乃夺德人之食以救协约国人，是岂根本解决耶？且夺来之食，未必便救济无食之人，取之以增兵响、制兵械、造军舰者泰半，取之以饵资本家之口者又半，逮饥饿待救者则已无缘分润矣。不仅如此，德人之食为人所夺，必思有以济其饿，则内以减薪裁人取之于工人，外以贱售夺之他国；他国亦反以减薪裁人贱售之道报之。于是辗转而全欧工人拜“夺食”之赐矣。是欲图现状之安，而终无以易不安也。

但欧洲工人非盲目者，且社会党人复从而鼓吹之、宣传之。今非仅英国劳动党职工组合声言反对矣，即法国 CGT[7]之工人亦倡言反对，使其国民知多索赔偿固无益也。美国消息谓，其政府已以来出代表会议，声言扣德出口税款于对美商业有直接损害，提起抗议矣。

至若吾人或于此等问题如隔岸观火，不甚关切。然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使赔款而终有济也，则德人取偿之术，又岂能外于奖励产业，辟新商场于欧土以外，而同时协约国得其偿款，其奖励产业与辟新商场，其法亦正相同，吾中国必为其消化之所，固无用致疑。吾人又焉能不推论其根源，记其近况，以为国人告。

注释

[1]本文中的联合国均指协约国。协约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同盟国（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核心的帝国主义集团）相对抗的另一帝国主义集团，由英、法、俄三国于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期间签订一系列协议而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意、美等二十五国先后加入。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退出。其后因协约国间矛盾加深，逐步瓦解。

[2]白里安（一八六二～一九三二），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间曾历任法国总理。

原业律师和新闻工作，早年投入工人运动，曾为各左翼出版物撰稿。一九一一年任社会党总书记。一九二二年以社会党人身份入众议院。一九二四年同饶勒斯创办《人道报》。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参加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一九二五年参加缔结洛迦诺公约。一九二八年参加缔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3] 劳合·乔治（一八六三~一九四五），一九一六~一九二二年间任英国首相和自由党领袖，首相任内曾镇压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也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策划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曾谴责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

[4] 福煦（一八五一~一九二九），法国元帅。一九一八年五月任协约国军总司令。八月升为法国元帅，十一月十一日接受德军投降。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胜利的主要领导者。

[5]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主要机构有：大会，行政院、秘书处、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国家有六十三。美国为倡议国之一，但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国联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宣告解散，所有财产和档案均移交联合国。

[6] 的里亚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伊斯的里亚半岛西北部，是南欧各国通向亚得里亚海的主要港口。住在市区的居民主要是意大利人，城区以外为斯洛文尼亚人。原属奥匈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里亚斯特建为自由区并分为甲乙两区，分别由意、南两国管辖。

[7] CGT 是法国总工会的法文缩略字。

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西欧通信）

（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

三月初伦敦会议，是为协约国对德要求承认赔款总额，结果归于决裂，而有侵城占地之举。今也伦敦会议再开，讨论之事项仍为对德赔款，而结果又将以占城侵地闻，不祥哉伦敦会议也。西欧外交之中心，野心家争权攘利之场，亦世界祸乱之策源地也。前旬通信，曾叙及德国之新提议与夫英法诸邦之态度，其结论谓将待决于四月三十日开始之伦敦会议。今结果将实现矣，请言此次会议之内容，以为邦人告。伦敦会议之开，决于上次英法两总理在林圃里之会面。彼时英法意见悬而未决者，即法主严厉、英主缓和，两方相持不下，遂商定留待今次会议之再审。

会期定四月三十日开始。先一日法总理暨福煦元帅等渡海往英。意大利外交总长亦于三十日果继至。法总理离法时，曾言“吾人此去，必求于此一次解决所有问题，而得一最终之办法。吾人主张严惩德人，英虽不能助吾以实力，苟许吾道义上精神上之援助、吾法可以以独力行之而有余。德国新提出之办法，吾人断难承认。苟德人有诚意履行条约，何必远隔重洋求助于人，而不为直接之磋商……”其言甚壮，而意有所向，不满足于德国无待言，所注意者盖在对岸之英及远隔重洋之美也。临行福煦尤叱咤不可一世，其视报复之机，盖千载之时也。三十日会议开于下午，五月一日继开，两日间所争持者在赔款总数之修改。英之意见，主张较上次伦敦会议所要求德国承认之数减少。法之意见，则主张维持原额不变。附议英者为意，附法者为比。原来一月底巴黎会议英相主少索，法人主多索，结果劳合乔治竟屈于白里安氏，定赔款之总额为二百一十三万万英镑，外附以四十二年之出口货税百分之十二有半，如法人之愿也。总额既定，扰攘至今仍未得德人丝毫之保证与承诺，是知数目过巨，德人终难屈就也。于是英相乃复提其旧日主张，减少赔额，以冀德国能俯首听命。至于法则以为德国无诚意，无论少赔与多赔，彼终希图延缓，不欲承诺也。与其虚与周旋，毋宁进占德地之为愈，英法意见既异，磋商乃大不易。然时期紧迫，五月一日之期既过，尚无最后之办法宣示于德，是授德人以隙，而暴露协约国不协之状于外，故协约国又不得不力求融洽，以图此会议之良结果。于是有所谓折中办法传于外者，为减低赔款总额，增加出口税则，倘德国仍不承认，则协约国之军队将进占西弗利亚[1]各产业区域矣。

五月一日会议曾两开，即为磋商此事之内容。当日晚间，法总理电告法京陆军总长，令其速行招回一九一九年后备兵，以备迅占德地之用。是知情势之急，亦所以内示协约外示德人，表法人持议之坚也。二日，会议继开。据当日公报，则声言三日仍将继开会议，且邀海陆军鉴定员列席。至于当日情形，则仅言实质协定已至一期限问题，而未言及商定之内容如何，此所谓外交秘密也。据各报所载，则云总赔款数目已改为每年赔款一万万英镑，外加以出口货百分之二十五税则，总数为六十六万万英镑，均须即行债券，其中有须立即印行者，有定于十一月中印行者，有视其力能支给之数随时印行者。此种债券，当以百分之五行息，至三日会议结果，则重要者多属于惩罚

问题，其大旨不外法国素所主持者，使德国果拒绝协约国此次提议，协约国将进占鲁尔[2]产业区域。同时，莱茵流域凡尔赛条约[3]规定占时十五年者，亦将延长至德国偿还赔款之日为止。设鲁尔占领、仍不足惩戒德人，即协约国军舰将投锚于汉堡、卢卑克、斯特丁、不来梅诸港之滨矣。鲁尔区域，据鲁尔河南北两岸，当三月初协约国占领德国三城之东，包含名地极多，为德国产业兴盛地。鲁尔河属莱茵河支流，在莱茵河右岸东西流，昔日联军占领地限在莱茵河左岸者，自进占三城后已越河而东，今则欲更进一步。且前述诸港均为德国要地，汉堡、不来梅当入北海河口，卢卑克、斯特丁当入波罗的海口。使此地亦见联军舰队，则影响于德商业、航务者，岂属浅鲜！果协约国甘犯不韪，强制执行，德人恐终不能默尔忍受也。三日会议犹有磋商者，则二日所定之六十六万万金镑总赔款额，增改为六十七万五千万金镑，首期印行之债券定为六万万金镑，是盖本于五月一日应交之数，而要求其立即实行也。此两日总额之审定，多本诸巴黎赔偿委员会上次所发出通告，定战争损失为六十六万万金镑之数。惟法国意见仍在多争，故遂有三日之增改，而同时巴黎赔偿委员会亦被最高会议召往过海，参与赔款额数之审定。此亦多赔少赔争执之结果所致也。四日会议乃以赔偿委员会为中心，详审赔款总数之内容，而调解英法两方之争执，结果经一日之核勘，英卒胜法六十七万五千万金镑之偿额、复减回为六十六万万金镑。此事既解，重要问题乃都告妥协。五日晨协约各国签字于致德哀的美敦书[4]上，于是协约内部之交涉终，协约各邦对德之新交涉又开始矣。

注释

[1]西弗利亚位于德国西部，多煤铁矿。[2]鲁尔，地区名，在德国中部。主要部分在莱茵河有岸支流鲁尔河下流和利珀河中下游之间。面积四千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六十万（一九七一年）。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集中了很大一部分机器制造、电力、化学、石油、提炼、车辆、军火生产等工业。境内城市工厂密集，煤矿林立。水陆交通方便。主要城市有埃森、多特蒙德、社伊斯堡等。

[3]凡尔赛条约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条约，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与战败国德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生效。和约共分十五部分，四百四十条。国际联盟盟约为第一部分。其他部分主要规定：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交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萨尔由国联管理十五年，期满后经公民投票决定归属。莱茵河左岸由协约国占领十五年，右岸五十公里为不设防地区。德国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其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德国须支付巨额赔款，并可保留十万官兵。美国代表虽在和约上签字，但美国国会未予批准。中国代表因中国人民抗议，未在和约上签字。由于凡尔赛和约是在帝国主义大国反对苏俄、宰割战败国和牺牲弱小民族利益的基础上订立的，它本身就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4]哀的美敦书即拉丁文“最后通牒”字的音译。

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纪（西欧通信）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两月前，日皇太子因离国问题，惹起其国内绝大政潮。军阀元老，受此事之影响，且以归隐为退步，一方关心皇室之士、复惧太子行后，将有人不利于皇妃，百计阻太子之行，以冀饵此未来隐忧，然事卒未果，太子终成行，是知政变虽剧，终仅关系太子一身。至太子来英之目的，则关系英日同盟[1]前途者甚重，非太子一行无以收其功也。日太子行矣。在东京驿出发之盛况，方传其消息于吾人，而一帆风顺，英伦维多利亚车站，竟迎其同盟国之嘉宾矣。此数日东西两太子驰车伦敦道上，开往筵于宫廷，杯酒联欢，其中之外交作用，政治家所恃以操纵者，又不知凡几。直接及于英日同盟，间接及于中日问题、日美问题、中英问题。名为游历，实质上确欲借此虚名，收极大之实效也。

日太子到英之日为五月九日。当日清晨日军舰载太子抵普茨茅斯海口，英皇太子亲身往迎。上午十点两太子乘专车入京，英皇乔治整队迎之于维多利亚车站。除军队官吏外，英皇族至者亦极多。出站后，英皇与两太子及此次随侍日太子来英之侍从长官珍田伯爵共乘一车，往白金汉宫午餐。至时英皇后及玛利公主均出迎。餐后日太子出宫赴一日人死事塔行吊仪，继复往威斯特敏士修道院，瞻仰名人坟墓。晚间英皇族开大宴会，集者约一百三十人。英皇及皇后来日太子坐。餐时英皇有演说，大旨谓英日以地理政治上关系，日增亲密。今后情势，仍愿因日太子之来而愈加友善。大战中日本助英者甚多，英甚感谢。而英国受战争之影响，产业工艺上之疏败甚多，英将以同盟之故，使太子得尽兴参观，毫无隐藏，甚望日太子加以批评指正。日太子亦有答辞，大多祝福英皇室及赞美英国国况之语。其最后数语，有特致谢意于英皇太子者，此日皇太子得意之笔也。

兹番日太子出国，扈从之盛，为从来日本所未有。出国之费，不惜预筹数百万，以求承认于国会，而国会无论政府党及反对政府党，均一致赞助之，其朝野上下之重视太子之行可知。出国后沿途所经，凡英国属地，大都停舰登陆，遍览其同盟经营胜况，英国官吏亦铺张扬厉欢迎之，以显其外交手腕，同盟厚谊于此未来君临六千万人民之太子之前。抵英伦后，各方面铺张盛况，尤不待言。然此不过表面事也，内幕之变化，则两方政治家方在台后商，日皇太子亦不过登台之傀儡耳！世界皇室，自二十世纪开幕以来，实权已无多存在。欧战后中欧北俄皇室继倒，所余之君主，尤甚寥寥。今英日两皇室，方恃此虚荣，彼此靡羁笼络，究其实，乃不过政治家策略上之运用，人等机械，殊无谓也。

美日关系本甚复杂，自哈定[2]，总统就任后，对日政策尤特别引世人注意。驻英美大使因总统更换之故，已辞职回国，新大使哈维君本非急急来英者，现因日太子至，已于十日赶来，其视英日之进行关系于日美者甚重。而一方日太子此来，其侍从长官不以他人而以向日使英之珍田伯爵充之，其不能虚此一行也尤明。英日同盟续约之决定在六月后，磋商之结果其定于今日耶。美既因是急遣其大使来监督矣。吾国之外交公使及国人，不知亦重视此

事也未？

注释

[1]英日同盟是英日两国为联合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结成的同盟。第一次同盟条约于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伦敦签订，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在第三国得到其他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则应提供军事援助。条约还保障英国在中国、日本在中国及朝鲜的非法利益。第二次同盟条约于一九〇五年签订，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并规定在遭到任何第三国进攻时，即应提供军事援助。一九一一年又签订第三次同盟条约。华盛顿会议期间，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日同盟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告终止，为《四国协定》所代替。

[2]哈定（一八六五~一九二三），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任美国总统。在任期间召开关于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及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华盛顿会议，缔结《四国公约》、《五国公约》和《九国公约》构成的“华盛顿体系”。

英法最近之意见齟齬（西欧通信）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德国赔款问题，自上星期柏林政府承认协约国最近之要求后，可谓暂告一结束矣。法国占领鲁尔流域之计划，坐视竟未能达，其遗憾为何如，而内幕则又为英法外交策略互异之结果也，德法本世仇，历史上住迹，历历可数，近五十年来因普法战役[1]结果，法人尤恨德入骨。大战开始，德人之残虐法人、毁践法土者，亦无不为己甚。远仇犹可忘，近恨实不易解除。故胜德以后，对德人之一切要求，咸含有报复与箝制两种用意。法人之用心良苦，而怨毒之结亦愈深。但此犹可曰，是德人自取之咎也。德人负战事之责最多，故应受和约之惩罚，无诚意履行和约，便当以严重警戒继其后，以监视德人之跳梁脱绊，是理或然矣。惟法人将何以自解于今日暗助波兰，违反和约规定，夺取上西里西亚[2]之举耶？

上西里西亚本德地也。巴黎议和时，以其地居民多兰人，经波兰代表一意要求割并，乃定为由居民投票公决，此盖适用民族自决主义于德国领土内也，在未投票公决以前，由协约国派兵镇守，保护秩序，惟不侵其人民自治权。今岁三月二十日实行投票，结果赞成属德者七十万四千五百七十九票，赞成属波者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依和约规定，德既以多数属意，上西里西亚当然为德旧土无疑矣。然内情殊复杂非易决者，当上西里西亚之定为民族自决也，本非新兴之波兰所能争得，内幕之关系乃在协约国之私心别有所注。波兰之得独立，其自动之精神，与长久之奋斗，因有以玉成。而协约国利用之北蔽赤俄，西分德势，亦为最要原因。故上西里西亚之票决，亦协约国用波兰分德势之余音也。主此事最力者，自以法为首。上西里西亚居民为数不及二百万。据德之调查，云德人多于彼人，波人之调查乃反是。兹事本难定，上西里西亚属于普鲁士，数百年于兹矣。波兰人数不易与德人敌，乃意中事。波人所以倾全力以争之者，在其地为产业极盛之区，煤矿尤富。是区面积约六千平方英里，包含十数城，地当德国极东端，波兰之南，捷克之北，三国交界中心也。投票结果，德人虽得多数，然波人殊不平。其所争执，云德人之投票者，多有由柏林及其他区域赶至者，其在上西里西亚并无住所及职业，不应允其投票，其实此类德人均生于上西里西亚，于故乡当然有公决权，此固协约国承认者也。且波兰人有生于上西里西亚而转至他处者，亦都归投票，特其数不及德人之多耳，故有是异议。波人又云，投票之总数虽属德，地方分决则有数处波票多于德票者，是类地方应属波人。其意盖指是区中产业兴盛诸地，因上西里西亚之波人多为劳动者，产业兴盛地多工人，波人视之殊有把握也。惟利之所在，赴之者争先恐后，波人重视是区，德人讷甘退让耶？三月初伦敦赔款会议，德代表且以得是区为赔款应允之一条件，其亦重视是区可知。逮票决结果既属德，德人要求按和约规定施行，更振振有词。协约国虽欲助波，亦苦于不易反汗。最终结果，乃迟迟未能实现。有持调停之道者，主分上西里西亚邻近波兰之璞里斯、锐白利克二地与波，此外再将邻边界略为改正，其所根据则在此诸处之波人实较德为多故也。但波人视此殊不足偿其欲望，其所希冀在得全上西里西亚之煤产区域。使此议

确定，其所获仅十之一二耳。争之既不得，波人乃取破坏激烈手段以进行。近一周中，上西里西亚乃大不安，波籍工人罢工，波人暴动，劫杀德人，甚至伤害协约国军人。凡兹事件，日日有所闻见，戍守上西里西亚之军队本为法意两国人，上级军官则英法意诸国均有也。彼人暴动本非自今日始，票决时便已发现。协约国军队既以保护秩序为名，胡不负镇压之责耶？曰镇压固镇压矣，然愈压愈乱，是盖有暗中为之助者。

* * *

当五月一日伦敦会议，法总理曾主张德人果再不承诺此次通牒，当占领鲁尔及上西里西亚两区。惟以不得英意等国之同意，遂将占领上西里西亚之动议取消。然上西里西亚非属德即属波也。法既主占是区，是表示好意于波兰，波人乌能不倾全力以争之。故入月以来，上西里西亚之暴动，乃益剧烈。且动乱之发，非纯由群众随意而为，实有人指使操纵，为之首者波兰官吏高尔方狄也，高氏居上西里西亚，以执行公务之身，亲自与闻暴动之举。是其所恃，不仅在波政府，且有强国为助也明矣。上西里西亚邻波境界，其守卒为法人者，波人入境，多少护照之盘查，其故意放纵可知。暴动群众，多为此新来自波兰之人。伤害之事，德人既首当其冲，死伤自不待言。英意军人为执行职务故，亦多蒙损害。而法人则被害者甚少，且常坐视不问。英意军官，对此殊愤愤。德人因死伤之事日有所闻，协约国军队既无法镇压，声言将遣德兵入境。最近数日，各国戍西军官，乃连电各国政府请示办法。各国政府意见何若耶，是不得不一言今日西欧外交之枢纽。

今之西欧，一英法争雄之场也。两国同以为非者，他人不得以为非；两国同以为非者，他人不得以为非。两国果异其趋者，则拥其他各国赞同之意见以为抗，或折中而定之，或竟屈一方以从之，常不易得其平也。一月底巴黎会议，赔款数目，英主少而法主多，结果法胜英。一百一十三万万金镑赔款，外附征出口货税百分之十二又半之通牒送达柏林，经一月之考量，三月初伦敦会议，德代表态度强硬，不允协约所求，谈判决裂，于是占城略地之举，征收德税之议，——见诸实行。是盖德法之主张也，英又负矣。惟英素以外交手腕狡猾胜世界，劳合乔治又为其中之翹楚，是岂易与者？英之让法，盖有待耳。果法占德城后，一月有半，德人应交纳之定期赔款又至期矣。德人四方呼援，声诉其苦情，求协约国减削款额，以冀力能担负。而英人亦若即若离以应之。同时大西洋对岸亦有作同情之声者，其音虽微，然足动此岸政治家之听。故哈定氏对德回答，有希望德国提议果能顺乎情理，当易于得协约国之赞同，达圆满解决之途等言，劳合乔治乃得凭藉之以操英国之胜利。四月下旬林圉里会议未决，五月一日伦敦再会议，卒达英人少索之目的，改赔款额为六十六万万金镑，于五月五日以哀的美敦书送达柏林，结果德遂屈服。是役也，法志在占地，以赔款之定，德人决无诚意交纳，与其徒费口舌，莫若取直接手段为愈。此报复箝制之念有以使之也。英人则不然，其于德也，非如法之有深仇者，其恨德在争霸，将夺其世界商权。今德既败，竞争者别有人在，眼光遂亦别有所注，故对德态度乃不若法之强硬，转而折中于其间，以示好德人。再英人重利，以为与其定庞大无垠之赔额，不得德人之承诺，曷若减少赔额，而能得德人之真实担保为佳。且占地事，乃最后不得已之手段，强取德税，徒增德人之怨毒。成功与否尚未敢料。因是劳氏对法占地之

意见，以其气盛不易抑服，乃转而一意图偿额之削减。法总理白里安氏，虽明知减款非法人之愿，然因法人需英助者甚多，且太固执易遭美人之訾议，失协约诸国同情，遂不得不屈于英。但法犹未尽料德之遽尔承诺也，故月初议定后，法人尚亟亟召还退伍兵役，遣派守戍莱茵军士，一若德国仍将拒绝要求，鲁尔流域转瞬可得者。反观英国，则通牒致德后，劳氏曾为一度之国会报告，此外并无所谓最后预备，岂英人视赔款之重不及法人耶，亦英人胸有成竹耳。此法总理白氏之智终在劳氏下矣。英既胜法，法人又岂能甘其积怒，乃不得志于西者转而泄之于东，阴助波兰，在西区暴动，以冀达其上西里西亚归波之主张。然此变更和约之事，法虽可以一手掩弱小诸邦之目，终不能无所忌惮于英也，其注意英政府之态度，自在意中。

注释

[1]普法战役是一八七〇 ~ 一八七一年法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为扩张领土，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拿破仑二世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德意志统一，扩大它在欧洲的势力，于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迭次失败。九月二日拿破仑二世率十万军队在色当投降。九月四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普鲁士军队仍长驱直入，包围巴黎；战争性质在普鲁士方面由防御转变为侵略。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于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同普鲁士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资产阶级政府迁到凡尔赛，于五月十日同德国缔结《法兰克福和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赔款五十亿法郎。五月二十八日，凡尔赛政府在普鲁士军队帮助下，镇压了巴黎公社。通过这次战争，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2]西里西亚是东欧奥得河中、上游地区的总称，在波兰西南部，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和德国东南部。在波德境内的东南部叫上西里西亚，西北部叫下西里西亚。西里两亚矿产丰富，是欧洲最大的煤田之一，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甜菜。

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旅欧通信）

（一九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一）林权助大放厥词

系人想念之华盛顿会议[1]，十数日后便将在美京开幕。群雄毕至，会聚一堂，其重要自无待言。西欧社会间当此会议初发起时，态度上之表示，殊甚冷静，不若美日哄传之盛。近者因大西洋对岸卷来浪急，各方面受其波动之影响，亦渐渐移其对德对土对匈对俄之视线，转而西向。于是外交上具有作用之表面活动，乃亦乘时而起，大事宣传，其中旗鼓最明响而目的又最简单者，自以日本为最。日本政府在欧之外交，于欧事则持一置于事外之态度，丝毫不苟，而又不即不离，常能调停和解于英法意诸国意见不台之时，以是日本在欧大使，乃有仲裁之目。惟其对欧事态度如此，同时遂又兼负解释东亚事务之责。凡日政府在东亚方面所施行之种种侵略政策，彼等无不尽力为之隐瞒辩护，隐瞒辩护之不足，则必设词污蔑他人，以证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实由于情形之相迫，而尤召不得不如此之势。此日本政府在欧之外交策略也。不仅其驻欧各大使守此义不变，即日本旅欧“臣民”，亦咸负有宣传此种策略之使命。故旅欧日人，在欧洲社会间之交际，无不含有外交作用在内，其唯一之作用，尤为表白日本之苦衷及中国之贫弱。国际间交际本多含有深心，然国民外交而亦时时不忘作用，是则为今日日本人独擅之技矣。华盛顿会议号召后，于东亚问题更有密切关系。日人在欧之活动亦愈形紧张，其行动分两段落，初则一切奔走均极秘密，务使西欧各国政治界舆论界于黑幕中得来的报告，信以为实，且更生先入为主之见，至是根基已固。而社会间对于华盛顿会议亦渐由冷静的变为热烈的相待。日人遂一改以前之秘密中活跃情形为公开的活跃，向大多数群众攫取同情，盖后援已固，更不惧舆论之不我助也。日昨伦敦外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午餐席上，驻英日大使林权助男爵，曾有一长演说，即为此最近公开活跃之一证。其演说辞大要如下：

十四日后，吾人将群集于华盛顿。吾人中即或有不克前往者，吾人之心亦必随往。此种责任，各国之人物与其代表，甚至吾人之全体，均负有使此会议成功之期待，使吾人均趋赴于共同赞助精神下，则吾信此会议之令人满意，初不为吾人之友之合众国，且更将被益于全体。

大战中吾人已为良友，此时更无有假设之原因，而必谓彼此间已有界限。其界限乃为吾人破裂种种束缚与彼此攻击而成。吾尤喜为指出者，即国际友谊信将增于美英之间，吾亦希冀吾所信此同样之感情，将必有同时之转移，发生于美日之间。关于中国问题，亦将在华盛顿讨论，并加入其全权大使。惟其国内之纷争，殊令人视之不胜遗憾。吾深信英美法日皆与中国有直接关系者，苟能至一协定地步，并寻出某种共同根据，则其国内平和，始可重图恢复。

停止中国内争，实力今日之必需，因其内争其国内一切活动都为停滞，无限之愁苦日以加增，且更将使欧洲全体在中国市场上之商业，受其战争之波及蒙极大之损失，吾人甚愿举所有诚心以助中国。吾人所冀之诚实通信士岂仅为少数，吾人并望各国外交人物及新闻记者，勿于此好意之热诚上加以阻力。

此种阻力在美国在日本均有人从事扩充、在此邦亦然，而更以在中国为甚。今早吾方阅报中载有吾老友伍廷芳[2]博士语璩尔斯科克利夫勋爵(璩氏为英国新闻界大王，现方东游历中日，国人当已聆其议论，记者注)，彼殊不信中国代表之参与华盛顿会议者将有若何用处。因彼等已甘居于日本势力笼罩之下，果尔殊甚不佳，使具有权威之人如璩尔斯科克利夫勋爵者亦信此语为真，则千百以上之人民居于此邦者，亦将随之以信从，但吾终希望彼等将不如是。

在英美中国代表中，将无人能信日本据有特殊之权力于华盛顿。所有报告，均无根据，吾人实期望平和。

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吾信其必能使吾人之友之合众国获得极大之满意，而吾人彼此间亦将如此。但吾甚望有许多问题如吾人之所听闻者，将不复在此会议中讨论，因此类问题将另俟解决于来日。如此，则各国之外交代表，必不至于虚费，其一年半载之长时间，从事于难以十分安定之问题，而未经多年之牺牲与设备者，但彼此共同之根基，却极易建立普通之主要条文于合理事实之讨论中。在所有情形之中，吾有一事为诸君告者，日本必能举其国家之可能以协助英美诸国，谋人间之永久和平。

林大使之言大概如此。吾人于其议论中，可获得下列之数项用意：

- 第一、极力表示美日联络之可能；
- 第二、宣传中国内乱之危险；
- 第三、禁止中国提出中日间一切交涉。

此三事乃为日本人对于华盛顿会议未开幕前所竭力从事之工作。林权助之言，不过为此种工作之一幕耳。

* * *

(二) 共管说盛倡美国之由来

日本政府对于作战计划，布置得亦极周密。彼明知大战中日本在太平洋上所获得之种种优先权利，深为英美所忌。今当战后休息之期，英以同盟故，不便直接向日有所表示，乃引出美国，以解决太平洋及远东之纷争为名，而欲日本于种种独占政策上有所让步，所谓让步者，普通说法，即恢复昔日利益均沾条件，切实言之，即英美欲与日本平分东亚一切权利，互不侵犯，保持彼此间暂时之和平。英日本为同盟国，续盟之事日尤急于英，英苟向日所请益，原无不可能，惟日既许英在东亚占有更优之位置，则续盟条件必更受束缚，影响之恶，于英美交谊上殊为不利。故七月间英帝国会议时，加拿大南非两首相极力反对英日续盟之实现。一方英本国又与日本力不即不离之表示，暗中则怂恿美国催开华盛顿会议，以太平洋及远东与裁减军备问题为主要，如此则事成英美日必立于同一水平上。在东亚谋尽量之发展，更不受日本任何之束缚。对美国亦无若何之不安。使所图难成，则争执之烈，必以美日为甚，英政府仍得立于中立地位力排难解纷之人，以见好于双方。此种外交策略，可谓狡猾老练已极。美政府亦明知之，然失此时机不图，则世界盟主之资格难保，而太平洋风云将愈趋迫切。日美之争执既无弥补之方，英日续盟若成，必更益日人猖狂之气，因此美政府宁循英政府之请，以和平手段谋太平洋上一时之相安。至所谓和平永久，乃不过外交官口头上之一辞令，岂真十数年来不能安定之猜忌排挤，一旦经华盛顿会议便可悉化为云烟耶？

国际间对待心理与其所处之环境，断无若是之易变者。英美之观念既如此，其于太平洋上所欲解决之国，吾国实首当其冲。西伯利亚及太平洋上诸岛犹其次焉者。其所注重对手国则为日本，在英美之意见上，现方有一共同之点，即对于吾国一切设施概取一共同管理态度。自大战终了后，世界强国已属无几。东亚问题，更握于四强英美日法之手，虽意大利亦难望有若何发言机会。惟系之国家愈少，彼此之利害冲突亦愈多。使无一共同调解之道，则终难免于破裂。故“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之呼声，自战后益高。但呼声中之成分，与战前却已大异。战前之所谓“开放”，所谓“均沾”，不过彼此以此为监视要挟之具，而成相待不下之局。结果监视稍一懈弛，则强而有力且有余勇可用者，必乘机破此均势之局。大战中日本之行动，已足为此举之佐证，使英美领受极大教训。是以今兹策略，均一变向日彼此监视态度为共同管理。此实进一步之主张，较彼此相持之局实已获利多多，而所谓“均沾”，所谓“开放”，更能十分做到。战后之新银行团，即本此意旨而发起者。日本本为反对此种策略之国，因共管之局实现，则特殊利益与特殊地位即难存在。英美本忌其特殊，故以共同管理之说制之。乃日本于此决不放松，致新银行团代表在日本费许多解说，始获将此计划之初步实现，然而日本已往所得之特殊利益与特殊地位，新银行团固已默许其存在矣。新银行团特不过一经济侵略政策之初步，其成立尚费如许周折，则今日英美所欲谋之共管办法其实现之期，彼必更难于新银行团之存立。日本政府于此知之甚审，论其衷曲，彼必不愿共管说之实现，而有碍其单独侵略之进行。然大势所趋，苟难于阻挠，彼亦必顺水推舟，另谋相当交换条件，如其加入新银行团时之态度。八九月间共管说之盛传于日本，固为日本人藉此以挑拨中美之友谊，然其用心，更别有所在。在日本方面着想，彼以共管说若得实现，必须经日本之赞助方得畅行无碍，果尔，则日本必有所得。否则亦可于此大行宣传之时，使英美知有所惮，而不复提交华盛顿会议，则东亚问题，彼心可仍继续居其主宰之地位。故共管说云日人赞成亦可，云日人不赞成亦可。观林权助“至一协定地步，并寻某种共同根据”之言，则知其说得含含糊糊，正所以表示其半推半就之态度也。且中国之内乱，成于日本人之手者十之七八。日本一方于世界尽情宣传中国内乱之危险，一方又竭力助中国内乱之延长，其用心之险，自无与比。其所以极力向世界宣传者，重要意旨无非欲破坏中国在列强中之信用，使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不得有所声诉。然宣传过甚，则益足以使共管说愈获有有力之根据。故谓日人纯粹不赞成共管说者，亦非事实上之真相，国人于国内苟注意于东邻之各种舆论，即知吾之所推测者非尽谬误。至有人谓共管说系属日人造谣，此亦不免武断太甚。“共同管理中国”之名词或系日本人造出，若共管之起意，则实起自英美。国人倘于两年来新银行团内部之组织与其运用上有所考虑，则共管说之发生，便知其不为无因。英美共管中国意旨，首重经济，实则战后亦惟有此经济之消长为能制人死命。至于政治军事等，彼等皆认为是乃枝叶问题。其于新银行团之组成固已费几许心血，惟其于运用上殊感不便。观两年来该团之不获发展，与不足以转移中国政府之设施便可证明。故彼等现在所谓之“共管”，乃求进一步而能获有指挥中国财政之全权。爽直言之，便是共同管理中国财政。

以今日中国财政之紊乱，据新银行团之核计，至民国十四年六月便将破产，迟早终须受列强之处分，则彼等今日之见地，亦正有其根据。前昨两日英法报纸遍载华盛顿传来消息，谓中国代表团九十余人已将抵华盛顿。同时

美国半官式之报告，已谓共同管理中国财政事必将于此次会议中解决。此信果属真耶？吾人为民族存亡之念所动，当含满眶眼泪，而希冀此信之不确。若细察此近两月英美外交界人论调，与其年来对于东亚事件之存心，则此议或终难免。吾人处此，已属最险期中！稍一不慎，便有覆国之虞。共管说为吾人绝对难承认之事，然持之过激、则日本必乘隙而入，助吾人以反对，而保其固特殊情势，是结果必不免亲日之嫌。而山东问题，二十一条亡国条约[3]，更将因之葬送，无丝毫抗争之余地也。若目光只及于山东问题与二十一条款，结果必致日本以此两事为承认共同管理中国财政之交换条件，而吾将两夫。前日加拿大传来消息，云日本代表领袖德川公爵已于本月二十九日抵彼，其重要之宣言，即云中日间之单独问题，为留待彼此直接磋商，毋须提交华盛顿会议。林大使之演说亦云，“有许多问题如吾人之所听闻者将不复在此会议中讨论，因此问题将另俟解决于来日。”是非专对吾国所欲提交之山东问题与二十一条款而发者耶。吾人今日之态度非常难处，盖已立于四面楚歌中。昔日巴黎和会[4]，尚为专对日本一国，已竭吾全国之力，始获有不签和约之效果，今则对日为一事，对英美诸国又一事。对日问题，无法争回，则东亚永无宁日；对英美之共管说无法打消，中国一切施設，更永无自由之可言。此两事不幸而均无争回之望，则英美日法必已打通一气。彼等所视之太平洋风波将因以小静，而吾东亚一片土必将遭大劫矣！故华盛顿会议所以能予人以抱乐观者绝少，证之以吾国代表之人选，更不免于亲日派之插足，是前途尤多黑暗之恐惧。兹以吾意先断日本代表在华盛顿会议所取之手段如下。

对于列强者：

（一）必极力赞助裁减军备之提议，且日本愿为首倡者，但必须获得交换条件及一切保证。此事日本代表德川公爵及加藤海军大将均已有类此意见之言论。

（二）对于英美整理中国财政意见，取赞否不明态度，以冀从中获得他项利益。

（三）对于列强在东亚利益均沾之主张，表面上极力赞成，暗中则以保留其所已得之特殊利益为要挟。

（四）对于英日续盟问题，第一步要求美国加入，成为三角协商，使蓝辛石井之协定[5]更加一层保证；不成，则必求得美国之谅解，而使续盟之事得以于此次会议中决定。

对于吾国者：

（一）极力破坏吾国国际间之信用。

（二）勾结吾国亲日派之外交代表，挑拨中国与列强之友谊。

（三）反对山东问题与二十一条款问题之提出。

（四）利用种种国际间不利于吾国之机会，施行威吓利诱之策略。

日本政府外交策略向以目的单纯、手段复杂见称。今兹会议，彼必仍不免于运用此种惯例。如吾上所列举八项，概括言之，仍一对华问题耳。其四方八面之呼应，已足供其指挥而有余，正不必如欧和会中提出人种差别案以为抵制而惹美人之反感也。吾此通信至国内时，华盛顿会议已将开会月余，则吾之所预测者，必可得一证明，是耶非耶？吾固不能预知，但吾甚希冀吾言之过当，而中国终得获有发展之机也。然吾终不免一最终之恐惧，即会议

开后，如非共管财政说之提出，即中日交涉案暗中打消，其甚者便为迫中国代表签字于列强均势之协定上也。

注释

[1]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华盛顿举行。参加者有美、英、日、法、意、葡、比、荷、中九国。会议根据美国提出的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缔结了帝国主义同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以及共同镇压远东人民，首先是镇压中国人民的美、英、法、日《四国公约》等。

[2]伍廷芳（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广东新会人。一八七四年留学英国。一八八二年起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十余年，多次参加清政府的外交谈判。辛亥革命时由起义各省推为外交总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司法总长。一九一六年黎元洪委托为外交总长。曾任孙中山的沪法军政府外交[3]“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 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4]巴黎和会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和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六月二十八日）。参加者有英、法、美、日、意等二十七国，中国作为战胜国亦参加了和会、苏俄未破邀请参加。会议由美、英、法三国操纵，经过激烈的争吵，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国联盟约》，还秘密拟定了武装干涉苏俄，瓜分苏俄领土的计划。当时中国人民为反对和会无理地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掀起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5]蓝辛—石井协定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全权代表石井菊次郎间的外交换文。换文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和两国重申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原则。它是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和日本达成的交易。

华府会议中之英法战略（一）（巴黎通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英法两政府之抱负

月初通讯，吾曾预测英法两国政府代表临华府会议后所持之态度。今会议开幕将三周矣，其所作为，殆皆不出吾人之所逆料。原英政府兹次计划，早于华府会议初开幕时昭然揭示于世界。而法政府之所希冀，尤根据其战后之国际政策，无或改变。吾人苟稍留意英法两国间一年来表现之政情，便知此次华府会议中英法两政府代表所给予世界之印象，为无足怪矣。印象中之最大者，为英法政策之冲突，换言之即英法大陆政策之不谐是也。一年来英法两政府于欧洲大陆上所施行之政策，殆无不此是彼非，此非彼是，极其冲突之能事。此类事变，吾已于过去通信中，数数言之，今兹华府会议主动者为美国，讨论问题之范围又多着眼于远东，西欧舆论于英法彼此间之态度，在开会前多略而不论。盖以为裁兵问题英法无冲突，东亚问题，英法无齟齬，会议场中当能互相提携，以求太平洋上之风波安定，希望如此，不图事实上终因两方根本见解之不同，一经接触，仍复格格不能相入，不仅不能相入，且更不能相容矣。华府之会议未终，裁兵与远东问题，百未决一，而英法之不谐，已喧腾于大西洋两岸。社会间舆论之下平声浪，近一周中，盖已充满于巴黎伦敦市上。而两国执政要人又复从而助长之。欧洲诚属多事之场，其事由来，近因为裁兵问题，而远因仍本于大陆政策之互异。当会议将开时，法总理挟其满腔热望，远临华府，其最大之希冀，在以欧事烦美政府加入解决。于裁兵一层，则视英美能担保其防御与否为交换条件。简言之，即财力与军力均盼望有一确实之国际保证，自华府携归也。法政府此种观念及其企图，已守之经年而未变，此次白里安氏亲自出席，实欲乘机一展其抱负。其所以成此观念者，根本动机由于惧德及国内经济界之恐慌。因惧德遂欲以暴制暴，因经济恐慌遂强迫德人交纳多数赔偿金，以谋救济。此种极不经济不安定之防御办法，在吾外人观之，实病其至不彻底。在法政府自身，按其平日施設而论，似甚以此为满意者。然他方观其求助于美之急，则又似其亦颇知此种举措为不甚可靠，但在他人未必相助之先。法政府乃仍不得不保持此种愚策，其嫌疑所及，穷兵黩武之行动，遂深为世所垢病，美人因之，更不欲多所过问于欧事，英人因之，乃常以极相反之政策与之相追逐、相煎逼，相持既久，至兹次会议遂益显明。本来华府会议之标题，虽为裁兵与太平洋两问题，但在欧洲人眼光视之，总希望会议中能加入欧洲事件，而以财政状况为最急。法政府为此盼望不待论矣，即在英政府亦未尝无此想望。观开会前英伦银行家及英政府中一二人所发之言论，便知其然。会议既开，美国务卿休士[1]首以裁减海军军备之议案提出，且详述英美日三国应减应留之吨数，其手腕之敏捷，颇足以震动一时。隔三日会议再开，英总代表贝尔福[2]氏代表英政府为接受美国提议之演说，于预定之减留吨数上，云将略有变动，至潜艇则主张多加裁减。日本代表同时亦声言为议案大体之接受。自是以后，公开之会议遂暂停止，而日日筹议于特别委员会中。又数日英政府忽有停造

现在建筑中四大主要战舰之通告，又惹起世人之一时注意。此数场开幕剧，颇似英美于事先曾略有商榷者。以表面之外交经过论，英伦政府曾数次要求美政府于华府会议召集前，在英伦先开一太平洋问题预议会，美政府却之，议卒未成。今会议开至十余日，闻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日聚九国代表议于秘密式之特别委员会中，为“利益均沾”变相之谋，至今犹未能将具体之大纲议出，是知公共集议而各有所谋之难。然裁兵会议开后，不过三五日，便已粗有头绪。此中实有可寻之线索，英美既有所商榷，对象中，日本乃为难处之国。观其争论于主要战舰三国比例之当改变，便知日政府心中已极不满意于将来五与五与三之比例矣。

* * *

日本东京各报之舆论，闻多斤斤较量各舰吨之多寡。且日政府又极力催促现在建筑中之三大主要战舰急速造成，以图幸免议题解决后停造之损失。此种态度，既极招物议，且亦足证其心中有所怯矣。日本当此难关，其惟一之希望，乃在英美能容许日本增加比例吨数之要求，所谓拒绝裁减，继续建造，已难出诸日代表口矣。日政府受英美联合之“强迫实行”、其不能直言反对者，乃由其无辞可借之故。故裁兵问题会议，在日政府之心中实不愿加入。此固不仅裁兵问题，即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又何莫不然。但在吾个人观之，彼对此两问题之怀疑与恐惧，前者实较后者为甚。缘后者为解决他人之事，尚容其借词要挟或拒绝，而前者乃其本身问题，英美且又合演此剧，宁不使其心中忐忑。日政府既不愿加入，然情势所逼，却又不得不加入，此实日政府外交最困难之时。

日政府如是矣，其他方尚有急于加入讨论，而竟为英美视线所未及者，则法国是也。法总理携其热望以临华府，美英乃以裁减海军问题冷淡之。关于陆地裁兵事，美代表又暂置不议，专俟法代表自为提出。论陆军军力，以四千余万之法人，拥有八十余万之陆军，今世实无一国足以与之比拟。此巨大之军额，使法国不躬自倡导，他国何能言裁？各国对待法国之心理如是，在法政府自视，则裁兵非易，须贵有列强问坚确之保证以为其后盾。兹议非法国所愿提出者，宁待他人提议减裁陆地军额时，持此以作交换条件。法人平日主张，本多直率无隐，此事美政府尤深知之，故益隐忍不发。美政府代表之能忍待，由于事不关己，而法代表远临万里，开会十数日，一无建树，问心岂能自安。终于不复忍待，愤而有本月二十一日之演说。由此一场演说后，英法问政策之冲突，遂益形显著矣。

白里安氏之裁兵演说

法代表之演说，属于白里安氏。演说之所在，则为第三次裁兵会议之正式大会也。先数日，白氏已宣告其行期定于十月二十五日，会议未终，法兰西所欲提议之议案，尚一无所成，白氏便欲匆匆上归国之道，其悻悻然不满意于此次会议之态度，已可想见。白氏既将去矣，则是番公开之演说，必大有用意，事前已为一般舆论所公认。二十一日开会，白氏首致词曰。

吾今得于诸君之前有所陈述，吾及吾国代表实觉有无上快慰。吾人所携以赴华盛顿者，实为广大之牺牲，吾人颇觉此为吾人保护之必需。吾人解除吾人之武

器，将于平和安定之再造为快乐的贡献。不幸，吾人竟不克言此；不幸，吾人终不得以言此。欲图平和，于此当从两方作起，其一为吾人，其一乃为吾人之邻人也。且欲图平和，吾仅就陆地裁兵而言，若仅谋减少精锐，限制军械，是犹嫌未足，必于此外另有一不可轻视之考虑，而其事实为平和之意图，即吾人必当有平和之空气是也。裁减军备，道德方面当与实质方面并重，且吾尤希望为君等证明者，欧洲之于今日，实已陷于不安之重大成分中。而法兰西尤因其本身安定之观感，益受此种情况之束缚。此开场数语，已足表示其论锋所指，与法兰西不允裁兵之态度矣。其下更进一步指明德祸日亟与法国所以不得不保持现有军额之苦衷。其大致如下：

有人固曾试为传说，法国若永久保持其现有军力，其内幕中心欲计划一军国霸权之建立，以袭帝国主义德意志之后。此种诬词，或足使美人坚信，唯对于吾法人则实力一残忍而又悲惨之担负，设于此有一国愿倾其全心，施其全力以图贡献此平和，则吾法兰西实足以当此。

概自休战以来，彼曾经历几多之不幸，而犹静待彼所希望者实现，一年中彼曾冷观德意志辩护其责任，拒绝赔偿，拒绝裁兵，于此种种可怒之情状下，彼均守其平静之态度。缘彼本无所恨怨于其心中，而尤愿从事于法德间血战纪录告终之事业。

吾人有所警告者，德意志至今实犹有一不安之势力，其初名为保安警察，其人数十五万人，其组织约为全体有职守之官吏。吾人曾要求其解散，嗣既解散，而其他之组织又起而为之代，其名曰保卫队，具有精密之同样登录簿，其数当已具有二十五万人，日日从事于战争再起之准备训练，犹有言吉，彼德意志自战场归去，投入私人生活中之七万军人，至今犹有团结，且日夜希望其组织中之计划，使此伟大之德意再生时能有所实现。有一事实足以使君等获一极敏捷之念，知此等军力实有可动之势。当上西里西亚问题未决时，人于数日间即集至四万八千携有旋条枪、机关枪、且获有甲车之人，此实为不可侮之精锐。故德至今日，苟遇有变故，仍能干数星期间，立集其旧有之六七百万军人，彼实有登簿足以核计彼等。

白氏声诉至此，盖已将其惧德要点悉行披露，于乃转而向美人曰，吾今将转语此伟大之美利坚人民，君等已将转君等之眼，以离此种危难那？君等已将抛弃所有权力以救君等之生命那，但何者为再进，以完成君等之荣誉，君等更将何为？于此使有“人将不为，美亦不为”之言者，吾知其必非美利坚之市民。此数语实极力表其希望美人勿抛弃欧事不问之至意，其后又转而叙述德国军人势力犹存之实况。其取以为证者，乃为德意志旧帝国之参谋次长鲁登道夫[3]，彼言鲁氏犹为今日德国不可侮之人，且彼深信鲁氏足以煽动未来之战祸，而德国旧日之军人更人人具有好战之野心。彼言德国今日之军额虽为十万，而暗中实仍具有七百万精锐之军力。其军械虽限制，然黑幕中难保无私藏私造之事，声诉德人之野心既毕，终乃归论其不能裁兵之主张：

吾已引吾国八千和平之道，惟设使吾行之过急，则吾必不免为一犯嫌之卖国者，干将来据法政府之计划，必可使减军额之事证实，至其时当能减低一半军额。

法兰西满心愿望此平和，但彼下能尽力于无所防御之中。设使其前日在战中之同盟国与联合国已向彼宣言：“使再有所抵抗，吾人仍当助汝防御”，则此时地位或将有所异，然法国终不能希此，彼必当自恃其力，彼尤不应与道德有所隔离。

白氏演说之大概，略如上述。其最后一段固已明明宣布法人非不能减兵

者，特须列国肯为之保证耳。其所谓道德上之隔离，乃自掩之辞。白氏言毕，英代表贝尔福氏起为酬应之答辞，其言大意谓法总理之演说，彼实具有无限之同情，今日英人得以优游重理其旧业，实出于法人不辞防御之赐。言虽誉扬，然都空泛不着实际，是法总理最后保证之希望，英代表已暗示拒绝矣。次之为美代表休士之答辞，休氏谓“为防护世界自由之国家，无所谓与道德上有所隔离”，其言虽似稍近一层，然不着实际则一也。次日美国舆论于白氏之演说，大力赞扬，于暂时不能裁兵之苦衷，亦深表同情。法人获此，其怨愤之气，自可稍解。但此种舆论，究空洞不足恃也。会议中列强之态度，果能容法国崛起坚持到底那，是又在难测之数。保证希望若绝，则法政府惟有实行其不能裁兵之坚决主张，于此法政府固认为势所迫也，非出于自愿。然隔岸之英人却不复为法人谅矣。法总理演说传出，英报在美访员殆无不有讥刺论调传达本国，而英伦岛上之舆论，更肆意攻击。有谓法人欲于欧陆建立伟大之霸权者，有谓法人此举实足激德人之怒，而隐伏将来之祸根者，有谓法人不裁兵英人减少军舰为无用者，更有谓法人穷兵黩武之念，非尽防德其心目中盖有英国在也。此最后一论，华府会议特别通信员魏尔斯即持此论调以发表于英美各报。斯不免有神经过敏之嫌。法固有所不谦于英，英亦何尝无所怨于法，两国间之齟齬，一年中几成寻常茶饭。两国政府虽防忌甚严，然必谓有借重武力于将来之意，不但法今日断非英敌，即使当日拿破仑[4]时代之雄心犹存于法人心理中，吾恐其惧德之念，亦足以使其抗英之念打消而有余也。英既讥法，法乌能忍？于是两方之笔战乃又开一幕。笔战未终，而更有舌战继之。掉此舌者，且更为两国政府之要人。英法真为好起冲突者矣。今夜已深，吾明日当继叙此舌战之事实于第二篇中也。

注释

[1]休士（一八六二～一九四八），美国共和党人，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任国务卿，曾主诗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

[2]贝尔福（一八四八～一九三〇），曾任英国首相（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和外交大臣（一八四八～一九三〇）。首相任内曾策划缔结《英日同盟条约》和《英法协议》。外交大臣任内曾致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银行家洛希尔，表示英国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这一信件后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3]鲁登道夫（一八六五～一九三七），德国将军、军国主义者，法西斯总体战理论创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九一六年任作战参谋次长，协助总参谋长兴登堡掌握德军指挥权。一九一八年被解职。一九二三年与希特勒共同发动“啤酒酒店暴动”。著有《战争回忆录》、《总体战》等。

[4]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一七六九～一八二一）。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一八〇四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他的一生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一八一二年进攻俄国遭到失败，一八〇四年反法联军攻陷巴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一八一五年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那岛。一八二一年病死该岛。

华府会议中之英法战略（二）（巴黎通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白里安之最后主张

本月二十一日华府公开之会议，白里安氏既代表法政府将其对于裁兵会议之意见宣布后，一般舆论咸谓此乃法人声诉苦衷之演说，然犹不得谓为法政府向裁兵会议提出之议案也。且二十一日裁兵会议之开，美总代表休士固明明声言此为陆地裁兵会议，而美政府于此当继续保持其旧有之少数军额。国务卿休士氏并云，美国当欧战初停时，美国陆军实有四百二十万人。然自休战条约签订后，即起首解散，一年中便已陆续归田，现时合格之军额，只限在十六万人以内，故美国于陆地裁兵事，其自事实无可裁减。美代表之为此言，意在促他国军额众多者之反省，首当其冲者乃为法兰西。唯法自白里安氏一场演后，其不保证便不裁兵之主张，已昭然若揭，使美国能慨然予以保证者，则法国政府之态度，当亦能随之改变。然而今日之美国执政者，终未易言此，于是法国最后之议案与其坚决之表示，遂终不得不出于裁兵委员会中。白里安之声明有云：

“吾可使吾之军队成至百分之三十三，以当君等减少队至百分之一，即此已足为法兰西对于此次会议之问题，甚欲使其完全而又绝对的实现。且吾犹有一同样意义之愿为诸君告者，即设使诸君必立一特别委员会以研究其效力，则吾将不复代表于此，诸君可自力讨论于法兰西缺席之时。然此外亦有一法，足以使吾法政府接受履行裁减军额之议，即君等当求得一同盟与保护之条文于吾人也，使君等果有此种提议，则吾法兰西当倾耳以听。”

此外法政府对于裁减海军之主张，本非重要之国，初无足动世人之听闻。惟自会议开幕后，既遭美政府之冷淡，复受英人之讥刺，遂忍无可忍，别开生面，于保持陆军巨大军额外，又有海军吨数之声明。其主张乃以主要战舰与日本同其比例；而潜航艇则以英国为其比例。此论一出，不仅英美讶其要求无厌，即日代表亦疑其有临日本而上之野心，法目前海军之劲敌为意，意代表因亦有海军吨数与法相埒之要求，是英美日之海军问题未决，而又益之以法意之相搅，解决声中又多一层困难矣。

捕获沙丁之谗语

法国之海军吨数比例案提出后，英美舆论多讶为意外，而英国舆论尤多下攻击之论调。于是白里安氏于其去华盛顿之前一日，复为此事有所宣言曰：当不列颠国欲保留其主要战舰至五十万吨时，吾固不能言此为对法用也，英吉利固有美利坚为友，而日本为其同盟，且又当俄德无海军舰队之时，假使英人愿用其主要战舰以捕获沙丁（鱼名），则吾人当用此潜航艇以研究海底植物，否则英国殆为反对一未知数之 X，以留此为保护者，则吾法国亦当以此为保护而反对 X。主要战舰值钱甚巨，彼等当为其富者，潜航艇需费不多，吾人乃为其贫者，英国极愿毁减潜航艇，吾人殊不能赞成，若英国愿毁弃主

要战舰，则吾人当立予以同意。

此一段话，完全为针对英人而发。盖法国之海军计划，重在增筑潜航艇，此英人大不愿者。美国务卿休士规定潜航艇为八万吨之提议，英国犹嫌其多，岂能愿法人亦增至此数？英国于大战中，备受德国潜航艇之苦，致其巨大军舰多无用武之地。而各洲商业上之联络，亦因之蒙极大之损失。今德舰消灭，各国潜航艇又建造不多，乘此裁减军备之机，一举而毁弃之，乃其大愿。惟所难望实现者，乃美日之观念不同，潜航艇之功用，于英虽为害多而利少，于美日之对待，则颇具效力于太平洋上。因此英国极力主张减少其吨数，而美国则持之甚坚，不稍退让。法国睹其利，乃以八万吨之同样比例请。此举不仅显示与英国为难，且就英人眼光观来，直谓法人有防英之嫌。其主要着眼点，乃谓德俄已无舰队，法人筑此潜航艇果将何用，非对英而谁归？此论在英国几乎一致承认，普通报纸多著论相诘，偶有三四表面表示联法之报纸，尚能为法之原谅。因此英国文学家威尔斯之华府通信，遂为英伦巴黎两《每日邮报》停止登载。盖威氏攻击法人处，过嫌激烈，亦可谓过嫌率直，颇妨其报纸之营业也。

英人谓法为对英，而在法人自解，则谓法人亦非无悔权须保护者。以地中海情势论，北非与小亚细亚在在足以引起争端，使无巨大海军力以镇慑之，法国属地之前途殊甚危险。法人此言，自亦实情。惟地中海之风云，又岂仅一法国属地之危险？其所关联者，法希问题也，法土问题也，法意问题也，何一不足以激动风云。今法土交绥矣，法希之关系当更恶。法意于地中海亦非能相安者，法意两国代表且公然指出之。彼此相忌相防如是，然则法国之不能忘情于海军力之增长也可知。惟必谓法国此举，一无防英用意，则地中海之最大势力范围，果为谁属？法意希之争，断不能逃于英法关系以外，而近者意国联英政策，又日进不已，此亦足使法人生惧者。

总之，欧事乱如麻，各国除自身外，其彼此相交相攻之点，迄无一定。吾人欲于其中，必寻出防御联络所向之迹，则舍德法世仇，可以略明其对待方法，他均不易言也。英法今日之不谐，已彰彰明甚，然一旦苟有变动，仍可复为大战中亲密之联络，此亦可敢断言者，惟今日尚非其时耳。

英外相之愤言

白里安氏在美既因极力表白法国所持之态度，敌对于英人之讥消与攻击，遂不能不有所回报。而同时与此回报作响应者，则有英外相克寇松[1]之演说。寇氏于本月二十四日在伦敦联合监护会午餐席上发表其个人政见，中有云：

设使吾人熟视此陆上巨大军额之堆积支持如故，则海上裁减军备之事将归无用。一种公例，必不当仅使一国实则，虽多至两三国，当使各国按其地位与能力为比例，以追随公例之下，此决不应仅使大下列颠接受允许为此牺牲，而他人之逸去。设使吾人真愿裁减吾人之海军力者，则亦当永无其他国家可以被允许以建筑其他攻人之机械于空中海厂，因此种机械足以使吾人之牺牲为无效，尤足以远离人当世立法之自豪地位，而予吾人以蒙有冒险之危境。

况此海峡，吾人伟大同盟国之实力与其保御，实当包有一种情状，即世界之良知与世界之联合实力。……吾人应引德意志人为国际场中之平和人员，假使诸强亦已结合，尤无强迫此条约，但求廓清此报复政策不再为彼等所默认，则彼

等之助此德意志以偿付其赔额者，必克表示其真实与用。大不列颠与法兰西、意大利之互相团结，固已如其矣，吾尤愿此结束之长存。

寇氏此言，虽非纯官式，但彼以外交要人发此议论，是知英政府对法国裁兵意见。已明示极端之不满意矣。

白里安氏之回声

英外相之言既出，好事之新闻记者，乃持以叩诸白里安氏，渠将作如何回答。时白氏已由华盛顿之纽约，其答此问之言曰：吾将无所回答于寇松氏之演说，因吾固未获得寇氏演说之正式全文也，此为外交官慎重发言之惯技。白氏盖鉴于前此因上西里西亚问题与劳合乔治一场舌战之不利，故不复再以恶声反报矣。同时波又声言曰：吾终坚吾信心于贝尔福氏在最近华府公开会议时之声言，彼因与其他代表同为坚决之承认，知法兰西之地位其所需以保护其安全者为例外，吾英国诸友应知实在情形。德国舰队已沉海底，而七百万之德意志军士，固仍得复生而现其效用也。此数语反诘，亦颇饶趣味。当二十一日白氏演说之后，贝尔福氏因曾声言英代表对法国之苦衷，实抱无限同情。而英伦方面，竟于数日后出以反对之论调，是英政府中各人之政见不和邪，抑外交家欲擒故纵之惯技邪？证以数日间之情形，乃知当日贝厌之言，实出于应酬，且事出仓猝，事前既无磋商，乃不得不以空洞不着实际之语慰法人也。至寇氏于英伦之言，殆有所为而发，其言一出，法国舆论界为之哄传，而英代表之在华府会议中者，其态度亦骤变。此关于英法之外交策略者至大。法总理虽以未得寇氏演说之正式全文为辞，不发表若何批评，然其声言中，所谓德国舰队已沉海底之言，固已明明洁英人保留主要战舰究作何用矣。于此英人或亦不难答曰，吾人之保有主要战舰，盖为保护吾人之商业用者，非若法国之保留增筑潜航艇，舍战事外殆一无用处。此议英国报纸已有持之者，英伦《星期日时报》即持此论以攻击白氏，两国舌战笔战同时开场矣。舌战因外交作用故，或小试其锋便止。今白里安氏已在道中俟其归来后之第一声，便知今后两国于华府会议中所取之态度究何若矣。至笔战情形，则英国报纸除少数保守联法政策者不事攻击外，其他报纸殆无不认法政府之恐德系根于军国热狂者。法国舆论则除作恶声回报外，多为其自己解说，然亦有攻击政府政策之不当者，是又属之于社会主义者所为矣。两国关系之究竟如何，亦决非此次华府会议中所能解决、所能确定，是则又由其数百年来之历史关系，有以养成此若即若离之情状也。

注释

[1]寇松（一八五九～一九二五），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年任外文大臣，曾参加策划武装干涉苏俄。

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

(一九二二年)

世界革命的钟声自从在北欧之野响起来后，到现在整是五个年头了。在这五年中，俄罗斯无产阶级努力创始的功绩和孤军转战的精神很值得我们予以极大之注意。现在我们当这五周年纪念声里，特将往事追论一番，此盖不仅能使我们知而生敬，且更将闻风兴起，好来完成这世界革命的伟大工程。

十月革命的使命

在过去历史中，革命的事件本屡见不一，最大的如法兰西革命，美利坚独立，也颇能震动一时，各有其历史上的相当价值，但一持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较，则广狭远暂的不同，又不难立见。前二者革命的范围只限于谋各个民族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后者便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身来了。有产阶级的革命，他对内要推倒封建制度或君主独裁政治而建立民主主义的代议政治，垄断资本，运用工业革命后的科学能力来图私利；对外实行侵略的政策，以维持其本阶级在国际间的优越地位。如此情形，支持了一百多年，现已算人到他的崩溃期了，过去四年多的大战，近四年的世界破烂情形，便是他的实证。恰巧在这期中，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便应时而起，这个革命所负的使命整个与民主革命相反，在历史上只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共治团能取来与他相比，只是巴黎共治团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了。再，十月革命之所以能与旧日革命相异的，乃因其立足之点在于全般的社会革命，而非仅限于一国一种一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起首，本含有阶级争斗重大意义，且因其发动于一种民族，故国力的运用，也并不不可缺少，但他的革命进程，却决不以此自封，且不得以自封。共产社会完全实现时，人人都是无产者，还有什么阶级界限可说？世界革命完成时，全世界的无产者都联合起来，他们还要什么国和政府？这样子一个革命，经济和政治革命实做了全社会革命的先锋两翼，除掉无产阶级外，谁能担当起来！俄罗斯十月革命实在是负有重大使命。不过他才做得世界革命的起首罢了！季诺维也夫[1]说得好：“在俄国并不是一个共和问题，只是一个革命问题。”“俄罗斯革命的不朽之功事实上在他为世界革命的起首啊！”

革命的原因与其成功之道

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这本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尝召示我们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先有三月革命[2]，此两个革命的来源甚远，从产业观点上看来，十九世纪的农奴制和其后的地主制，与工业发达后的生产力变化和外资竞人有极大关系。其在阶级观点上，则俄国历来的政权都只是操于俄皇和贵族高僧之手；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除掉依附权贵，阿其所好外，很少能崛起自组成一雄

厚的有产阶级以与俄皇贵族对抗的。农民虽是占全俄人民的最大多数，但他们因产业情势和大地主的压迫终不能有什么组织，不过他们反抗地主的心却总是烈的。至劳动阶级则自工业盛兴以来，他们的组织和活动能力，的确是日见进步，外方更加以俄皇专制的压力与们以种种练习反抗的机会，他们的战斗力遂益加伟大，终成为俄国各阶级中的最强阶级了。此两点既明，我们再归论到革命近因，则俄皇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三年大战实与以直接影响。俄皇室的亲德嫌疑，在民族间的憎恶性又适足以增其助力，三月革命本此遂抢得民主革命的一时胜利。惟是另一方考之实际，当俄皇尚未宣告退位之时，彼得格勒实已有劳兵苏维埃的兴起，继之者为莫斯科苏维埃，三月革命告成后，各地苏维埃蜂起，于四月中旬便开成全俄苏维埃会议，自是革命临时政府的举动乃常为苏维埃的向背所转移了。五月初皇冠城苏维埃宣言承认临时政府，克伦斯基[3]遂据之人阁而为陆长。其后，叶喀德琳堡苏维埃开始反对战争，农民会议赞助苏维埃、皇冠城苏维埃亦继起不服从临时政府，民主革命的根基乃见动摇。至七月，彼得格勒的工兵先后声言“政权归苏维埃”，形势更见紧迫，克伦斯基显出他的反革命本领，捕获些多数派的首领，镇压一时空气，更改组了内阁，他改坐在第一把交椅之上。但这种情势终是不稳的，接着便是莫斯科工人为反抗民治会议而罢工，九月中彼得格勒苏维埃更接受了多数派抢夺政权的动议，黑海舰队继着有同样的主张，至十月北方劳兵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又相继响应，最后乃由彼得格勒兵工发动，于是政权终归苏埃了。

这种劳动阶级组织和活动的发展情势，与农民兵士赞助之功，在三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中间我们既已找出如许痕迹，惟其成功之因，尚不止此，尚有更远的肇端可说。在一九一五年的俄国革命中盛你的赤星期日便是俄都造船工人的血染成的，同时接着起的各地骚扰，造船所的破坏，彼得格勒等城和波兰诸市的兵工血战，巴库煤油矿工的大规模同盟罢工，十月底八十万铁路邮电工人的大罢工，十月立宪令发布后的普选运动，殆没有一事不是劳动阶级为之主的，且苏维埃的制度，也是彼时创生的，兵工联立的情势也由那次黑海舰队的变动而立其始基。彼时革命骚扰，差不多延长到一年之久，事虽未成，但其与人心上的刺激和旧势力的打击，已给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暗伏下不少助力了，其中自更以无产阶级所得之教训为最大。总这十三年前后三番革命的因果关系来看，我们当知俄国革命中含的阶级争斗意义至为明显了，且每次革命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农兵从旁赞助，而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无真实力量又无团结训练，以致宪运动民主革命均无建树，国力政权终落到无产阶级手里，使十月革命独著其功勋了。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学说

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世人尝说共产革命不先出现于工业发达的英美，而首见于俄国，乃是马克思学说上所未曾料到的事；但这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的话，也可说人还未懂得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两说打成一片来看。一般工业发达的国家，他的资本制度已不能再与生产力适合，崩坏之期本已很近，但是他国中一般有自觉性有组织力的有产阶级却不甘束手待毙，他必要千方百计来救济这个恐慌，过得一时算一时。他方，无产阶级在这决战期中，困于种种情势，一时也还未能取胜，然而这决不是无胜之可望，只是暂时的

相持不下。俄罗斯虽是个工业后进国，惟他生产状况的变动已不复能与君主独裁、地主专横的制度相适合，于是乃必然地需要一个革命。恰巧应这革命而起的阶级，只有劳动者是富有阶级斗争性较有训练的战士，他们眼看着这资本战争的惨祸从恐惧的自觉中，乃终能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超过了欧美先进国中兄弟们向来成就的纪录。但这样，不过仅是一个革命的起首。我们当知工业发达之国的共产革命虽难，革命之期实短，半开化之国则革命易而革命期长，换句话解说，便是：共产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这话却不是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我们一方也当知道在共产革命期中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万万；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且一方也不当忽视易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易于握得政权的时机，因此才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

十月革命中的一个忠实的指导者

十月革命成功之因已如前述了，但我们还当追想下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俄罗斯的劳动阶级中也实只有共产党称得起他的忠党，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当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立宪党人也多是运动中的参与者，但等到俄皇《十月敕令》下了之后，他们便都弃了劳动阶级，眼巴已等着次年的国民议会召集了。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成了功后，社会民主党和少数派又复卖尽劳动阶级，大踏步地走入联合内阁，讲起民主共和来了。剩下来的只有多数派他始终是百折不挠，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他自己的利益，一九一五年，他的党员也多参加在运动中，托洛茨基[4]且做了一时的劳兵会长，惜因人少势弱，终归失败。他们饱受了这种经验，加以十余年亡命国外时的奔走，三月革命一来，他们便极力注意到劳动阶级的指导和苏维埃制度的运用上头。革命初起时，各地苏维埃内部政党派分子还很复杂，四月中列宁初归，便向社会民主党提出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以清党略。自此后，各地苏维埃的会议中，遂渐渐增加了多数派从中指导的分子，最显著的例是七月一日彼得格勒工人示威运动中所发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那确为多数派取得胜利的象征。这个口号且立时传遍了全俄，克伦斯基着了忙，竟诬多数派为德探机关，赶走了列宁，擒获了托洛茨基及其他党员。但这种压迫终无效果。九月十六日托洛茨基出狱，次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便接受了多数派《抢夺政权》的动议，因是执行委员会辞了职，再选举，多数派变成多数，他开始宣布“抢夺政权”的时候已经来到。接着，列宁、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赴民治会议的代表，要求政权归诸苏维埃。十月俄都市政选举，多数派又获多数，托洛茨基做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长。从此，革命的酝酿日熟，各地苏维埃的响应也均以多数派之动议是从；最后红旗一挥，无产阶级专政之局开始，多数派忠实指导的功勋乃得大白于世，十月革命遂得在历史上建了不朽之功了。

注释

[1]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一九一一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俄国二月革命后参加编辑《真理报》、《无产者报》和《工人报》。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一九一九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四年列宁病逝后，与加米涅夫结成“新反对派”，一九二六年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同年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亦免除其职务。一九二六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四年被捕，一九三六年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季诺维也夫恢复名誉。

[2]二月革命发生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今通称为俄国二月革命。

[3]克伦斯基（一八八一～一九七二），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加入社会革命党，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起任第二届临时政府总理，九月起兼俄军最高总司令。执政期间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利益，对内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时，化装逃出首都，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一八年亡命法国。一九四〇年起定居美国。

[4]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一九一二年联络过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在战争、和平以及革命等基本问题上以“左”的立场反对列宁的正确方针政策。一九二三年秋集结同伙，提出反对派纲领，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和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清除出党。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

——质工余社三泊君

(一九二二年)

在九月号的《工余》上有三泊君一文，名《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此文题及其内容颇能惑昧于俄事之人于一时，本志对此似不可不一加驳论。

在三泊君文题中最足感人的便是“俄国共产主义失败”八字。俄国自从革命后直到今日纯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讨生活，这谁也不能否认。取例来说，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废除遗产制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的恶制，……凡此种种，全是过去五年中俄罗斯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活动换得来的。因此活动，所以才引起内部皇党、有产阶级、自私的农人的反革命结合和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行为。并且他们更互相勾结起，继续不断地来图捣乱，而各国的无产阶级又因困于情势，都按兵不动，于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遂不得不独自地持续下去了。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世界革命呢！我们若因要急观事的成效，便忘掉革命的时效，或更忽视了四周反革命的空气，则只能怪我们性急，若硬加俄国以“共产主义失败”之言是不当的。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斗争的根本见地来理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我们应知俄国现正在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期中，换言之，便是正处在共产革命期中。

在革命期中，最初建设是要少于破坏的，五年来苏俄的努力多一半是用在铲除旧毒，内防叛乱，外拒强敌的工作上头。我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俄罗斯五年革命的记录，则知他们并不是不图建设的，也不是没有建设的，只是旧势力的反动迫得他们不得不在破坏上多下功夫。且他们从事破坏，又岂无意义？扫除了旧的障碍，新的制度方得逐渐实施。未来共产社会的实现，须要有共产制度为他做保障，俄国无产阶级今日的努力，乃正因要立此保障之基，所以他们的破坏才非盲目。

明乎此，乃知三泊君“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一言，是极不合于事实的闲话。

三泊君既错立了题目，因是他开宗明义第一句便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为“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佐证，这真太背事理。俄国之施行新经济政策，其在事的根据上实有极重要的来源可说。1.俄国在革命前工农业上的生产机关和工具都大腐败。2.大战发生后，生产运输机关的破坏和壮丁的损失更是直接地增加经济恐慌。3.十月革命过后反革命派的骚扰，一方既使大战中的情状愈加延长，一方更使无产阶级无暇修补此危急的灾害。4.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所与的压迫。5.落后工人在工作纪律上的怠弛。6.政府因经济的恐慌，无法供给农民以工业品。7.无知识而只图私利的农民不仅不肯供给于并且还因受反革命派的煽动要图反抗。总此诸因，生产状况遂呈现出一个

极大的不稳，最后且更激出皇冠城和唐波省的农民军暴动，于是新经济政策乃在这种事实的要求上势所必至地产生出来。

事实是不可侮了，我们且再转向理的根据方面来看。在新经济政策中最受世人非难的要算是重建私人小工商业一事。他们常爱以废除私有制一义来反证俄国今日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其实他们却未尝明白俄国今日尚是在共产革命期中，离着共产制度的全部建设尚属很远。私人小工商业的恢复在共产社会中自然是不容留，容留了便是还没到共产社会，但在共产革命过渡期中，遇到此种情形却不足为惧。新近英报访员兰沙未曾问列宁，说有了这般小商人，他们不将觊觎政权么？并且买卖交换的利大，握在商人手中，国家多管些无利的事件，此无论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见地上，全可看出有后退之虞。列宁回答他的大意是说这些小商人犹之伦敦市上的小贩，买卖虽然极好，究离着政治很远。若说他们利大，则未免忘了俄国尚是个农业之国。本年政府收入，粮税乃为大宗，农业丰收，更影响到卢布价格近来的安定。轻便工业已多振兴，国家银行近又有余裕可计，行将用他来振兴机械工业。这样情形，不仅从资本主义见地看来可以乐观，便是从共产主义见地看来，也可抱同样乐观，因为现在俄国的政权固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啊！后退是不可能了，俄国今日已决不能走向“封建专政”之局，他只是要以国家资本主义来领路好走向共产主义（兰、列两人的问答，全文见曼彻斯特卫报十一月二十二日份）。列宁此言很可指明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决不会妨害共产革命进行的。并且就一年多实施的效果看，也的确可以增加无产阶级国家的财富。在政策中征收农民粮税是与农民自种其地据为己有相呼应的，若农业共治园之以产业归公，则其组织自与国有的工场相同无所用其粮税了。对外通商，是现状所必须，且大权握在苏维埃政府之手，更无所恐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诱惑，热那亚[1]和海牙[2]两会议的结果与乌尔圭哈突[3]对英商约的延签，不己明示我们了么？

以上的事理我们皆根据于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革命的可能性而来断定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三泊君所的“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佐证。且不但不能为其佐证，我们更信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三泊君也肯研究此事实上？

上述两点既明，三泊君文中一切论点遂多失了根据，其所谓乐观派的话，我们既可置诸不论，便是悲观派之言，也多受了各国有产阶级蒙蔽、社会党人欺骗而后发出来的“杞优”，其实俄国今日的劳动阶级岂真是“除了换过几个统治者外实际上一无所获”么！凡稍注意俄事的人，当皆知其谬！

三泊君闻也是赞成阶级争斗的人，严格说来，既赞成阶级争斗，则因缘而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专政期中一切必然的设施，有何可以反对呢？除非他是站在“有智识的人仍然多属于资本阶级”的地位来说话。

三泊君所最批难俄事之点是“中央集权”与“产业国有”。中央集权为无产阶级革命期中所必不能免的事实，这是凡稍懂革命战略的人都知道的。且全俄苏维埃所集的是什么权；各邦苏维埃所分的又是什么权，我们若不加以实在考察细心地研究，便笼统地以“集权”二字来反对，亦嫌未当。至说权力集中是多数党争权的结果，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尤属武断。多数党当三月革命方发生后，便力嚷“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十月革命是全俄苏维埃应着这个口号而起的，要说争权，便是俄国无产阶级来与有产阶级争权，要说无政府党、社会革命左党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退出联合，那是他们昧于

阶级争斗之义，却怪不得多数党。

“产业国有”是生产集中的必然现象，俄国这几年的经济恐慌正因为他生产运输机关的集中还未作到十分好处，不是因为他不能碎分产业而生出的反动结果，此就经济现象与原理看来，都能证其无误。依三泊君意，总以“饥则耕而食，寒则织而衣，劳则筑而居”的自由境界与产业国有相反，此话说来何尝不好听，其实就生产趋向说，历史是不重复的，如要硬来碎分生产机关，返之上古部落生活状况，则因实质的条件难合，必要引起更大的经济恐慌。如此人必有不得食，不得衣，不得居的了，更何从言其自由！

注释

[1]热那亚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五月十九日在意大利召开的讨论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德、意、苏俄、波、法、日等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苏俄代表团列宁为团长（后未出席）、契切林为副团长。会上，资本主义列强提出了旨在苏俄恢复资本主义并进而变苏俄为殖民地的备忘录。苏俄代表坚决拒绝了帝国主义者的无理要求，并要求西方列强赔偿因武装干涉和封锁苏维埃国家带来的损失。会上未达成任何协议，只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查，苏俄通过这次会议第一次登上国际外交舞台，并成功地利用协约国与德国的矛盾结束了外交孤立的局面，扩大了国际影响，打开厂同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新局面。[2]海牙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九日在荷兰海牙召的国际会议，是热那亚会议的继续。有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主要由工商界代表和专家组成。苏俄代表团团长是李维诺夫。会上，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拒绝了苏俄代表关于建立国际合作的一切建议以及向苏俄贷款的问题，他们坚持要苏俄政府偿还沙皇政府的债务和归还已被没收的外国企业与财产。苏俄代表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最后，会议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比利时代表的一项建议，即禁止各国代表同苏俄进行谈判和签订协定，于是会议失败。

[3]乌尔圭哈突，也译作乌尔卡尔特，是当年参加海牙会议英国代表团中曾任十月革命前开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富源的俄亚银行经理处经理的大企业主，他在海牙会议上投票赞成禁止与苏维埃俄国签订个别双边协定的协议，而另一方面却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九日在柏林商妥了关于乌拉尔和连那金矿的承租权。苏维埃政府鉴于英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所采取的敌对政策，没有批准这个协定。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北洋军阀[1]的势力在中国历史上已占有二十多年纵的地位。近数年来，吴佩孚[2]更以北洋正统为号召，打倒段祺瑞[3]，赶走张作霖[4]，傀儡一阵黎元洪[5]，然后以先宪后选的手段拥曹锟[6]进了三海。他自己也随即正位直鲁豫巡阅使。吴秀才这样一气呵成的北洋正统之争，浩浩荡荡地南征北伐四五年，似乎北洋派正统横的地盘又可继袁世凯[7]之后而更行扩张了。但这不过是吴秀才一种梦想吧！我们且先看看曹锟窃取总统、吴佩孚作了“传统长子”后祸国殃民的成绩：一、曹锟贿赂猪仔议员用了一千三百多万元资本。这笔大选费的来路是，王承斌从直隶各县摊款，金丹罚款[8]，直隶省公债二百万元，预征直省地丁二百万元和并径矿务局向外国银行抵借现款九百万元等项中支出的。

二、曹锟为要博得列强的欢心，列强也以交换觐见为名，于是临城案[9]的通牒北京伪政府全部承认了。

三、曹锟的总统本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一手造成的。伪政府深恐日本吃醋，竟于曹锟登台旬日之间承认了日商擅发的俄发债票利息和参战借款的转期。

四、威海卫退还交涉经山东人民再四奋争，而结果洋奴顾维钧[10]回答山东人民的批示竟说：“……归还威海卫系属英国善意，故无条件交还，自难强英人以必从。”于是威海卫又继青岛而去了。

五、吴佩孚为要贯彻他的武力统一迷梦，不借指使北政府卖国以快己意。美国军舰助赵恒惕[11]在长沙示威，日本宜阳丸替吴佩孚运军火入川，北政府暗示外舰占据粤海关。这全是此事铁证。

六、王克敏[12]为要替曹家政府买好于法国，竟收买报纸三十家，以图金法郎案[13]得于暗中恢复。

七、直军人川入湘，孙传芳[14]攻入浙境，陈炯明[15]、沈鸿英[16]在广东骚扰，山西阎锡山[17]将受直派的排挤，这全是吴大将军殖兵政策的德政。

八、外交系以孙宝琦[18]老板作幌子的卖国内阁于本年一月中组成了。开台第一出戏便是顾维钧演。他的拿手好戏卖了三条铁路——山东的烟潍，直隶的津赤和沧石——给英国财团借英金二千万镑，成为袁世凯后的第一次大借款（事载《工人旬报》三十七期）。

够了，够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强盗洋奴，我们若不将他们赶走净尽，无法无天的罪恶将更从此层出不穷了。

* * *

是的，但赶走他们是反直派诸人们能胜任的么？我们知道黎元洪为要过足总统瘾而南下，于是托庇日人，勾结政学会，接近唐绍仪[19]，收买议员甫下。但结果竟因金钱势力远不及曹吴，弄成买空卖空的僵局，而自己也不得不跑到日本去藏拙。次之，皖系奉系都只为日本受了九月一日地震的影

响，不能尽力助段祺瑞、张作霖的响械，于是马厂誓师[20]的活戏乃不得不于曹锟贿选成功后演出。虽说现在浙卢沪何有蠢然欲动之势，但孙传芳若不逼之于南，齐燮元[21]若不以漱沪警察厅长事逼何丰林[22]，则老奸巨滑的卢永祥[23]决不会点起反直之师。再次，则四川的熊但、滇唐、贵刘[24]都在自顾不暇，而且更是不足与谋之人。总之，这一干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反直运动，不但一时不是曹吴对手，而且即使真能倒曹倒吴，他们又何尝不可继续曹吴的卖国工作，这种循环的军阀祸国之局，真将我们教训够了！

* * *

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可恃者，能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而现时中国国民党[25]实在领袖此国民革命群众的地位上。我们试看年来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在广东奋斗的经过，便知全中国中真能集实力与北洋军阀抗争的实仅此一支孤军。假使陈炯明不几次阻挠北伐，现时南方革命势力至少也可伸张到长江南北。即就最近说，曹锟贿选成后，孙中山方将举兵北伐，陈炯明又出死力将中山困住。虽近报广州已转危为安，陈军已败退下去，但死灰尚可复燃，况甘心从贼媚外的陈炯明后方又有英政府、吴秀才作靠山，前途的胜负亦正未可预料，然而孤军转战的孙中山却已疲于奔命了，负有革命使命的国民，果忍长此作壁上观么？

* * *

不，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

第一，全国有觉悟的工人，自从京汉路流血后，大都看透了北方军阀和外国强盗的恶毒，表同情于革命派国民党的日见其多，因为他们深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得到南方政府助力不少。

第二，自曹锟图谋总统开始，全国学生总会即通电否认北京国会政府，并请孙中山指日北伐。及曹锟贿选告成，安徽学生对猪仔议员首先激起了群众的惩戒运动。

第三，中国农民本来是最称驯良的，但近因迫于军阀的祸害，亦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上年广东海丰农民因飓风大水为灾要求地主减租，田主竟勾结陈家军捕去农会职员二十五人，遂激起十余万农民的反抗运动。又湖南衡山的岳北农会已拥有会员四万余人复能四出宣传，颇引起地主的极大恐慌。这两桩事实全是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

第四，《向导》报载：“最近山东省政府强迫征收产销税，税则之苛及于青菜大蒜，于是激起沿胶济路十余县人民剧烈的反抗，全体罢市，殴毙税吏，拒绝官厅，结果停止征收才没有酿成大变。”其后“山东好商丁敬臣以三百万元运动包办青岛一带盐田，与日人狼狈为奸，事为盐户侦悉，即起反抗。”又有“吕某在山东财政厅承揽山果税，遂引起历城、长清、滕县、南山……等处山果商贩之反对，以性命力孤注阻止征税之进行。”及年底十二月，山东滋阳、泰安、宁阳等七县花生商人又因财政厅私委省议员王某包办津浦路济南段的花生税，举行全体罢市，反对增长印花税价。这几件事一方面足以证明列强欺凌、军阀压迫最甚的山东商人已涌起革命潮了，他方面也实足与全国商人一个团结反抗的暗示。

好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注释

[1]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〇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八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力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

[2]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二九），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反对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时，曾以“爱国军人”姿态，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九二〇年联合奉系推翻段祺瑞政府，随后曾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一九二二年将奉系逐出关外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军击溃。

[3]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安徽合肥人，一八九六年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江北提督等职，一九一〇～一九一六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和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国务总理把持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〇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一九二四年直系政权垮台，段被奉系及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

[4]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北洋奉系军阀首领。辽宁海城人。一九一六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打败直系军阀后，他的势力伸入关内。一九二六年又联系直系军阀吴佩孚人据北京。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退回东北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5]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曾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篡政后，又伙同袁镇压革命。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议院，他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一九二二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

[6]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北洋直系军阀首领。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吴佩孚同为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二三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囚禁，后直奉两系联合，获释。

[7]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卖国。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称帝，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

而死。

[8]一九二三年曹锟公开贿选总统工作逐步展开，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二十余人，分赴各地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九的制毒犯百余入，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

[9]临城案指临城劫车案。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夜，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今枣庄）至沙沟站抢劫由浦口开往天津的客车，将车上行李财物悉数枪去后，把二百余名旅客（内二十六名外国人）虏至峰县（今枣庄）抱犊崮，作为“肉票”。帝国主义乘机对北洋政府进行要挟，扬言出兵干涉和“共管中国”。曹锟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节谢罪，允许外国人干涉中国路政，并将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袁州镇守使何峰珏革职查办，收编匪兵而“和平”解决。

[10]顾维钧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公使，也是参加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11]赵恒惕，湖南湘潭人。清举人。曾肄业武备学堂，继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一九一六年任湖南第一师师长，不久任湖南水陆军总司令。一九二一年任湖南省长。一九二三年前后，镇压湖南地区农民运动，破坏农会。

[12]王克敏（一八七三～一九四五），浙江杭县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历任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等职。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后又两度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畏罪服毒自杀。

[13]一九二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一两白银。欧战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暴跌，纸币一法郎只值现金三分之一。按一九二五年换文规定的赔款偿付方法，中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偿付法国之庚款。但是，法帝国主义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法国根本没有金法郎这种货币，如果按照金法郎偿付，中国将损失关银六千二百多万两。紧随着法国之后，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照会，要求各国赔款一律按硬金计算。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压力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曹锟任命与金法郎案有密切关系的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打算秘密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由于全国人民和“反直同盟”再接再厉地发出反直的呼声，曹锟不敢一意孤行。此后，北京当权人物再也没有人敢于出面来主张承认金法郎案了。

[14]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爆后，驱逐了皖系卢永祥，任浙江军务善后督理兼闽浙巡阅使。一九二五年又起兵驱逐了苏皖等地奉系势力，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后期最大的军阀。一九二六年镇压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同年冬其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被北伐军打垮，后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安国军第一军团长，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渡江反扑，在南京龙潭被国民党军打败。一九三五年在天津被刺死。

[15]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广东军阀。广东海丰人，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一九一七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三年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东江。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16]沈鸿英（一八七四～一九三八），佳系主力之一。广西雒容（今鹿寨人）。一九二一年乘孙中山讨伐陆廷荣之机，宣布自治，所部称“救桂军”，欲取陆廷荣而代之。阴谋败露后，退入湖南，投靠吴佩孚。一九二三年逐走陈炯明后，再次背叛孙中山，

进攻广州大元帅府，一九二四年二月彼击败请降，率残部返佳。

[17]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山西五台人。辛亥革命时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盘踞山西，依违于北洋军阀皖、直、奉三系之间，投机自保。九一从事变后，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阻挠中国工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参加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一九六〇年死于台湾。

[18]孙宝琦（一八六七～一九三一），浙江杭州人，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三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年阁的外文总长，一度兼任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一月任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19]唐绍仪（一八六〇～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辛亥革命时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国务总理，六月辞职。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一九一九年任护法军政府代表，与北洋军阀政府代表朱启铃在上海议和。此后任国民党政府的国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长，一九三八年上海被刺死。

[20]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入京解散国会，驱走总统黎元洪，拥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段祺瑞借助全国人民反复辟的声势，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三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十二日讨伐军五万余人沿京津、京汉两路分兵进攻北京，张勋兵败。段以“再造民国”的“功臣”，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重掌政权。

[21]齐燮元（一八六九～一九四六），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获胜。同年因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被北洋军阀政府免职，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敌，配合日军“扫荡”，残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被捕，一九四六年枪决。

[22]何丰林，山东平阴人。原为袁世凯新军教练官，一九二三年任浙江宁台镇守使。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战争爆发，任浙沪联军第一军司令。一九三五年左右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首席参议。

[23]卢永祥（一八六七～一九三三），山东济阳人。原系曹锟旧部，后投靠段祺瑞，成为皖系干将之一，曾任北洋军师长和淞沪护军使。一九一九年任浙江督军，一九二二年标榜“废督裁军”，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一九二四年因争夺上海地盘与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江浙战争），兵败下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上台，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借奉系军力逐走齐燮元，占据江苏，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

[24]这里指的是西南军阀，即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刘显世。

[25]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一九一四年，为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变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革命救国论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国的界限，自从各民族间开始商业交通后，各个统治阶级，遂都用它作成对内号召统一、对外兼并他国的武器。及资本主义勃兴，各国的资产阶级更是挟其方兴之势，运用这个武器——国——对内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和革命，对外抵御强敌并凌辱那产业未曾发达的各弱小民族。于是，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

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至被压迫阶级即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且在他们中间，以经济地位论，不说无产阶级，便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也都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故，迟早都要走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所以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若是看明白了此事，正宜速行运用这个国的利器来攻打敌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压迫阶级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而不分国界的一样，而且当着他们自己引起不可免的国际战争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日子便到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民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前者的例子是土耳其[1]，后者便是俄罗斯。而俄、土在土耳其国民运动中的相互关系，更足证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的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 * *

至我们中国呢，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在其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间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

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讎。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地一无忌惮！要不是清廷昏庸，庚子之变[2]何致损失如斯之巨！袁世凯[3]若不急图帝制，“二十一条”[4]何致签成！段祺瑞[5]苟非志在卖国，中国人民的肩上何致压上一笔巨大的参战借款！曹锟[6]、吴佩孚[7]若不是一志

在总统，一志在武力统一维持什么北洋正统，又何致开门揖盗，自华盛顿会议[8]席上迎来些自家承认的太上政府！陈炯明[9]果非志在排斥国民革命领袖，又何致勾结英国香港政府，延长广东内部的战祸至今未熄！有了这一干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洋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于是卖国的勾当乃越发做得兴旺，而帝国主义的列强亦遂特加他们以青睐。有时几个帝国主义者吃起醋来，或是几个军阀恃宠而骄，于是军阀相互间的战争，乃遂在列强的嗔笑中一来一往，而中国人民遂匍伏在枪弹底下讨生活了。总之，他们的罪恶祸害是数不尽的，我们只要认清这全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我们便能找到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且相信，他们进攻我们——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我们既做国民运动，我们必须先认清国民革命的势力，然后才能有团结之可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辛亥革命[10]又曾将共和招牌挂张起来，但我们如要从中找出一派可靠的革命势力，则我们相信只有海外华侨可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只有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为最早，故他们希望一个必须保护侨民的民治国来做他们海外发展的后援，乃属当然的需要。无论入保皇党[11]或同盟会[12]，其心理上的希望皆属一样，不过清廷政治的教训使他们倾向革命的心易于胜过改良的错误观念就是了。第二派革命势力直至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时起，始渐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涌出，一年多的膨胀，至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工人大流血后，北方的劳动势力，虽稍受一时挫折，但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三派中国的知识界，自从五四运动[13]后，顿呈活气，中间虽因受新文化运动中的恶影响消沉了两三年，但近一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第四派便是新兴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论，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虽说是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除非他们甘于卖国，甘与外人合办。但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也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了，自己也知要起来过问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好的现象。而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人救国的革命队中。第五派革命势力现在方在酝酿期中，这便是庞大的农民阶级。农民的势力果成与否，全视努力之人多寡为断；至农民本身，国际强盗之为害，他们或还感觉较少，但军阀的祸国殃民，他们已是确信无上述的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14]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过去它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十二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

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所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申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15]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最后，我们要说道，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

斯。这些，我们是要与他们以统一前敌的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们国民革命成功的。

* * *

如此，我们才不致染上旧日列强所运用的国的武器的祸害，而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了新的意义，人类历史上展开了新的记录。

注释

[1]这里是指由穆斯塔法·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政府追随德奥帝国主义集团，使土耳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加剧。战败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土耳其，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一九一九年，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帝民族解放斗争并取得胜利，于一九二三年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得到列宁和苏俄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二二年苏俄政府承认基马尔建立的安纳托利亚民族政权，次年三月又签定了苏俄土耳其友好条约。

[2]庚子之变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事变。一九〇〇（庚子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组成侵华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大肆烧杀抢掠，践踏中国主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同年十二月全盘接受合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的《议和大纲》，并于次年九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3]袁世凯，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7]。

[4]二十一条，参见本书《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一文注[3]。

[5]段祺瑞，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3]。

[6]曹锟，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6]。

[7]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8]华盛顿会议，参见本书《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一文注[1]。

[9]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10]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但是，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

[11]保皇党指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海外的政治团体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次年七月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并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建立组织，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进行活动，拉拢华侨入会。一九〇七年为了迎合清政府预备立宪，保皇会改名国民宪政会，不久又改称帝国宪政会，成为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团体。

[12]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一九〇五年八月，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同盟会除了在国内各地建立支部和分会外，还分别在南洋、欧洲和檀香山等地建立支部和分会，积极联络华侨。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联合会党、新军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

[13]五四运动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14]中国国民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15]指由北洋封建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后分裂成的直、皖、奉三派旧军阀，和南方的背叛孙中山投靠帝国主义成为新军阀的陈炯明。这四派新旧军阀势力，得到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武器的支持，扩充实力，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妄图以武力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

段祺瑞赶走了张勋，日本的势力随即霸占了北京政府。吴佩孚赶走了张作霖，英美的势力当即继承了日本一向在中国的地位。陈炯明叛卖了孙中山，英国的香港政府乃即成为广东的太上政府。这些过去的事变，都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施行的乘火打劫的惯技；我们本已受够了这些教训。但惯爱做和平梦的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人——却依然昧于此类情势，有时还不免要跪在洋大人面前请他们来解中国之围，至少或也要请洋大人的傀儡来图谋那不可能的和平，如赞助和平会议一类事实。这种“倚仗洋势”的心理说来真是可耻可叹！

但是，眼前又快横着一个事变。据最近法报电讯：江浙的战机因着苏齐增防和以海军防沪闽军窥浙的举动将逼使浙卢沪何不得不出于一战^[1]，于是外交团决议个条件：（一）沪宁铁路不得运兵，上海不得发生战事；（二）各国速行组成联合舰队；（三）警告中央政府及军事当局者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并须负责赔偿战事中外人某种损失。这是三个明明白白乘火打劫的条件：扩大的联合舰队借着这个题目实现了，铁路共管又正可扩张到沪宁路，转瞬便将到沪杭路，而赔偿损失又正好作为将来敲诈一笔大款取得某项权利的张本。惟事变虽如此明白，然而我们不敢说惯爱做和平梦的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人——不会像上欢直皖战争时天津寓公以天津幸有三十里内不许驻兵的外国条约的同样心理来“欣然承受”此三个要求。国人们！以我言为苛么？请各回省下：“倚仗洋势”的心理在我们中间较鸦片的流毒胜得几何！注^[1]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发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是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争夺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的上海而爆发的战争。双方军队在嘉定黄渡、大仓浏河一带相持。其后，盘踞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率兵入浙。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表示声援何丰林的浙沪联军。

北洋军阀[1]的内哄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封建阶级的武人因各谋私利争为雄长演成互相征伐之事，常较资本阶级因自由竞争而引起的国内战争多得无算。此其故：一由于封建武人利在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好广积金钱；而资本阶级则利在图谋其本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分配及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或携手合作；二由于封建武人所恃者武力，资本阶级则恃资本。本此，现时中国的封建余孽军阀乃遂兵祸连年，互相残杀，成为不可避免的内哄，非至覆灭不止了。

在中国军阀中，自以北洋军阀为主干，自曾李练兵湘淮[2]，满清帝制的金瓯便已生了裂痕，及袁世凯小站练兵[3]，更树立了北洋军阀的始基。至帝制倒，袁世凯兴，随袁氏而起的“王龙段虎冯狗子”[4]便顿时有各树一帜的异心。惟王士珍[5]手无重兵，虽一试国务卿两试总理，终无多大发展，卒让冯国璋[6]段祺瑞[7]造成了直皖两系以争北洋正统。袁世凯死，冯段互相争霸，结果军师徐世昌[8]虽坐收了一时渔人之利，但重要政务仍不得不仰鼻息于皖系军阀。继着吴秀才[9]捧着曹锟[10]为直系军阀复仇，于是一战胜段，再战胜张，驱徐驱黎，终至浩浩荡荡地将曹锟拥进了三海。这样一气呵成的直系天下，宜可以使北洋正统的招牌在曹锟手中稍延时日了，殊不知四围的军阀还未倒，而直系的内部亦起了正统之争。本来，此次拥曹首功为保津两系的冯玉祥[11]、王承斌[12]和王毓芝[13]、高凌蔚[14]、吴景濂[15]、边守靖[16]等，洛系吴佩孚、宁系齐燮元[17]不过尽赞襄之助，乃论功行赏吴佩孚、萧耀南[18]、齐燮元各得一巡阅使，王承斌得副使，而冯玉祥“竟不与焉”。及组阁，高凌蔚又排吴景濂，终至吴景濂连一议长也失掉逃津。孙主琦[19]阁成，知孤立无援可危，乃内联津系外结段卢以张声势，然因此却得罪保系要人，于是内王（王毓芝）外王（王克敏）[20]协以排之。但孙宝琦亦自不弱，居然能两使国会提出查办王克敏案，而金佛郎案[21]与中俄交涉亦遂成了他们政争的武器。金佛郎案王克敏实主大谋，近日，王更以非金佛郎案解决中国财政将无办法为言，以暗示孙阁非承认不可。至中俄交涉则因东交民巷日、法、美大上政府之反对，法国在道胜银行收买的东中路股票事和苏俄在蒙古撤兵条件与冯玉祥垦边雄图有碍故，顾维钧[22]、陆锦[23]、王克敏、王敏芝、冯玉祥乃在外院内府大事挑剔，硬行延搁中俄协定不与通过。北京城中的内哄是如此了，至外方呢？吴秀才自拥曹登位以来，隐然以长子将承正统自居，这种态度自然醋起了与他平日比肩事曹的直系军阀，而他所提拔的后辈亦知急起直追模仿昔日吴对曹的态度，渐欲自成一系。好个奸阴狠毒的吴佩孚如何不看懂此剧，于是撤王承斌、张福来[24]、郑士琦[25]、萧耀南的师长兼任，使他们各自成个光杆督军；留蔡成勋[26]督赣赞助，安徽设军务帮办，遣使赴浙联卢，助温树德[27]与杜锡珪[28]争衡以牵制苏齐新起的势力，尊段所以制奉；联陈降赵所以制粤；重用周荫人[29]，驱逐两王（王永泉[30]、王永彝）正所以防闲孙传芳[31]；用杨森[32]、刘湘[33]、刘存厚[34]、邓锡侯[35]协以图川。及成都重庆既下，而又以刘存厚督川，邓锡侯长川，以启刘湘杨森之争，俾北军得以长久留蜀，此与以北

军驻扎岳州同一心事。吴秀才的锦囊妙计如此，但一般军阀也非尽是蠢才，吴既以撤师长兼任倡，于是大家也就请君入瓮，吴亦不得不辞兼第三师师长，而各个督军更眼灵手快，师长由旅长升，旅长依旧补了亲信之人；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更谋保津宁，三系的亲密联合。在长江流域，萧耀南、马联甲[36]、齐燮元更有联盟的传说。在豫，张福来为换省长师长事已曾一度负气至京与冯玉祥有所联络。山东郑士琦为换师长熊炳琦[37]为换青岛商埠督办与吴佩孚强占胶济路收入事亦对吴极感不快。似此种种，直系的内部未等曹锟“龙归北海”便已破裂得如此之甚，一旦曹真死了，吴有何力能进三海？且就广义的北洋派看，皖派在浙在闽力尚不薄，臧致平[38]近已连克漳泉二州了。奉派虽在养精蓄锐时，但不久必力直系的劲敌。在山西，阎锡山[39]虽无四略野心，但直系终不能指挥自如，故今春有京遣刺客的秘案发现。在陕西，刘镇华[40]坐镇关西，近已不复为直系所有。四川湖南的军阀虽多降直，但北军如长久留川，吴佩孚如迫令湖南取消省宪，或迫令赵恒惕[41]供给军饷，则夔门以内和三湘七泽间的反直风云必仍层出不已。论滇黔，虽唐氏兄弟[42]和刘显世[43]已为新兴军阀，但必为直祸无疑。广西陆荣廷[44]、马济固又已降直，然因此迫得沈鸿英[45]、林俊廷近又向孙中山输诚，虽其成否不可知，要亦属于直为不利。至破坏革命最力的陈炯明[46]，虽与洛吴早已私通，只是他终不敢揭破他的联省自治假面具，亦适足为将来不能真正助直之证。

由此一段军阀祸国史上看来，北洋军阀的内哄，非但直系无术自解，即反直系亦同样无法解脱。今日的反直军阀，又何一非当年曾一度当权的军阀！总之，时至今日——亦即是生产力发展到这个时代——封建军阀的末运已至。北洋军阀的内哄亦不过证明此混乱之局，军阀自身决无能力整理，尤其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勾结的军阀更无能力整理。代之兴的，只有国民革命派。

只是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产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我们国民革命派在此北洋军阀内哄的混战中，须要严密我们的战线，严防我们的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列强——才不致力敌所乘而打散我们的集中势力。注[1]北洋军阀，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

注释

[1]北洋军阀，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

[2]曾国藩（一八一—~一八七二）为清末湘军首领。一八五三年初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展为湘军。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一）为清末淮军军阀。一八六一年编练淮军，次年调至上海，在英法美侵略军的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

[3]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为试练新式陆军，派胡燏棻在离天津七十里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训练“定武军”。后由袁世凯接办扩编，分步、骑、炮、工、辎重五个兵种，聘德国人任教习。袁世凯掌握这一支新式军队后，支持那拉氏发动戊戌政变，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被摧为直隶总督。此后扩充为六镇（相当于师），形成为北洋军阀势力。

[4]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有“北洋三杰”之

称。有人对这种形象化的说法解释道：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为龙；段祺瑞常发虎威喻之为虎；冯国璋狗头狗脑喻之为狗亦无不宜。

[5]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三），直隶正定人。一八九六年投靠袁世凯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辛亥革命后，在袁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和陆军总长。袁死后以北洋派元老身份调停皖系、直系、奉系的冲突。

[6]冯国璋（一八五八～一九一九），直隶河间人。袁世凯小站创办新建陆军时，被任为督练营务处总办。一八九九年随袁至山东参与镇压义和团。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清政府任力第一军总统，率领北洋军至湖北镇压革命。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时，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他为直系首领，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控制北洋军阀政府的皖系首领段祺瑞，称“长江三督”。一九一六年当选副总统，一九一七年代理总统，一九一八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

[7]段祺瑞，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3]。

[8]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直隶天津人。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管营务处，成为袁的主要策士。武昌起义时，助袁窃取总统职位。一九一八年十月总统冯国璋下台，由安福国会选为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议和与段祺瑞发生矛盾。一九二二年段下台，企图依靠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一九二二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遂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下台。

[9]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10]曹锟，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6]。

[11]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旅长、师长、督军、督办等职。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十一月五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一九二六年九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曾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争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一九四八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九月一日在由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途中遭遇火灾逝世。

[12]王承斌，今辽宁兴城人。一九二二年任直隶省长。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时，总管贿选工作。后任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副使兼直隶督军、省长。

[13]王毓芝，以前是军中的老“司书”，随着曹锟的升迁，做到巡阅使署秘书长。

[14]高凌蔚（一八七七～一九三九），直隶天津人。一九二一年任内务总长，后助曹锟贿选，代国务总理。一九三七年任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委员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天津特别市”市长兼“河北省”省长等职。一九三八年五月因附敌卖国遇刺，次年死于北京。

[15]吴景濂，今辽宁兴城人。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投靠直系军阀，为众议院议长。帮助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抨击。

[16]边守靖，曾任直隶省议会议员。

[17]齐燮元，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1]。

[18]萧耀南（一八七七～一九二六），湖北黄冈人。一九一八年追随吴佩孚进攻湖南。一九二三年，参与镇压京议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同年十一月继吴佩孚任两蒙巡阅使。

[19]孙宝琦，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8]。

[20]王克敏，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2]。

[21]金佛郎案，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3]。

[22]顾维钧，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0]。

[23]陆锦，直隶天津人。一九二四年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

[24]张福来，直隶交河人。北洋军阀曹錕部第二十四师师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直军援军司令。

[25]郑士琦，安徽定远人。历任北洋第五镇军官，后升任第五师旅长、师长。

[26]蔡成勋，直隶天津人。直系骨干。一九二二年被吴佩孚派往江西，任江西督军。

[27][28]驻粤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投降北方前，吴佩孚许以不受海军总司令的节制，后又保荐他为渤海舰队司令，直接隶属北京政府。这一事件引起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不满，因此忿而辞职。海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齐燮元的态度完全站在杜的一边，杜、温之争演进而为吴、齐之争。

[29]周荫人，直隶武强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历任福建护军使、福建军务督办、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

[30]王永泉，直隶天津人。一九二一年与徐树铮合作在福建成立军政制置府，同年十一月任省长。一九二三年三月任福建军务督办。王永泉与孙传芳是结拜弟兄。

[31]孙传芳，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4]。

[32]杨森（一八八四～一九六七），四川广安人。一九二四年任陆军上将，督理四川军务。一九二五年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部发生冲突，杨兵败出川，被吴佩孚委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

[33]刘湘（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四川大邑人。一九二一年被推为四川各军总闭令。

[34]刘存厚，四川简州（今简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归国任云南武备学堂堂长。依附北洋军阀为争夺四川督军职务，与滇黔军进行长期混战。一九二七年投靠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一九三三年在四川堵截红军，兵败被撤职。

[35]邓锡侯（一八八八～一九六四），四川营山人。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部属。一九二五年，吴佩孚任邓为川黔讨贼联军副闭令兼四川联军第二路总司令。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一九三七年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川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主席，西南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四川彭县起义。起义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部部长，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6]马联甲，安徽军阀，曾任安徽军务督办。

[37]熊炳琦，山东人。曾任禁卫军参谋、直隶都督署参谋、江苏都督署军务课长、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山东省长等职。

[38]臧致平，安徽太和人。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时，任浙沪联军第一路副司令。一九二五年一月任江苏宣抚使署参谋长。

[39]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

[40]刘镇华（一八八二～一九五五），河南巩县人。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时，任陕西后方筹备总司令。一九二五年任陕西军务督办。

[41]赵恒惕，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1]

[42]唐氏兄弟指唐继尧和唐继虞。唐氏兄弟为云南会泽人。唐继尧（一八八二～一九二七），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运动，借护法自保，排挤孙中山，暗通北洋军阀。为了称霸西南，多次出兵川黔，并召开联省军会议，自称“联帅”。一九二七年彼胡若愚、龙云威迫去职。唐继虞（一八九一～一九二四），一九一八年先后任滇黔靖国联军总参

谋长、昆明卫戍总司令，权重一时。后历任东南巡阅使、贵州督军等职。

[43]刘显世（一八七一～一九二七），贵州兴义人。一九二一年追随滇系军阀唐继尧汪滇黔靖国军副司令，参与川滇黔三省军队混战。战败后为部属驱赶下台。

[44]陆荣廷（一八五九～一九二八），广西武陵人。原系桂系军阀，一九二一年直皖战争爆发，投靠吴佩孚。是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企图依靠直系支持，进行反对，因桂系溃败，所部倒戈，逃上海。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发动叛乱时，又潜回龙州，北洋政府任之为“广西军务督理”。

[45]沈鸿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6]。

[46]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共管中国江河的新形势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

自外国的军舰商船可以自由行驶于中国内地的江河后，中国的港湾河流，久已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下了。及长江外舰联防，外国商船可以武装的事件发生，中国的江河更进一层变为列强的共管物，沿江沿海的中国被压迫民众遂永远在列强的炮口下讨生活了。但即此，列强尚以为未足，最近北京东交民巷大上政府更借口保护外侨安宁的名义决定：（一）由各国在华军舰组合三个舰队，以第一舰队任辽东直鲁沿海之警备，第二舰队任长江一带之警备，第三舰队任浙闽粤三省之警备，分任巡戈，以资保护；（二）凡西南各省及长江一带并奉吉黑三省各大商埠地方由各国之领事团征集精壮外侨组织商团以资防卫，……同时齐燮元的导淮督办令下，一方代表美国帝国主义者利益的广益银公司立刻派人往宁与齐接洽一万大借款，一方藏在华洋义赈会后边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立刻可以由代浚苏州河的诡计进而包揽导淮。这样一来，不仅长江外舰联防成事实，全国的外舰都联防了；不仅已通行的中国江河成列强的内海，待浚的江河也断定他的被统治的命运了；不仅江河共管完全实现，且进一步又要做到各大商埠的共管了。

号称“爱国”的旅法华人啊！你们为一个“进兵赤塔”的谣言，而能表示那样“磨硕以须”的勇气，现在列强共管中国的事实都迫到燃眉，你们难道反一声不响么？

至我们，我们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的人，却永远一心不乱地反抗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列强——日英美法意等——到底。

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

美政府自华府会议成功，得了列强在中国共同行动的保证后，对华政策即一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侵略的故道。两年多的经历，已使我们饱尝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在华一切设施，殆无不备有钱臭和血腥的混合滋味。尤其露骨的，便是美国工商业的资本家，张家口之克门案[1]，临城案[2]，宜昌的大来案，浙江纸烟捐案，长江舰队联防案，上海美国侨商会议案，无不与他们息息相关。最近沪报载美国在华商务总会的报告有云：“……去年本会与美国协会曾致电国务卿，要求增加美国在华利益之保障，所幸本国政府，尚未认为极端主张，已由海军部准添长江巡舰六艘，且已先由檀香山派鱼雷两艘来华。此各国已暂停关税会议，并闻对华债务将有所措置。凡此，未始非吾人要求所生之结果。至国务卿休士亦认定中国时局之严重，并有具体对华政策之决定云。”但什么是“具体对华政策”？请看四月中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所通过的议案：许造一万吨之快巡舰八艘，每艘需费一千一百万元，军装经费在外，并造炮舰六艘，每艘需费七十万元，此炮舰乃供中国海面之用。这个议案审查至六月五日美国上下议院完全通过。美国国务卿的“具体对华政策”实现了，美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要求”得到“结果”了，被压迫的中国人从此将更增受了六艘炮舰的射击。

然而聪明点的美国人究竟知道这不是个万全的侵略政策。有个美记者李查得·哈顿竟在报上公开说道：“溯自一八四一年中国在英国枪尖之下被迫割让香港于英之不幸之日起，以迄华盛顿举行所谓裁军及远东问题会议之日止，中国人民对于西方任何强国始终无可敬之理由。而美政府于兹会中辜负中国人民可靠之友谊，殆为此不幸关系之最后大结束，亦为一号称友邦者对其友之最重打击，且此可谓为中国历史上之转捩点。盖当美国因欲取悦英日两强而出卖中国之前，中国颇有步武西方诸大共和国所取途径之势。今自被卖于美国之后，彼乃觉悟中国必须自立不赖外助，且必须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反对。盖此等国家之唯一目的实力掠夺中国之富饶天产也。……美国最近联合他国，在广州为海军示威运动而以保护条约权利之脆薄理由为根据。此项疯狂举动，可谓铸造中国对西方各国及其蕞尔东邻一串怨恨锁链之最后一环。欲迫中国群众投身于布尔塞维克主义而试行苏维埃制度，美国此举，殆已有充分之效力矣。……西方诸共和国果欲挽回中国，使仍为彼等之姊妹国急超直追或由未晚。但为时已甚迫促，受苦已久之中国人民正在力图自救，无暇久待。若彼等竟断然效法俄罗斯者，则西方世界之烦闷将从此开始矣。”这位美国记者的议论，毕竟有超越美国普通工商业资本家的卓识。设无最后一段话，至少我们会疑心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从“西方诸共和国……使仍为彼等之姊妹国……”数语看来，便知道这是一位不着侵略痕迹的巧妙的新闻记者，会这样说话的人，美国向中国做文化宣传的教育家、传教师、新闻记者、旅行家都惯为之。我们，尤其是从事国民革命独立运动的我们应将他们看成和主持武力侵略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是一流人物，严防受他

们甜言蜜语的诱惑。

又，美国总统将于本年年底改选了，代表大工商业资本家、大地主的共和党若胜，则柯立芝[3]联任，军事的对华政策自然具体的继续施行。否则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胜，他们或要采取旧日阳示亲善的对华政策以缓和国人对美恶感。这个，在外表虽有缓急之分实则同一样子有帝国主义从中作祟，我们切须紧紧记牢，一律反对。

注释

[1]张家口克门案发生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商人乘自用汽车四辆，搭载外人三名，华人十一名自张家口驶出，未遵守当地规则出验护照，拒绝检查，强行开车，并向岗兵连发六枪。岗兵出于自卫还击两枪，伤及美商人克门。一九二三年一月，美使舒尔曼为克门案向外交总长王正廷面致抗议，提出道歉，惩处，赔偿六项要求。一九二三年五月，察哈尔都统张锡元来到美使馆谢罪，克门案全部照美要求解决。

[2]临城案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9]。

[3]柯立芝（一八七二～一九三三），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任内反对“侵犯”私有财产，两次否决麦克纳里—霍根农场救济法案；对外推行“新孤立主义”，不愿与外国签订政治协定、参加国联和承担国际义务，但鼓励大企业对外贷款和投资。利用道威斯计划加强美国势力对欧洲的渗入。

勿忘党仇！

（一九二五年八月）

总理去世不到半年，中央党部门前竟演出空前的惨剧！我们的党代表廖仲恺[1]先生被刺死了。

廖先生是我们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总理的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总理在时，廖先生已担起党中大部分的工作，总理死后，廖先生更成为党中的重心。而今党之重心竟遭惨死，我们岂仅哭我们的党代表，我们更哀痛全党之失却重心！

廖先生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数十年来自种了不少政敌。但是此次死廖先生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党代表惨死了，我们最痛心的是党代表不死于他数十年之革命奔走中，不死于东江讨逆[2]之棉湖视师中，不死于杨刘作乱[3]之恶险空气中，而竟死于国民政府组后正在秉承总理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发展国民革命之进行中，是党代表之惨死，简直为承继总理遗志而牺牲！

廖先生是总理熏陶下一个最有担当者。十余年的革命历史中，他是一个最服从党律而热心作事者，英士执信[4]两先生外，我们找不出第三人可以较他再勇往直前凌厉无比。廖先生惨死，使我们同时联想到英士执信两先生之惨死，足以证明死廖先生的敌人竟不容国民党中有最能负责最能工作之领袖存在。

且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招帝国主义者一尤其是香港政府之忌，最烈的也莫过于廖先生。廖先生既为反革命反工农群众分子及帝国主义者所忌视，于是廖先生遂为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工农运动而牺牲。

一句话，在总理死后，我们国民党是绝对须要一个承继总理遗志为党最能负责最能工作而又勇于革命运动、工农运动及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而今廖先生竟因适当其选之故惨遭那卑鄙狠毒万恶的仇人暗算，在廖先生为党牺牲，求仁得仁，在我们却痛失其领袖。

为党牺牲的领袖死了，我们要认定这是党仇，不是私仇，仇人是来毁党的，不仅仅毁廖先生个人而已。

黄埔党军党校的同志啊！我们为爱党而敬党代表，我们更要为爱党而痛党代表，杀党代表者必是毁党之人。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注释

[1]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一八九三年回国。一九一五年参加同盟会，为最早的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一九二二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

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2]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三年陈炯明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广东东江（惠州、潮汕一带）。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之役，“陈家军”全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3]刘杨作乱指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件。杨刘是最早投入孙中山旗帜之下的滇桂军将领，他们对革命事业并不抱有热情，而是在广东称雄道霸，并准备借口反对廖仲恺等发动武装叛乱，以实现其推翻广州政府的阴谋。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与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作乱被平定。

[4]陈其美（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一九〇六年入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一九〇八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率部光复上海，被推为沪军都督。一九一五年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同年十二月，陈和杨虎城等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失败。一九一六年曾计划在上海发动陆军起事，未成。同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暗杀于上海萨坡宝路寓所。

朱执信（一八八五～一九二〇），广东番禺人，原籍浙江萧山。一九四〇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次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世凯）斗争，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革命方略》，任《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编辑，坚持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思想激进。一九二〇年为驱逐桂系军阀赴广东联络民军，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

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近来有人颇怀疑目前许多民众运动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颇误会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我们为国民革命利益与其前途计，有以下的話要说。

不错，某个时代的革命方式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合环境的要求”。否则，便是“反革命”。

所以我们很久就肯定国民革命是目前中国唯一的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任何被压迫阶级的要求都超不出打倒他们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以图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解放。质言之，就是要求一个民主政纲的实现。

理论上既无冲突了，我们且看实际上目前民众运动有无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

首先说到工人。现时工人运动最易引起非难的，大半是工会擅自捕人，封闭工厂商店，工人持械游行，强取商店什物。这几件事，我们须研究事实真相。广东职工运动要没有行东厂主工贼流氓做分裂工会运动，实际上早已团结坚固，很但平的向前发展了。怎奈工人要求工会统一，行东厂主却设立了行东工会从事破坏商议，工人因生活痛苦举行罢工，行东厂主却收买工贼从事捣乱。等到破坏捣乱还不足，便雇用流氓毆杀工人，威迫利诱，拆散群众。工人受着这种客观的痛苦于无可如何之中乃不得不组织纠察队自卫队以图自卫，逮捕流氓免遭毒打，防守工厂商店门口以免工贼破坏罢工。这些问题久已成为劳资间工人间的纠纷，国民政府只要设法处理，使工人得到生活保障，他们本无须取这种形式。强取商店什物，果使属诸事实，可以窃盗论罪。罢工事件，原是工人受经济压迫过甚出于不得已之举，条件太高，行动太骤，都有磋商改善的余地；最好就事论事，不必牵动工人运动全体。至于因梧州潮州惨案而引起的工人同情运动，其实在原在几个不法军人，工人的要求仍不出生命保障。

在乡村，土匪劣绅贪官污吏实是应该肃清的。只要看到近来农民运动人员被害事件之多，便知乡村反动势力之大。实际上农民目前的要求，不过是减租以维持生活，剿匪以保护生命而已。

总之，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至其行动，外间流言说工人要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某某，实行劳工专政，完全为反动派离间工农与政府之休戚关系。革命的工农知识虽低，但他们需要国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决不至如此荒谬以违反国民革命的方式。且工农群众对于国民政府自始即竭诚拥护，在去岁风雨飘摇之中，更会出其死力，他们岂有不要这种给民众以政治自由的政府，而要压迫民众的陈炯明或张作霖的政府么？不过这类流言，自有工农运动以来便有。但因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团结一致，故流言亦无伤于我们的毫末。

学生运动原也有些纠纷，但始终未出国民革命范围。拿一年来的现象比

较，现在总算进步了。若还有不完善处，可从教育机关方面图整顿，从青年运动方面谋改善，这种整顿改善，应从革命的利益方面着想。

商人方面如除暴安良保护河道等要求，更显而易见乃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利益。

讲到整个民众运动，不管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方案，或是依据最近政纲关于人民团体的解释，目前广东的民众组织，大家都承认有集议和建议权了。在党政府方面，须指导这些民众团体的集议和建议，在民众方面，亦因晓得国民党的最近政纲为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的需要，故决不会有什么超出国民革命的要求。民众团体除掉接受这个政纲，护拥执行这个政纲的国民政府，并无第二条出路。故民众团体应帮助党政府积极宣传这个政纲及次第施行这个政纲。

第一点说过了，我们再进而问实际上有无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

在解释国民革命的性质上，人人都承认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如此，关闭的国家主义派所以为反革命，国际性的中国共产派所以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而成为革命分子。目前的中国政治状况，不但帝国主义的锁链——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丝毫没有动摇，军阀尚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便是在国民政府领域中半封建势力——贪官污吏买办大地主土豪劣绅土匪等还遍地皆是。这时候除掉团结各派民主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以集中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向共同的敌人进攻，再没有其他的争斗。在这争斗中，我们可以公然说共产党人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罢工中，在东征北伐抗军阀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部力办国民党遭遇的囚杀中，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忠实地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向国民革命，无一点迟疑，无一点吝惜。一切工作上他们尚找不出非国民革命的证据。我们更很坚确地认定现时方式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辽远。所以这时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人都感觉急切。或正因望之急而肯之切，遂引起许多人的误会，也是意中之事。惟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所有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何况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的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引导工农上解放之路。否则，除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敌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国民革命只有归于失败。

我们高呼：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斗争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1]而斗争，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何以于国民党[2]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前政治斗争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愈加团结和互相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的回答：

(一) 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既不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前驱。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二) 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3]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4]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二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地表明之必要。

(一) 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

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他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趋左倾，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5]，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的故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故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本党，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在已有组织的民众，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蒙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的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时如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庚，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6]这些严厉的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摭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胜利。

我们最后高呼：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注释

[1]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

[2] 国民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

[3]“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近万人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4]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在广州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为了调查这一重大暗杀事件的真相，由有关方面人士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5]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新的译文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6]见《国民周刊》第3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所载范谔写的《从海康案说到农运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广东海康县军政当局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枪杀农民运动工作人员程庚的罪行。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

郭沫若[1]来，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2]，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3]，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4]。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5]、严重[6]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7]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贻。二十六军、十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8]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注释

[1]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2]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安庆市国民党党部和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筹各处，打伤多人。

[3]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四月九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杭州袭击了市总工会，三十一日又开枪杀伤参加抗议游行的工人八十多人。四月九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捣毁了左派领导的江苏省和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四月十日逮捕、殴打游行的革命群众，杀害省党部常委侯绍裘(共产党员)。四月十二日蒋

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率立三同志等。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背叛革命，公开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

[5]薛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

[6]严重（一八九二～一九四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总教官，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蒋介石任命的职务。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

[7]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北路）总指挥兼三十七军军长。

[8]中央政府，指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

彭杨颜邢四同志[1]被敌人捕杀经过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时时合作以压迫工农群众，以屠杀革命领袖的。尤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自“四一二”[2]以来，在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铁蹄之下牺牲的已经有几万人；现时关闭在西牢，在漕河泾，在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的，还有成千以上的工农群众、革命战士，过着那无期徒刑的岁月。

近来因世界大战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战争还在继续，而群众斗争又在日益开展，于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乃更加紧地合作，向着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施行更残酷的进攻。彭、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切的合作、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暗杀！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3]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4]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闻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六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至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二十八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5]，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钉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

三天中，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6]，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夹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7]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们相聚谈话时，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可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

在三十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五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公安局包探多人，司令部副官几个，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法院在特别法庭开庭，不许人旁听，问辞与供辞如上次。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辞他说了一些，并未将彭、杨等同志罪状究是些什么公开宣布。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法官等并不注意，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直至彭、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上海英文报上忽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这一复审，简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他们想以法律的手续来欺骗群众，但又深恐怕群众晓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知晴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屠杀成河的血，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心，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谁还管你们的鸟法律！

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于“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力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当着彭、杨五同志初被捕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夸功报告。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狗们寝食不安，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

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中的不知儿多！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个革命战士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的确，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故敌人消灭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压迫革命之最残酷最恶毒的办法。我们只有努力于群众的斗争，加紧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力量足以消灭白色恐怖，消灭敌人的屠杀，则革命的胜利便将临近，敌人的统治便届末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赎今日的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尽了彭、杨四烈士的遗志！才报了我们的被压迫阶级的大恨深仇！

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来暗杀革命领袖，我们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回答，却永远是赤裸裸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仅只这一点差别，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利器。因为只有公开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只有群众力量才能消灭敌人！惯于阴谋暗杀的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便要在这公开的阶级斗争中一齐消灭，一齐死绝！

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革命先锋战士们！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我们的奋斗不绝！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地前进！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注释

[1]彭，即彭湃；杨，即杨殷；颜，即颜昌颐；邢，即邢士贞。他们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尤华被敌人杀害的烈士。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县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一九二五年五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失败后，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在党的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六”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杨殷（一八九三～一九二九），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并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八年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常委，并任中央军事部长。颜昌颐（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湖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四师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和彭湃一起发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任红军党代表。

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

邢士贞（？～一九二九），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

[2]“四一二”，指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参见本书《迅速出师讨代蒋介石》一文注[3]。

[3]张际春（？～一九三三），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同年领导上海五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两次反帝大示威，八月二十四日被捕，一九三一年冬出狱。

[4]《布尔塞维克》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前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共出一二六期，前二十三期是周报，后三期是三日报。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停刊，同月十五日和《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红旗日报》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同年三月九日改名《红旗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六十四期。

[5]熊式辉（一九一三～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6]《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一九二二年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年先锋队歌》。

[7]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托洛茨基反对派[1] 在中国发生 原因及其前途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2]上说：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3] 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活动情形与反党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有人说，反对派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起了反对派的介绍作用。现在，我们指出反对派发生的几种主要的客观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时，很注意如何引俄国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宝贝”不但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所利用，即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一样地看上了。在联共的反对派坚决地固执他们的路线时，欧洲资产阶级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们分裂联共的组织，破坏联共的正确路线。在中国，胡汉民[4]、戴季陶[5]、周佛海[6]，都企图借着宣传反对派以分裂中国党。中国的统治阶级恨不得抓住中国党内的这一工具，以达到消灭中国革命领导者的目的。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容许反对派在中国活动。这是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俄国在一九一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是如此。中国党自“八七”会议[7]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在组织上有相当成功，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直到六次大会[8]，才有相当成功；然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还都是待机而动。这是中国发生反对派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结合之思想上组织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国党的党内生活，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健全。虽然在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引进工人分子入党，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坚固地建立起来。因此，党的生活上，常发生动摇的现象。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来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在上海，有些中心的产业支部并不巩固，有些产业支部非常缺乏政治生活，因此，斗争胜利了，支部就活跃；斗争失败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瓦解的。这表明政治路线还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完全巩固，不但反对派可以借此活动，即机会主义者亦容易去活动。这是第三个客观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注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这是第四个客观原因。

这是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所做的报告。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尽管过去没有发生过反对派的活动，然而有了这四个原因，就必不可免地使中国有反对派暂时活动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回国的学生与机会主义的复活。

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四点：

第一，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与统治阶级勾结。《新生命》[9]已经登过关于反对派的文章。将来反对派更要利用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关，以进行其帮助统治阶级反党的活动。如果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他们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当前实际问题上表现他们的反党路线的宣传与活动。他们在“五卅”[10]纪念时，宣言号召同志向党斗争，要比反帝国主义斗争更重要，客观上毫无疑问地是帮助敌人。“八一”示威[11]，他们又认为是盲动主义，反映出许多失败的情绪，在论调上表现出极右的悲观的取消主义。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实行其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他们借着停留在支部内，以动摇下层群众，并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利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当斗争困难时，反对派在宣传上可以说出极左的口号，如“没收工厂”，以使工人阶级孤立，并引导工人群众幻想未来的天国而忽略了目前斗争的实际意义；反之，在实际问题上却又提出极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无出路的消沉状态。

第四，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结合。这些机会主义者因为固执自己的路线，现在既不能深入群众，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纲，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样，反对派的政纲，正好在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上，在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与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于是就被他们利用了。而反对派的策略，也正是利用这些分子帮助他们进行反党的活动。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12]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诬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必须提到支部中，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注释

[1]托洛茨基反对派，参见本书《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注[4]。

[2]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指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

[3]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4]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长等职，著名的右派首领，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盟者。后来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长期对

[5]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忠实追随蒋介石。

[6]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一九二一年曾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叛党。蒋介石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长等职。

[7]“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农运、工运及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大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时候，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下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8]“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9]《新生命》是周佛海主编的反动月刊，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创刊。

[10]“五卅”，参见本书《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注[3]。

[11]一九一九年七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国际，议决八月一日在瑞士卢赛恩召开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全世界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游行，向第二国际示威。一九二九年六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定八月一日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了反帝示威。

[12]惺惺惜惺惺，原意是聪明的人爱惜聪明的人，这里借用这句成语，形容机会主义者和反对派同类相聚。

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 ——致张学良[1]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2]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3]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4]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代，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5]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6] 军长处恕不另笺。

注释

[1]张学良，一九〇一年生，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五年十月起任国民党政府军西北“剿总”副司令。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邀周恩来到肤施（今延安），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以及双方通商和互派代表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忘我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成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全民抗战的基础。周恩来盛赞张杨两将军为“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2]蒋氏，指蒋介石。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抗日。这一行动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武力阻拦。蒋介石先后派遣约十个师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进攻抗日先锋军，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进攻陕北根据地。

[3]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对华三原则”，作为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4]在日本帝国主义屡次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形势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苏联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互助议定书，即蒙苏协定。协定规定如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遭受任何第三国攻击时互相支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对此曾以“侵害中国主权”为由，于同年四月六日和十一日两次提出抗议。

[5]刘鼎（一九 三~一九八六），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后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6]以哲，即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六），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人。东北军爱国将领。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第六十六军军长。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王以哲等主张和平解决。在反动势力的挑动下，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王以哲被少壮派刺杀。

请一言为天下先
——致张伯苓[1]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

不亲先生教益，垂念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力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

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已于十一月出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先驱，集中河北。不图山西阎氏[2]阻挡于前，蒋[3]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是实现广田三原则[4]中日“满”共同防共之要旨，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

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

事急矣！东进匪遥，率直进言，幸赐明教，并颂教祺！

周恩来
一九三六·五·十五于瓦窑堡

注释

[1]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天津人，教育家。一九一四年在天津创办敬业中学堂（后改名南开学校）。一九一九年任南开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2]阎氏、指阎锡山。参见本书《车阉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

[3]蒋，指蒋介石，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一文注[2]。

[4]广田三原则，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一文注[3]。

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 ——致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介石先生：

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1]，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十三年改组[2]，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之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那？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禱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下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人，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奉上八月二十五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顺祝
起居佳胜！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注释

[1]一九二六年六月，广东地方势力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发出通电，宣布“北上抗日”，接着组织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激战。这一事件被称为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同年七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妥协。

[2]民十三改组，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

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致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

蒋先生：

自汉卿[1]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2]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3]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内对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问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4]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人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5]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力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仁候回教，并颂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

注释

[1]汉卿即张学良，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一文注[1]。

[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军政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分别发表陕甘整理办法，主要内容是：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撤职留任，调整陕甘地区部队驻地。一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又颁令撤销由张学良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3]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西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

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杀害。

[4]敬之，即何应钦（一八九一～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

[5]宋，指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

释放七君子以一新天下耳目
——致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蒋先生赐鉴：

前电计达。

阅报见上海被捕之爱国分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1]，竟以救国罪名为苏州法院提起公诉，并通缉陶行知等五人[2]，此举已引起全国不安。良以三中全会[3]后，先生即以释放政治犯、容许言论自由晓谕全国，会今沈、章、邹诸人，政治犯也，其行容或激越，其心纯在救国，其拥护统一尤具真诚，镣铐入狱已极冤，抑乃苏州法院竟违背先生意旨诉以违害民国之罪，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先生洞照四方，想能平反此狱，释沈等七人并取消陶等通缉，以一新天下耳目，是则举国民众所引颈仰望者也。谨电陈辞，敬祈鉴察。

周恩来叩

注释

[1]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当时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同年十二月，七君子被移至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次年四月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提出公诉。由于七君子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纷纷声援，七七事变后被释放。

[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沈钧儒等七君子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正在国外访问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陶行知受到通缉。与此案有关受到通缉的还有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人。

[3]指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商讨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 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 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 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心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力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力推翻日本帝国主

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 ——致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蒋先生赐鉴：

来庐后所陈宣言[1]，已荷阅正，从此露布四方，当能使举国同慰。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昨蒙面示张淮南[2]君转达各节，其中关于同盟会纲领[3]，承允讨论，极为欣慰。惟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于党中同志。缘上次在庐，承面告三师以上不能设指挥部时，来即陈说红军在改编后无统率机关以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等事的困难。先生当答以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来管理联络。来彼时曾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先生曾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面谒后，来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嫌不妥，曾向子文[4]先生及蒋夫入再三陈说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因先生坚持未允，来乃归陕北磋商，中间并一度来电重申前请，得慕尹[5]主任代复亦仍囑以庐山所谈办法解决。来即据此再三向党中军中诸同志解释，告以只要政治机关能够统辖人事、经理教育、指挥各事，名义如何应勿计较，各同志始不再争。乃昨据张君转告，部队在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请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林、秦[6]两同志着能同时晋谒，更所切盼。专肃。

敬颂

崇祺！

周恩来启
七月十五日

注释

[1]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参见本书《宣言》全文。

[2]张淮南，即张冲（一九 四一—一九四一），字淮南。浙江温州人。曾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等职。抗战期间作为国民党代表加国共谈判。在抗战中，张冲坚决赞成国共合作，兵御外侮，同周恩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一九四一年八月，张冲病逝，周恩来深为哀悼，除在《新日报》发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送挽联：“安危谁具；风雨忆同舟。”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3]为了控制、削弱和溶化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六月，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期间，提出由国民党与共产党选派同等数量人员合组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合作的方式，蒋介石为该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该会可代替中同共产党直接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此外，还要制定一个同盟会的纲领。经过几次磋商，中共代大最后拒绝了这一提案。

[4]子文，即宋予文。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致蒋介石》一文注[5]。

[5]慕尹，即钱大钧（一八九三～一九八二），江苏吴县人。当时任蒋介石侍从空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6]林，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秦，指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作为中共代表，在庐山与国民党谈判。

目前抗战危机 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危机

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具体的分析来看：

甲、在战局方面——日寇已占领上海，突破松江，我军防线已退至嘉善苏州昆山浏河之线。华北方面，自占领太原后，敌人已进逼汾阳介休子洪镇之线。平汉津浦亦有前进消息。日寇企图是想在稍加整理后，压迫我大军退过黄河南岸，以便其向全世界宣告：华北战事已告段落，海亦已占领。他将从事于华北自治，上海中立，分化蒙回，捣乱华中华南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口头的停战协定掩护之下来进行，以欺蒙列强，利诱汉奸，这比明枪真火来得毒辣！

乙、在国际方面——九国公约[1]会议，虽表示了英美的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硬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能做到，因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意完全赞成日本说话，日本不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提出他的六项要求，英美并预言如果日本态度强硬，中国坚持抗战，他们将使九国公约会议延续下去，准备觅取新机从事调停。苏联因英美态度如此，自不能单独行动，虽说他在道义上、在实际上已给了中国以有力的帮助。

丙、在军事上——中国正规军队，现已用到相当的数目，而全民全面的动员，军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后方工作的改善，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没有开始。战争的失利，部队的损伤，给养的不充，这使部分的军人发生颓丧失望的心理。如恃着现有的正规军持久抗战，其胜利信心确已锐减。

丁、在民众动员方面——三四月来，不但政权没有开放，民运也没有开放，直到现在，党部仍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因此，包而不办，是普遍现象。于是许多大城市民运，反不如过去局部抗战时的活跃，前线则不得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民众武装不能组织。这是给日本造顺民给自己造反对者。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由于上述的严重现象，遂至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而发生了下列的危机：

(1) 汉奸政权的活跃——华北自治政府，上海华北维持会，内蒙独立，汉好的活跃等等。

(2) 投降主义的生长——亲日派的活跃，主张对日直接谈判，英美系的软弱，主张依靠英美谈判条件，没有自力更生的信心。对苏联失望的人，主张结束战争。这一切都是投降主义的变相。汪说主和者是汉奸，蒋亦说抗战

这是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的一篇演讲纪录，原载《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二期。

到底，目前讲妥协者是汉奸。政府给中国代表团的训令，亦说日军不从中国撤退，没有调解的余地——这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当头棒！

(3) 特殊化思想的增长——从冀察特殊化的影响，至今尚引诱着许多人企图在此特殊化之下苟安。这是可能吗？绝对不可能，而已是创造汉奸，颓丧民气，出卖正义的过渡政治机构。故对日绝交，十分必要，战败不能使中国民族屈服，特殊化，可使中国民族万劫不复！

(4) “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认为军事失败，一切部无办法，不是幸求一拼，便是退求自保；拼而求幸，胜已不可能，便更倾向于退过黄河以自保。果真在华北已无战的可能吗？如无可能，退过黄河也不能自保。故无命令自由退过黄河的是等于让日寇来便利统治华北。

我们为要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要如此，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得到国际友邦的赞助，才能拒绝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调停，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二 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

抗战危机发生了，日寇更集中全力来加深我们的危机。但其中心的一环，仍在压迫我军迅速退过黄河，拿着华北，好做文章。上海原是其牵制方面，次作战线，谁知战中的损失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因而进迫苏州，现正向南京前进。但日寇的战略中心，第一步仍在取得华北，故华北的抗战，如真告一段落，抗战的危机，便严重到万分。而且日寇也可以喘一口气再于。

因此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目前太原已失，华北抗战能继续么？能持久么？我们回答绝对的能。

第一、假使中央能有得力的生力军开来，能实行各线配合的出击，能增加生力军到敌人后侧，改变过去专守御的战略战术，能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可转变目前的危机，进入胜利的反攻！

第二、如果上述这些条件一时做不到，甚至于敌人继续前进，占领了我们的渡河点——风陵渡，晋城，企图占领我们黄河要口，我们也还是有办法。在华北在山西进行持久抗战，这持久战有下列各条件：

(1) 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村子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甲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证以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恢复了十四个县城，烧毁了二十二架飞机，最近又夺回了南怀化，击败了敌人许多前进的部队，就可以相信。

(2) 在地形上，持久战也是可能的。因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识中国内地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存在与扩大。

(3) 在气候上，外国人总不能较中国人适宜。尤其是冬春两季，更于日军不利。

(4) 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日寇侵略中国，不论他怎样欺骗利诱，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蹂躏的。故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敌人愈摧残，群众将愈觉醒起来，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奋斗。

(5) 民众武装已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晋冀察边的广大发展，将是我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

(6) 政府领袖和军队的决心成为争取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条件。现在蒋阎及不少军队，正在加强着这个战争。我们还望他们有进一步的全局的布置。

(7) 最后，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也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是红军改编的，他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发挥他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

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的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这虽然会有一个时候，但他决不同于六年来的东北四省。他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他，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他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他要在持久战中，壮大了自己，武装了人民，恢复了许多城镇，破坏了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了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三 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

怎样来坚持华北抗战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的问题，也就是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如何？最主要的我提出四项问题：

第一、军队的改造。原有的正规军，虽越打越少，但打仗要用组织好了的军队来打，因此，改造旧军成立新军，便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了。改造军队，目的不是在换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组织制度。在这里，今后在华北作战的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应采用三三制，而附有游击队，及轻便后方辎重与多数的通讯资材的编制。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生命线来巩固部队。提倡自觉纪律，保障部队与人民密切关系。其三，部队的的生活必须改善，政治生活要平等，连经济要公开，士兵生活要提高，官兵要团结一致。其四，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要使其能独立作战，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其五，作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击战，争人不争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国难时也要独立自给。这样的军队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开放政权，现在全华北，已不是中华民国的统一政权，而是日寇汉奸好的政权。日寇的自治是伪自治，我们应该以真自治来活动民众，开放政权。因此，目前华北的政权，应该是国民政府一部分的地方政权，首先他在制度上应该是民主政治，应该团结全华北的抗日人民，不论何党何派何军，均应容纳他们的代表，来共同担当国事，主持救亡大计。其二、在组织上应该从县区分上施行地方自治自给，以坚持中华民国的正统，然后及于省区。其三、在政策上，应实行抗日的纲领。我们提议应该根据共产党提出的十大

纲领来实施战区的救亡政策。

第三、开放民运。华北要再不开放民运，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无丝毫迟疑的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来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首先应向民众作广大深入的抗日宣传。其二、要组织广大的民众在工会，商会，农会，学生会之中，并吸引他们到政治团体中来。其三、要发动民众力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并联系到民族利益上来。其四、要组织他们在武装训练之中，引导其参加人民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并吸引到部队中来。

第四、肃清汉奸，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是争取持久战的先决条件。只有反对这些汉奸，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战争，而取得最后胜利。

注释

[1]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主要反映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日本拒绝参加。出席会议的除原缔约国家外，还有苏联、印度等共十九个国家。由于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拒绝讨论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原则，会议没有取得积极结果，助长了日本的侵气焰。

怎样进行持久抗战？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

—

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五个月前，抗战初起，我们即主张坚持长期抗战，决定最后胜负的方针，但当时未尝不有人设想：上海战役可以幸胜，日寇侵略可以限于局部，国际大战可以立即牵动。等到抗战经过五个月，察绥沦亡，保定太原上海相继失守，最后首都亦复陷落，证明抗战既不可幸胜，国际大战亦非轻易可以牵动，于是这些人便设想调解或可找到出路，屈服或可停止日寇前进，日寇汉奸又从而利用之，因此，和平妥协的主张，便一时甚嚣尘上。然而日寇的贪欲，却是无止境的。日本阁议对于中国的屈服主义者的幻想，算是给了当头一棒，而蒋先生的告国民书（十二月十七日），更安定了浮动惶惑的人心，击破了一切和平妥协自甘退屈的主张，坚持着贯彻抗战到底求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方针。

本来这个基本方针，早就定下了的、但是由于战局的变化，由于对于怎样进行这个基本方针，过去没有很好的阐明和执行，以致一部分人对于这一基本方针发生动摇，失去信心，并表示无办法，另有一部分人便因之发生埋怨和愤慨，于是抗日阵线内部，生长着离心和动摇的现象。现在为消灭这些现象，贯彻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就必须对于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提出更积极更具体的任务，号召和动员全中国的同胞，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奋斗。

二

要回答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的问题，首先须认清：抗战五个月中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是些甚么？

第一，这次对日抗战是中国海禁开后近百年来所没有的。以两个敌对的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武装斗争了十年，一旦团结御侮，走在一条战线上杀敌；以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政府，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军队，一旦决心抗战，无间南北东西，都一致行动，一致奔赴前线，以许多装备不完军队，许多尚无组织训练的新兵，继续向前线输送，前仆后继的牺牲；这种统一团结的意志，英勇战斗的精神；是我们抗战中的伟大成绩，如果从此长期坚持下去，并扩大和发扬起来，将基本的保障着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

第二，这次抗战几乎可以说以无甚准备的中国，抵抗准备四十多年的日本，毫无疑问的在战争初期，日寇是尽量发挥他们准备好了的长处，而我们则到处都发现我们没有准备或是没有准备好的短处，以致遭受军事上的失利。这从军事对比上看来，中国国防力量与技术条件，就大大落后于日本，经济对比，亦不相称，尤其是军事工业与运输，我国居绝对劣势，在政治上日本取得了中国汉奸托派和亲日分子的内应，而中国则还没有取得日本内部

反战运动的响应。本来我们并不反对抗战需要准备，只是内战不停，抗战无从准备，即有准备，也要对消掉了。内战停后，日寇又不让我们准备。故我们对抗战的准备，只能在长期抗战中来完成，一边抗战，一边准备。以西班牙那样国家，被佛郎哥[1]一直打到马德里，还能在坚持战中，组成了新式军队五十万，构筑起新式防御工事，建立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并且能做到制造飞机，自装坦克。我国地大物博人多，战争的条件还没险恶到马德里被困的状态，我们的长处是可以在持久战中发扬和增加起来的。特别是民众动员，愈因战争延长会愈加深入，军队作战，愈因持久，会经验愈丰，改正愈多，军事工业和军事交通，愈因持久，会成就愈大。在日寇方面，则因他的短处，在于财政困难，军事工业原料缺乏，国内矛盾增长，后方不巩固，远东形势陷于孤立等等，如果战争持久，战线延长，他的兵力，将不够分配，他的短处，将日益暴露，他的长处，将逐渐减少。

第三，这次抗战以中国军队装备技术的落后，竟能给敌以极大的损伤（敌我伤亡约一与三之比），使敌人不能依其预定计划实现，直到现在，日寇在中国的北方及东部，仅占有沿铁路和公路的城市，而广大的北方及沿海地区，仍在我手，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军队将士的英勇和某些军队（如八路军等）的机动，以及日本军队不善于山地战与不够分配等原因。但我们虽不赞成唯武器论的观点，然而军队技术的提高，装备的现代化，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装备好的技术高的政治坚定的现代化的几十个师，是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

第四，这次抗战，我国军队能在狭窄的上海地区，吸引敌军至十余师之众，坚持至三个月之久，引起全中国民众全世界同情我们人士的拥护和称赞，这是伟大的成绩。但以我军的装备和技术条件的落后，阵地战尚非我们特长，当时我军如能抽出相当数量和质量好的部队，转移到北方的战场上去，则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把握，当较东战场为多，北方的战局，也许更能开展。现在沪宁失陷，我军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我中国军队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长，但这并不是说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但这也不是说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了，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术。只有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争为主，游击战争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我军在运动战中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重新转入阵地战的壕沟工事里去。

第五，这次抗战表示出我国军事指挥的开始统一和集中，我国最高统帅决心的坚强，与许多高级将领指挥的坚决，是值得称赞和尊敬的。但是现代战争，是一个有组织的科学战争，特别在中国的军队复杂，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补给不济的条件下，在敌我军事力量强弱的对比下，更需要有计划的组织战争。因此，在指挥上，一方面需要全国的统一和集中，另一方面需要分工，需要依据一定的战略计划：授权与各战区，使之能机断专行的独当一面。小而至于一师一旅一团一营，都要能依据当前情况，授以机断专行的权力。在补给上，依据敌人深入的情况，也要有分区自给的办法，尤其在敌人占领区域及其周围，更要有独立专行的作战区分。这一切都是过去抗战期中没有完满进行的，并且有时候，因为指挥系统的混乱、重复、无权和受限制，使某些战役遭受不应

有的损失，这是应当立即改正的。

第六，这次抗战，我们应当称赞某些部队补充的迅速，新兵参加前线的勇敢，与某些民众团体及个人参加战地服务的勤劳，但我们同时应当指出：过去民众运动，还没有以动员参战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首先征募兵役的机关，便有保安司令，师管区，军训委员会等等的重复组织，征募的方法，多带强迫性而缺少宣传鼓动与解决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具体办法。在民众运动中，不论指导机关，民众团体与个人，对于动员新兵上前线，动员青年学生受军训入军校，动员一切民众参加战地服务，推销公债，都还没有造成广大的动员热潮，这不能不说是抗战五个月中的一个损失。

第七，由于抗战的英勇与坚持，已经使国际同情中国的运动发展，使友邦的赞助增加，但应当指出：过去我们还没有尽量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来增强自己抗战的力量，反而有时散布一些不应有的幻想和依赖，转至丧失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信心。目前最能运用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是扩大国际宣传，取得全世界工人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技术上的援助，另一方面应加紧建立军事工业，加速军事交通，以便尽量利用友邦的援助，更强的武装起来。

第八，这次抗战是进行了肃清汉奸的工作，并取得部分成绩的，但严重的问题，却不在于肃清一般的小汉奸，而在于某些特殊化的思想，汉奸的理论，亲日派的活动，特别是日本侦探托洛茨基匪徒的言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这就使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容易受人利用挑拨，发生误会磨擦，特别是抗日的前线和后方，容易被日寇所利用，进行军事上的阴谋，张慕陶在山西的行动，和王公度等匪徒在广西的阴谋，便是明证。

三

根据上述的这些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决定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是获得了，现在的困难是要依据与发展现有的力量和基础，阻止敌人的深入，以渡过这一青黄不接的难关，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具体的办法，我们认为应当是：

第一，巩固前线——在蒋委员长坚决意志之下，要坚强北方津浦及东南各战线将士在那里持久抗战的决心，要认识敌人愈深入愈困难的真理，确定各战线的作战部队作战地区与作战基地，确定全国统一的作战计划，并严格遵守各作战地区在统一计划下的相互配合行动。残破的部队，应调在后方整补。留在战区的，应缩小庞杂的单位，使之适宜于发挥运动战山地战的特长，改变过去某些时候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万一敌人突破某些支点，必须抛弃过去全线后撤的办法，在正面留下箝制部队，坚守纵深配备的支点，将突击兵力转移到敌人的侧面后方，寻求新的机动，以迟阻敌人的继续深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全线溃退，敌人跟踪而入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时机，渡过目前的难关。太原失陷后，两个月来，敌人不敢南下临汾，主要的因为有八路军十三军及一部分晋绥军在他的侧面后方威胁吸引所致，这是最值得效法的例子。

第二，建设新的军备——在最短期内，在现有的军队基础上，要决心建立几十个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师。为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国防师

的编制，必须适合于对日作战和新的技术条件。这些国防师的干部，必须以有抗战经验的军官作骨干，并迅速培养和训练大批的青年军政干部。这些国防师及其干部的教育，必须特别着重于实战经验的联系，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政治训练的加紧。这些国防师的生活和待遇，必须从健全政治上，做到政治上官兵平等，军民一致，连队上经济公开，废除打骂制度，实行自觉的严格纪律。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坚强的革命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最后的完成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补给，和统一的作战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与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第三，建立军事工业——为提高军事技术，最后战胜日寇，必须集中各种专门人材，建立统一的国防工业。依据目前可能的条件，我们应迅速的适当的分布军事工厂于一些安全而便于制造和运输的地区，应有计划的集中生产于某些急需的部门，应加强国防工业各部门对于这些生产必要的配合，应集中现金负责的购置必要的军人与制造兵工的器材，应利用国内外专门技术人才，迅速建立制造或装置新式的军事器械，特别重要的，应迅速打通和巩固西北与西南的军事交通，以便利和加速一切军事上的运输。

第四，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依据敌人现有的兵力，不论其在北方，在津浦，在东南，只能占领我国交通要道及重要城市，如敌继续前进，其后方将愈加薄弱。因此，我们应抓紧敌人这一弱点，派遣某些得力部队，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首先以自立的原则，一直发展到脱离自己乡村城镇的武装队伍，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我主力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不易在其占领地区，树立汉奸组织和汉奸部队，更难于统治起来。

第五，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动员新兵上前线，应成为今天动员工作的中心。在政府方面，应由上而下将一切征兵机关统一起来，组成各级征募兵役的委员会，号召指导和进行征兵运动。各种民众团体，应抓住这一中心工作，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到乡村中去，直接召集群众大会，响应政府这一号召，动员壮丁自动的参加前线，讨论优待这些抗日军人家属的具体办法，使有钱的人，担负他们家属的救济，有力的人，帮助解决他们家属的劳动，并发动群众，举行盛大的庆贺与欢送，务使这一运动形成上前线杀敌的广大热潮，更经过这一运动，成立各乡村群众选举出的动员委员会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使这一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中去，使这一运动深入到各种动员工作——募捐、运输、慰劳、救护、自卫的工作中去。

第六，巩固后方——这首先须从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保卫武汉的工作，要巩固江防，要加强平汉粤汉两路及其两侧的保卫力量，要动员大江南北的群众，参加这一保卫大武汉的计划。但这不是说，巩固后方的中心，只放在保卫武汉方面。为准备长期抗战；我们应同样在其他重要城市，构筑和加强全国必要的要塞和支点，巩固全国的交通运输，特别是宣传和组织各地民众，使之适合于军事抗战的需要，和参加一切有利于抗日的工作，肃清一切汉奸敌探托匪的组织和活动，以造成统一的强固的后方。

第七，加强国防机构——为使全国政治的军事的机构，能适合抗战胜利的需要，必须使过去不适合战时需要的重复的庞大的分散的一切政治机构，加以适当的改变，务使各级政府组织，能适合于领导全国战争，尤其是军事组织，更要有适当的科学的集权与分工，以便于指挥战争，组织战争。在人

力上，要不受人事的牵掣，能集中全国确能代表民意和有能力的各方人才，参加各种工作，以充实统一政府，加强国防机构，这是目前最有利于巩固政府团结御侮的工作。

第八，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因为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固反对幻想出兵式的外援，但我们并不反对运用国际环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有利条件。过去因幻想出兵式的外援，痴等外国出兵，致许多国际的有利条件，反被忽视了，反而没被运用。现在我们应估计到国际上的同情增长，要以全国统一的对外宣传，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材料，向全世界供给，要以各党派各团体联名的通电、联合的组织，派遣到海外去，并配合华侨的活动，取得各国人民物质上技术上的援助。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各国可能的赞助，加紧推动，加速进行，务使这种可能扩大起来，畅利起来，而不要像现在已经获得的某些可能，停顿和迟缓起来，这是于长期抗战的支持和发展极为不利的。

以上这一切具体办法，都为着实现一个目的——即是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目的！重复的说，要能贯彻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首先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反对一切动摇，反对一切妥协屈服投降的思想。次之，必须坚决相信进行这些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是能够渡过目前难关，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的。有了坚强的信心，有了实行这一切具体办法的意志，有了实行这一切具体办法的长期努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进攻，必然会遭受到最后的惨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必然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注释

[1]佛郎哥（一八九二～一九七五），西班牙独裁者，长枪党首领，军人出身。一九二一年因镇压摩洛哥人起义有功，升上将。一九三五年任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大选中，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同年六月，佛郎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和政府的叛乱。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京城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五个月的时间。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用虚伪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帮助侵略者，又由于人民阵线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马德里陷落，共和国政府倾覆，开始了佛郎哥的独裁统治。

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

我在说话之先，首先向我们最高统帅前线将士及全国同胞致热烈的胜利的敬礼！

一 这次胜利的意义

我首先来说明这次鲁南胜利[1]的意义。鲁南胜利是我们二期抗战[2]的初步胜利。这个胜利虽然是初步的，但它的意义却很伟大。

第一，我们摧毁了日本强盗最精锐的两个师团——坂垣与矶谷。

第二，我们缴获了日本强盗许多新式武器，如大炮，坦克车，步枪，轻重机关枪及其他的战利品。

第三，证明了我们二期抗战中战略战术的进步和成功。

第四，证明了我们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战斗情绪的旺盛。

第五，证明了我们各战区备战线以及各战场上的配合动作收了成效。

第六，证明了战区中军民合作的成绩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七，愈加暴露了敌人兵力不够，军纪败坏与战斗力不强等等弱点。

所以这次胜利虽然在一个地方，但，他的意义却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二 日寇正准备新的进攻

敌人的情况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是我们跟着要回答的。日本强盗虽然无耻的否认这次台儿庄的惨败[3]，但上海、天津两方面的增兵，却不能掩盖它的实际恐慌，同时也证明敌人的冒险进攻，还要继续。

本来敌人自从开始第二期进攻计划以来，满以为依靠原有的在华兵力，便能实现它的第二期进攻计划。它这种轻视我国的狂妄举动，完全没有认识愈深入中国愈加困难的真理。因之，第一步打通津浦夺取徐州的计划，在二月中便遭受了初次失败。继着，第二步突入晋南，扫荡黄河以北的计划，又在二月中开始的碰了壁。接着，第三步又回转方向，仍从津浦南进，并且增加了两师兵，企图重新实现它打通津浦的计划，不料这次失败更大，竟使它弃甲曳兵而逃。现在敌人决不会认输，它只有从国内增加兵来。敌人开在中国内地的军队番号，大约已达到廿九个师团，在国内约尚有八个师团，在我国东北四省约尚有八个师团，台湾尚有二个师团，高丽也有两个师团。据估计敌人向上海天津方面增加的兵力最大限度可达到八个师团。如果这个做得到，则敌人留在国内及在东北四省台湾朝鲜现有的兵力，只剩十二个师团了。并且自开战到现在，敌人在华损失的兵力，已经超过廿万，已经不止八个师团，所以即使八个师团全能开来，也不能弥补过去的损失。何况愈进攻，兵力愈分，愈深入，兵力愈少，愈持久，兵力愈消耗疲惫。再加上敌人的纪律败坏，也是有加无已，甚至敌人自己的报纸——中央公论，都不免泄露这种

这是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第五日的广播词。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新华日报》。

残暴无耻的消息。这种量与质综合起来的弱点，随着战事发展下去，将使敌人的战斗力逐渐减弱。

不过敌人目前的冒险进攻，是必然要继续的，并且会依靠增加的兵力，根据失败的教训，采取更有力的进攻步骤。

敌人将从那个方向进行新的进攻呢？

大约估计，可能从下述的三个方向：

第一，使用更集团的兵力，仍从津浦南下，但主力可能使用在敌人的右翼；

第二，更可能的从津浦南段北上，但主力使用在迂回合肥方面；第三，沿平汉线两侧，突过黄河，切断陇海，使津浦线我国大军放在敌人的外翼。

在新的进攻中，敌人根据失败的教训，可能有下列的改变：

第一，敌人将会更集团的使用它的兵力，改正一些过去轻视我军的观念；

第二，敌人从有进无退的锥形直入的战术，可能改正为更灵活的使用包围迂回，使用有进退的运动战；

第三，敌人有可能改变过去专攻一方面的作战方针，与逐渐增加的弱点而向各方试攻，控制强大的突击兵力于待机位置，等到发现我军弱点在哪一方面时，再直向哪方突破。

第四，敌人在各战线上的配合动作，也必会较前加强。

估计到敌人将要发生的这些情况，我们全国军民才能懂得注意敌人新的进攻，才能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

三 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

更大的新的胜利怎样争取呢？

我认为首先要更加巩固全国的团结。抗战九个月来，我们中国有了空前的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最高统帅和民族的觉醒，结成了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的全民族的大团结，这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基本条件。尤其二期抗战后，全国各政治党派中心力量集于武汉，最近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又发布了战时的抗敌建国纲领[4]及其宣言决议等等，更能推动全国的团结，趋于巩固。我们热望这种团结，一直巩固下去，一直发展到全国，一直团结到抗战胜利以后。

次之，我们更加努力争取前线上的胜利。二期抗战虽还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但我们的胜利，如果能一次一次的增加，一线一线的开展，我们定能阻止敌人的深入，保卫我们抗战的中心——武汉，以便争取时间，准备新的力量，进行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因此，我们热望前线上的将领更能坚持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发挥野战军灵活的运动战与歼灭敌人的特长；派遣有力部队挺进和坚留在敌人后方去进行战斗，坚守必要的支线工事，广大的发展群众的自卫武装和游击战争，取得各战线上更好的配合，以争取更大的新的各战线上的胜利，以粉碎敌人整个二期的进攻计划。

再次，我们要努力争取时间，建立新军，以准备决定的战斗。建军，不仅是抗战必胜的保障，而且是建国必成的保障。我们热望全国军民都努力来参加建军的伟大工程。要做好这伟大工程，就须有好的自愿的自觉的人民来当兵，就须有政治坚强的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就须有统一的适合抗战需要的编制，就须有自党的严格的军队纪律，就须有近代化的技术条件高的武装配

备，就须有新的军事政治的训练，尤其须有能使官兵一体军民一致的政治工作。有了这样的国防军，才能保障新的胜利的到来，保障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最后，我们要努力于抗战期中的建国。抗战期中的建国纲领，国民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已经规定明白、无疑的将要成为国民政府抗战期中的施政方针。我们热望全国军民要努力实行这个纲领，最重要的，是训练全国军队，一致致力国效命，动员全国力量参加抗战，实现国民参政的职权，充分保障纲领中规定的人民权利给广大民众以武装的组织和训练，推行战时教育，集中主要生产力于建立军事工业，树立重工业基础和发展农村经济，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并坚持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的外交方针。这一切努力，都是为的在抗战中树立起建国的基础，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全国同胞们！前线上的官长士兵们！我们从这四个基本工作上，就是说要从巩固全民族的团结，争取前线上的胜利与建国的工作上，来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第二期的进攻计划。保卫我们抗战的中心——武汉，准备最后决定的战斗，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复兴我们中华民族！

注释

[1]鲁南胜利指日军占领济南及山东广大地区后，中共山东省党组织、领导人民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即分别组成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开辟了以鲁南为中心的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

[2]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62页。

[3]台儿庄在山东省枣庄市东南、大运河北岸。是大运河沿岸物资集散地之一。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日军第十师团向台儿庄进攻，一度被中国守军击退。四月三日，中国军队以四十万优势兵力包围进攻台儿庄之敌，并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敌第五师团一部，至四月六日取得了歼敌两万余人的胜利。

[4]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是一个两面性的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形式上的让步也成为一纸空文。

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

中国抗战已一周年。目前正当着日寇沿着大江南北，向武汉方向进行水陆空联合进攻的时候，我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正关心着两个问题：第一，保卫武汉的可能如何？第二，抗战的发展前途如何？

我现在联系起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要回答敌情如何？一年来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经过一战再战，虽已占领了我们沿海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其聚歼我军，逼我屈服的企图，终未达到。最近敌阁改组，其中心方针，仍在速战速决，但又惧战事不易速了，消耗不易持久，故对内乃以准备长期战争动员，对外故造调停和解谣言，企图动摇我国内外抗日阵线，从政治上压我屈服。因此，敌人的三期作战，乃是在矛盾的发展中继续作冒险的进攻。其战略方针，必然是集主力以包围武汉，切断粤汉平汉陇海，逼我退出一切铁路交通，以便最后的威胁广州兰州。其作战计划，可能估计的为由东向南，由北向西的迂回武汉，切断粤汉平汉，企图聚歼我军主力于蕪沼地区，陷断我军一部于东北山地，并压退我军一部于武汉以西及其以南的地区，以造成武汉大混乱的局面。目前黄河汉水泛滥，江淮间山地起伏，敌人大兵又出现于马当湖口之间，其主攻方向，显已着重江南，但我们亦不应忽视敌人在其他方面的乘虚而入。同时，敌人对扫荡黄河北两岸，夺取潼关西安以及沿南得浙赣两路。夺取南昌长沙的计划，亦有可能相机而行。

敌人的企图既如上述，但敌人的困难并未减轻，相反的还在发展，最重要的为，（一）敌人兵力愈因深入而愈分散愈单薄，新的部队未见大增，原有部队且因我挺进军深入热冀边境而有调出关外的；（二）敌人的配合动作较前更差，同一进攻武汉，江南紧急，豫东皖西沉寂，同一增援同蒲，道清敌进，晋北晋东受阻，这都证明敌人兵力不够，指挥不灵；（三）敌人战斗力在野战场中脱离其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不论进攻迟却与被我攻击，都较在阵地战中力弱，都易为我军所败；（四）敌人军纪败坏，影响其士气至大，思家自杀反战逃亡等等现象已渐发生；（五）敌人一年来追加之军事预算七十三万万，已渐用光，新年度的军事预算，将更加重日本人民的担负。板垣之准备作战十年的大言，将不知吓退几多日本人民；（六）敌人的交通运输，将愈因深入而愈感困难，保护接济，将因我游击战争沿江沿铁路的破坏扰乱而愈感苦恼；（七）敌人后方愈大，将愈感空虚，我挺进游击部队将利用之以恢复失地，恢复政权，敌人如调兵回击，则又利于我阻敌深入；（八）敌的政治矛盾，不论是陆军与海军，关东军与派遣军，华北敌军与华中敌军，军阀与财阀，军人商与轻工业家，政党与政党间，统治者与广大人民，帝国政府与属地人民，无不反映其冲突的增长。综合这各种困难的发展，将给敌人作战企图的实现可能性以极大的阻碍。因此，结论是：人的三期作战，不仅在矛盾的发展中、而且在困难的增中，继续作冒险的进攻。

次之，我要回答我们抗战力量如何？一年来我们坚持了长期抗战的方针，击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拒绝敌人和解诱降的活动，这是我们基本

的成功。成功的原在于抗战以来，我们有了下述的基本的进步：（一）我们民族有了空前的觉醒）空前的团结；（二）我们有了统一国民政府；（三）我们有了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及英勇牺的前线将士；（四）我们有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党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五）我们更有了全国最高统帅，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建国。这些成功和进步，我们要拥他，坚持他，才能使成功和进步继续发展。

但既有了基本的成功和进步，为什么还不能阻敌深入？这主要原因由于我抗战力量还不够坚强，还不够大，还不够持久。还不能改变敌我的强弱对比，还不能使敌我强弱的差异大大减低。第一，从军事上看来，抗战初期我们的弱点很多，二期抗战，战略上，作战上，均有极大的进步，给敌人有相当大的损伤，但部队的编制，作战的区分和指挥，兵员的补充，军火给养的接济；干部的训练，伤兵的治疗，政治工作的建立，游击战争的发动，民众武装的领导，尚有许多可商榷和应改善的地方。第二，从政治方面说，抗战建国纲领的产生，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各党派的公开与合作，救济工作的重视，这都是一年来最大的成就，但行政机构之欠调整，地方自治急需实行，保甲制度急需改革，抗战自由急需保障，民众团体急需领导，青年教育急需改善，财政金融急需整顿，经济生产急需发展，交通运输急需统一，均为目前应兴应革之事。有了军事上政治上这些弱点，自然抗战力量便不足以阻敌深入。所以一年来我们在上海华北，虽相当大的消耗敌人，台儿庄虽获得重大胜利，在华北虽破坏了敌人的扫荡计划，在全国虽调动了敌人百万以上，消耗敌人达三分之一，但所有这些，还只是局部的胜利，还不能粉碎敌人的每期进攻，还未能产生出足以决定最后胜负的力量。我们指出这些弱点，决不能说我们是在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更不能说是在攻击政府。因为拥护政府是抗战以来，全民族基本的立场，大家决无二致，而这些弱点，正因为我们是弱国，在抗战初期，不能尽免，只有尽情指出，不断改善，才能化弱为强，转败为胜。因此，结论是：中国抗战，已有了基本的成功和进步，但抗战力量，因有种种弱点，还不够坚强，广大和持久，这需要我们在坚持长期抗战中，改正这些弱点，克服这些困难，争取胜利的前进。

再次，我要回答保卫武汉的条件到底如何？

第一，有人问：保卫武汉的有利条件，已经有了些什么？我的回答是：最高统帅坚守武汉的公开声明，卫戍武汉及其以外地区的主力部队，全国战场的战斗配合，武汉三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广大民众，全中国民众的后援，全世界人士关心，最后还加上武汉以外的有利地形，敌人的困难和弱点，都给了我们保卫武汉以坚强的信心，动员的力量，与争取胜利的兴奋和鼓励。

第二，有人问：条件虽然有利但还不足，且目前战况已日见紧张，弱点还仍然存在，新的努力，新的胜利，是否还来得及保卫武汉？我的回答是：诚然条件有利而不足，时机已极紧迫，但只要不再延误一刻，依据我们基本的成功和进步，努力改正弱点，争取胜利，保卫武汉的条件，一定可以在战斗的发展中更加生长起来的。试看，首都陷落以后，谁能保证津浦会战，支持五六月之久，这正因为战略的改进，战斗的努力，使得敌人遭受意外的损伤和阻碍，同时又因为许多弱点还未改正，所以敌人终于切断陇海打通津浦。现在我们要为保卫武汉而动员一切力量，改正一切足以妨碍保卫武汉战斗的弱点，战斗就一定能够持久，由持久的胜利中，又可产生出长期保卫武汉新的条件。这是由战斗的发展中求得解决，而不是以机械的定命论来预测的。

因此，结论是：保卫武汉的有利条件是有的，但还不足，且时机紧迫、急切需要政府与人民，一致的改正弱点，争取胜利，才能够生长出保卫武汉的胜利的条件。

复次，我要回答保卫武汉的具体方案如何？我在这里只打算说最主要而最紧急的问题。

第一，在战略上，我以为必须确定两个战线，亦即内外线夹击敌人的方针。在武汉卫戍地区，是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而沿黄河、平汉线以东及长江下游，已全处于敌人外翼侧，成为外线作战的形势。敌人愈进攻愈深入，我们在敌人外线的活动地区将愈大；敌人如退守后方向我游击地区围攻，则我内线作战部队的活动范围及出击机会将愈多。因此，内外线作战部队的机断专行与协同动作，关系非常重大。凡在敌人进攻正面，及已在和将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战区，应重新划分，前者应有其固定的和预定的后方，后者应规定为若干游击战区，坚持留在敌后作战，其后方，只能依靠不经常与不固定的运输线与补给基地，在前一种战区中作战，尤其是保卫武汉战役中，运动战、阵地战应成为密切配合，游击战要准备发动。因此，这里要有足够数量的坚强的野战军，装备完整的守备队，责任要分明，指挥要统一，然后才能在敌人每一个方面，每一次的进攻中，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或消灭之，最好是能击败和阻止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外。次之，也要能侧击和消灭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中，最后，还要能截击和歼灭敌人于湖沼地带，这样才能达到直接保卫武汉的任务。在后一种游击战区，运动战与游击战，应广泛的配合使用。因此，这里要有确定任务，坚留敌后政治强的得力的挺进部队，应赋给该战区高级将领，以广泛的组织游击队与发动游击战争之权，一切党政军及民众领导均应统一，然后才能在敌人进攻正面的近后方，以运动战配合被进攻的部队，夹击敌人，在敌人的远后方，以广大的游击战，切实截断铁路及沿江交通，困惫敌人，调动敌人，以便将敌人后方变为前线，在那里恢复失地，恢复政权，创造出新的游击根据地，以便与敌人持久作战，准备将来战略的反攻。这是间接的保卫武汉的胜利条件，同时也正是直接的破坏了敌人扫荡黄河南北，深入江西湖南的计划。

第二，在建军上，我们要不失任何时机的培养新的力量，以便能继续战斗，并培养出将来足以担当决定胜负的战斗的力量。这就必须：（一）在兵役法上，要能改善征兵制为征募两用的兵役制，使及龄壮了，能自觉的入伍，以提高部队的质量。（二）部队编制，要能根据抗战经验及上述战略方针加以修正。（三）部队及干部教育，要能依据抗战经验，补订教令教程，加强政治及技术教育，对新兵训练，尤须注意于野外战斗教练，务使其能完成一定时间的教育计划，不因战况紧张，轻易调动，因其于战事既无补而有害，于建军本身将更困难完成。（四）部队装备补给，要能依照任务而规定其统一办法，如野战军应多配备山炮，迫击炮，轻机关枪；挺进游击部队，应多配备轻兵器，工兵器材及打战车炮；守备部队应配备足够数量的重兵器；机械化部队，应集中使用等等。（五）政治工作，要能从基本上加强，政治部要普遍设立，连队政治工作要开始，干部要重新训练审查，薪俸要减低，巡视检查制度要建立，政治工作更要求做到保障命令执行，提高官长威信，巩固战斗情绪，加强士兵教育，注意伤兵工作，提倡自觉纪律，改善军民关系，进行对敌工作，以代替过去政训工作的不良传统。

第三，在动员上，我们要求，要用最大的决心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

练民众，武装民众。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所说：“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这在今日保卫武汉的动员中，尤为至理。有人说：“战况吃紧，兵力尚且不行，民力有何用处？”不知战况愈紧，兵民相关的作用，所需的情形，更重要于平时。兵员扩充、工役、运输、担架、向导、慰劳；办粮、侦察等等，是兵需于民。组训、武装、保卫、疏散、救济、领导，是民需于兵。因此，凡属战区，动员工作，比任何其他行政工作为急要，同时动员工作能做得好，一切政治问题中的困难和弱点，已解决大半。动员工作的方针，应该是统一领导，统一计划，联合组织，分工合作，各级动员委员会的组织，不应只是建议的机关，而应是执行的机关。他们的成分，一方面应包括党政军各机关的代表，另一方面应有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后者代表总数超过前者。动员组织的领导，在战区的属之于政治部，在省则属之于省政府，在县区两级，应由战区和省动员委员会派人主持，或由县区长兼为动员委员会主席。动员委员会，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并吸引广大民众团体及人民参加工作，以扩大动员基础。动员工作的内容，应分兵役动员、参战动员、物资动员、自卫动员、人物疏散及组训工作等，只有用一切力量，动员全武汉及其附近的民众，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不必要的人员和物资，迅速的向外疏散，才能使人力物力为兵力所用，不致力兵力之累，甚至转为敌用。

因此，结论是：保卫武汉具体的方案，最中心的是：动员一切兵力、人力、物力，争取保卫武汉的直接胜利，争取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外线胜利，同时争取一切时机建立新军，以便继续战斗和准备最后决定胜负的战斗。最后，我要回答抗战发展的前途究竟如何？

第一，有人问：武汉的重要，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军事上不如徐州，文化上不如北平，即使不守，也不会影响大局。我的回答是，（一）诚然，分开来看，武汉或者不如南京和上海北平的重要，但在南京上海徐州北平失陷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乃至文化上，都集中于一地——武汉，其重要性就胜过去任何一个城市的陷落。（二）如果武汉不经许多严重战斗，不给敌人以极大损伤，便就发生问题，即使敌人聚歼我军企图不能完全达到，但将武汉造成大混乱的局面的企图，这不能说无实现可能。因此，坚守武汉的决心和布置，是消灭敌人战略主要企图的实际步骤。

第二，有人问：保卫武汉的具体方案即使如前项所述，均在实施，而仍不能阻敌深入，则前途又将如何？我的回答是：只要全国军民在坚守武汉的方针下，对于上项方案作最善之努力，则我消耗敌人必多，在敌后的发展必大，敌人的困难必增，我们的抗战力量必日益坚强扩大，民众的动员必日益深入，即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尚未达到质的变化，不得不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但敌人所能取偿于武汉的，将是焦土荒墟，那我们增长的力量，不仅能继续抗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能转弱力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这中间，需要经过多长过程，主要的要看我们持久抗战的努力，更千百倍的加强我们国内的团结，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步，乃至国际条件的变化。一切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动摇，在现在，在将来，在整个长期抗战中，都应该遭到我们的反对。

因此，结论是：只有坚守武汉，才能保卫武汉。只有以保卫武汉的口号和决心，来动员一切，来坚强和扩大抗战力量，才能争取不断胜利，才能使

抗战持久，抗战前途争
取到最后的胜利。

今年的八一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

今年的八一，正当着东西侵略主义者在全世界人类面前演着空前的残暴的屠杀，这三个法西斯国家，在中国，在西班牙，不仅以残酷的战争，来摧残中西两国的文化经济，而且以大量飞机轰炸中西两国的平民和不设防的城市，要在广大范围内屠杀更多的反法西斯的种子，并且对于所谓中立的友邦船只，也毫不客气的施行轰炸。法西斯的日德意为贯彻其侵略野心，不惜向全世界挑衅。

因此，今年的人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一切维持和平的国家，决不能再像往年一样，仅仅开会示威，而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方法，来制裁侵略者。我们中国人民，我们西班牙弟兄，站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正以浴血的自卫战争，来扑灭法西斯侵略的魔鬼。我们中国抗战已经一年，我们以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反对一切妥协动摇，破日寇一战而胜中国的国策。在一年战斗中，我们以空前的团结，以持久战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揭穿日寇一切挑拨离间的诡计，击破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敌人愈深入愈困难，我军愈打愈强，信心愈坚，愈能深入游击到敌人后方，创立出许多新的抗日根据地。但我们弱点缺点还多，因此我们还没能阻止敌人前进，更还没能与敌人决最后胜负。我们共产党人，现正与当权的国民党谋进一步的团结，坚持动员民众，坚持统一战线的发展，坚持保卫武汉的战斗，坚持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坚持建立现代化的军备，以便继续战斗，准备决战的力量，坚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中国。坚持长期抗战，不达收复一切失地不止，这是我们纪念八一，反对侵略战争，实现世界和平之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已经以一年抗战的收获，吸引敌人百万，损伤敌人三十万，消耗敌人弹药到去年储存，击落敌机六百架以上，击坏敌舰三十五艘，损坏敌人战车汽车过万，来作给国际反侵略日的献礼。我们愿以更大的收获，击退敌人的侵略，来做来年八一的预约。

苏联是世界和平的支柱，他的存在，他的发展，已给了和更要给世界法西斯阵线以更大的威胁。我们更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维持和平的国家，反战支柱的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在今年八一，要巩固世界的和平阵线，强化国联机构，实施世界集体安全制度，给侵略者以实际制裁，抵货、不卖军火给日德意，反对法西斯屠杀平民、轰炸不设防城市，援助中西两国反法西斯的自卫战争，给我们以更多的同情和援助：军火，借款，药品，及一切资材，一切技术人员，一切志愿战士。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类，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东西法西斯的侵略魔鬼，一定能在中国、西班牙的战场上失败。看呵！中西两国的政府和人民，永远站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誓死抗战到底！

论目前抗战形势

(一九三八年十月)

—

中国抗战，经过了十五个月的英勇战斗，完全证实了一个真理，即是：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切对中国抗战之速亡论或速胜论，均已从事实上宣告破产。因为速亡论者只看到中日军事的强弱悬殊，没有看到其他许多政治、经济、自然因素及国际等条件不利于日本，所以他们不能预见也不能相信中国抗战能支持十五个月之久，而武汉还能保持在我们手中，华北广大的地区仍飘扬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创造出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津浦沿线及长江下游同样能发展游击战争。速胜论者则存在着另外一种心理，或者错误的过低的估计敌人的力量，过高的夸大自己的力量，忽视自己的弱点，以为一战再战就可以使日本精疲力尽，承认失败，或者希望外援，想倚靠国际的变化，来替中国打败日本，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十五个月的抗战史迹，已证明中华民族主要的靠着自力更生的国策和信心，支持了这一血战，一切速亡论的悲观心理与速胜论的侥幸心理，已被粉碎无遗。

但是，现在抗战正处在紧要关头，武汉又告危急，新的悲观动摇的心理，新的幸胜幸得的企图，或者会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对目前抗战形势，有更加阐明的必要。

首先我们应该认明的，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强盗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赶到中国的“堪察加”[1]，迫上昆仑山[2]，我们也不能很快的转弱力强，反守为攻，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因此，中日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他描写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即是：“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换一句话说，中日战争既不是一个阶段被敌人一直进攻到我们亡了国，也不是两个阶段敌人进攻中止后被我们一个反攻打出了中国，而是三个阶段，先是敌进我退，继着彼此相持，最后我进敌退，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

这三个阶段如何演进，如何转变呢？我们回答：抗战愈持久，才能愈向有利于我们方面演进，抗战愈胜利，才能愈有利的转入新的阶段。第一阶段敌进我退，我们虽遭受颇大的损失，但因为我们的英勇抗战，同时也给了敌人颇大的损失。我们更得了颇大的进步，这种敌人的损失和我们的进步，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胜利的转入第二个阶段，造成相持的局面。但相持决非已经造成军事上的势均力敌，而是军事、政治、经济、地理、交通及日本国内、国际诸条件的相配合和相互因果，使得敌人再难继续大举进攻和深入，不得不转向敌后反攻我游击部队及其根据地，这便是相持局面之具体表现。这就是说要使我们防御的正面，能够基本上阻止敌人前进，我们在敌后

这是为武汉《新华日报》写的社论。刊载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七、八、九三日武汉《新华日报》。

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创造；能够抓住敌人，使其基本上不得不以主力回攻和保持已得之战略据点大城市及军事要道，我们新的力量能够继续生长，支持长期抗战。而敌人的兵力，因其长期作战重大的损丧及其他不利于敌人诸条件的增长，使敌人不得不退到战略保守，回攻敌后的形势。这种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只要我们能坚持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坚守防御的正面，特别要培养出相当数量的近代化的国防师，大量的消耗敌人，改变敌我的强弱异势，我们一定能胜利的转入反攻、完成第三阶段的任务。

依据上述形势的预测，目前三期抗战，显然是处在第一阶段尚未完结的时期，但应当指出：我们要争取三期抗战成为过渡阶段，即是说要使保卫武汉的战斗，能胜利的持久下去，使敌人的进攻难以继续深入，而过渡到第二阶段的相持局面。然而敌人是不容许这一阶段迅速来到的，他的政策是一方面，无论如何要拿下武汉，并图继续进攻，加强其军事分割；另一方面，在拿下武汉前后，更加紧其政治分化的阴谋，以击破我们拿着武汉或在武汉失守以后造成相持的局面。

因此，保卫武汉的战斗，从整个抗战的形势看来，它只是第一阶段能否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因为我们要使武汉保卫得住，能即过渡到第二阶段，就必须使直接保卫武汉的战斗，能持久的阻止敌人前进，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能广泛的发展到大江南北，直接的抓住敌人，新的力量能够继续生长，准备反攻，这才能胜利的有效的过渡到第二阶段。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具备，我们不能保卫武汉到最后，那我们就不能在保卫武汉的战斗当中过渡到相持的局面。然而，决不是说，没有了武汉，失去了三期抗战的中心，我们就没有可能继续作战，争取胜利的转入相持的局面。因为上述的转入相持局面的各种条件，并不会因武汉的失去而完全改变了性质，这在军事上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正面防御敌人的兵力只要存在，敌人愈深入，一切地形交通条件，是愈有利于我们防御的；第二，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只要我们部队坚决的留在敌后领导，在敌人愈深入，则力愈分散，后方愈空虚的条件下，是愈能够广大发展的；第三，我们新的力量，只要有作战英勇经验丰富的军队作骨干，依据一年多的抗战经验，尽一切可能保持我国不被完全封锁，争取国外帮助，并尽最善的努力去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则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我们还可生长出新的近代化的部队以备反攻的。所以，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坚持保卫武汉愈久愈好的主张，要求从各方面配合的战斗中生长出长期保卫武汉的力量，以便能够过渡到战略相持的第二阶段。但同时指出武汉的得失，决不能解释为能否长期抗战的关键，而发生新的悲观动摇的心理，或孤注一掷幸胜幸得的企图，我们要认识抗战是长期的，只要我们在保卫武汉当中尽了最善的努力，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第二阶段的到来的。

因此，我们基本的口号是：坚持持久战！我们目前的战斗任务是：争取愈久愈好的保卫武汉！

二

根据上篇的分析，我们指出目前三期抗战及保卫武汉的战斗，正处在一个紧要的关头，即是说或者保卫武汉的战斗持久下去，生长出长期保卫武汉的力量，或者我们尽了最善的努力以后，而仍不能保有武汉。在这样一个紧

要关头的前后，新的一时期的困难的发生，是可以遇见的。

抗战既是长期，我们决不畏惧困难，但必须认识困难才能克服困难。什么是可以遇见的困难呢？

首先，看到敌人方面，他将以军事分割和政治分化加强我们的困难。敌人目前进攻武汉的步骤已经加重其山地迂回和切断平汉、粤汉的作用，其企图系在发展向南北两方深入的步骤。现在敌人在黄河北岸沿风陵渡、垣曲之线，企图渡河，便是响应信阳以东敌人切断平汉、陇海的准备。敌机在粤汉沿线的继续狂炸，敌军在台湾，敌舰在南海的故作声势，便是向我华南进攻及向香港政府威胁的预兆。总之，敌军夺取武汉的计划，是包含着继续进攻，实行军事上分割华北、华中、江南、华南及西北和西南的企图的。配合着这一军事进攻，敌人必更加强其政治分化的阴谋，土肥原[3]的特务机关的加强，对支（中国）院的成立，在香港敌人策动机关的活跃，过去意、英调停的传说，对中国国内团结的各种挑拨造谣，均证明敌人久已在组织上工作上进行了若干准备步骤。今后战况愈急，武汉愈危，愈会看到敌人这种阴谋及其走狗应声虫的加紧活动。尤其是武汉如果不保，则敌人必配合其军事分割，更要扩大傀儡政权的建立，加深其威迫利诱的阴谋，挑拨离间的诡计，特别会助长地方分裂倾向，策动反对抗战领袖的私图，暗中勾引局部妥协，以图达到其政治分化的目的。

次之，看到我们自己方面，将要遇到的困难是：（一）一部分人将因为不了解武汉的得失并不关系于能否长期抗战而发生动摇悲观的心理，慌乱逃避的现象；（二）如果战斗激烈，会发生短时间军事转移和兵力补充的困难；（三）在敌后的游击运动，会因敌人抽兵回攻，将遇到一时发展的困难，目前敌人在华北以主力围攻晋冀察边区，便是首先想以打击晋冀察游击根据地，来阻止各战区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四）因为敌人在军事上分割我们的领土，全国政权在联系上的困难，会有人怀疑到政权的统一是否可能，地方分裂的倾向会在小范围内发展，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或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会强化起来；（五）咽为大城市更多的失陷，铁路交通的割断，财政经济会有突增的困难；（六）汉奸亲日分子的活跃，敌探托派[4]的挑拨，会在一个时期内增长，以破坏全国的团结和统一。

再次从国际形势方面看，日本强盗既然会利用欧洲紧张形势的间隙，加速的向武汉进攻，则欧洲暂时的妥协局面，张伯伦[5]的妥协政策，不能不相当的影响某些国家。当然这不是说欧美的民主国家会完全屈服于日本强盗面前，这是与国联[6]引用盟约十六条的决议不符的，但是，一种半妥协的状态，或者一种不更积极援助中国的状态是可能的。这样，将会引起一部分的人对于国际的援助表示失望，而更减低其自力更生的信心。

以上，这一切可以遇见的困难，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使我们认识在战斗激烈和战况不利条件下可能到来的。这些困难，是长期抗战中不完全可以避免的困难，是过渡到新的阶段的关头常常会遇到的困难，正如胎儿降生时的困难一般。

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在估计和认识这些困难之后，有无可能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的回答是：在十五个月抗战的进步和成功中，我们已有了可能的基础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看：

第一，战争是烈火，是洪流。十五个月的抗战，它已将中华民族的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它已将半数以上的中国人民或沦陷在敌人占领区域，或流

亡在四方的，起了根本的生活变化，它已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战区，在敌后，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浴血战争！这种民族的觉醒，民族的愤怒，民族的斗争，区域之广，数目之多，动员之深，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力量的伟大团结和发展是敌人任何的军事分割和政治分化所不能分解的，它将保证着中国抗战的继续，它将保证着中华民族的胜利！在这种伟大的斗争前面，一切动摇悲观的心理，慌乱逃避的现象，将要消失下去。一切地方分裂的倾向，一切秘密的局部妥协，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因此，只有全民族的生动的力量，首先是敌后战区的一切力量，都能团结起来，一定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第二，全民族的领袖蒋委员长一年多对于抗战的导和坚持，是保证长期抗战的中心。日本强盗想用一切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将灭亡全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故意解释成为反对蒋委员长的个人及其领导。我们应该以全民族的力量，用一切方法，拥护蒋委员长及国家的统一，去反对日本强盗及其汉奸走狗的任何阴谋诡计、妥协投降，反对任何地方分裂倾向：反对任何反对抗战领袖的私图。要认识敌人所怕的，所恨的、正是我们应该拥护的。敌人所要分割的，所要分化的，正是我们应该统一的。当着敌人正在进行军事分割、政治分化的前面，最高统帅抗战到底的决心，国家的统一与团结，才更证明对于克服困难有决定的意义。

第三，抗战造成中国进步，首先是几百万的军队，在抗战的烈火中经过了巨大的锻炼。现在全国的军队，不论东西南北，都已在战斗中认识：只有抗战到底，才是生路，中途妥协投降，便是死路一条！坚持抗战才能增强战斗力，生长出新的力量和发展敌后广大的游击运动，才能击破敌人继续进攻和军事分割的计划，才能使敌人的政治分化归于失败。敌人以山地迂回，切断铁路，包围武汉和继续深入，来困难我们，我们只有以更坚强的正面守卫，更多的野战部队，迂回敌人侧翼，才能战胜敌人，消耗敌人，破坏敌人的分割，转而分割敌人。敌人以强渡黄河，割断西北来困难我们，我们应以黄河两岸的积极行动，敌后的更多活动，抓住敌人，不使深入。敌人以进攻和封锁华南来围困我们，我们应以加强华南防卫力量，增多和增强国外交通，来回答敌人。敌人以首先打击晋冀察边区，来沮丧我们对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应以坚持华北游击战争，保卫晋冀察边区，特别是在全国战区敌后发展更多的游击根据地，来回答敌人的围攻，来吸引更多的敌人回攻敌后。敌人以缩小我们的地区，切断我们的铁路交通，来困难我们的补充和运输，我们应控制更多的兵力在敌人的后方，来扩大我们的补充，以保证我们的交通。敌人以夺取我们的大城市，捣乱我们的金融生产来困难我们，我们应以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汉奸部队，以包围敌占的城市，切断它们水陆交通，断绝它们经济流通，增强我们自给能力，来孤立敌人。特别是敌人以控制一切战略据点，交通要道，想从分割地区，走到分割我们的武装，使之成为零星分散的部队，便于他逐渐消灭，我们应以坚持长期抗战，在作战的正面，继续补充正规部队，在广大的敌后游击区域生长出更多的正规部队，尤其是在自己保有的后方，尽一切可能成立新的近代化的部队，准备反攻。我们相信这一切新的困难，在战斗的努力当中，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第四，国民党是处在政权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它的进步，决定着中国长期抗战及其胜利的前途。应该特别指出，国民党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作基础，有辛亥[7]及北伐[8]两期革命传统，有孙先生、蒋先生的先后领导，在发动

抗战后，又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9]，这在基本上，已给了国民党向前进步的基础。发展这个基础，不仅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全中华民族的任务。我们号召全国人民诚心诚意的为实现三民主义及其抗战建国纲领而工作，就一定能够解决当前许多新的困难。民族主义的实行，会使全中华民族更加团结起来，参加抗战，日寇树立的傀儡政权就会更加缩小，满蒙伪军，就会更多的过来。民权主义是包含着尊重各抗日党派独立性的，它的实行就会使参政会[10]的制度普及到省、县、市各级，它就会更广大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使之投身军队，参加战争，实行自卫，供给资财，以保证人民抗日权利的扩大。民生主义的实行，它就会实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真正合理负担，并会满足民众社会的及物质的要求。尤其是抗战建国纲领的实施，更能适库抗战的紧急需要，一切旧的数千百年分裂国家的屏障，在战争的烈火中已被破坏，新的民权制度必会起来代替。旧的组织机构及行政实务，不适合抗战紧急需要的，就会依据抗战建国纲领加以改造。贪污浪费，腐化堕落，妨碍廉洁政治及战时生活的，就会改进。财政、经济、教育、民运等政策，不合抗战利益的，就会改以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实施。尤其是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更会坚决彻底的执行。对外政策，就会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外援，而不是依赖外援。这一切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的政策，应首先在恢复的沦陷区域实施；在那里，旧的基础被敌人摧毁了，我们只有依靠三民主义的模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华民国。建国是在抗战中开始，这在敌后游击区域才更看得真切，才更能击破敌人分裂我们统一政权，分化我国政治的阴谋。

第五，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特别是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是回答敌人及其汉奸走狗分裂中国破坏团结的最好办法。敌人一切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禁不住实际团结的回答。国民党领袖的屡次宣言谈话，共产党抗战前后的主张，各抗日党派的公开表示，参政会全体的宣言，都证明中华民族是团结的，统一战线是形成了的。在这统一战线的面前，一切历史的痕迹，应当消失，一切小的磨擦，地方的冲突，某些党部不妥的做法，均应受到批评。一般的说，战场的团结，经过血汗交流的凝结，以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是坚固到后方。上层的了解和来往，能够影响着下层合作的扩大。因此，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必须首先在敌后战区做出统一战线的模范。拿那里的统一战线的成绩，国共两党的良好关系，来证明给自己的后方看，国共两党长期合作是有保证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可以给敌人及汉奸托派看，一切破坏是枉然的，更给一切怀着历史成见及顽固分子看，一切担心疑虑是不应有的。

综上所述，在全民族的团结前面，在民族领袖坚决领导抗战前面，在全国军队戮力抗战前面，在国民党及政的进步前面，在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尤其在国共长期合作前面，一切新的将要遇到的困难，我们是有保证有力量来克服的。

因此，我们在将要遇到的困难前面，不是畏惧困难而悲观失望，也不是轻视困难反而增加困难，而要勇敢的坚定的克服困难。

三

我们分析了目前抗战形势及其趋势，特别指出了可以遇见的困难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条件和方针，现在我们还应再进一步说明相持局面的第二阶段，

是否有到来的可能。因为保持武汉在我手中，来胜利的过渡到相持局面，这是大家所能了解的。但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并未具备，这不能不使我们着重的估计到即使武汉不保，也还有可能争取第二阶段的到来，不过中间却须经过一个时期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就一定能够造成相持的局面。然而在这种事实没有来到之先，武汉既濒危急，新的困难又已开始，许多悲观论者会怀疑这个前途，一部分侥幸论者，想从孤注一掷中来挽救这个危机。这两种观点，都是对武汉失守后失去前途，而缺乏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因此，我们更须进一步说明相持局面到来的可能性问题。

一，一般人如只从单纯军事上的势均力敌，来认识相持局面，则不仅武汉失去后一个期间不会有此可能，即在武汉在我手时，亦无此条件。中日军事上的势均力敌，不到接近于我之反攻阶段，是不会来到的。因此，敌我的相持局面，是靠着军事、政治、经济、地理、交通及日本国内、国际诸条件相互配合，相互因果而组成的。武汉在我手中，这些条件固然可以向着有利于我方面发展；武汉不在我手，这些条件也不会起基本上的变化。但一个条件，我们必须保有可以继续抗战的力量。力量存在，一时期不利于我们的条件，是可以在继续的战斗中改变过来的。

二，许多人在军事上只看到武汉一点，而没有看到全国，只看到敌人在进攻武汉时所集中的兵力占优势，而没有看到敌人兵力在中国各战区分布的情形；只看到我们目前尚不能以更强的兵力和装备保障武汉不失，而没有看到我国军队在全国范围内所生长出的力量。敌人可以在进攻武汉较狭窄的地区，以优势的兵力压倒我们，但不能在全国战区及敌后处处集中优势兵力压倒我们。目前华北五省敌人分布的师团计十一个，兵力过三十万，但不论他进占风陵渡和垣曲，反攻晋冀察边区、都不能抽出过五万人的部队。如果敌人想以同样的兵力布置于华中、江南、华南，则平汉、粤汉以东的广大区域，非两倍以上如其在华北的兵力不为功。从地形上看，不论敌人在得武汉后，向南向西或向西北，都要经过更多的山地和西北的高原草地，这是使敌人困难加深，消耗加多的。从交通上看，敌人在华北拥有全部铁路、公路线，既不能阻止我们游击战争的发展，相反的，还经常被我们切断破坏，即使敌人深入武汉，有长江水路可通，但向西南、西北深入，铁路、航路都将无法利用。因此，只要我们正面防御保有继续作战的部队，后方能迅速加紧建立新的近代化的国防军，特别在战区敌后，派遣着得力的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运动，使每一个区域都像晋冀察，则军事上正面堵着，后面抓着，新的力量生长着，以准备反攻的相持局面，是一定可以胜利的到来的。

三，不仅从军事上看，我们还应从政治上看，敌人侵入中国内地，并不能达到其统治中国的妄想。华北五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在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手里，广大的民众被组织起来参加游击战争，许多汉奸维持会被摧毁了，许多伪军保安队反正了，唐山矿工暴动了，甚至平津的人民都偷着帮助中国游击队。这一种燎原的战火是日寇点起来的，它将燃烧到华中华南。只要我们绝对相信这种政治优势，努力发展这种政治力量，特别是争取伪军，摧毁伪政权，反对汉奸敌探及任何亲日投降活动，不使敌人得到任何中国人的帮助，则敌人虽然深入了我们内地，直等于进入墓道。

四，在经济上，有人以为敌人占领了武汉，且占领沿海各口岸，可以恢复长江及沿海商务，来从中国吸取金钱、原料，支持他的侵略战争。这种可能虽有，但是很少，很难，并且很慢。我们不要忘记日寇占领东三省三年后

才得到收入上的利益。我们更不要忘记中国还是农业国，今天敌人所占的大城市要道，其工厂、矿山、铁路，有的被敌人炸毁了；有的被我们迁移了，能够保存的，只能作敌人军事上的若干补助，决不能作为日本军事生产上的最大依靠。大城市的商业，是靠吸收中国农村的原料和货币来贸易的，今天的华北日货，已不能推销到平津百里以外，晋察冀边区及冀中竟禁绝了日本香烟的输入，这是游击战争锁住了城市。只要我们在敌后的游击战争普遍发展，处处包围城市，并配合着正规军作战，则敌人即使占领了沿江沿海各口岸，其作用决不会如预想那样大。而我们自己如果能坚决的实行战时财政政策，加紧的建立国防工业及军事交通，限制国内的法市的外流，广泛地发展内地小生产，增加农业生产，加强内地的交通运输，则我们在相当范围内的经济自给，是可以对抗敌人的。

五，在日本国内方面，不论敌人的内阁如何改组，外交如何强化，思想如何统制，长期作战如何强调，但其速战速决的方针，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敌人国小人少，资源不富，而又野蛮暴虐到极点，国外树敌既多，国内矛盾又大，因此，敌人启开战迄今，始终没有决心进行长期战争。显明的是：每次用兵，都是逐渐增加，常常失去时机；兵力分散，又不协同；在动员上，常是临时抽调；在财政上，更是挖肉补疮；在军事生产上，消耗既多，大的长期设备，还未见；使用满蒙伪军，更多顾虑；布其本国军队，反战空气，也渐增长。这是日本国内条件，并不利于支持长期战争而有利于我们造成相持局面的。六，国际条件，目前当然会被日寇利用，加紧压迫中国，威胁英法，求得局部妥协。但张伯伦的妥协政策，虽其基本上在东方在西方都是一样的，然而欧洲没有大战，欧洲人民怕战争好和平的心理异常浓厚；而中国却不是捷克，中国已处在日寇侵略战争的屠杀底下，抗战年余，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是被日寇侵占着、摧毁着。张伯伦既不能也不会使中国完全变成捷克。日本今天也决不会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要求，而且，它的外交政策正在强化。所以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欧、美民主国家，尚不会完全改变态度，也还不会反对其他国家在它们所许可的条件下援助中国。并且，只要我们抗战有力，日寇侵占摧毁各国在华甚至远东的利益愈多，各国援华制日的行动，也不是不可以增强的。

以上这些条件的生长与发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因果，相持局面的到来，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力量是保证长期抗战的决定条件！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

注释

[1]堪察加是苏联最大的半岛，在亚洲东北部，面积约三十七万平方公里。

[2]昆仑山横贯我国新疆、西藏间，东延入青海境内，长约二千五百公[3]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一八八二～一九四八），日本军事特务头子，陆军大将。一九三一年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制满洲国的主犯之一。七七事变后，拉拢吴佩孚，拥立汪精卫，制造傀仍政权。日本投降后，以甲级战犯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4] 敌探托派，参见本书《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注[4]。

[5] 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〇），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首相任内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八年承认意大利墨索里尼侵占埃塞俄比亚，默认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并与德国缔结《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被迫卷入战争，绥靖政策破产。

[6] 国联；参见本书《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伦敦通信）一文注[5]。

[7] 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8] 一九二六年七月，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9] 抗战建国纲领，参见本书《争取更大的新胜利》一文注[4]。

[10]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聘请”，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党员占绝大多数。该会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为了表示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出席了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召开。以后由于国民党日趋反动，言论更受束缚，该会日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等力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曾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多次拒绝出席参政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消。

辛亥，北伐与抗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

在武汉濒于危急的今天，来纪念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的双十节——武昌起义[1]，我们抚今追昔，比任何一年都应有不同而严重的感想和希望。

第一，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2]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这个历史的城市，革命的城市，今天正被东亚的猛兽——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攻着、轰炸着。全武汉的人民，全中国的同胞，将生着如何感想？我们悲哀吗，不！我们怯却吗？不能！我们只有以更大的动员，来保卫武汉到最后！更展开保卫武汉的血战，到全湖北，全中国！武汉三镇的人民，不应该让辛亥革命[3]，北伐时代，两次光荣的历史空空过去，而应该发扬光大这个革命传统，来作武汉三镇的卫士！今天是保卫武汉的最后时机了。做工的，我们不能日本强盗来到武汉屠杀我们，奴役我们，我们要勇敢的投身军队，参加各种战时工作队，去筑工事，去做担架，去任运输！做买卖的，我们不应该设想日本强盗来后可以安居乐业，赚钱发财，我们要更慷慨的实行献金竞赛，捐助寒衣，募集药品，发动慰劳！开工厂的，我们不应该设想可以在日本强盗底下讨生活，不论大的工厂，小的作坊，我们都要有决心的向内地迁移，一方面可便利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可便利内地的经济流通！武汉附近种庄稼的，我们决不能幻想在白寇铁蹄下可以当顺民，要避免日寇的摧残烧杀，奸淫掳掠，只有投身军队，武装自卫，要使日本强盗死在我们面前，不让他们压在我们头上！有知识的，念书的，我们不要散乱的往后跑，跑得到的地方，敌人追得到，我们要成群结队的上前线，往敌人的后方走，去战地服务，去救护伤兵，去组训民众，去发展游击战争！今天是武汉三镇人民的最后关头，敌人向着武汉猛攻，武汉人民要站在全国人民的先头，拿我们的力，拿我们的钱，拿我们的知识，做全国人民参战的模范！全国人民将在我们的影响和兴奋之下，共同动员起来，保卫大武汉，保卫全中国！

第二，辛亥起义，是发源于新军[4]暴动。北伐战争，也正是十五年双十节前北伐军打到了武昌城。今年双十节，又正当着全国主力部队激烈的进行着保卫武汉的血战！这些军队，多少都经过北伐的洗礼，有着革命战争的光荣传统，而又在当年北伐统帅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现在黄鹤楼头的国旗，武昌城下的血迹，正被他们光荣的保卫着。中国革命军队，从辛亥，到北伐，到抗战，在武汉不仅有史的联系，而且有血的联系。光荣的任务，落在光荣的革命军队身上，我们正应发挥革命军队的特长，坚决，勇敢，迅速，机动，来击破敌人的进攻，挽救武汉的危急。我们更应发挥革命军队的优点，政治工作，造成上下一心，军民一体，来巩固我们的战斗，扩大我们的部队，发展全民族的抗战，建立起新的中华民国！

第三，辛亥革命，是在中华民族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创造的。十二年前的北伐战争，现时的抗战，又正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三民主义是这三次革命的旗帜。同盟会、国民党，是具有这个历史传统的政党。不论辛亥革命后来失败，北伐后又有内战，但三民主义的历史发展，孙先生的遗教，

蒋委员长今天的领导，国民党今天在政权中、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都成为今天全民族抗战中所决不能少的胜利因素，我们希望国民党同志，在其信仰的主义、领袖和党的领导下，更加发挥其光荣的历史传统，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着抗战建国纲领，领导着全中华民族，向着坚持抗战，巩固团结的胜利之道前进！辛亥革命，是多少革命烈士的头颅筑成的，是多少革命先辈的心血造成的，彭刘杨三烈士的纪念碑[5]，至今还矗立在武昌城内，国民党中央现在还有不少辛亥革命时代的斗士，应该本着推翻满清，至死不屈的精神，领导我们中华民族后起的儿女，向着民族革命的大道前进！北伐精神，更是今天许多国民党员所能回忆的，当时国民党改组不到三年，便打下了半个中国。现今日寇占领了半个中国，历史的任务要求国民党恢复辛亥及北伐的精神，来完成辛亥革命以来未竟的事业！特别是，国民党历史值得回忆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扩大成为国民党，被官僚分子窜入，革命失败，于是，孙先生有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倒袁护法[6]，国府[7]两广，陈炯明[8]僭乱，孙先生离粤，于是，有民十三国民党之改组。北伐到建都南京，中经内战，革命又败，于是，抗战起，而有蒋先生领导召开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发布抗战建国纲领，发起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举。这一历史的发展，需要国民党在武汉危急，抗战发生新的困难的紧要关头，在孙先生伟大坚强，蒋先生艰苦卓绝的感召之下，将改造国民党，重建中华民国的艰巨任务担负起来！我们共产党人，愿追随国民党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国民党，一致的为战胜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第四，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要算是第二次统一战线，于是，造成北伐胜利。现在，全国抗战，在蒋先生领导之下，于是，又有第三次统一战线，包含着新的国共合作，及其它抗日党派的参加。但是，抗战是长期的，我们需要更坚强的，更扩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来战胜全副武装的凶恶的日寇！因此，我们不仅要回忆历史的成功，更要回忆历史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不能不使我们承认：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还不扩大，特别是北伐时国共两党的政策，还没有取得一致。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我们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我们奋斗的目标，不仅在共同抗战，并更要共同建国。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各抗日党派，全中国人民，谁也不能在抗战中有异图，闹分裂。谁这样做，谁就是帮助敌人！抗战胜利后，建设艰难，更需要大家合作，共同努力。谁要想独霸，想分立，谁便会再度招致失败！中国抗战，非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不能成功。抗战胜利后，只能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客观历史决定的真理。谁违背这个真理，本身的失败事小，中华民族的失败事大！今天在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全中华民族之爱国各抗日党派，应该宣誓：使中国不再闹分裂，使统一战线永远的巩固和发展下去，使大中华民族永远地团结起来，一直达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辛亥、北伐、抗战，这三个历史时期，将造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长白山的雪，黄河扬于江的水，南海的波涛，蒙古西藏的高原，西北的风霜，将永远伴着中华民族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徽，雄立于世界，万世无疆，这应

该是我们对双十节永远的颂祷！

注释

[1]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五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名义，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各省人民的反抗。六月十七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举行请愿，遭到镇压。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早已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积蓄了力量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组成领导机构，决定于十月九日起义。九日上午，共进社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试制炸弹不慎爆炸，在汉口的机关暴露，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闻讯，改定当夜发动。因送信人未传达到炮营，号炮未响，各营未动，而武昌的机关又被破获，十日上午，清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将按名册捕人，形势紧迫，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在当晚起义，晚七时，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和金兆龙等首先发难，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各营奋起向总督署进攻，瑞澂、张彪等逃走，革命军遂占领武昌，时孙武、蒋翊武均下在场，革命党人强推清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2]北伐，参见本书《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注[8]。[3]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4]新军，指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辛亥革命前夕，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日益增多，新军就成为武昌和各地起义的重要力量。

[5]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碑即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遇害纪念碑。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是革命党人原定的起义之日。这天晚上十一点，起义领导人彭刘杨等正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楼上部署起义，迎候南湖起义的炮声，突然遭到清宪兵队和巡警的包围和搜查，彭刘等二十多位革命党人被捕。同时，为起义部队传递消息和运送弹药的杨宏胜也遭不幸。彭刘杨三人很快被押到湖广总督署大厅受审。三位革命者大义凛然，不惧酷刑，坚贞不屈，于次日凌晨就义于东辕门。三烈士殉难，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无比义愤，成了武昌起义的催化剂。如今三烈士纪念碑位于武昌造船厂后院，烈士就义处建立了纪念碑亭。

[6]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伪造民意，准备称帝，改次年为“洪宪”。孙中山和全国人民积极进行反袁运动。同年十二月蔡愕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要求停战。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别有意图，不肯为袁作战。六月六日，袁世凯忧惧病死。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卒驻沪海军到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一九一八年五月，桂系军阀分裂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辞职，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7]国府即国民政府，其前身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于七月一日改组为国民政府，通称“广东革命政府”。一九二六年一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政府从广东迁至武汉，通称“武汉政府”。同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八日在南京另立所谓“国民政府”。从此，“国民政府”便成为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政权。

[8]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在鲁迅逝世二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

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心诚意的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然而我却不愿意如景行严口声声“吾家大炎先生”似的而也说“吾家树人先生”，我只能如古诗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似的来怀念鲁迅先生。

确实是的看到田汉[1]先生的文章，想到去年纪念鲁迅先生，正是上海抗战危急，而今年纪念鲁迅先生，又是武汉危急的时候，所以使我们更易想到劲草忠臣的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人佑上，都有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鲁迅先生生时，在国难当头或局势摇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来的光明，把握注光明的前途。

在文艺上，鲁迅先生一贯地对旧社会给以无情的批判与揭露，不妥协，不苟且，指示我们一个光明的前途。即使在反映中国社会腐朽的阿Q正传上也显示出伟大的奋斗前途，而鼓励着大众反抗腐恶势力，这是在先生早期到后期都是如此的。

在先生为人上，对于社会改革、政治运动，是深切地关心着，而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个人生活、社交来往也是丝毫不苟且不屈服的。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特别在晚年对中华民族解放之努力，回答一个托派的信上，不容情地揭露托派之阴谋，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中华民族解放之大道，是值得我们钦佩他的政治远见的。

到今天，抗战已经一年有余，更走到一个艰苦困难的阶段，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非有如此信心，即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向前奋斗，反而会随时因困难而动摇屈服，妥协投降。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

在文学创作上，也可如此了解。一般常常争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在鲁迅作品中可得到正确的解答。一种写作的作品，没有不受环境的影响和加以主观见解的。只有主观上抓住最现实的生动材料，起了极深刻的反映，能产生出成功的作品。现实离不开环境及物质的支配，而同时又须有主观的选择，包含了理想的见解，并暗示着光明——奋斗目标，这必然是个好作品，正是鲁迅作品的精神、这理想在今天民族抗战的烈火中，便是争取民族解放胜利，一切以此为目标而奋斗着。今天读抗战文学，读现实文学，也便是需要这样的作品，才能动员大众，深入人心，而后在方法上、技巧上，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在武汉青年会举行。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武汉《新华日报》。

也便能更适合现在，更大众化、更通俗化。这种作风、，需要我们今天学习的。

所以，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发挥鲁迅先生的精神，有着强烈的现实反映，未来的光明追求，是我们今天在武汉更加危急，抗战遇到困难，同时也是战争更加扩大时，我们应有的抱负。我们应坚苦不拔，克服困难，为实现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注释

[1]田汉（一八九八—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自“五四”运动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抗敌演剧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建国后，对新中国的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和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领导人。

论今后敌人的动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目前战局正处在—期战争已经结束、二期战争将要到来之过渡阶段。从战略的意义看来，—期战争的特点，敌人是在企图速战速决，求得聚歼我军，逼我屈服，我们则在坚持长期抗战，诱敌深入，以图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这一战略任务，在敌人是失败了，在我们是成功了。因为敌人过去既然没有歼灭我军主力，今后更没有可以聚歼我军的机会。速战速决的可能既已没有，敌人将被逼进行长期战争，这是敌人战略上的失败。在我们则经过这十七个月的战斗，证明给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看，中国的长期抗战，不仅是必须，而且是绝对的可能。敌人愈陷愈深，我们愈战愈强，已成为中日战争中的真理，这是我们战略上的成功。

二期战争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在敌人方面，将因深入困难，后方威胁，不得不停止进攻，回攻敌后，在我们方面，则由防御与退却转入正面相持，深入敌后发展，以准备反攻。这种相持局面的来到是可能的，但必须以力量来争取，而目前还没到达这种时机，还没具备这种条件。因为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虽被击破，今后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诱致我军主力进行歼灭战斗，深入我方以后的兵力虽然不够分配，士气虽然日渐颓丧，地形交通财政生产等等条件虽然日渐困难，但敌人继续进攻的力量还有，进攻的企图并未中止。而我们虽已树立长期抗战的信念，最高统帅告国民书中所指示的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的一贯方针，虽已为全国军民所共守，但敌我力量的对比，究还未达到相持的程度。我们在正面的战斗，还未能完全阻止敌人的前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更未达到吸引和分散敌人使之难以前进的地步，在我新的力量的补整与训练，也还未达到足以击破敌人进攻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期战争中我们虽获得政略与战略上的成功和胜利，但由于许多政治军事上的错误和缺点所造成，使我们在—期战争已告结束之后，还不能不经过相当时间的过渡阶段。即是说，敌人的困难正在增长，我们的困难须待克服的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的长短，决定于战斗。敌人的进攻无疑是继续的，它不仅正在正面准备继续进攻和深入，并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外交通，并且在敌后也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我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即政治上，也正在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特别是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团结，削弱我国际影响。而我们只有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和动摇悲观的观念，特别在政治上，加强政治机构，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生动力量，供献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在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后方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只有这样，才能胜利的进入二期战争。

敌人新的进攻将向哪一方面发展呢？在广州陷落，武汉撤退之后，敌人的行动，在长江流域是扩张战果，在华南是集结兵力，在华北是企图打击和缩小我国游击力量，这一切都为的准备继续进攻。具体的情形，敌人陆军是

在补整与调动，海空军则加强活动，以扰乱我之南海，轰炸我之后方。在敌人准备继续进攻中，可看出一特点，即是敌人今后进攻的方向，有时将不局限于一点，而将同时进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向。因为，战区之广，交通之长，兵力之分散，不仅我们战区被敌人分割，不可能集中主力保卫一点，即敌人也不易集中全力进攻一方。故敌人今后的行动有可能向平汉粤汉同时进攻，为达到这一战略任务，敌人更有可能先攻广西，以破坏我西南局势，先攻陇海西段以切断我平汉联系。同时，敌人有进攻我国西北的可能。但不论怎样，敌人进攻必有重心，在南在北，将决定于敌人兵力转移的动向和战斗的发展。故目前战局虽较沉寂，但决不应以为敌人已停止进攻，而忘记利用敌人这一准备时间，加紧我们的布置，提高我们的注意，使敌人今后的行动再不能有以前的便利，到处要受到我们的打击，以增加敌人的困难，而争取有利于我的时机的到来。这是目前过渡阶段的战略任务。

二期抗战的重心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近两年，二期抗战也进行了半年多，目前抗战形势究竟怎样？这是大家急于要知道的，但为要了解目前抗战形势，必须先弄清二期抗战的重心究在哪里？依我的见解，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不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来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武汉陷落以后，敌人指出新阶段的战争，是建设战争，这证明重心是在敌后。我们南岳会议，最高统帅的指示，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精神重于物质”“节约重于生产”等等以及决定以几分之几的人力兵力财力深入游击区域，也都是重视敌后的明证。在国际方面，他们认为我们失去这样多的大城市，还能不能继续抗战，尤其是在沦陷的区域中，敌人能不能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补偿他的损失，来打我们自己？这种关心，也正是重视敌后。我们看，假使一期作战，敌我争夺的心是在正面，那末二期作战，敌我争夺的重心便在敌后，因为一期作战，敌人的目的，是在以其强盛的兵力求得速战速决，从正面压倒我们，不图打了十五六个月，敌人消耗兵力六七十万，并不能歼灭我们主力，占领了我们许多城市及交通要道，分散兵力过百万，也并不能控制我们，尤其是我们战斗意志并不因屡屡撤退而丧失，反而愈打愈强，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既归失败，于是进而便以诱降的手段，发表近卫[1]声明，企图速和速结。这个声明虽然勾引了卖国贼汪精卫[2]的响应，但禁不住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的当头一棒，打得近卫下台，精卫显露了卖国投降的原形。速和速结既又失败，敌人知道即使再进占两三个大的城市，也不能歼灭我们主力，更不能解决战争，但敌人的兵力却会更加消耗，更加分散，诱降的企图，反会更加无望。要是决心进行长期战争吧，敌人又决没这个把握，兵力的不够，财力的不济，物力的缺乏，人心的厌战，都使日寇军阀决不能作真正长期战争的打算，因此，这半年来敌人的方针，便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心使转向敌后，所谓以战养战，便是企图拿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补偿他的损失，继续来打中国，以敌人的想法，假使将敌人占领的区域真正为敌人所用，则敌人今日所侵入的十四省区，的确是中国人口最密，物产最丰，财富最多，交通最便的沿海各省，以此资敌，当然敌人困难会减少，而我们困难会增加，敌我相持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敌是不是能如愿以偿呢？我们的回答是决定于战斗，决定于各方面的斗争。我们现在看敌人是怎样在进行以战养战的企图，首先军事方面，半年来敌人是扫荡重于进攻。敌人在华兵力，约卅六个师团番号，除南昌枣阳两次战役，敌人使用了五六个师团向正面推进外，其他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之防卫与扫荡。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正面只看到南昌枣阳两次较大的战役，而在敌后则敌之扫荡战与我之反扫荡，几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次之，在经济方面，敌人是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这半年来，敌人自兴亚院[3]成立之后，尽力企图经营在华占领地区的经济，如恢复工厂矿山，收买原料粮食，推销仇货，发行伪币，建设交通海港等等，都是想从中国来补偿损失，维持战争。再次，在政治方面，敌人已

这是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讲话。原载《群众周刊》第三卷第五期。

知南北傀儡政权，全无作用，故极力勾引汪精卫，企图由汪来组织伪党伪政府来分化我国。最近汪逆精卫跑到上海去，组织所谓“世界和平会”即是这种叛国逆谋的具体步骤。另一方面，敌人还企图勾引吴佩孚[4]组织伪军，以中国人来杀中国人，但吴佩孚究竟胜过汪精卫，至今不屈。于是日寇不得不利用落伍军人士匪流氓来组织皇协军、绥靖队这些不堪一击的伪军。更次在精神方面，敌人是欺骗怀柔已渐渐重于残暴屠杀。作战近两年，敌人已知其残暴政策只能增强我国人更大的同仇敌忾，决不能压服我国人心，因此，敌人乃不得不提倡华新认识。但不管怎样，仍然是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意识，东洋思想，共同防共那一类话。以上这一套法宝，便是敌人重视敌后以战养战的具体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怎样呢？我们可以说基本上上半年来敌人并未达到他以战养战的预期效果。扫荡战愈因扫荡而兵力更散，更加无力进攻。经济开发遇到我们抵制封锁，建设遇到我们破坏，收效也就会极微。汪精卫叛迹愈著，他的欺骗作用也就愈小，死期也就愈近。精神欺骗，只要我们随时揭穿，警觉着大家不要上当，则和平便是投降；反共即是灭华的至理名言，将永远为我们抗战的戒条。并且汪精卫叛国的勾当做得愈多，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也愈易暴露，愈难收效。即使过去敌人有一些收获，也都因为我们自己有些弱点，有些缺点，并非敌人之强所致。我们要知道，一期作战，敌人还凭着他自己的国力来进攻我们，故我们当时在争取主动，现在二期作战，敌人要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其主动已操在我。只要我们努力，不让敌人利用我们人力物力财力，则敌人便无法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而只有继续失败。所以我说，二期作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便是这个道理！认清这个道理，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展开敌后的全面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是军事任务，而且是政治经济上精神上的任务。要与敌人展开全面战争和各方面的斗争，必须在敌后有根据地的建立，才能依靠那里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与敌人进行精神动员，武装斗争，经济封锁抵制和破坏，推翻敌伪政权，瓦解伪军，动摇敌军，恢复自己政权等等工作。没有根据地，便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便无法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敌后争夺，而敌人以战养战的危险便会增长。而以变敌后为前方，必须以建立游击根据地最为具体的要求。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是游击战争的直接任务。游击战不拒绝必要时机袭占敌人占领的大城市，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主力，但经常的任务是在不断的杀伤敌人，破坏敌后，只要我们深入敌后的作战部队，不断的消耗敌人，则积小胜成大胜，便是今天的战略任务。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我们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假使我们每一游击部队每天平均能消耗敌人十个，则全国里一百个这样游击队，便可以消耗敌人一千，一年便可消耗敌人三四十万。敌人最基本的弱点是兵力不够，怕损失。我们如能牵制敌人向后，而又消耗极大，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年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事，重心认定。二期抗战，一定可进入有利于我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村，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夺敌后，在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注释

[1]近卫，即近卫文营（一八九一～一九四五），日本首相（一九三七～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组阁，发动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扩大侵华战争。一九三九年一月辞职，任枢密院长。一九四〇年七月再度组阁，对内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新体制运动”，对外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并同美国进行谈判。一九四一年七月第三次组阁，因对美谈判陷于僵局，阁内意见不一，十月十六日宣布总辞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十六日服毒自杀。

[2]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一九二六年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兴亚院是日本政治经济侵略的主要机关，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举凡所有对华根本方针，都须经兴亚院会议议决才能付诸实施。所谓兴亚院会议，系五相（即首相、财相、外相、陆相、海相）加上总务长官的会议。兴亚院从其性质上看来，属于殖民地化的建设，它所包括的部门为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

[4]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 和目前任务

(一九四一年三月)

—

中日战争已经进行快三年了。这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国人民为谋其民族解放的彻底成功，只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然而由于长期战争的关系，特别是对于日本的消耗，不能不影响战争的双方，尤其是由于西欧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以来，整个的国际形势有了变动，这就给中日战争更带来了新的影响。于是在日寇，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及一部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中间，正发展着一种共同的趋势，即是企图从牺牲和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从分裂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及引导中国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协的出路。但是中国的广大人民和抗战军队，则正增长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要求，以期达到胜利的出路。

这正是—个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及其英勇的军队，在这个严重的转变的时机中所进行的反对投降、分裂和争取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斗争，正关系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样对于世界劳动人民尤其是日本人民及东方被压迫民族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

在中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抗战营垒中存在着的投降危险，再没有比现在更尖锐化了。这种危险的来源，要从三方面看：

第一，要从帝国主义列强方面来看这种投降危险的来源。

在国际新形势下，世界反和平、反人民利益、反苏联、反弱小民族的先锋，已经是英法反动政府。它们正在企图牺牲全世界劳动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将它们拉入西欧帝国主义的战火中去。美国政府表面上虽讲和平，虽主中立，但实际上是支持英法帝国主义这一倾向的。因此，这就不能不使它们对于中国的立场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重大的影响着中国的抗战营垒。

假使在欧战开始以前，英法帝国主义者利于中日战争延长，双方削弱，以便后来它们好出头仲裁，那末，在在它们便利于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利用中国资源人力到欧战中去，吸引日本加入英法联盟，并诱引中国去反对苏联。显然，目前英法在远东的地位是减弱了，因此，它们更趋向于对日妥协，相当的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所得，以换取它们在远东利益的保持。美国在远东的比重虽然加强，但它一方面既怕中国民族解放战争走向彻底胜利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因为战争谋利者的重要主顾已经转在西欧，所以最近它在远东问题上的积极，正是要寻找妥协的途径，以便好出头调停中日战争。不管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在远东问题上有何矛盾，不管它们对日寇的矛盾多么大，它们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所加强的压力，正是一致的趋向于引导

中国走向投降，并企图从挑拨中国抗战内部的分裂上开始，以便取消中国人民对于日寇的抵抗。

同时，它们这种取消中国抗战的企图，又正是与它们压制其本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压制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联系着的。

三

第二，要从日寇方面来看这种投降危险的来源。

日本帝国主义在近三年侵华战争的消耗中，造成它国内困难的日益增长。日寇在两年半的时间，动员到中战场作战的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其中伤亡数目便近七十万人。照专家估计，日寇在其保留的壮丁中，只能再组织三十个优秀的师团（包含已组成在后方的十三个师团在内）。这样就使日寇感觉它准备用以应付其他事变的兵力大大的不够了。日寇三年来关于军事性质的用费已达到一百六十万万日元，其中属于战争的追加费用已达一百二十万万日元。本年度的国家预算，已超过一百万万日元，较战前一九三五年度预算增高到百分之四六九。这一切费用的增加，完全依靠于榨压人民的捐税及巨额公债的弥补，而公债推销不出的情形，已一天天严重起来。日本的军人及其军用品原料，大部分是依靠国外输入。单一九三八年便输入十一万万日元。因是，在战争中，日本贸易每年都人超五万万——六万万日元。而为弥补入超，便须输出现金，现存的金子在一九三九年底，不过两万万日元左右了。由于这些空前的战争负担，加以轻工业的衰落，农产品的缺乏，物价的昂贵及战时的一切征发，使得日本人民的生活严重的恶化了，尤其是日本军队士气的低落，日本人民厌战心理的增长，更加使日本帝国主义内在的困难尖锐化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及其军队的抵抗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也是它完全没有料到的。它在侵华战争中的速战速决计划，是早已失败的了。但战争愈延长，它的消耗愈大，困难愈多，危机愈深，单靠军事力量决中国问题的企图，它就会愈加无望。当着战争的第一年，日寇用兵达三十七个师团，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一千八百多公里，第二年减成三十三个师团，只前进了一百一十公里；第三年的上半年，军队无大增减，亦只前进了一百多公里。显然，日寇单靠军事进攻，是很难大有作为的。因此，它在最后一年中，便着重于政治进攻，企图用“以华制华”的办法，树立傀儡政权的中央，分裂中国内部，引诱中国当局投降，并企图用“以战养战”的办法，开发中国经济，将战争的担负放在中国人民身上，放在其占领地区。然而由于汪精卫的无耻卖国，使中国军民反更增加对于傀儡政权的鄙弃和愤恨。关于敌占区域的经济开发，日寇虽有它的在华北、华中增加工厂企业和吸收中国资源的计划，并企图以中日合股公司来引诱中国资产者做它助手，以便共同榨压中国的劳苦人民，但因为日寇占领区域之中国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破坏，除掉几个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等外，这些计划也还难于实施，而中国的资产者也常常因此发生踌躇。两年半中，日寇侵入中国十四个省区，在其所包含的九百多县中，因为无中国正规部队及游击队的活动而能完全实施敌伪政权的只一百多县。最近一年多，日寇也曾用其在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兵力（约二十七八个师团）担任其占领区的保卫和“扫荡”，但结果，只在某些中国部队不熟练于游击战术或与人民关系还不好的情况下，才收到一

些“扫荡”的效果。同样，货的倾销，伪币的滥发及其对我金融的捣乱，也正因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封锁不严，抵制不力，尤其因为买办奸商的无耻投机，才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某些收获。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加懂得：如果战争继续延长和单靠军事力量解决中国问题，它会有一天在中国完全破产，并促成其国内矛盾的爆发。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就更加急于要结束战争。

同样，由于上述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也更加懂得：如果不从中国抗战营垒内部，布置内奸，制造分裂，则它单凭从外面实施政治进攻，也还难于收效。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就更加要用全力来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和引诱中国当局投降。还有，由于欧战的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希望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忙于欧战的机会，加紧巩固其在华掠夺的所得，并希望从欧战中获取利益，以补偿它在侵华战争中的损失。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也很希望能从速诱成中国当局的投降，以便造成其征服中国称霸东亚之更优越的条件。

因此，不管日本统治阶级的内阁更换多少次，他们内部的矛盾多么大，但他们这一引诱中国当局投降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方针，是确定的了。并且这一方针，又正是与其压制本国人民军队的反战运动密切的联系着的。

四

第三，主要的更要从中国自己方面来看这种投降危险的来源。

在中国内部，抗战的困难不是没有的，然而并非不能克服的困难。一部分人在长期战争中感到疲倦，这也是事实。然而广大人民及前线军队却正前仆后继的奋勇争先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可是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深怕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宁愿在困难面前投降，去与日寇勾结，企图从中日合股公司中乞得榨压中国劳动人民的利润残余，并企图从欧战得余中也能分得一些赃物。

这些人，一部分已直接的去向日寇投降，去与汪精卫及其他汉奸勾搭一起，这种公开的出卖，是中国人民所能看见的危险，是汪精卫一流的投降分子。但现在最大的危险尚不仅如此，还有更严重的是今天尚暗藏在抗战营垒中的投降妥协分子，他们口头上说要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则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的抗战力量，以放弃中华民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最坚决的、最一致的斗争。

这种危险主要的是反映在国民党中。投降分子与国民党的抗战领袖及其群众是有严重区别的，与广大人·250·及抗战军队是对立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主张抗战到底，他们却希望对日妥协，或者经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仲裁，尤其是希望美帝国主义出头仲裁。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要求政治进步，他们却压制进步的抗战组织、抗战言论、抗战分子，尤其是共产党。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要求全国抗战军队的团结和一致，他们却挑拨抗战军队内证，阴谋叛变。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欢迎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民主制度，最广大的动员了人民的抗战力量以推动全国的进步，他们却主张取消边区，并给以军事压迫。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欢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创造了许多游击根据地，他们却主张削弱八路军、新四军，取消游击区域，并进行武装冲突。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拥护国共及其他抗日党派合作，拥护统一战线，他们却不

承认国共及其他抗日党派合作，并破坏统一战线。

这一切抗战营垒中的投降分子、顽固分子，是在企图以自己的造谣污蔑，陷害全国进步分子，陷害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和军队，而展开武装的冲突，以分裂中国抗战的力量。这样，正是铺设投降的道路，正是适应日寇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而造成目前投降危险的主要根源。

五

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华民族处在今天的严重时机，只能是继续抗战，决没有和平可言。今天中日间所讲的和平，不管是汪精卫所解释的、或者是抗战营垒中投降妥协分子所活动的，或者是幻想经过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仲裁得来的，只能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不能有其他意义。

“和平”就是投降，乃是今天中国抗战中的真理。投降必然引导中华民族走上不可挽救的悲惨结局。

汪精卫所解释的和平，就是完全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实质呢？日本帝国主义要建立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奴役中国人民的秩序。日本帝国主义所说的东亚协约国，就是要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所要实现的中日“满”经济提携，就是要在殖民地化中国的基础上，繁荣起日本帝国。日本帝国主义所高喊的共同防共，是要分散中国的抗战力量，便于它宰割中国人民。显然，在这些基础上所接受的和平，只能是亡国的和平，中国人民所万万不能接受的和平。

抗战营垒中投降妥协分子所活动的和平，就是一方面在中国抗战内部打击抗战力量，并对抗战怠工；另一方面则解释日本帝国主义既然希望迅速结束战争，必能它适可而止，以求得彼此和平。结果呢？我们知道：打击抗战力量，就是要压制中国进步力量，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边区；对抗战怠工，就是要使中国抗战的有生力量不能源源增长，一切抗战的资源不能拿来利用，在日寇占领区域的人民抗日游击运动，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样，正是解除中国自己的抗战武装，而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所要求的和平。同时，我们也知道：所谓适可而止的和平，就是要让日本帝国主义拿稳了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域，以便它好从这些最富饶的区域取得中国的人力资源的补偿，并且还可利用这些补偿，一方面继续征服全中国，另一方面好向亚洲的南部发展。最后，日本帝国主义还可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去做它在将来帝国主义战争中的牺牲品。显然，这样的和平，不仅要今天的中国人民变成服服贴贴的奴隶、牛马和炮灰，而且还要中国人民的子子孙孙都变成服服贴贴的奴隶、牛马和炮灰。

还有，对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出头仲裁的幻想，以为经过它们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让步的和平。实际呢？在现在西欧战争的条件下，英法美帝国主义不仅难于从日寇方面得到多少让步，即使得到什么让步：也是对英法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让步。现在美帝国主义正以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开放中国扬子江航路及赔偿美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损失，做为日美商务谈判的交换条件，这就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哪里了。并且，在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对中国有任何实际上的让步，即使有一些名义上的让步，也是为的引诱中国当局，麻痹中国人民，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以便其分裂中国和继续征服中国。显然，这种幻想的和平，只能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宰

割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牺牲中国的危险。

这一切的和平，在中国的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眼中看来，都是投降。中国的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决不容许把中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决不容许把自己及自己的子子孙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牛马，决不容许投降妥协分子出卖中国，决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牺牲中国。中国的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懂得：要取得中国人民的真正和平，只有把抗战进行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赶出中国去。汪精卫式的投降，已经被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所反对所唾弃了。不管今后任何人主动投降，采取任何新的方式投降，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总要继续反对他们、唾弃他们的。即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抗战营垒中经过投降妥协分子，打击抗战力量，分裂抗战中国的阴谋，万一得到某些成功，中国的人民群众及抗日党派，武装力量，也一定要继续抗战下去的。不达到胜利的目的决不休止的。

六

并且，目前中日战争的形势，正处在这样的情形，就是谁能够将战争坚持下去，谁就能够取得战争中的优势，以便于争取最后胜利。中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失地很多，损失很大，但许多条件，却利于持久战；即使在现在，这些条件，也大多存在，并且还有新的条件的增加。

首先，中国是以人多优越于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了超过它预定计划四倍以上的兵力（三十三个——三十七个步兵师团）进行侵华战争，中国却以三倍于它的兵力抵抗它。战争近三年，中国军队伤亡的数目，虽然超过日本，但中国抗战的主力军，却仍然保存，抗战的情绪却仍然高涨。中国土地的损失，虽使中国人力的动员受到影响，但现在中央政府能够实施动员计划的区域还包含二万万七千七百万人口，过去的动员还只达到中国人口百分之一，即在敌人占领区域，中国游击部队也还能进行动员，这证明中国人民对于抗战军队的补充，还有着无限的可能。

次之，中国是以地大优越于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虽占了我国许多领土，但直到今天，也还是点与线的占领，即是说，它只占了一些城市，靠着铁路、公路、航线来联络，更靠着庞大的军队来保护，此外广大的乡村，仍然中国的抗战军队及人民游击队所占有所活动。所以中国抗战的战场，不仅在正面，而且在敌后。同时因为中国的地形复杂，所以日寇近代化的兵力便难于到处施展，而中国军队运动战、游击战的优点，却能到处发扬。

再次，中国的资源也是优越于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国内资源动员方面，已感到了相当枯竭。而中国则正相反，许多能够制胜日本的资源，还没有动员起来。中国虽失去许多工业中心和铁路矿山，中国的海口虽尽被日寇占领或封锁，并且日寇还正在继续进攻，企图达到它从广西切断西南、从宁夏切断西北之中国对外交通的计划，但是，中国军队最低限度的需要，中国现在是能够生产能够供给的。中国的粮食不缺，去年还是丰收。中国的棉花、羊毛是有的，困难在织造不够。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在敌占的沿海口岸，而内地却是货币不够周转，中国国防工业的资源也是具有的。

还有，更主要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是民族解放和保卫祖国的战争，是抵抗日本强盗侵入中国领土的战争，所以它最能动员广大的人民。在战争中，英勇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几百万人的补充到军队中去，千百

万群众为参加战地服务，担任临时工役，在后方增加生产，动员征募，这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尤其是在日寇占领区域，有无数的中国人民游击队。他们在敌后，成为一种武装的统一战线，在他们中间及其周围，聚集着不分派、不分阶级、不分民族，只要是抗日的老少男女，一致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斗争。他们不仅与敌人作战，担任牵制、消耗和破坏敌人的任务，而且还与敌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摧毁敌伪政权，封锁敌人经济，力的是要打破敌人利用中国人力资源的企图。

另一方面，日寇所进行的战争，却是帝国主义侵入他人领土的掠夺战争。成百万的中国劳苦人民和青年学生，受着日寇的压迫，在各地流亡，失业失学，成千成万在战区、在后方的中国人民，已经在日寇炮火炸弹之下做了牺牲，这些都不断在增加着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同时，日本人民特别是在士兵中，由厌战心理已渐渐生长起反战情绪，开始了小部分的反战活动，最近日寇枪杀其反战士兵甚至其下级军官的事，已在广东山西等许多战线发生。因此，日寇军队在中国作战，外部既已孤立，内部又有隐忧，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展起来的致命伤。

最后，中国人民在自己方面还有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援助，而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则恰恰相反。尤其是欧战发生，它已从远东吸引去了英法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这更便于中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走向彻底的民族解放。并且这一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引起这些国家内反战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引起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正是与些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世界联系。

以上这一切优越条件，再加上一个时间的延长，便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每一月每一季的持续，对于日寇是一天天陷入难境，对于中国是正好拿来增强自己的各种优越条件。

七

所以在目前严重的转变的时机中，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继续和争取抗战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警觉起来，为着克服这种投降危险，并约制这种危险的发展而斗争。投降分子在中国散布和平空气，我们要揭穿他们在这种和平空气下所进行的投降阴谋。投降分子故意扩大宣传中国在抗战中的弱点，我们要发扬那些有利于中国持久战的优越条件，以坚强政府和人民继续抗战的信心。投降分子对抗战怠工，我们要暴露他们的阴谋，以抗战的胜利行动来打击他们。投降分子与顽固分子合力压制中国的进步，我们要团结全国进步的力量反对他们的倒退，投降分子结合顽固分子向中共及其军队和边区进攻，我们要站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上，反对他们破坏民族抗战中最坚决的力量，停止他们这种进攻。投降分子正在企图从抗战营垒中，分裂统一战线，以扫清达到投降的道路，我们要孤立这些降分子，排除这些投降分子，以巩固抗战营垒，使抗战能够继续，能更有利于争取最后胜利。

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更广泛的动员起来，为着继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战斗到底。中国的军队在其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已经写下了空前的英勇战绩，最近一年，在湖北、在河北、在山西、在长沙附近，最后在广东、广西都曾经击退了敌人的战役进攻，取得了我们局部反攻的胜利。

现在我们要展开这种胜利到各个战线上去。我们要改善动员工作，使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够更多的到军队中去，参加前线服务，参加游击运动，尽他们的一切力量，用他们一切所能做到的办法，去进行反对日寇的斗争。正面的中国军队，要能够更加坚强起来，阻止敌人的前进，并取得更多的战役反攻的胜利。敌区的中国游击部队，要能够更好的配合正规部队作战，更密切的结合战地广大居民，更多的得到中央政府的帮助，以便更有力的击破敌人的“扫荡”，吸引和分散敌人的主力，使敌人难以继续深入中国内地。同时要反对一切破坏游击队的阴谋。后方的中国预备队，要能够更加紧于近代化的装备和训练，以便能源源不绝的补充前线，加强前线，并准备将来的反攻力量。这一切动员，都为着战斗力的提高，都为着中国抗战的继续发展，同时，也正是给投降阴谋分子以实际的打击。

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敌人领区域中去。在那里，我们不仅要发展游击战争，并且要破坏日寇“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在那里，军事的行动要与政治的、经济的斗争配合起来。我们要破坏敌伪政权，要揭穿日寇的一切欺骗宣传。我们要破坏敌人在占领区域的开发经济计划，抵制它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向中国倾销日货，破坏它在中国的交通运输和一切军事建设，拒绝使用它的伪市和供给它的食品原料。为着达到这些目的，我们特别要组织起敌人占领区的城市工人、交通工人、矿山工人，广大的乡村农民，以及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是反对日寇斗争的基本群众。为着达到这些目的，我们也要坚决的反对那些与日寇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的汉奸买办。

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为着便于抵抗日寇的斗争，要求政府实施一些必要的政治的、经济的改革。我们要求民主，是为的使人民代表能够参预国事，便于动员民众到抗战中来，同样也是为的使抗日的言论集会和团体得到自由保障，而破坏抗战阴谋投降的言论集会和团体得到制裁。我们要求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是为的能够把国民大会变为巩固全国统一和动员全国人民力量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保障。我们要求实施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是为的使政府的财政设施不是为着少数财政巨头和贪污分子的利益，而是为着抗战的利益，使政府的经济建设能够向着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即是动员全中一切资源，以最快的速度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

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认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谁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同盟者和同情者，谁是为着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来利用中国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反对对于任何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出头调停中日战争的幻想。我们信赖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更要首先注意到援助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尤其是瓦解日军的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在危机是一天一天增长，我们要使中国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联系起来，我们要使中国人民和军队对于日本军队的宣传和破坏工作与日本军队内部的反战运动配合起来，以便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最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坚决相信：为要实现这上述一切任务，就必须依靠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首先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三年来，中国共产党无日不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为着全国的团结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巩固，敌后游击运动的扩大，都是有利于抗战的重大因素。同样，只要与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也曾采取过而且还要采取一切必须的步骤，以巩固

全国的团结。但是必须指出，那种取消边区，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计策，是与中国人民抗战的利益不相容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的。在今天，投降分子还企图分裂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却忘记这已为中国人民连国民党的抗战领袖和群众在内所反对的了。在今天，投降分子还企图挑拨起中国抗战军队中自相残杀战争，他们却忘记这些军队已经不是抗战前的军队了。所以某些顽固分子勾结投降派，曾利用军队挑衅，但结果却受到应有的惩罚。

中国人民今天已经懂得：凡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他们拥护；凡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坚决的站在这一立场上，愿意与国民党的抗战领袖及其群众亲密合作，愿意与中国的抗战军队戮力同心，一致的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

我们相信贤明的国民党的抗战领袖，英勇的中国的抗战军队和我们一样想法。只有团结，才能击破投降分子的阴谋！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维护团结坚持抗战
——致阎锡山[1]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

百川先生赐鉴：

年前因臂伤出国，未遑趋候。比治愈归来，复因委座电催南下，而先生亦已东行，更不克及时晋谒，歉憾殊深。举国抗战，瞬达三载。华北苦撑，赖先生维护其间，得有今日。不幸晋中新旧之争[2]，竟造成骑虎之势。来于远道闻之，已感至痛，归后得悉梗概，深觉此种亲痛仇快之事，必有好人播弄其间，故欲使先生多年心血所造成之抗战力量归于瓦解而后快意者。诚以八路与新军之合作，曩来在太原与先生计划战地动委会[3]时，即有定议。临汾失守后，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恢复失邑，成绩昭然，而全国亦咸以敌后模范归功先生。乃奸人见忌，故抨新军于外，以毁先生之长城，来实为我山西之模范抗日阵线痛惜不置。

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披诚直达，敬希明鉴。顺颂道安！

周恩来 启
五月九日于延

注释

[1]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2]指山西的新军和旧军之间的斗争。新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以第二战区山西部队的名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番号，由中国共产党人组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旧军即阎锡山的晋绥军。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旧军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向新军发动进攻，企图消灭新军，结果这次进攻被新军粉碎。[3]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等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共同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晋北、绥远、察哈尔战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动。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战的问题，很显然地这是每个人都在考虑着的问题。兄弟个人提出九个问题和答案供献大家参考。第一个，世界往哪个方向走；第二个，中国向哪个方面走；第三个，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第四个，日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第五个，苏联保持什么立场；第六个，中国采取什么立场；第七个，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第八个，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的危机。最后，第九个答案是中国怎样才能使抗战步？

关于第一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正进行着广泛的战争，在这里一共有三个不同的体系和范畴，一，帝国主义争世界霸权的战争体系，由德国和英法的战争发展到德意日与英美的对立。是帝国主义走向削弱和崩溃的过程。二，是进行着解放战争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主要的代表就是中国的抗战。三，是坚持和平政策，站在战争以外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他正日益坚强与壮大着，他增加着摧毁帝国主义体系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这三种体系的发展，就是整个世界趋势的答案。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在目前的局势下，我们主要的斗争目标仍旧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来应付世界大变动的局面，坚持独立的立场。这个不仅要使我们自己得到解放，而且将要引导全世界半数以上的被压迫民族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这就要遵照蒋委员长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指示。

第三个关于欧战趋势的问题，欧战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战争开始前后，英法帝国主义始终是怀着把自己的战争转变为反苏战争的幻想，但是失败了。接着第二阶段便是持久战与速决战的斗争，在英法方面，那时有两套法宝以争取持久，一是扩大战争，二是争取与国；而在德国方面的两个法宝则是，一是闪电战术，二是各个击破，以求速战速决。但这双方的法宝都遭遇了失败，在法国屈服[1]，近卫[2]登台，美国积极支持英国特别是德国攻英不甚顺利以后，德国的政策显然要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英美，英美也更需要站在一起，因此，成现在德意日和英美两大帝国主义阵线的对立。这说明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持久下去，扩大下去。也就是全世界人民遭受的灾害将更大，人类文明的损害必要多。

第四个关于日美关系发展的前途问题，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不应对任何帝国主义外援存着幻想，但亦不应抱那种忽视利用国际有利于中的每一个变化的态度。日寇在其解决中国问题的迷梦幻灭以后，日寇不得不更积极南进，以求解决国内矛盾，国防上的资源供给，同时也因为德国现在局势的需要，于是订立了德意日的三国同盟[3]，这总是拖日寇下南洋并且主要的是防美制美的一着，但日美矛盾尖锐的发展并不一定急转直下，立刻发生大冲突，他们还尽可以走着曲折的道路。但这种矛盾发展的前途，终于会走上冲突的道路的。

关于第五个问题，首先应指出，苏联为了要脱离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为了防止反苏阴谋的爆发，为了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他是坚持着和平中立政策的。但援助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和善邻友好的政策是一个和平政策的两面，而且援助中国更是由其革命政策出发的。时，苏联对美日的冲

突和中日战争的看法是完全两样的，他对美日冲突的态度显然是中立的，而对中日战争是同情中国，因此他一定能不断地给我们以援助。

第六个问题是中国自己在目前应采取的立场。

一、如上面所说，必须坚持最高统帅的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主张，对日美冲突不要幻想。二、应利用日美冲突反对日本，要坚持我们抗战立场，不要使抗战变质，甚至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对美国二千五百万的借款，我们诚然感奋，但这是三千万钨矿换来的，我们熟知美国的朋友张彭春先生就说过：“英美对中国的帮助是使我们吃不饱也饿不死！”同时更要求把这笔钱完全用到抗战上去，不要再加在那存在美国银行的一万七千万美金上去！三、对德意态度，在欧战上我们是中立的，但在太平洋上，他们如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力量支持日寇，我们则坚持反对。四、对苏联我们应法除疑虑，如果日美冲突更大，苏联是不是还会帮助中国？只要中国进步，是可以的。有人问中国会不会全像波罗的海几个国家的命运，归并给苏联？关于这，这是没出息的想法。

第七个问题“日本帝国主义能不能结束侵华战争”？这是不可能的，这原因在于我们能够不无端悲观，不过分乐观。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现实，克服一切困难。在近卫登台后，日寇的企图，是想结束中国事变，以便抽身南进。他的企图最可以有三个：即是一，如果我们屈服，他就抽身南进，否则二，截断西南交通增加抗战困难，以便分兵南进，三，如果上面两个都不可能，而时间又迫不及待，他就只能不顾一切，放手南进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抗战争取时间延长下去，日寇终会迫不及待的放手前进的。只要们撑得下去，日本就拖不下去。

关于第八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投降的危险和空前的困难呢？投降的危机是有的，但这是局部的，在全国人民的坚持和最高统帅的英明领导下，可以保证我们不会投降。同时因为西南交通不是完全由我们来决定，必须要看英美有没有决心。所以我们可能遭受到这种困难，但如果我们能够忘掉北平，天津，上海的糜烂的生活，想起我们凡十年前老祖宗的生活，我们现在并不苦。

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抗战进步？抗战本身就是推动进步的基本力量。在这里关于兵员的补充，粮米的筹储，金融的调节等等的进步方法，到了紧急的关头，将要为各方面逐渐采取的。所以坚持抗战就是解决进步问题的前提。比方团结问题有人认为进步太慢，但中日战争的发展本来就是慢慢的。我们不必性急，在患难中一定能够抱头痛哭，也就能够看出谁是真正的朋友。只要全国的人民一致要求团结，齐心对付敌人，团结是没有问题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注释

[1]一九四一年六月，法西斯德国侵占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七月一日迁都法国中南部城市维希，组织维希傀儡政府。赖代尔、佛兰亭、达尔朗等先后主持维希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军队和法国游击队的联合打击下，宣告垮台。

[2]近卫，参见本书《二期抗战的重心》一文注[1]。[3]三国同盟，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又称《柏林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扩大侵略战争，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统治权；德、意承认日本在“大东正”建立新秩序的统治权；缔约国以一

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条约标志了德意日三国轴心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后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芬兰、西班牙、泰国以及克罗地亚，伪满洲国和汪精卫傀儡政权也相继加入这一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失败，条约遂亦废除。

为皖南事变[1] 题词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

—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中华民国卅年一月十七日夜

二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注释

[1]一九四一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PGN0272.TXT/PGN>

答《大公报》社论_09100821_0273ESPL>
——致张季鸾、王芸生 [1]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季鸾

芸生 两先生：

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 [2] 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惟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一部又为《华盛顿明星报》之毫无根据的社评，不权贵报“不愿相信”，即全国同胞亦皆不能置信。盖美国虽为助我国家，但美国报纸论断通信社消息，却不能尽据为信，例如华盛顿十九日合众电，竟称“据拥护政府最力之参议员多玛斯对合众社记者谈称……彼素即主张以逐渐之方法调解中日战事”，我们能因此便信美国政府已接受日本之和平提议么？况中共与汪逆 [3]，久成“汉贼不两立”之势，国内某小部分人或可与汪逆重谈合作，中共及绝大多数之中国军民，吾敢断言，虽战至死，亦决不会与汪逆同流合污，投降日寇。至敌人谣言，则所造者不止一端，即单就晋南战事论，南京二十日同盟 </PGN0273.TXT/PGN>电，亦曾说：“当晋南、豫北战事发生之前，胡宗南 [4] 为奉命包围红（？）军计，曾自晋南抽出所部五师调至陕甘宁三省……以致晋南渝（？）军实力大减。”我想贵报对于此种说法，当同样“不愿相信”。

再贵报所引事实，一则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再则谓：“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但我可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它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言，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惟环境限人，贤者当能凉我等处境最后，贵报更寄其希望谓：“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在其向所服膺的团结抗战精神之下，十八集团军更应该立即赴援中条山。”贵报的热忱，我们感奋，贵报的热望，我们永远不会辜负。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 [5]，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 </PGN0274.TXT/PGN>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竟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今年皖南事变 [6] 后，正当着敌人从信阳出击我友军东进之侧后，而李长江 [7] 又适于此际叛变于苏北，我们在苏北、皖北的部队，决没有丝毫放松与友军配合打敌，并且还追击了叛军李长江，这也证明我们并不是抱怨者。今年二三月日寇在华北分区扫荡，由五台而大行而冀南而山东，我们决没有丝毫放弃华北抗战的根据。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更不会以此抱怨别人。并且，也不如敌人谣传十八集团军主力是以中条山为中心（自去年漳河

划线 [8] 以来，我们严遵军令，中条山并无十八集团军一兵一卒），而是远处在敌人重围中的。不过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同时，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我们现在仍守漳河之线，未入林县一步，犹为敌人故意挑拨，说十八集团军袭击林县某总司令部，而此地亦有人据此为言者，想见情况之杂。

诚然，“山西是北方的高原，有山西可以控制北方数省，中条山是山西的锁钥……”但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管洋山可以俯瞰塞外，五台山可以连接冀察，太行山可以东出河北平原，吕梁山既可屏障大河以西又可配合太岳山，控制汾河流域。临汾失守以后，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握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尤其因二十七年春晋东南反敌扫荡一战 [9]，早奠定了中条山锁钥之基。回想彼时各军协同作战之盛，诚愿能复见今日。

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则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十九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作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我欲言者虽未尽万一，但个中况味，亦雅不欲再公之笔端，为敌人造挑拨资料。惟信不久战况揭晓，捷报传来，当必较千言万语为能作更有力的证明。匆匆书此。敬颂
撰安！不一。

周恩来 谨启

五月二十一日夜

注释

[1]张季鸾（一八八八～一九四一），原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当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一九〇一～一九八〇），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当时任《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

[2]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在山西省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后国民党政府军溃退，日军随即占领中条山地区。

[3]汪逆，指汪精卫。参见本书《二期抗战的重心》一文注[2]。

[4]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5]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对日本侵略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6]皖南事变，参见本书《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7]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政府军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一九四一年初率部投降日本侵略者，随即被汪精卫伪政权委任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其主力被新

四军击垮。

[8]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中共中央力争取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抗日，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三月中旬，双方议定沿漳河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政府军驻区，该线以北为第十八集团军驻区。这就是漳河划线。

[9]指一九三八年四月晋东南军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军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之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等进行围攻。这一地区的军民与日军展开坚决的斗争，至二十七日，共消灭日军四千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十八座县城，彻底粉碎敌之围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向着扩大和持久的道路着着迈进。战争的范围正由欧洲非洲发展到亚洲，由地中海大西洋发展到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在今年春季后的整个时期中，将充满着激烈的决斗，并且会继续下去。

目前战况，正在地中海和地中海沿岸向前发展，大西洋中的封锁战与反封锁战亦日益激化。虽然最后的决战还没到来，最后的胜负谁属，抑或两败俱伤，都还未定，但这种空前的屠杀和灾害，已经降落到和将要降落到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身上。而遭受屠杀灾害的世界和平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也正在发展着和将要发展着反抗运动、革命酝酿乃至革命战争。只有苏联是屹然站在这个战争烽火之外，坚持其和平中立政策，建设其伟大社会主义，并给国外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以同情和援助。但同时苏联仍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他不能不严重的提防着“种种惊人巨变”，以阻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帝国主义战争自去年法国降德[1]以后，显然已分成两个集团。在三国同盟[2]方面，德国是主角，意大利是配角，日寇则在太平洋上发挥其半独立性的助威作用。在英美集团方面，美国是跟在英国后边，一步一步的进入实际参战。德意日是要先打垮英国，英美则是先对德，后对日，故目前战事重心在大西洋，并非太平洋。纳粹德国的战略企图有两点：一点是切断苏伊士，封锁地中海，使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解体；一点是封锁北大西洋，将英伦三岛困住，然后一举而在三岛登陆。英国政府的战略企图也有两点：一点是扩大战场，拖长时间，消耗和分散德国兵力；一点是尽力拖住美国，争取美国直接参战。这两方面战略斗争，在现在，在将来，各有他们的成功，也各有他们的失败。德国可能将苏伊士切断，地中海封锁，并且可能在北大西洋使英国的海上输入一天天减少，但是他的后果，将是时间的拖长，兵力的消耗和分散，美国的直接参战，德国的不利，正是英国的利之所在。但是苏伊士的切断，地中海的封锁，英国将遭受无可补偿的损失，而争取美国直接参战，英国必要付出难以收回的巨大代价，所以将来的结局，不论胜负谁属，纳粹德国所侵占的弱小民族国家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决难长治久安，而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和世界统治，即在美国直接参战之后，亦难维持原状。之，英德胜负之外，还有个两败俱伤的前途，而引起的将是这些国家内的和平运动和革命酝酿，以及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这一前途，是今天许多人

所不愿承认和不敢设想的。

美国在这个局面的发展中，他所争取的是如何有利的进入直接参战，多多的接受英国的利益，而又不致使英国倒台，这是他考虑的条件之一。使德国消耗得更多一些，美国国防工业生产得更充足一些，这是他考虑的条件之二。推迟太平洋上的日美冲突，避开两洋作战，这是他考虑的条件之三，最好能挑动起苏德冲突，使苏联代他们火中取栗，这是他考虑的条件之四。但是客观的局势下不容美国的算盘打得那样精，英国隔洋又叫得那样急，所以美国便由巡逻代替护航，海上自由代替中立法，而一步一步的实际参战了。

有人执拗的说，并且不停止的希望德苏一定会冲突。诚然，德苏的立国制度完全两样，德国的向东发展，有碍于苏联国防利益，但是由于苏联坚持其和平中立政策，由于苏联严重警戒其国家防卫，纳粹德国如果不是改变他的对英政策，便很难设想他今天可以采取这种冒险的两面战争。不过挑拨者终不会停止挑拨，而苏联防止“意外事件”的国防戒备，更不会丝毫松懈罢了。

伴着世界战争的发展，太平洋上的风云也就更加紧张了，但绝对不可忽略的有个条件，始终影响着太平洋上风云的变化。一个条件是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已经坚持了四年。另一个条件便是英美作战的重心尚在大西洋不在太平洋。如果能推迟太平洋上的冲突，而又能使中国抗战拖住日本，以便其先对德后对日，英美是会不惜任何代价以缓和的，但这两个条件的配合运用，又需要辩证的发展。假使因为缓和对日的冲突而牺牲中国利益，固然可以引起中国抗战的失望和失败，但假使因为援助中国抗战而引起日本更加积极的发动武力南进，这更是英美所顾虑的。所以英国在保住新加坡，美国在推迟太平洋冲突的主要要求下，暂时的对日和缓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也不会和去年一样主动的封锁滇缅路[3]和承认东亚门罗主义，损害中国利益到那样程度，因为时代不同，去年是三国同盟以前，而现在已经是三国同盟的缔结半年以后了。因之，他们对中国的援助是渐渐增加了，但同时却更希望中国多靠自己的力量拖住日本。假使他们在这上面失望，别的打算也不是不可能的。

日寇呢？他在苏日中立条约[4]以后，正利用各方对这个条约的猜疑，以及反映他统治内部的矛盾，进行这样的政策。首先是积极的准备武力南进。次之，是加紧对中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展开军事进攻，企图封锁中国，另一方面散布挑拨谣言和平空气，企图分化中国，以达其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目的。再次，对英美荷印[5]，也同样展开两面政策，一方面加紧进行外交攻势，另一方面，又采取一些威胁姿态，企图取得英美某些暂时的和缓和让步。最后，要看希特勒[6]的作战结果如何来决定日本是否发动武力南进，而其对象，又在英不在美。日寇这些政策的发展和配合，他必然以封锁中国和取得南洋的经济利益为目前中心。因为中国如果真被他封锁住，则英美的援助，便要客观上受到阻碍，而南洋经济利益的取得，在日本也可暂时的和缓其武力南进。等到苏伊士切断，地中海封锁一旦成功，日本仍然可以图穷而匕首见，发动军事南进。到那时，英国亦仍然被迫得要应战，而美国至少也不得不实行经济封锁和以军舰租英作战。这在我们看来，当然要认英美目前的暂时和缓政策是多余的事了，因为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但在英美政府主观看来，他们不能听任地中海失败，而且要用全力来转变目前局势，所以暂时和缓太平洋上的冲突，也是他们政策的当然逻辑。

最后，在这个世界的战局中，中国的抗战是坚持着自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我们对于战争的政策，是独立自主，决不介入和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而放弃我们民族独立自由的立场的，但这决不能解释为我们不去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不能解释为我们不去运用英美对日的对立和可能冲突，这犹之我们讲自力更生并不等于取消争取外援一样。但必须弄清主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只要抗战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即使在某种可能和战争必要上，在日寇的战争火焰已经侵入别国领土，甚至是英美的殖民地时，一定战场上的战争配合行动是许可的，而这其间并不发生战争的变质问题。如果放弃我们独立自主的立场，即使没有一定战场上的战争的配合行动，也依然得不到民族的彻底解放。至于目前战局，我们更不应该寄其希望和等待太平洋上的冲突，这不仅不合于目前战局发展的实际，而且对于动员英美人民援助中国抗战，也成为一种不合理的想头。

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用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我们当前以及将要到来的更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以准备我们的反攻。拿我们这样自信的和坚决的抗战方针，来争取外援，适当的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灭华与南进之间永远得不到出路，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火焰之中。这些，便是我们对于目前战局应有的认识和态度。

注释

[1]法国降德，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1]。[2]三国同盟，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3]。

[3]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缅甸是东南亚唯一未被占领的国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公路是美国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运输战争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滇缅公路在我国境内从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畹町，长九百五十八公里，一九三八年全线通车。[4]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废除这一条约。[5]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前于十六世纪末遭荷兰殖民者侵入，一八二二年正式设立殖民政府，称荷属东印度，简称荷印。一九四二年荷印被日军占领。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一九五五年印度尼西亚取消联邦制，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6]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一三年参加德意志工人党（次年改为国社党），其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关于中央社发表谈话 的事实真相的声明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

中央社所发表之谈话，共有三点。前两点皆证明我在五月二十一日夜致大公报函中所举之事实确有根据。惟第三点，即“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一点，则与事实不符。盖在中条山战事[1]发生以后，中枢以作战相间，我即表示抗战到底为我们素志，十八集团军必能协同作战无疑。嗣得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先后电告协同作战决心及配合作战计划，我均呈报最高统帅部，并定由朱彭总副司令向战区长官部直接电陈作战意图及经过。自是以后前方战况紧张，且又远在敌后，其首要之联络为前线，次之则为长官部，我处辗转收得战报如白晋公路之战况，不仅业已呈报统帅部，且已公诸报端（见五月二十三日本报）。根据此点，决不能谓为“尚未据报”。至战报少，更不能谓为“尚未……与敌军正式接触”，因最近一周，单就中央社之洛阳专电，便有六次提及晋东我军或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之战况的，而大公报两次西安专电，更证明太行山及晋北我军均在与敌作战。大家均知道太行山晋东晋北无其他部队，同蒲路白晋路正大路平绥路平汉路大部均为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通讯社限于规定不得以作战部队之番号标出，但不能以此便谓无十八集团军在内。再此等电讯发自前方，见闻自更翔实，既经前方军事机关检查于先，又经后方军事机关复审于后，揭诸报端，已历多日，岂能谓为非战报？！且四年来，所有各部队战报，皆赖中央社为之报导，何以独苛求于十八集团军？

大公报说得好：“我们愿声明，只要有此事实，就满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战果。”但我们当然并不以此等战果为满足，我们愿意接受国人善意的督责和更多的希望。我们期待着更大的战果的来临。我敢负责声明：十八集团军是敢于接受敌人回头扫荡的挑战，以求得阻止敌人之冒险渡河的。但同时我却企求国人注意，在我上次致大公报公函发表以后，敌人挑拨的谰言，已停止了，但最近两日却又广播起来了。我们应勉励勿为敌人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我们全中国军民应团结成一个铁拳一样，好击碎敌人的进攻，也击碎敌人的挑拨流言！

注释

[1]中条山战事，即晋南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侵略军以约十万人的兵力进犯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本来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犯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大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给国民党军队以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部溃败，在三周之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

论时局中的暗流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

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走向扩大和持久，英德走向决战，美国一步一步的进入实际参战，日寇则伺机南进，这是世界战争中的主流。

在中国，日寇正展开以封锁中国为中心的军事进攻，我全国军民正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准备用自己的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日战争中的主流。

但在战争主流前进之中，并不是没有暗流或逆流的，暗流不仅是自然界难免的现象，而且是人类政治活动中必不可免的现象。暗流下一定每次都成为巨流，更不一定每次都冲破了或淹没了主流，然而人们必须认识和提防暗流，在中国更须反对暗流，才能使我抗战主流更加汹涌澎湃的前进。

什么是目前战局中的暗流呢？

在西方，英德妥协共同反苏，是世界战争中一股暗流，而赫斯奔英[1]，正是这股暗流中的契机。我曾说过，纳粹德国如果不改变他的对英政策，便很难在今天发生对苏战争，然而存着这种希望的人，在英德两方在全世界都还不少。有人说，德国可以采取对英又对苏的两面战争，甚至有人说，纳粹德国可以在两个月之内打到莫斯科，并且有人证明，连统治莫斯科的人选都已内定了。其实这都是烟幕，内心是在希望以德苏战争代替英德战争。不错，赫斯奔英正是揭露了这股暗流，他的行动曾否得到希特勒的默许，这是次要问题，重要的在证明西方和英共同反苏的意见，在纳粹德国已渐渐的增长起来，并且得到了英国一部分人的支持。为什么这种企图和活动在全世界扩大的进程中增长起来，很明显的是由于战争愈扩大愈持久，将愈给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带来可怕的后果（这里包含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和革命酝酿，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以及超然于战争之外的苏联力量的增强）。于是在赫斯奔英后，纳粹德国宣布了他神经失常之后，便无下文，丘吉尔[2]曾准备在国会宣布此事经过，以后也杳无消息，甚至罗斯福的炉边闲话[3]也曾为他延期。同时苏联由于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而纳粹德国也正在着着东进，影响到苏联的国防利益，所以在最近一两个月，更着重其提防“种种惊人巨变”的动员，由此看来这股暗流的增长与提防这股暗流的动员，是很显然的，然而却不能说这股暗流已经成为巨流。因为摆在德国面前的，地中海的封锁、苏伊士的切断和大西洋的反封锁，已一天天的增加其可能，而对苏战争的把握还在未可知之数，并且苏联的严紧国防更使他无懈可击。两面战争既不可能，希特勒总是向着较易的方面发展。而摆在英国面前的，地中海的危急，近东问题的紧张，大西洋上的运输，都是最现实的问题，稍一不慎便会失利，而且稍一松懈，便会延缓美国直接参战的过程。忽视目前的危急，憧憬未来的幻想，这是现实主义的英国政府所不敢冒险尝试的。因之，在赫斯奔英，英德甚至美国都经过一度摆动之后，克里特岛的争夺战[4]，大西洋上的海战都更激烈化起来，胡特号和俾斯麦号都彼此击沉了，李德[5]的声明，罗斯福炉边闲话，也终于发表了。

战争仍然循着最直接的战争轨道前进，暗流总是暗流。但必须了解美国

是这个问题中的枢纽。如果美国失利更多，美国直接对德开火，日寇又在东方趁火打劫，则帝国主义战争必然更加循着世界的范围扩大和持久下去，如果地中海大西洋的战局照现状僵持下去，日寇对武力南进踌躇，美国仍留有游刃的余地，则暗流的继长增高，也会更加可能。况且资本主义世界总不会忘怀苏联。所以终世界战争之局，暗流总不会停止的，不过战争越扩大持久，苏联的力量越增强，这种暗流的增长，也越发会增加它的困难。在东方，中日直接妥协的暗流久成过去，而新的一股暗流却在日美的少数人中渐渐的生长起来。他们企图或承认以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事，这在日本是有它的基础的。中国的坚持抗战，在客观上久已证明日寇很难于独力解决所谓“中日事件”。过去的近卫[6]，现在的本多[7]及一部分侵华军人，都曾经或仍在想加强对汪逆的扶持，以便从中国得到解决“中日事件”的内应，其实这种前途是会失败的。另一部分日本人包含近卫松冈[8]及一部分军阀在内，他们却想配合着军事进攻放出与国民政府直接谈判的和平空气，及分化中国内部的挑拨流言，企图以此来结束“中国事件”；这又必然要遭受中国军民的坚决反对，而得不到任何结果。因此，日本维持现状派中的保守分子即所谓实业界老外交界人士，鉴于上述两种企图都会归于失败，于是便想经过美国来调解中日战事，为着达此目的，更须先和缓日美关系。我们看，在罗斯福炉边闲话发表之后，日本报纸“除少数外，一般均认为罗总统演说内并未提到远东战事，甚有意义”（二十九日同盟电）。中外商业新报竟公开说：“苟美国重新考虑实际情势，则日美关系之改进并非不可能”（三十日同盟电）。而曾任首届近卫内阁外次之松本忠雄[9]更公开说：“日美冲突之危机，并非如所想象之紧迫。美国甚有见地不肯向日本挑战，日本也不至向美挑衅。……”（三十日合众电）。且在罗斯福发表谈话以前，所谓日本请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之说，已甚嚣尘上，据十九日合众电也承认：“此讯之来源为东京，后在纽约报纸上发表，恐系日本之半官方故意发出，以测验中美两国之态度。”这派人在今天近卫内阁中虽未占若何势力。但他们已渐渐抬头活动，已渐渐成为近卫松冈外交政策运用中之一面，这与运用军部乃至海军系少壮军人向美挑衅的为另一面的，正起着一拉一打的作用。单单日寇这种态度尚不值得我们重视，所可重视的是这种意见在美国的反映，首先反映这种意见的是美国的少数人士，然而却是重要的人士。据十九日合众电：“拥护政府最力之参议员多马斯对合众社记者谈称，不论和平条件是否如真理报所载，调解之本身是为有价值之努力。彼又谓，彼素即主张以逐渐之方法调解中日战事。……”合众社并且更进一步说：“其他方面……咸认为目前为一九三八年以来调停最有利之机会。”而“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记者韩宁关于罗斯福炉边闲话之意见，认为罗斯福演说中未提及日本，系对日修好新政策之结果”（卅日同盟电）。这句话牵涉到罗斯福总统了。大公报说得好：“本报昨论罗斯福总统的广播演说，以其未提及太平洋情势，也未曾特别提及日本，是在精神上留了罅隙。兹据华盛顿路透社讯，国会某负责人士谓：罗总统演说未提及太平洋问题，系政府根据情报推断，认为日本实业界渐得势，或将压倒军部势力，而减弱依附轴心之程度云云，可见美政府一时似为日本的烟幕所迷。”有了罅隙，日美两国人士中的暗流，便会流了进来。我们很懂得，罗斯福所以留此罅隙，美国所以没有全面对日禁运，全是为的以太平洋舰队一部调往大西洋，以便先对德后对日。然而罅隙愈大，时间愈长，大西洋的战争愈陷于僵局，日美暂时妥协和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事的念头便

不会不被人想了出来。在中国，也不能说无一响应之人。到那时，东西两暗流便会桴鼓相应。

因此，我们在东方，指出这种暗流，反对这种暗流，是绝对必需的。在实际上，只要德国切断苏伊士封锁地中海的可能一天天的增加，日寇武力南进的准备也会一天天的积极，对美暂时和缓，将成为他最后发动武力南进的烟幕。所以在今天，日寇对中国的进攻，也以封锁中国和摧毁中国军事力量经济基础为中心，而不一定过于深入，这便是他要兼顾南进的准备所致。配合着军事进攻，特别加紧散布挑拨流言和平空气，这又是他动摇中国抗战决心和英美援华信念的另一阴谋。这也就是日寇今天在侵华和南进中所运用的复杂矛盾而又狡猾的两面政策。

敌寇的这种两面政策，东方的这股暗流，我们将它指出，不仅不会动摇我们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而且会因为认识他的危险更加坚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来揭破敌人的烟幕和阴谋，来争取和稳定友邦对我们援助的信念，以便毫不动摇的走向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胜利大道。

注释

[1]赫斯是希特勒最亲近的心腹、纳粹党的副领袖、仅次于戈林的第二号接班人。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晚乘一架战斗机独自飞在苏格兰，他的这一行动在战争进行的整个期间一直是一个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英国人把他作为战俘释放，以便他能在纽伦堡受审，他破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主要由于他神经失常而免受死刑。

[2]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提出联苏抗德的主张，反对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反对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入侵苏联后，立即发表声明援助苏联，后与苏联缔结盟约。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在美国发表演说，主张美英联盟对抗苏联，揭开战后“冷战”序幕。一九五一年重任首相后，对苏采取强硬政策。

[3]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发表的几次广播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在其白宫屋内的火炉旁，用谈家常的口吻向全国发表了数次广播演说。表示美国愿意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向英法等国提供大量军火，这样既支持英法的反法西斯战争，又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号召美国人民支持其对外政策，以后被新闻界称为“炉边谈话”。

[4]德军入侵克里特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战局的最后一个战役，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希特勒下达了在克里特岛实施空降的命令。克里特岛的守军共约四万四千人，其中英联邦军队三万人，希军一万四千人。德军攻打克里岛历时十二天，虽夺占了该岛，但损失惨重，希特勒对此大为震惊，错误地认为伞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反，盟军却从这次失败中总结了教训，大力加强空降兵的建设。[5]李德（一八八七～一九二〇），美国记者，社会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作为随军记者赴俄，目睹十月革命，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回国后参加美国社会党，编辑《纽约共产党人》，成为党内著名左派。一九一九年八月，同一部分左派组成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担任党机关报《工人之声》主笔。同年十月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再访苏俄，不久病死于莫斯科。[6]近卫，参见本书《二期抗战的重心》一文注[1]。[7]本多，即本多熊太郎（一八七四～一九四八），日本外交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代表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日华基本条约》后至翌年十月任所谓“驻华大使”。

[8]松冈，即松冈洋右（一八八〇～一九四六），日本外务大臣（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三三年任全权代表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当国联通过不承认“满洲

国”议案时，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一九三五年任满铁总裁，配合军部推行侵华政策，一九四一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九月负责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翌年三月出访德意，四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但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时，主张对苏作战，并反对日美谈判。迫使近卫内阁于七月总辞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甲级战犯被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病死。

[9]松本忠雄（一八八七～？），日本外交官和国会议员。一九三七年任第一届近卫内阁的外务政务次官。七次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

论敌寇两面政策”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对于敌寇知之者固然很多，但欲求真能不带感情不偏主观，具有真知的见的人也并不易。大概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好而又能集中力量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便常易发生悲观的论调或情绪；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坏而又在其休整兵力的时候，我们便常易过分乐观，且常喜夸大敌人的困难，好像敌人已时时的处在崩溃之中。其实这种悲观与过分乐观，都是长期抗战中所不应有和不必要的。尤其是轻敌观念更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和对敌人的警惕，反而使对内重于对外，抗战更受损失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想一下去年，从法国失败一直到三国同盟缔约之前，敌人的国际环境是较有利的（德意与英美双方都在争取日本，英国不惜封闭滇缅路，美国不惜承认东亚门罗主义以迁就日本），敌人亦正在集中力量攻我宜昌，于是我们国内的悲观情绪，彷徨心理，一时大盛。但我们当时曾一再指出，新的国际变化就要到来，敌人的困难很大，我们的办法还多，我们不应悲观，而应检讨错误，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更于七七纪念三周年宣言中，就指出世界帝国主义已走向两个集团，德意日站在一边，英美站在另一边。果然不多几天，近卫第二次登台，日本加入轴心[1]以与英美对立的倾向便最后确定了，而中日战事，也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重庆依然是抗战的陪都，敌人并没有敢来窥探。接着，从三国同盟到日苏协定为止，敌人的国际环境转坏了（英美对日的对立，意大利在欧非战争的失利，滇缅路的重开，美国的对华借款等等）。敌人的兵力亦正在休整与补调之中，对我侵战没有大的进展，甚至在开始还采取从龙州南宁撤退以节约兵力便于南进之步骤。于是我们国内过分乐观的情绪便大大增长，甚至一时忘其所以，竟以为天下莫敢予毒。但我们当三国同盟一开始，便警告国人，切勿因一时国际形势好转过分乐观。而应发扬蹈厉，加紧团结，加强力量，以利反攻力量的准备。哪知短视的人，却在此时作了一些亲痛仇快之事，反而使天下惶惑，敌人乘机，沿南海沿长江之战，便从敌人在信阳的出击开始了。而国人的情绪，也又为之一变。

其实这种变化，敌人是根据其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敌人国际环境的好转，固然不会好到举世强国皆为敌助，但敌人国际环境的坏转，也还没有坏到一无与国，就是真正孤立了，也会逼得敌人的政策在这方面改变。敌人的内部困难，诚然因为长期的侵华战争，愈打愈多，但敌人也还没有进入崩溃之中，就是真正进入或接近于崩溃，也会逼得敌人的政策在这方面力图挽救的。

因此，敌人的侵华战争，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灭亡中国的国策，其发展固然是愈陷愈深，愈久愈难结束，但敌人决不会听任自己在战争中淹没，他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战争的目的的。所以，敌人于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这

种两面政策、从战争开始就出来了，有时先后运用，有时同时配合，战争愈久，尤其是敌人需要南进，就愈使敌人急于要解决“中国事件”，于是两面政策的行使，也就配合得愈加密切了。

同时，敌人的南进政策，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独霸东亚的国策，其发展固然会走向武力发动与英美造成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敌人也决不会在不利于武力南进的条件之下，不去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南进的目的。所以敌人在实施南进政策的开始，便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武力的威胁和占领，另一方面又是外交的谈判和妥协。这就是敌人南进的两面政策。这不仅对于安南[2]泰国如此，对于荷印对于英美也莫不如此，

尤其在英德战争变化甚多的发展中，在现在在将来都如此。

要了解敌人这种两面政策的根源，当然是由其国内外复杂而矛盾的条件所产生。也正因为敌人所处的国环境，特别是太平洋上的环境极端复杂，也正因为敌人内情况的复杂和矛盾，也更因为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了四年，这就使敌人的政策更带矛盾性和摇摆性，也就是敌的政策困难所在。但是敌人这种两面政策，既不是对立政策，而是一个政策的两面，也不是平均政策，而是在实的时候有主从，也有重心。譬如不论军事进攻或政治进攻，其目的总在侵华和南进。譬如侵华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军事进攻便是主，政治进攻便是从，但重心有时放在军事，有时也可放在政治。而南进对于荷印及英美属地，既尚未发动军事进攻，其政治进攻自然是属于目前南进政策的主体了。

要击破敌人这种两面政策，不仅要了解敌人这种政策的目的、主从和重心，并且还要了解敌人所处的国内国外环境的复杂和变化，以及敌人在侵华和南进两政策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尤其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

什么是针锋相对的政策？就是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敌人要抽身南进，我们便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敌人想通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争，我们便坚持独立自主抗战到底的立场，来击破敌人这一阴谋。简单一句话，便是：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

目前的敌人两面政策又怎样呢？

联系起来看，敌人最圆满的想头是侵华与南进的利益都要得到。但其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力量，是否能容许呢？自从松冈访欧与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以来，一方面说明日寇要从复杂而变化的西方战争中解放出来，发挥其对于轴心同盟之半独立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日寇要暂时撇开苏联，以便先用全力解决太平洋上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依靠武力，即使抽调国内及关东之兵，也不过增加若干师团，既不能单凭他解决中国战事，而且如作深入的进攻，必归旷日持久，坐失南进良机（当利于敌人武力南进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国消耗兵力愈大，对南进的威力也就会愈益减弱。如果先解决“中国事件”，然后抽身南进，则扶汪既成画饼，而直接妥协又为全中国军民所坚决反对，必致徒延时日，得不到任何结果。如果放着中国事件暂不解决而先行南进（日本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曾作此想），这在敌人既难以放下，而且会有可能使中国抗战力量更加发展，使敌人难于两面应付，因此，目前敌人最狡猾的两面政策，就是一方面在军事上，增加一小部兵力，配合和集中在华相当大的兵力，发动对华军事进攻，将中心放在封锁我们交通和摧毁我们有

生力量与经济基础上面，其步骤则由东南而华北，而沿黄河沿长江，如果可能更会封锁到西南西北。为此便可控制一部兵力，尤其可节约大部海军作为准备南进的姿态。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却企图以“远东慕尼黑”[3]的引诱来和缓美国，并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事，同时又放出挑拨流言，企图以此分化中国内部团结，便于实施其诱降的诡计。这是一箭双雕的两面政策，在军事上先求困住中国，然而又决不放松对于武力南进的积极准备，在政治上却转到以美国为中心对象来解决中国和太平洋上的问题。后者较前更为毒辣，虽然在目前还是暗流，但在日寇方面，这种暗流已在增长，已非完全烟幕作用，而是有其政治基础的。

有人说，日本统治阶级中尽管有人作此想，然而实际妥协很难找到中美日的共同点。尤其是日本的少壮派，更是好大喜功，决不肯放弃其征服中国和武力南进的企图。不错，日本少壮派中，诚多鲁莽之徒。但今天日寇内阁中掌舵的，却并非这流人物。我们只要看自从平沼[4]加入近卫内阁后，内阁的革新色彩，已有褪色的印象（日本《国民新闻》语），继着来的，大政翼赞会[5]改组了，小仓[6]入阁了，中野正刚[7]等退出翼赞会，嚷出“昭和维新”“放逐金融资本”之类的口号了。这就说明近卫内阁虽然建立在国内革新派及国外轴心同盟的基础上，但近来这种基础却已随着国外国内的变动而动摇起来，于是也就反映出日本政局正处在一个彷徨不定的趋势上。彷徨不定，最后总会有新的归宿。果使西方英德战争大有利于日本武力南进，日本政局的摇摆，便会更多的倾向于革新派。就是这样，也不能说日美没有暂时和缓的可能。而现在日本政局彷徨不定的趋势，正好给美国方面某些人士制造日美妥协空气的机会。最近一周来，不仅寇使野村[8]在美大放厥词，不仅美国某些报纸记者公开讨论日美无战争而有友好之必要，并且还有人甚至讨论到调解中日战争的条件问题；这就是要在中美日中间找到妥协的共同点。日美愿意避免战争，而且愿意友好，这是他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以调解中日战争换取日美的妥协，那便是侵犯了中国的自由。因为在今天，中日战争的解决，只有凭中华民族自己的抗战力量，打出日本帝国主义去，美国如出头调解，在缓和日美冲突的条件下，必然会牺牲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利益。就连美国的外交界也认为“……此种解决办法，等于牺牲中国，欲造成远东慕尼黑，故美国乃拒绝此议”（华盛顿三日国际电）。我们很欢迎美国外交界这种消息，但我们更希望美国政府公开的拒绝这种提议，我们尤希望我国政府公开的申斥这种阴谋，那末，远东慕尼黑的暗流，也才会受到有力的打击。总之，敌寇的两面政策，不论在侵华或南进上，他不遭遇到最后的失败，他是会一直发展下去的。我们认清他目前两面政策的重心所在，我们便应一方面加强我们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加紧我们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只有这样针锋相对的政策，才能彻底的粉碎敌人的两面政策，一直到最后胜利！

注释

[1]轴心，指轴心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在大战期间结成同盟的法西斯德、意、日三国。

[2]一八二二年，安南改国号为越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民间仍沿称其为安

南。

[3]慕尼黑是德国东南部拜恩州首府，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英法企图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促使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并在九月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为了自私目的而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纵容侵略的行为称为慕尼黑。东方慕尼黑或远东慕尼黑指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英美帝国主义妄图牺牲中国，与日本达成妥协的阴谋。

[4]平沼，即平沼骐太郎（一八六七～一九五二），日本著名的法西斯官僚。一九三九年一月组阁，任首相。因诺门坎事件日军惨败，加以受纳粹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冲击，不足八个月便下台。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日本投降后以甲级战犯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二年病狱中。

[5]大政翼赞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近卫内阁为推进“新体制运动”而建立的法西斯政治组织。一九四〇年十月成立。总裁由首相担任，支部长田道、府、县地方长官兼任，并在中央和地方，仿照意大利法西斯的职业代表协议会建立“大政翼赞协议会”，议员由总裁、支部长任命。它积极协助政府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军国主义体制。一九四五年六月解散。

[6]小仓，即小仓正恒（一八七五～一九六一），日本时阀兼官僚。一九四一年四月任第二届近卫文磨内阁国务大臣和第三届近卫内阁大藏大臣。此外，还担任战时重要金融机关“金融金库”总裁和国会贵族院议员。

[7]中野正刚（一八八六～一九四三），日本法西斯政客。一九三六年组织法西斯政治团体东方会，任总裁，大力推进法西斯主义运动。一九三七年访问德、意，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内鼓吹“昭和维新”，对外叫嚷完成“大东亚战争”。一九四〇年任“大政翼赞会”常任总务，翌年辞去。自一九四二年因与东条英机矛盾不断加深，一九四三年十月以反东条首相和策略倒阁活动遭宪兵队逮捕，被释放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8]野村，即野村吉三郎（一八七七～一九六四），日本海军将领和外交家。一九三二年任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官，率舰队参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四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发生的天长节（天皇诞辰）爆炸事件中被炸瞎一只眼。翌年晋升海军大将。一九三九年任阿部信行内阁（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外务大臣。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命担任驻美特命全权大使，主持日美会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

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上篇，二十二日下篇)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在抗战四年中已为全中国人民所接受所实行了，我们只要一想到前线军民浴血抗战，敌区民众忍辱苦斗，后方人民出力出钱，就可认识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意义的伟大。然而“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虽其单纯，但其真正的含义却常被人曲解或误解，作为攻击别人或批评别人的口头禅。我们于此，愿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含义有所阐明和声明。

一个口号的提出和被大众所接受所实行，必其口号的本身合乎此时此地的具体环境和大众具体要求。“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虽其所含义已不仅限于单纯的口号，但如果这种口号用之于纳粹德国或大英帝国，其所含义将完全不同于中国，其所动员的能力也就大有差异了。

什么是“民族至上”在中国的含义呢？

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认清中华民族是处在被压迫民族的地位，他要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自求解放，尤其在今天，他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自力更生，从抗战中达到解放之路。所以“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

次之，应该认清：中华民族解放的任务是什么？依照国父孙中山先生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两方面的意义，应该成为我们民族解放的任务和目的。

在第一方面，孙先生又解释“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从这些解释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可得出三个解释：一是中华民族依靠自力更生，求得独立解放；二是反对别人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三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第一，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所以对于日寇侵入中国，我们主张抗战到底，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不出卖民族利益。也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所以我们民族独立解放的命运，决不能依附于别的国家。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并不拒绝外援，而且争取外援，但我们决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同时，我们也并不拒绝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与日寇的对立和可能冲突，甚至在某种可能和必要时，一定战场上的军事配合行动，都是许可的，但这种运用，这种配合，必须求得有利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进行。这，不仅不能损害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运用和配合上，取得和奠定中华民族从一切侵略和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始基。如果有些国家完全站在日寇方面帮凶，我们反对。如果有些国家想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寇妥

协，我们也反对；如果有些国家更想引诱中国为他们火中取栗，如过去日寇及德意劝我们加入三国反共同盟一样，我们更反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牺牲民族利益。抗战四年，说明我们民族是能够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以坚持长期抗战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经验中，才能懂得什么是不出卖民族利益，什么是不让人家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第二，正因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所以我们也反对侵略别人；这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在自求解放的抗战中，并无侵略别人（连日本在内）野心，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民族也反对别的帝国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压迫其他民族之非正义的行动。也正因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所以我们必须同情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这不仅朝鲜、台湾的反日运动，巴尔于非洲民族国家的反德意侵略，我们应该赞助，便连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也应同情。固然我们应该集中和争取一切反日的力量，反对我们主要的敌人，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南洋印度等地被压迫民族不要中日寇之计，为他利用的工具，但我们决不能站在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宗主国方面，要他们牺牲民族解放的利益，一味的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这，不仅不近人情，而且置我们民族利益于何地？！第三，正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必须弄清什么民族能以平等待我，并须弄清我们怎样以平等待人。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必须他自己不是侵略别人依靠殖民地为生的国家，必须他自己有鲜明的反对侵略别人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策，必须他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平等友谊，而且证明给中国人民看，他曾经是现在也是将来必是赞助中国革命最力的友人。合乎这种条件的，当然是苏联。我们以平等待人，决不能照别有用心的人所解释，牺牲自己利益，服从人家利益，因为这根本是不平等。何况苏联的国家利益，决没有建立在侵略中国的利益之上，而中国的民族利益，也决不会从反苏中求得，并且双方站在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更有他们共同的利害，所以中国联苏是绝对平等的，只要我们彼此尊重各自立国的立场，不时而赞成，时而反对，不公开称道，暗中怀疑，下一面联合一面仇视，而一贯的坚守孙先生的遗嘱，则平等的结合，革命的友谊，必能大大的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成功。总起来说，不出卖民族利益，不止人家牺牲中国民族利益，不侵犯别的民族利益，也同情别的民族自求解放，更平等的尊重民族间的彼此利益，这便是国际间真正的民族平等，也就是孙先生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的精华。

在第二方面，孙先生又解释“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从这个解释及孙先生其他著作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内方面，可得出四个解释：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二是中国各阶级应合作对外；三是中华民族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四是中国的民族道德，民族气节，应该发扬光大。第一，正因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所以我们主张尊重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宗教，并尊重他们自己的领袖干部和一切人材，尤其要反对我们汉族中的藩属观念和自大主义，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动员他们联合一起，共同抗战；同时我们更主张承认各民族的自治权和自决权，而不是简单的称少数民族为边民，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取得他们同意，共同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以建立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第二，正因为中国各阶级应合作对外，所以我们主张除汉奸外，全中国人民都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就连汉奸除绝对坚决不愿悔悟者外，都应争取之，宽恕之。我们认为在中国，阶级利益并不与民族利

益矛盾。除掉极端自私自利大发国难财的极少数分子外，任何阶级欲维持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日寇不打走，民族解放达不到。尤其是对于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但这并不是说，在力民族解放奋斗的过程中，便不能相当的解决阶级利益和相当的改善工农生活，其实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增强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上，也是有利的。譬如，许多民族工业家迁厂内地，如果政府给以应有的资助和保护，他们一方面可更多的生产出国防上及人民中的急需品，另一方面也可得到他们合理的利润。譬如沦陷区域的地主，因为政府和军队广大的组织了民众的游击战争，使这些地主的土地不致落于敌手“或荒芜起来，于是他们便觉悟到只有捐出一些游击军费或者减低一些租息，方能使劳苦农民得以参加那些游击队，保卫乡土。同时，从另一方面看，为得适合目前物价高涨，增加工资，以增强工人的劳动力，为得适应目前粮食需要，减低农民租息，实行农村借贷，以增加农民的生产量，这都是与抗战有利，与其他阶级并无损害的。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最高原则，就是一切阶级利益都不能超过民族利益，都应该服从民族利益。因此，我们反对那些少数极端谋私利的分子借口国难期中，加紧剥削工农劳苦大众。我们也反对那些不从改善劳动生活中求增加生产出路，而一贯以强迫虐待为能事的干法，我们更反对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利用国家企业，大分红利，而不肯增加工资，甚至减少生产，以便高抬市价，而不顾社会需要。第三，正因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所以我们主张只要发动抗战，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必空前的增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必前仆后继，至死不屈，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必愈因敌人的失道寡助而积久弥坚，中国人民的奋斗苦干，必愈因不断的困难需要克服而愈显其坚韧不拔。抗战四年，证明这一估计完全合乎实际的发展，这是汪逆精卫之流的投降妥协分子所不能认识的，而应成为我们民族革命精神之所寄；并应在这上边建立起我们自力更生的精神基础。第四，正因为中国的民族道德民族气节应该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主张民族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便应该大大发扬，尤其是礼义廉耻，更是民族气节之所系，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忠孝施于国家民族，仁爱施于同胞，信义施于友邦，和平施于人类，这都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不分清敌我友恶。对敌人，要集中火力去攻击；对自己，要紧严抗战的阵线；对朋友，要明辨，要争取；对怙恶不俊的人，要戒备。我们要重气节，才能挽颓风、清贪污、建革命的秩序、止投降的倾向。尤其要尊老敬贤，重视他们的经验学问，爱护青年，要提拔教导他们，不要摧残他们，更不要特务化他们，而对于寡廉鲜耻的人，却不应该使他们篡据高位，阻塞贤路。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目前抗战中，特别需要。总起来说，民族平等、阶级合作，自立奋斗、守道德、重气节，这便是孙先生民族主义在对内方面的精华。

这一切，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部纲领，也就是民族至上在中国的全部含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的纲领上，在这样的含义中，拥护“民族至上”的口号，实行“民族至上”的口号。违背这种原则的，我们认为不是误解，便是故意的曲解来破坏中国的民族阵线。这将是抗战的罪人，民族解放的罪人。

什么是“国家至上”在中国的涵义呢？

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弄清国家的定义。“按马克思的学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列宁：《国家与革命》）这个定义，原则上对于一切国家都

适用的，而现在处在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并立的时代，尤其是处在目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国家的作用，便更有它新的发展。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机关，而法西斯的国家，或因为战争而亦极权化了的国家，更是极少数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机关；在这样的国家中，被统治的工人阶级（连家属在内），已成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他们除掉因为被压迫的或者被欺骗的在“保护祖国”的口号下走上战场，去为统治阶级牺牲而外，如何能心悦诚服的热爱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呢？！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说法，便是指他们而言。在苏联，他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现在已经进入无对立阶级的社会，但是因为它还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包围之中，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便须用来对抗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成为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灯塔，所以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祖国。还有，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被帝国主义战争所蹂躏的一些弱小国家，他们所要建立的或者要恢复的国家形式，将是一种民族国家。虽然这种国家中，仍会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分，但当他们整个民族需要合力御侮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作用，便成为对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以求自己民族独立解放的统一机关了，并且在今大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胜利。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各阶级所共有的，“保护祖国”的口号，也就适用，而“国家至上”也就有他严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这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反对“保护祖国”的口号，并无矛盾之处，相反的，还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很显明的，在中日战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在中国是拥护抗战，“保护祖国”，而在日本则是反对战争，则是“工人无祖国”。这种事实，难道还不够塞造谣者之口，解怀疑者的忧虑么？

次之，应该弄清：我们要建立怎样一个国家？大家都承认，我们的抗战建国，是为的要打退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依照我们的认识，这个三民主义的国家，既不应该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更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应该是抗日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家，因为它要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政权的问题上说得很明白：“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以三民主义的政权，是一种新民主制度。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而不是一阶级一党的政权，它只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侵略以及汉奸反动势力，并不推翻参加抗日反帝的任何统治成份。它在经济上，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把日寇汉奸企业财产及有独占性质的大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和经营，同时保护工商业的发展，扶助私人的中小企业，也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的民主国家，既不完全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并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这种新的民主制度，虽然是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同时又是替社会主义的生长创造前

提。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权，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及社会主义苏联日益强大的时期中，只有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才有实现的可能，别的取巧的办法，是没有的。而且一经妥协，不仅日寇的势力赶不走，便连从别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下解放出来取得平等的机会，也会失去。所以为着“国家至上”，必须抗战到底，必须努力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再次，新的民主制度，究竟是怎样内容？依照孙先生的解释：“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同上），而在国民党政纲上，孙先生又规定：“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力标准之阶级选举”，“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均同上）根据这种主张，我们提议和要求在目前抗战期中政治的民主，至少限度应做到：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容许各抗日团体的合法活动，保护各抗日书报书店的出版发行和营业的权利，扩大国民参政会及省县参议会的权限，筹备真正的普选的民意机关，并禁止特务机关的非法逮捕，这总不能算丝毫过分，根据这种主张，我们更于陕甘宁区及敌后游击区，在不违背国宪（实际是三民主义党纲及政纲）的原则下，试行省县自治及直接创制（举例如最近陕甘宁区施政纲领），并请求中央批准和指导，这也不能算丝毫过分。有人说，在陕甘宁区及敌后游击区，也同样没有民主自由。我们回答说，根据中共提出的选举纲领，我们欢迎各抗日党派及一切爱国人士去边区参加选举，参加政权，办报纸，开书店，组织团体，开发实业，并负责担任保护，但关键却须得到中央政府许可和批准，否则，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从进入边区。我们更欢迎各方面对于边区游击区的一切设施给以善意的严格的批评和指教，但我们却希望大家亲身去看看，不要只凭道听途说，易失真相。譬如国民党部过去在延安虽未办日报，但在其公开的壁报上却大谈一个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并未受到任何干涉和检查，可见民主自由在延安是有的。拿大后方来说，即使现在仍在训政时期未到宪政时期，地方自治总该开始实行。那末，县区乡的人民直接选举，并非难事，罢官权可先从有权控告任何公务人员之非法行为开始，以肃清地方的贪官污吏，创制权可先从改善兵役制度和粮食动员开始，以增加国家兵员的补充和粮食的接济，复决权可先从审查地方政府的预决算开始，以树立地方廉洁政治的楷模。这样的地方自治，在今天决不会妨碍抗战，而只是有助于抗战，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真正动员地方民众直接参加，而不是听任少数官吏包办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民主政治才真正向前走了一步，抗战的困难，也才能依靠这个基础去克服。

又次，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今天，国家需要有中心，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以及国民党在全中国的领导地位，都是四年来抗战中国的中心。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谁都会拥护这中心，珍重这中心。我们共产党人，四年来始终承认这中心，拥护这中心。我们不仅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努力，我们并为尊重国民政府的领导而无数次的请求其承认陕甘宁边区为中央政府所管辖的一部分行政区域，以便更有力的打破对于中共要建立第三个中央政府的造谣。我们更为尊重最高统帅作战意旨，最近不待命令的下达，不顾以往的创痕，不计饷弹的两缺，便发动了华北的破击战，以协同友军抗战，以击破敌寇及傀儡者的挑

拨和污蔑。同时，我们始终认为国民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有极重要的关系。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国民党中极少数的对于抗战的动摇分子，和仇视中共的顽固分子，绝对没有反对国民党的全体。有人硬说我们要另建一个国家中心，要推翻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要破坏抗战的军队，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深知道，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但我们希望国民党人士也要了解，大家既拥护这国家中心，自己便应更珍重这国家中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善意的批评，这对于巩固这国家中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古语云，以国士待之者，必以国士报之，凡愿他人拥护这国家中心者，自己亦应以国士待人。尤其是人家并未不拥护这国家中心，而自己先肯定人家要推翻这国家中心，甚至不给人家以拥护这国家中心之可能，其结果，只有逼得人家自力更生。就是这样，也还不能视为另建中心，因为人家固无时无刻不在承认这国家中心。所以拥护国家中心者，不应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而负此国家中心责任者，亦不容有“天下莫敢予毒”的想法，而天下为公，才是“国家至上”的最好保证。

这一切，就是中国民族的民主的国家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国家至上”在中国的全部涵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样的内容和涵义中，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实行“国家至上”的口号。

最后，我们还得说明：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上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我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是统治世界的特殊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被统治者。我们也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优越观念，或人种优越观念，因为他们认为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或其国内的有色人种，都是劣等民族，或将被淘汰的人种。这两种观念，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无丝毫相同之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民族已经不是整个利害相同的民族，而其中的阶级矛盾早已超过民族矛盾，故我们决不能同意和赞许帝国主义国家也用“民族至上”的口号，维持和扩张他们对于其他被压迫民族及人种的统治和蹂躏。

中国民权主义亦即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社会主义者亦即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权主义，才能使中国成为独立的民主国家，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亦即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同样，中国的民权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走向世界大同。我们反对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为极少数的大资产阶级，即取消民主，还加重的剥削劳动群众。我们也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爱国主义，因为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是要欺骗他们国内的劳动群众为帝国主义的利益牺牲。这两种主义，与我们中国的民权主义并无可以联合之处，因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机关，被统治的阶级决非有爱于这种国家机关，故我们决不能同意和赞许帝国主义国家也用“国家至上”的口号，维持和加紧他们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并压迫他们去当战争中的炮灰。

因此，“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在中国，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是革命的，而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反革命的，我们共产党人拥护前者而反对后者。这决不是矛盾和不一致，而是根据不同

的环境不同的历史条件，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只有糊涂的人，或者故意不去辨别差异的人，才会说“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类口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被诸万世而不变的呢！

纳粹德国反苏战争爆发！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月来盛传的德国反苏暗流，由于纳粹德国向苏联进攻和轰炸，已于昨（二十二）日晨四时爆发成为反苏战争了。这个战争诚如莫洛托夫[1]所说，并不是德国人民、德国工农和知识分子要向苏联进攻，乃是德国血腥的法西斯统治者要向苏联进攻。苏联军民在保卫其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责任前面，已动员起来应战了。

苏联历来是一贯的坚守其和平中立政策，并忠实的履行了苏德协定[2]中所规定的义务，一直至昨日德国反苏战争爆发前，犹可见苏联是在努力维持其和平中立政策，绝未向德国以及德国所侵占的一切国家作任何的挑衅。但是苏联对于纳粹德国的态度是严守限度的，苏联绝不容希特勒有超于苏德协定的要求，更不容希特勒对于苏联有任何领土主权的侵犯。现在，苏联元帅铁木辛哥[3]在五一节所指的“种种惊人巨变”，已在苏芬和苏罗边境爆发了，苏联全国军民必然会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发挥其空前团结和巨大无比的力量，以击败此凶顽残暴的法西斯者的进攻。

目前战争方在开始，以一个进行战争将近两年而又侵占屈服了十四个国家的纳粹德国，一旦对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有两万万人口而又将近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苏联开战，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而且此变所系，影响之大，会要超过任何战争，国际风云，也将为之变色。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预见的，即是苏联方面站着的有全苏联的军民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以及愿和苏联友好的人民、民族和国家，而纳粹德国方面站着的只有统治阶级法西斯和愿意参加对苏联的侵略者以及被法西斯蒂所欺骗所驱使的军队，而其中将要发现在纳粹统治下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我们中国抗战四年，苏联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是人所共知，今天苏联正遭遇着惊人巨变的纳粹侵略，这与我们在东方遭遇的性质正复相同。患难见真情，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必以关注的心怀寄以无限的同情，并预祝着苏联的最后胜利！

注释

[1]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一九八六），苏联政治家和外交家。一九三二～一九四一年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联的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还兼任外文人民委员，谈判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侵入苏联后，他还在国防委员会中工作，组织苏联与英美结盟的工作，曾出席同盟国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会议，以及创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辞去外大部长职务。斯大林逝世后，他又担当这个职务，直到与赫鲁晓夫因政见不同于一九五六年六月被免职为止。

[2]苏德协定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互不使用武力；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缔约国另一的国家集团；就彼此有关问题，密切接触，交换情报；和平解决相互间的一争端。有效期十年。但条约签订不到两年，一九四一年六月法西斯德国即动侵苏战争。

[3]铁木辛哥（一八九五～一九七二），苏联元帅。一九三七年任北高加索和

哈尔科夫军区司令。一九四 年起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卫国战争间任副国防委员，最高统帅部代表，西部战线、西南战线军总司令，斯大林勒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司令。

论苏德战争 及反法西斯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世界的惊人巨变，已因纳粹德国毫无信义的突向苏联进攻而爆发了。二万万伟大的苏联人民，已在苏联政府及斯大林的号召之下立即起来应战。战争就这样于六月二十二日在苏联西线开始，战线之长达二千五百英里，双方动员兵力之多之强，将成为全世界空前的一战。这不仅在数量上说是空前的，而且在质量上说也成为世界战争的转换点。这一战争，一方面站着纳粹德国及一切法西斯的同谋者，另一方面站着全苏联的军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民民族和国家；前者是企图在击败苏联的基础上，继续扩张和达到他侵略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血腥统治的目的，而后者则是为保护苏联，也同时为保护全世界人民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前者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后者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这一战的胜负，关系于全苏联并且是全世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苏联胜了，不仅苏联而且全世界被奴役的人民和民族都要得到自由和解放；纳粹德国胜了，将使全世界陷于黑暗的深渊。所以世界战争进入到苏德战争的新阶段，已经是历史上的新时期了。在过去，在西方，英德的争夺战是主体，而许多弱小民族国家却被法西斯侵略者所侵略所蹂躏了。在现在，法西斯侵略者的战火已转向苏联，苏德战争已成为主体，苏联已站在全世界反抗法西斯奴役斗争的最前线，背负着保卫全世界自由的重任，而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和民族，将得到恢复自由独立的机会，甚至被纳粹攻打的英国，也得到喘息的机会，这些事实，显然成为世界战争中新的分水线。因此，全世界一切痛恨法西斯主义和压迫的人民民族和国家，都会认识苏联人民的奋斗，也就是他们应该参加的奋斗。丘吉尔说得好，“苏联的危机，即是英国的危机，同时亦为美国的危机”，扩大来说，也就是全世界的危机。苏联的人民已在前线，继着而起的，我们已看见来自全世界的同情苏联的呼声，这是一种新气象，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高潮。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四年来久已站在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更会不落人后的将自己抗战的胜利和苏联抗战的胜利亲密的联在一起，共同努力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事业的成功。

这次苏德战争的爆发，完全由于希特勒背弃国际信义撕毁德苏条约的一手所造成，而苏联则一贯的坚守信约，履行协定，决未向纳粹德国作任何的军事挑衅，这已力举世所公认。但苏联这种履行条约的精神，并非自缚其手足。苏联的国策一向是为阻止战争制裁侵略而斗争。当慕尼黑会议，集体安全制度被破坏以后，帝国主义战争已成为不可避免，于是苏联仍坚持其和平中立政策，与德意日先后缔结协定，以避免战争扩大。但这并不是说苏联便减轻了对法西斯国家的警戒，两年来，苏联国防力量的加强，尤其是最近半年苏联政府的重要措施，铁木辛哥“五一”的文告和演说，都证明苏联并未忽视在此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谁将是越境窥伺的侵略者。这也更不是说苏联便因此改变其对于为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族的援助政策，两年来苏联对波兰境内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犹太民族的解放，对波罗的海三小国及

比萨拉比亚等地之归还苏联版图，决没问纳粹德国是否愿意，而苏土宣言，苏南互不侵犯协定，以及对于罗马尼亚，对于保加利亚，对于匈牙利之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和追随纳粹德国之后的谴责声明，更不管纳粹德国是否高兴。这犹之苏联缔结了苏日中立协定，并不改变他援助中国的政策一样。谁说苏联两年来是在助长侵略而不援助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这完全不是事实。并且也正因为这种原因，希特勒始终不能放心苏联立于战争之外。但是希特勒何以不在德苏协定以前反而在欧战进行了将近两年之后进攻苏联呢？两年前，慕尼黑会议，暴露了英法不仅没有制裁侵略的决心，而且还破坏了集体安全的可能，以自俯于侵略者，这自然使希特勒向易于进攻的方向动手。现在战争扩大了，美国一天天的走入战争，希特勒不能马上渡海攻英，而向埃及或近东发展，更有重兵远出的顾虑，于是遂不顾一切的先想从扫除苏联的威胁入手，这是一。战争走向持久，纳粹德国虽占据了十四个国家，但其资源并不够纳粹德国的持久消耗，而欧洲粮食的恐慌，亦已造成大多数国家的饥谨，于是希特勒便迫不及待的向苏联伸手，企图夺取乌克兰的仓库和高加索的油田，奴役苏联的人民，以便继续他征服全世界的长期战争，这是二。两年来，法西斯蒂的黑流，和其血腥的统治，已经引起法国人民中尤其是被奴役的民族中的深刻不满和革命觉醒，而日益趋向于迅速结束战争，为人民的和平独立自由而斗争，于是希特勒便因为恐惧于此反法西斯的革命运动的生长，而迫不及待的想先从打击为人民的和平而斗争的大本营入手，以阻止革命发展，这是三。还有“英美上层阶级的反苏“情绪”（《大公报》语）的存在，也颇利于希特勒的煽动，以便他转过头来先打苏后打英美，而收各个击破之效，于是赫斯奔英，便揭露了这个阴谋，而成为反苏暗流的最高峰，这是四。所有这些，都是大家意料中事，而所成为意外的乃是希特勒何以在英德并未妥协之前，敢于两面作战？这由于没有估计到希特勒在军事上，如果不在夏季动手，延到秋冬之间他便无法东进，只有等到明年，但在经济上又不容他等到明年，而政治上英美亦非一无弱点不能供其利用者。在英国，有所谓戴维斯多克对德媾和的计划（二十五日伦敦合众电），在美国，斯克利泼霍华德的报纸，在德苏战争开始前就宣称，“这就是我们可以赞许的一种战争”。因此，希特勒就在这些基础上，爆发其最大的冒险的反苏战争。希特勒的意思是在说，我先打给你们看。实际上不管其战争进行得如何，只要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希特勒总不会放弃其对其他国家的和平攻势的。暗流虽是暗流，但我们总应该警戒这一暗流，才能使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主流，得以汹涌澎湃的前进。

现在战争已爆发了一周，根据莫洛托夫的文告，根据全苏联人民热烈的响应，和对于敌人的愤怒，根据苏联红军红海军空军在前线的英勇抗战，证明苏联全国军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是有准备有力量能击退纳粹德国疯狂进攻的。苏联民族历史上屡次击退外来侵略的英勇传统，十多年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力量，苏联全国军民坚固的团结，苏联布尔塞维克党、政府及斯大林的领导，全世界同情苏联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后盾，都是保证苏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是苏联的人民知道，进攻苏联的敌人是强大的敌人，苏联并不希望轻易致胜。苏联人民很勇敢的面向法西斯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当着最艰巨的阵势。他虽不愿为帝国主义的争夺去火中取栗，但他为苏联的存在和发展，为全世界人民的独立自由，却不惜重大牺牲，以争取人类的真正和平，这是社会主义的侠义行为。

战争的发展方在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但是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纳粹德国利在速决，故一开始便攻势甚猛，企图仍以闪击战达到其两个月征服苏联的狂言。苏联的战法，不论是拒之于国门之外，或是引之深入，只要苏联的主力在，人力在，物力在，时间一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惨败。故我们对苏德战争，不能以一时的出入胜负为断。同情苏联的人，因为不知苏联的究竟实力，有力苏联着急担心的，这是一种好意，应该向他们解释。然而也有幸灾乐祸的人，以苏联败了为高兴的，那真是别有用心，应该归入法西斯之流。还有认为不管苏联胜败如何，都于我们有利的，那更是有害的思想。试问纳粹德国如果胜了，他将与其东西盟友日意法西斯强盗共同征服世界，我们何能幸免？

我曾说而且也很希望：“战争仍然循着最直接的战争轨道前进，暗流总是暗流。”虽然将来的变化还多，而且我们还应时刻提防着暗流的生长，但是目前英美的态度还总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尤其是英相丘吉尔的态度很坦白，他知道对德妥协，不仅欧洲霸权无法取回，便连非亚属地在德胜苏之后，仍然有被侵入的危险，而苏联作战，不仅可以利用目前喘息的机会巩固英伦及北非近东的阵地，而且在反法西斯蒂的斗争中，还可维持英国某些利益。我们认为英国这种态度应该更求彻底，对于过去一贯反苏而又亲德的分子应该肃清出去，以免中途变卦，对于国内人民应恢复其民主权利，对于其属地人民，应给以解放可能，以便真正有力的动员人民的力量反对法西斯的侵入。对于苏联，英国正在进行其援助的协商，但最有效的还是军事上的协同动作，而空军的轰炸，海军的牵制，又为最重要的步骤，美国方面，确实是松了很大一口气，海长诺克斯既说德苏战争对于美国有利，而孤立派议员更大叫美国从此更无须参战，这就使罗斯福的对苏态度和援苏政策来得更加慎重，太平洋上的变化，也使得罗斯福要有所待。

然而不管怎样，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英美应该与苏联建立共同的阵线，这首先必须求得政治上的谅解，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向着为消灭法西斯统治以求得各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为着这个目的，必须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参加，才能保障其实现。

在轴心国方面，法西斯意大利已经成为纳粹德国的附庸，亦步亦趋的跟着希特勒走。而东方法西斯强盗，则向具有半独立性的作用，尤其因为缔结了苏日中立协定，所以连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事先都不知道，事后松冈所受到的打击，可以想见。现在日寇正处焦急彷徨等待之中。目前最大的可能是北进攻苏，这由于亲德派及反苏分子现在正好集中在这一焦点上，而维持现状派之反对武力南进，也正可作为他们转向北进的根据。但是北进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第一，中国问题将因此更陷于不能解决之境；第二，西伯利亚并没有像南洋那样多的国防资源；第三，时间上不很易于侥幸成功，万一拖长，则日寇的另一泥足又要陷于冰天雪地之中；第四，万一英美在其发动攻苏后，实行太平洋上的封锁，岂不陷于前后绝境？！并且武力南进虽然暂时搁起，但是经济妥协并非不可能的。何况在英美人士中，也并非无人主张对日妥协以拉其疏远或退出轴心者，这点也颇能眩惑日寇，使其想先拿住南洋资源然后再图北进，可是时间上又何能许？！因此，遂形成日寇目前的焦急彷徨和等待，而近卫松冈内阁也便在动摇不定之中，不过，德意法西斯蒂，却策动其北进不遗余力，所以日寇攻苏的危机是增长的，我们应该严

重注意他的政治军事动态。然而不管日寇发动北进与否，对于已在他侵略下的我国，绝对不会忘怀，不会罢手，这是很显然的。他对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两面兼施，一打一拉。打的方面，有可能在配合其准备北进的步骤上，加紧华北的“扫荡”战，渡河侵犯郑、洛、潼关，或沿长江出击，以便在压迫我们之后转移兵力北进。拉的方面，有可能采取一些形式上的让步，诱我投降，引我分裂，以便其先集中力量北进，然后再回师灭我，这是最毒的一着，也是我最应警惕的一着。

总之，世界风云变得这样急，这样大，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已屹然不动的坚持了四年，现在更不应受这个风浪波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并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有害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蒂头子的日本强盗。在东方，英美的地位也显然增高了。过去，我们因为了解英国对德作战的困难，故只望英国不再对日妥协，而现在则较有可能加强其远东反日的力量，加增其对我的援助了。过去，我们因为了解美国不愿两洋作战，要先对德后对日，故也只望美国对日禁运，不再妥协，而现在则更有可能断绝一切对日妥协的念头，彻底对日禁运，加强对我的援助了。有人提议，中美英苏应该结成同盟，当然是很好的，但我想在今天的英美政府，是不会接受，不能实现的。不过我们最小限度的主张：不再对日妥协，实行对日全面禁运，加强对我援助，准备太平洋上反法西斯主义的自卫力量，“共同制裁日寇”一个要求，这总应该可以作到，而我们更应联合起英美人民结成太平洋上反法西斯阵线，以求其作到。

还有，因为苏德战争及日本有北进可能而引起的一些过分乐观心理，这在我们四年抗战中已屡次证明是有害的心理。德苏战争，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所打击的正是四年来助我最多的友邦，而遭到战争惨祸的正是二万万为世界和平民族自由奋斗的人民，我们不仅在患难之交上同情这个朋友，便在援我的意义上，我们也要受到一些影响，但这里我们要声明一句，苏联的援助历来是助我整个民族，给我国民政府，而决不如上海哈瓦斯电讯[1]所说，中国共产党系依靠于苏联的援助而存在的。至于估计到日寇北进，我们更不应因此过分乐观，致使放松对外，转而对内。我们应该乘机努力，加紧国内的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以便一方面能有力的抗击敌人的进攻，收复一些据点，另一方面，在敌人果然北进时，我们也可配合友邦，实行反攻，击败敌人。

只有这样，我们的抗战，才有胜利的前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东方坚持反法西斯大纛，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与苏联成为反法西斯的战斗共鸣，才配称得起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儿女。

注释

[1]哈瓦斯通讯社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通讯社。一八三五年由法国人查理·哈瓦斯在巴黎创办。一九四一年由法国政府收买。德国占领后，附庸于纯官方通讯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法国政府接收，改组为法国通讯社。

“七七”四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

(一)

抗战四年，我们遭遇了空前的局面，我们打出了空前的场面。这个局面，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侵占我东北四省之后，又侵占我十四个省区的土地，奴役和屠杀我千千万万的人民。这个场面，是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长期抗战。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敌人既已侵入我们国土，杀戮我们人民，我们只有起来自卫，起来应战。战鼓既然响了，四年来我们便义无反顾，非打到将敌寇驱出国境，决不罢手。敌人企图速决，我们便应之以持久。敌人欲歼灭我主力，我们便分散而消耗他。敌人只能正规战，我们便发动游击战困他。敌人占领我点线，我们便以面来包围他。敌人建立傀儡政权，我们便以敌后抗日政权对抗他。敌人欲以战养战，我们便以封锁和抵制破坏他。敌人封锁我们，我们加强生产，自力更生。敌人轰炸我们，我们不怕炸，不怕烧。要从焦土中建起新中国。敌人杀戮我们，我们仇恨更深，杀敌更坚。敌人怀柔我们，我们誓死不做顺民。敌人诱降我们，我们坚持抗战到底。敌人分化我们，我们坚持团结统一，共御外侮。敌人派敌探，放谣言，企图动摇我们，我们紧严壁垒，决不做敌人的应声虫。敌人利用汪精卫组织南京伪政府，我们开除他，通缉他，誓不与之两立。敌人利用德意等轴心同盟承认汪逆伪政权，我们便撤回使领，对他们绝交。敌人欲孤立我们，我们便加紧争取外援，结成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以孤立敌人。四年中，我们牺牲了无数的英勇将士和在敌人残杀下的同胞，取得了各个战线上的抗敌胜利，杀伤近二百万的敌伪军队，消耗了敌人二百万万日元以上的军费，建立起深入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巩固了中国西部的抗战大后方，结果，不仅巩固了我们自己抗敌的胜利信心，并且也使敌人不得不承认“中国事件”已陷于无法解决。因此，四年抗战，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民族。长期抗战，已不仅是可能，而且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胜利的解放道路。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向是多难能够兴邦的民族。敌人打进中国来这一事实，使全中国人民认识：只有团结，才能外御其侮，只有统一，才能众志成城，打到最后。四年抗战，我们国家有了从来所没有的统一，我们人民有了从来所没有的团结和民族觉醒，我们军队有了从来所没有的指挥统一和意志集中。抗战的领导者——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成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戴的中心。抗战的经典——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成为全中国人民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目标。抗战的武装——数百万的正规军队，敌后的游击部队和广大人民的自卫武装，成为全中国人民所信赖的力量。抗战的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一切其他的政治集团，成为全中国人民所仰望的团结中心。抗战的后方——中国的整个西部和各战区的后方，成为全中国人民所重视的国防生产和战争动员的根据地。四年来，我们看见前线上将士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伟大战绩，我们看

见在敌人铁蹄下被蹂躏被杀戮的同胞之可歌可泣的壮烈行为，我们看见沦陷区域被敌人奴役的同胞那种忍泣吞声不忘祖国的精神和热望，我们看见在后方千百万的壮丁走上前线，劳苦的同胞日夜不息的增加生产，有知识的男女从事各方面的动员和服务，我们更看见海外侨胞的踊跃输将和回国服务，我们还看见各友邦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给予我们的热烈同情和物质援助，最后我们更看见战场上伪军的不断反正和敌军反战情绪的生长。这一切，都是我们抗战四年的空前成绩和伟大收获。四年抗战，证明了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是永不可侮的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团结，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大保障。

(二)

抗战四年，我们还遭遇了国际间空前的变化，我们也打出了国际间患难相共的朋友，本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侵略战争，是发端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日寇作了世界的祸首。因为当时欧美列强放任祸首，于是引起西方法西斯国家的贪欲，意大利强占了阿比西尼亚，德意发动了西班牙战争，而日寇复要求华北特殊化；这对形势，已显然是三个法西斯国家采取共同行动，然而反法西斯侵略的集体安全制度，却不为列强所重视。接着七七事变便在中国爆发了，日寇又放了侵略战争的第二次信号，可是共同制裁侵略者的主张，仍不能为欧美列强所接受，反而使绥靖政策成为一时风尚，于是奥国被兼并了，匈牙利附德了，捷克灭亡了，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侵略气焰日高万丈，最后连英法自己也不能不投入战争，形成彼此的争夺战。在不到两年的功夫，十四个欧陆国家先后沦亡或屈服，这才引起美国的不安和全世界的震动，这才使中国反东方法西斯侵略的领导地位为英美当局所重视。

另一方面，苏联在法西斯侵略开始，便提出集体安全制度共同制裁侵略的主张，然而，曲高寡和，接二连三的在西班牙战争中，在慕尼黑会议中，在捷克灭亡中，不断被人出卖，最后，更因濒于反苏战争威胁的前夜，才缔结了与邻邦维持和平友好的苏德协定。苏联缔结这个协定，一方面根据于不得违背苏联维持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的国策，另一方面也决未束缚苏联同情和援助世界和平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运动，关于前者，苏联争取了时间，保证自己力量的准备；关于后者，苏联始终站在同情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地位，这不仅对于欧洲诸小国如此，尤其对于抗战四年的中国的援助，更是信守不渝。现在，希特勒因为西向发展有待，便不讲信义的撕毁条约向着苏联开火了。伟大的苏联军民立即起而应战，于是世界战争乃进入新的时期。这就是以苏德战争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阶段。这一战争，关系于全苏联并且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命运。

四年的战争，已使日寇完全出乎意外的拖得兵力疲惫，困难百出，四年的世界变化，已使日寇不能预见的失去许多机会，不得抽身南进，现在日寇在此次事变刺激下，更加反映出他在侵华战争中的巨大消耗，他国内物资的缺乏和财政的困难，他国内统治阶级各派的矛盾以及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表现出他的焦急彷徨和等待。他的决策虽说是定了，但并未宣布，据估计，北进是他最大的可能，但困难重重，还想有所期待，武力南进虽暂时搁起，但仍想和缓美荷，取得经济妥协，并且在北进和南进尚未揭晓之先，更有先行向中国加紧军事政治进攻企图解决“中国事件”之可能。不过，有

一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就是日寇基本上尚是站在德意方面，所以德意也就以承认南京伪政权来鼓励他。这种行动，说德意推动其北进也可，说德意拉紧其离开英美也可，说德意企图帮助解决“中国事件”也可。然而中华民族的抗战，却决不会因为德意的帮凶而气馁，而停止。要是有这样的人，就不配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世界显然是向着两个集团两个阵线的方向走的。虽然世界战争的变化正多，法西斯挑拨英美反苏的阴谋不会停止，法西斯国家对世界的进攻还没有遇着最后的致命的打击，纳粹德国在苏联还会有一些暂时的军事收获，但是中苏英美日益站在一起，已为明显事实。我们坚信：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终会形成，苏联终将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而世界的法西斯强盗终将失败，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也终将得到胜利。

我们中国，十年来首先遭到法西斯日本的侵略和蹂躏，四年来又坚决站在反对东方法西斯的战争最前线，经验使我们坚信：日本法西斯强盗必败，抗战的中国必胜。

(三)

然而，胜利是我们的前途，要达到最后胜利，还须经历和克服许多困难过程。我们曾说过，抗战第四年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曾经遇到法兰西失败后国际上的困难，我们也经历了国内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有的已成过去，有的尚未克服，有的还在继续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四年抗战，胜利的基础是打定了，长期抗战的信心是更加坚强了，但我们不能讳言的，是抗战中的困难还多，弱点还大。

首先在敌我两方，日寇虽然失道寡助，但也不是一无帮手，德意法西斯及其所豢养的傀儡国家，至少还在那里为他虚张声势；我们虽然得道多助，但同情我们的友邦，如英美，对日寇还有人存着若干幻想，援助我们还有若干困难，而它们与苏联的接近也还在开始。

次之，在战争方面，我们的原则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但我们民族中间，也还有一小部分人存在着对于抗战的动摇观念，他们对于长期抗战，有些不耐，对于敌人诱降，发生动摇，对于敌伪挑拨，表示响应，对于国际调解，发生幻想：这都是极有害于抗战的观念和分子。同时，我们还有人存在着等待胜利的观念，他们等待敌人撤退而不努力准备反攻，等待外援而不重视自力更生，等待敌人南进或北进，而疏忽我们自己的警戒，等待有利于我的世界变局，因而悲喜随人，失去独立自主的精神。尤其在皖南事变后，我们更忽略敌人进攻，于是信阳出击，沿海进攻，中条山扫荡，敌人便利用我们这种弱点乘虚而入了。军事是最大意不得的，一疏忽，一放松，一等待，便会涣散我们的战斗意志，减弱我们的军事戒备，忽视我们的训练学习，松懈我们的战斗生活，动摇我们的抗战信心，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再次，在政治上，我们的弱点更大。中国政治既称民主，战时又应集权，但我们在应该民主的地方，如人民的合法权利却常受非法干涉，人民的战时动员却常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而在应该集权的地方，如政府组织却尚不合战时体制，国家政令又常受着党部的干涉和特务机关的破坏。国民参政会及省县参议会，如果使他们成为民意机关，便应提高职权，试行民选，以扩

大政府的基础；如果使他们成为政府集权的辅助机关，便应选拔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真正人材，辅佐政府，赞襄国事，这便需要人少、任重、会勤、议事务其大并务其精，以巩固政府的威信。党派的团结是全民族团结的杠杆，但在野党的公开合法尚成问题，时被特务机关非法捕杀。武力是用于对外的，但不幸事件却接连发生，至今还有抗战而得不到公平待遇的部队。服兵役是中国男同胞应负的天职，但因为办理未得其人，未得其门，致使群众未能自觉的从军，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国家，还发生兵役的困难，这是我们应该自责的。还有，战时的政治机构，贵简单而不贵复杂；机关应集中而不应重床叠屋；职权应专而不应一事分作数人，或一人又管数事，致相互矛盾，相互牵制，一事难成；业务应找专家而不应用非所学，或无所不管；用人应用而不疑，疑而不用，而不应善善而不能去，恶恶而不能去。我们承认：政府是抗战的政府，领袖是抗战的领袖，我们应该拥护，但是这些政治的弱点和历史遗留下的官僚制度残余，还障碍着我们抗战的政治设施，要求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改善。

更次，在经济上，我们的困难还多。国防工业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但也是我们最弱的部门。我们一切生产计划，交通运输，国外输入，专门人材的培养，还不能配合着国防工业的需要。在抗战初期，我们便主张建立国防工业，直至最近始被重视，然而，实际上国防工业的生产并未加多，甚至连国防工业所最需要的原料，都在市场上堆集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异现象。主要的原因，实由于建立国防工业的信心，在政府中甚至于在主管部门中还没有坚强的建立起来。自给自足的小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的增加，也还未能大大的发展起来，这一方面由于政府在这上边所用的人力财力，还没达到应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则由于官僚资本障碍了中国民族资本及合作事业的发展，官僚资本的危害，最主要的是投机事业，他利用一切权位和便利，破坏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破坏了银行的正常业务和资金内流，破坏了商业市场的正常贸易，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影响了物价的昂贵，助长了营私舞弊和贪污腐化，破坏了国家的紧急需要及其财政经济政策。在粮食上，我们如集中主要火力于反对土豪大户的囤积居奇，那末，我们在国民经济上，便应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危害最大的官僚资本。我想，政府机关中的高级官吏，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如果能彻头彻尾的不进行投机事业，不囤积居奇，那将是大有助于抗战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以上这一切，都是我们抗战四年中未能克服的主要困难和弱点。我们希望，抗战的第五年，将是我们克服困难的一年，也是真正准备反攻的一年。这一年将决定世界的命运，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四)

为着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我们在进入抗战第五年的开始，必须认识我们长期抗战的胜利基础。尤其是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坚固团结，这是我们战胜日寇的基本力量，同时也必须检讨我们抗战的经验、缺点和弱点，以便我们能在克服这些困难中胜利前进。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长期抗战，直到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为止。我们必须反对中途妥协和对于抗战动摇的一切观念，反对等待胜利而不努力于自力更生的苟安心理，反对专靠外援而不加强自己反攻力量的依赖心理。

我们必须努力于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最大的同情寄予苏联，声援苏联，努力争取英美的援助，要求美国对日全面禁运，共同制裁侵略，以孤立日寇，以打击世界的法西斯集团，并加紧对于苏联英美的联合。

我们必须加强军事的力量和装备，提高军事技术的教育，号召我们的壮丁和青年，服兵役、进军校、习航空、学驾驶坦克车装甲汽车，学一切军事技术。我们必须加强各个战线上的戒备，提高我们的士气，进行军队中及居民中的抗战教育，组织战役上的反攻力量，以便击退敌人从任何方面的进攻，并收复一些据点。我们必须加强对于敌后游击区域游击部队的领导和帮助，承认他们抗日政权及一切抗日政策，以便有力的打击敌伪扫荡，破坏敌伪政权和瓦解敌伪军队。我们一切服从于国防生产，健全国防工业的领导权，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增加国防工业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准备起我们的反攻力量，才能保障我们最后的战胜敌人。

我们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我们愿尽一切努力，拥护国家的统一和进步，反对国内的分裂倾向和军事行动。我们要求抗战中的民主，人民的合法权利，各党派的公开存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秘密的捕杀，反对摧残青年。我们主张战时的政治集权，但不是包办，更不许党部和特务机关的无理干涉。我们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对各地方政权、对各军队、对各种抗日的人民团体，应不分党派关系，一律平等待遇，不得有任何歧视。我们要求彻底的动员和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进行一切征调劝募和动员的工作，以保证抗战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我们主张政府机构合理化。专责、专业、专人、专信，以巩固和灵活政府对抗战的领导，以肃清官僚制度的残余。

我们认为一切应着国防工业，反对将目前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与国防建设分立起来，或仅仅看成是他的一部分。我们主张扶助民族资本，反对官僚资本。我们必须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严格的统制对外贸易，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以大力扶助中小企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以力求自给自足。我们必须依靠农民的组织 and 动员，反对土豪大户的囤积居奇，彻底的解决粮食问题。我们必须相当的改善劳动者职教员及公务人员的生活，以增加生产，增强教育和行政的效能，以利抗战。

这就是总结四年抗战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对于抗战进入第五年的希望。我们号召全中国人民应为此希望努力，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愿为此希望奋斗不懈！

最后的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

团结起来打敌人！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上曾指出，法西斯日本“反苏之危机固已增长，灭华之方针，则决不放弃，南进以侵略英美荷澳之野心，亦依然存在”。现在日寇内阁又改组了，不管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但其灭华之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而且还会先来个西进。且即使日寇北进的方针定了，甚至先来个对海参威的海上封锁，他也要先行或者同时扫荡华北，甚至突入西北，以巩固其北进攻苏的陆上根据地，假使敌人不北而南，或者兼行南进，他也要以加强安南的军事根据地和扰乱甚至切断我西南交通为先决条件，或者说作为与英美讲价的条件。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总应准备敌人西进，乃至迎头打击敌人西进，这才是万全之策。等待胜利，总是一种最有害的心理，尤其是专门希望日寇打别人，最是一种没出息的想头，而且对于联合友邦，争取外援，也颇不合乎情理。并且我们已经单独的打了四年，即使敌人已经发动了北进和南进，我们也应更加努力工作，反攻敌人，以配合友邦行动，这不仅称得起患难相共的朋友，并且也才能争得出我们独立解放的胜利前途。所以不论敌阁如何改组，敌人的行动如何改变，我们的任务总是打敌人。那些天天争论于敌人究意北进还是南进，天天希望敌人北进或是南进，甚至天天等待敌人北进或是南进以解决我们困难，以决定我们对内政策的人，在现实的演进中，不仅有时会使希望落空，有时会使高兴过度，并且根本上最有害于自力更生，最有害于争取胜利。

这种思想，便是从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的任务上看，也是不妥的。我们抗战四年，久已成了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现在全世界都正在或将要走上反法西斯的战场，而纳粹德国正是法西斯头子，日意是其帮凶，苏德战争又是世界战争的主体，中国抗战则已经起了牵制世界法西斯帮凶的作用。因此，为着使全世界集中目标，集中力量，打击世界法西斯头子，不仅苏联，不仅英国，便连美国也要用极大的力量去作战，去协助，而对于日本如果它还不北进南进，我们更应继续担任牵制日本的光荣任务。这是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侠义行为，这是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英美苏联，不是要求他们对日作战，而是要求他们加紧援华，对日禁运，共同制裁法西斯侵略。如果敌人一旦北进或南进，我们更应努力牵制敌人，使其陷于两面乃至多面作战的困难，以尽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主员之一的责任，那才不愧为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才真能以中苏英美为中心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

还有，从中国抗战内部来说，也只有团结起来打敌人之一道。中国抗战的对象，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如此巨大任务，非团结起全中国人民，全中国军队，不能达到。中国抗战的目的，是要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如此巨大任务，也非集合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各抗日党派的才智，通力合作，不能达到。

为要打倒这个对象，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加强军事力量，这就须全中国的武装力量，不论前线后方，不论战区敌区，不论中央地方，不论属于

任何系统，都应团结于最高统帅指挥之下，一致杀敌，而不容有任何摩擦，任何歧视。如果有人问，最近第十八集团军，又在晋鲁等地擅自行动了，我可负责答复他们：为配合中条山作战，十八集团军部队，曾向白晋路平汉路南段袭击敌人，但任务完成后，便立即退还原防，而山东茌平，乐陵，惠民等县，原属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友军何以开入，何故发生冲突，而究竟有无其事，十八日电十九日便登报，不仅朱总司令不及呈覆，连我也未得到事前任何通知，这就是事实真相，这就叫“擅自行动”。不过我们总是要求团结，而不是要求分裂；要求一心杀敌，而不是要求分心对内。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杀敌，而不致给敌人造任何分化机会。

次之，必须加紧国防建设，这也须团结起一切建设的力量，以建立国防工业的始基。尽管今天建立国防工业的可能性很低，但并非一无可能，一无所有。我们纵观世界战局，法西斯侵略国家，杀人凶器之多且强，奴役人类之残且暴，直欲将世界文明一齐毁灭。如果我们再不从此得出教训，再不从此努力国防工业的建立，而仍听其自然，倭诸客观困难，那真是自暴自弃，甘为人奴。没有自力更生的力量，不要说不会将敌人赶走，即使敌人自己崩溃了，或者友邦把它打败了，我们也不会得到彻底解放，强盛的立于世界。所以我们自始就应该不分国营私营，不分厂方工方，不分技师专家，都应团结一起，集中力量，为着加紧国防生产建立国防工业而斗争。

再次，必须加强政治民主化，这更须不分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而团结在民主旗帜之下，一致努力。有人说，以中国之大，各党派外还有着最大多数无党无派的人民，他们最能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公正意志。这是非常正确的，唯有最能尊重人民公意的人，才是最富于民主思想的人，才是最能团结的人。要想从政治上动员民力，参加抗战，就必须团结起中国的广大人民，听取他们的意见，顾及他们的生活，发展他们的组织，给他们以合法自由，然后才能得到他们踊跃从军，努力服务，加增生产，热心献粮的好处。又有人说，政府应与现有纠纷之党派提议协商，劝告合作。这也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所望的也正是“加强各抗日党派合作，调整国共关系”（中共中央七七四周年宣言），而不是肃清异党分子，或者说，对共政策已确定，只需待时而动，无再行考察之必要。我们所望的是调整关系，而不是制造纠纷。我再重复说一次：“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今天中国抗战的铁则。谁不遵守这个铁则，谁将成为万世的罪人。

总之，今天的国际形势，今天的国内情况，都须要我们团结起来打敌人。不打敌人，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不团结起来，我们无法打败敌人。

我们号召全中国的人民，全中国的军队，全中国的党派，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就是：团结起来打敌人！

“九一八”十年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

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徽，重新插在白山黑水之间？尤其是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同胞，十年风霜，使壮者老了，年青的变成壮年，孩提之童也长大了；他们更会慷慨悲歌：“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真的，没有一个热恋着故乡的东北人士，不想“打回老家去”的，也没有一个坚持抗战到底的全国同胞，不想“收复东北失地”的。家国之痛，流亡之惨，切齿之恨，复土之念，诚十年如一日。我们于此，敢以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我们更以最大的同情和热忱，致敬于在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你们是东北的子遗，你们是东北的孤臣孽子。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战争的导火线，而七七事变，更是日寇在世界侵略战争中的第二次信号。我们抗战也四年多了，抗战目的，是要达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就是说：起码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不赶走日寇出境，不恢复东北失地，决不能停止抗战，这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这也是东北同胞日夜萦思十年奔波的目的。民国二十七年九一八纪念，蒋委员长在其告东北同胞书中指出：“这整整七年中间，尤其是去年全国抗战以来，我全国同胞和将士所受无限的牺牲和无比的痛苦，为的什么？为的是我们的东北和我们东北的同胞；为的是要求得中国独立自由，要恢复我们东北的失土，拯救我们东北的同胞。”民国二十九年九一八纪念，蒋委员长在其告全国同胞书中，更指出：“我们九年来艰苦奋斗，三年余奋勇抗战的目的，就要为恢复我们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东北同胞。……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复东北和解放东北同胞的日子愈接近一天。”今年九一八纪念，蒋委员长在其告全国国民书中又指出：“我们流血的目的，自始至终，就是要保障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和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亦就是誓万死，排万难，要恢复我们东北的失土，与拯救我们东北的同胞，来洗雪‘九一八’以来的仇恨和耻辱。”“如在中国境内还残留着敌军之一兵一卒，而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还没有完全恢复以前，我们的抗战，就一日不容停止。”这一切，都是抗战四年来取得全国统一团结共同奋斗的国策，也就是九一八十年来全国爱国同胞奔走呼号所坚持的救国方针。民族领袖说出全国人民心坎中所要说的话，谁能不拥护我们的民族领袖？现在的问题，便如何在如何使这些主张坚持下去，实现起来，好日益接近于“驱逐日寇出境，援救东北同胞”的胜利。

今年九一八前夜的国际形势，从苏德战争到罗丘宣言[1]，本已澄清了国际反法西斯蒂反侵略的阵线，不意日美谈判一起，又复使太平洋上的疑云密布。日美的基本矛盾，本是无可调和的，我们尤觉得在罗丘宣言之后，美国

政府更不能以牺牲沿太平洋各国的民族利益，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换取对日的妥协，而使宣言中的八项主张成为骗人的空谈，因为这不仅会使东方求解放的民族失望，而且也会使正在纳粹铁蹄下喋血奋斗的十四个民族国家同样感到失望。但我们却也不能轻于置信日美谈判一无妥协可能。假使日寇表面接受海洋自由、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伪装承认停止武力南进的要求，难道他不可以设想骗取南洋的利益均沾吗？假使日寇在答应不妨碍美国援苏，难道他不可以设想从美国骗取同样的物资输日，以便待机北进吗？这在表面上，或者会有人竟解释与罗丘宣言第四项“对于贸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受平等的待遇”之原则并不冲突。而实际上，日寇骗取这些物资，一方面正好如过去四年一样，用在侵华战争的火线上，并轰炸到中国的后方，另一方面，正好拿来加强日寇的国防力量和生产，转去威胁英美，待机南进。此不仅大失中国人民同情，抑且养虎噬人，自食其报，以美国今日之处境，罗斯福总统何致必欲步张伯伦[2]之后尘？！或谓罗斯福对日的试探谈判，意在拖延时日，一方面可以打破国内孤立派对日妥协的幻想，以便逐渐的增强太平洋上的国防戒备，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日寇内部矛盾，求其远离轴心，好拆散他们目前的东西策应。这种用心虽苦，但我们可以断言必致得不偿失。一月来，日美谈判在全世界所造的印象，不能不是罗丘宣言后的损失，谈判中的妥协气氛，更给美国一部分上层分子以幻想，而减弱太平洋上的戒备，同时，更可使日本少壮派感觉美国易与和可欺，而愈加肆无忌惮。所以，不论从九一八日寇侵华的痛史中，不论从世界法西斯侵略的教训中，我们都可看出，日美谈判是罗丘宣言之后一件不智之举，而且有上日寇大当的危险。我们认为：在德苏战争已经打了快三个月的今天，英勇坚强的苏联军民，已经为英美苏在西方奠定了灭亡纳粹统治的胜利基础，在东方，英美正应用其余力，援助中国，对日寇。以封锁代替谈判，以制裁代替妥协，使一时日美谈判的疑云消散，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蒂反侵略人民的一致愿望。

然而不管怎样，日美谈判决不能影响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决不能动摇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蒋委员长在廿九年双十节告全国军民书中说得很清楚：“我们抱定信心，不问环境如何，国际形势有利的时候固然要努力，就是在过程中间，国际上对我抗战形势不利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奋斗到底。”何况现在国际形势，在前途上看来，显然是有利于反侵略的国家，而日美谈判甚至妥协，不过是一时阴霾，世界上反侵略胜利的光明，并非遥远。只要我们坚持东方反侵略的大纛，我们是东亚反侵略的先锋，谁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地位，谁也不能使我们屈服。去年九一八纪念，蒋委员长曾指出：“由于这九年来尤其是欧洲战事发动以来的国际事实，可以证明，任何民族只要他能自力图强，则辛苦复国，多难兴邦，真是计日可待。而转弱力强，更是常见的事实。另一方面，更证明精神不屈，为克敌制胜的要素，如果精神一经屈服，这个国家就要万劫沉沦，不可挽救。所以我们今天要外察事变，内省天职，要知道世界上没有比屈服更痛苦的事，屈服的结果，只有灭亡。”（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指示，在今天更显出他的重要。我们不仅不应该因为国际形势一时一地的不利，而动摇，而灰心，甚至精神屈服，并且更重要的还在于认识多难兴邦，自力图强之可贵。世界上没有不靠自力更生，专靠外援而能战胜强寇收复失地的。我们固然决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而独干，但我们更不应将我们最大的甚至于一切的注意力，放在国际的变动上面，将我们全民族的命运，押输赢于他人的赌博场中；这是无可救药的奴隶根性，决不是

我大中华民族抗战四年来所发扬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所以欲纠正目前因日美谈判所引起一种惶惑和屈服的心理，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四年来，直到今春为止，美国何常以军火援华，美国输日的飞机汽油和军火原料何常停止，但中国的抗战，并未因之中断，并未因之屈服，现在即使情况有变，也不会恢复到今春以前的状况，我们何至于反而无力抗战？如果我们肯从加紧团结入手，排斥一切挑拨分裂的企图，则日寇的政治攻势，将必归于失败。如果我们更加强军事力量，扩大国防生产，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改善一切政治经济财政教育的设施，进行民众动员，采用民主制度，以便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用于反攻的准备，则某些地区的恢复，二三重要据点的夺回，在目前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果能在事实上日益收获胜果，而谓反侵略的友邦，仍不愿助我拖住日寇，反而逼我屈服，宁有是理？！因此，我们认为：一切须返求诸己。我们也很同意郭外长[3]本月十五日谈话中所指：“近来关于美日试探性质之谈话，颇多不同之传说，有些是推测性的，有些吾人相信是具有作用的，而此种具有作用之传说，其目的欲在引起中国人民之疑虑。”推测性的传说，是反映某些人对于日美谈判将影响中日战争的忧虑或悲观，这应该以自力更生的信念回答之。具有作用的传说，是有意或无意的传播了敌伪乃至某些分子的谣言攻势，以动摇我们抗战阵容，这必须以揭穿这种阴谋，打击之。这在今天纪念九一八十周年坚持“消灭伪满，收复东北”的时候，尤其有严重的意义。

我们中共党人，历来是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十年来，我们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抗战后，我们更主张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

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中共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任何困难，任何敌人的进攻，包围，封锁和烧杀，都不能丝毫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即使没有任何的援助和接济，我们都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坚持敌后的一切抗日根据地。最近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华中敌后特别是在晋冀察区的反敌“扫荡”的血战，便是明证，他们是蒋委员长“喋血抗战”号召之最响亮的响应者。

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更向东北同胞声明，特别向流亡的东北人士声明：我们誓愿和你们肩并肩的抗战下去，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这是我们纪念“九一八”十年的决心，也正是你们“九一八”十年来梦寐所不能忘的志愿！

愿大家一齐努力，东北四省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注释

[1] 罗丘宣言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当时德、日法西斯的侵略已使英、美两国受到损失，中国、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空前高涨。英美两国在宣言中宣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宣言的发表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为日后建立联合国打下基础。这个联合宣言也被称为《大西洋宪章》。[2] 张伯伦参见本

书《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注[5]。[3]郭外长指郭泰祺。郭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国民党政府外长。

太平洋的新危机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

近卫[1]下台，东条[2]上台，滚的快，上的也快。其人其事其时，都说明日本法西斯军人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闷拖延的局面，而必须自己出马，采取冒险的行动了。

本来，苏德战争起，近卫三次组阁，牺牲松冈[3]及政党人物，实行财政经济新的措施，派遣大兵入我东北，加紧扫荡华北，已经表示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不过，要北进，必须稳定南洋，妥协英美，避免两面作战。要北进，必须骗和中国，免致腹背受敌。要北进，必须等待时机，免致损失过大。这就是近卫第三次组阁的方针，也就是据此以说服法西斯军人，据此以取得现状维持派支持的法宝。因此，这三个月中，近卫内阁除加紧准备北进外，首先便与维希政府[4]缔结越南联防协定，增兵入越，虽因此引起英美封存日寇资金，亦仍然故作隐忍的进行日美谈判，期待有利于己的妥协之到来。不料谈判两月余，毫无成就，且反使美国窥破日寇用心，造成僵持局面。对我中国，日美谈判开始时，日寇故造日美妥协将逼成中日妥协的谣言，企图以此动摇我抗战阵线，不料竟遭到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在“九一八”十周年纪念告国民书中的迎头痛击。蒋委员长申明“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胸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一申明，实代表了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公意，亦代了我们全国将士的战志和决心。日寇因此恼羞成怒，发了长沙郑州两战役。不料一由其南进北进之举棋未定，由其轻视我军过甚，竟演成长沙惨败宜昌被攻郑州胶着及华北扫荡无功的状态，影响于其国际的威信至大。着，纳粹德国又在进行对苏的第四次猛攻，苏联人民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似乎日寇北进的时机已等到了，于是平沼[5]被刺中野[6]狂吠之后，纳粹德国压力之下日法西斯军人便不能再耐，终于将军内内阁抬出场了。

日寇新阁名单虽尚未揭晓（截至写稿时止），但从东条英机担任新阁首相及其登台之原因和背景看来，已知新阁之大概趋势。这一趋势，便是太平洋新危机之来。新危机的范围，决不会止于北进，日寇必然是以占西伯利亚，囊括南太平洋，解决“中国事变”为其连贯的针。本月十六日东京电，权威方面评论东条之组阁，亦说：

日本之政策，为解决“中国事变”，建立“共荣圈”[7]及附三国公约[8]之精神。建立“共荣圈”，就是包括南太平洋，排斥英美势力；依附三国公约，就是敌视苏联；“解决中国事变”，更是“万变不离其宗”了。在第三近卫内阁时，是想将这三项政策分别解决的，所以他一面积积极准备北进，另一面则企图以日美谈判分散美苏联合，离间中美关系，以便其各个击破。但结果弄巧成拙，日美谈判陷于僵局，中国抗战更加坚持，英美援苏援华日趋积极，甚至影响泰国亲日态度亦渐有变，这不能不使第三近卫内阁归于失败，而代之以完全的军人内阁。东条于此，至少必有一个新认识，即是欲建立“东亚共荣圈”，必须使大陆与海洋一道解决，至少要连贯解决。东条原有对华对苏两面作战的主张，现在恐更有三面乃至多面作战的主张了。这就是太平

洋的新危机。

有人会说，东条是旧阁的一员，且参与近卫对外政策的密议，故新阁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将无变更。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日寇政府每次改组所持以不变者，是其基本国策，亦即吞并中国独霸东亚的国策，至若实行这基本国策的方针或方案，则每次日阁改组均有变更，何况这次近卫倒台，内阁情报局已公开宣布“系由各阁员对执行国策之方针，缺乏一致之见解所致”，更何能谓无变更？！所谓缺乏一致者，很明显是在对内尤其是对外的方针上，有了现状维持派与法西斯军人派之间的分歧，而东条显然属于后者。现状维持派的方针，重在妥协英美，法西斯军人派的方针，重在依附轴心，近卫想利用两者的分歧。引前者骗取英美妥协，导后者积极准备北进，以便时机一到，他好对外各个击破。现在近卫既失败下台，东条继起，必将有所改变，可断言无疑。

又有人会说，东条的军人内阁意在威胁英美，实际上，他仍将继续对美谈判，求得妥协。这个意见，似是而非。东条虽系法西斯军人，但向以智称，况希特勒虽在多面作战之中，仍懂得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东条也不会一无所学，故他在组阁后，可能不仅不会取消对美谈判，而且还会继续运用亲美分子对美故示好意，同时，他也会摆出反美阵势，故作先行南进准备，以便软硬兼施，眩惑美国，使之犹疑不定，等到一旦北进，日寇便可少受美国海上的牵制。日本法西斯军人这种可能的做法，显然与近卫内阁的方针是有区别的。近卫想与英美成立真正的妥协，即使是一时的，也可使他达到孤立中国，放手北进的目的。现在法西斯军人内阁，于近卫失败之后，必然是要在准备多面作战的方针下，欺骗英美，先行北进。故近卫是以对外各个击破为战略，畏惧多面作战，而法西斯军人，则不怕多面作战，是以各个击破为战术的。从发展上看来，只要英美不上当，近卫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日本法西斯军人，则不管英美上当不上当，总是要向着冒险路上走的。所以太平洋的新危机，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阁出现之后，是必然要到来的。

还有人会说，东条内阁，既重北进，对华侵占，必将减弱，或者说，将使我们易于反攻。这种看法，也很危险的。因为这不仅从日寇对华对苏战争之不可分性上看来，是不完全对的，便单从军事力量的对比和部署上看来，也是不完全对的。敌寇为着北进，可能从侵华的某些地区抽兵，甚至从某些城市撤退，但必须明白：撤退决不会影响对该地区的封锁（如福州之例），同时还要起动摇我抗战意志，涣散我反攻准备的作用；而抽兵更不等于放弃，也并不一定使我们易于反攻。宜昌之役，一方面，证明在敌人调动兵力时，我们有反攻而占领之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又证明我们的力量也还没有长成到足以保住这种胜利的地步。故若认侵华战争将要减弱，不仅会松懈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并且会减弱我们对于反攻的积极准备，尤其会给动摇妥协分子以活动的机会。至谓易于反攻，也会不合事实，因敌人一旦北进，则我们所要反攻之点，亦必为敌人坚守之地，如果我们不从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着手，而误于易于反攻之说，必至坐失良机，不仅难于配合苏联作战，而且会堕入敌人麻醉的陷阱，给敌人造成顺序解决的各个击破条件。何况在敌人实行北进之先，也还有可能先图摧毁我们一些主力，破坏我们一些地区，然后再转锋北上呢？华北“扫荡”及长沙郑州诸役，便是明证。敌寇以轻敌致败，造成阁潮，我们却不可轻敌自骄，转滋国内纷扰。

因是，在苏德战争空前激化，日美矛盾愈加尖锐，中国反攻局部胜利，

ABCD [9] 的南洋封锁越发强化的时候，太平洋的新危机是异常的紧张了，而近卫上台，东条组阁，更成为这一新危机的导火线，假使说，第三近卫内阁“为置日本于全面战争基础上之一步”，则东条内阁将置日本于全面战争之更进一步了。不管东条新阁组成后，是先从北进开始，或是先行继续对美谈判，甚至先作南进姿态，或是先从压迫甚至诱降中国入手，或是先从解决其国内矛盾开始，其以武力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冒险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了。诚然，东条英机也并非日本法西斯军人十分得力的头目，其组阁也并非一定可以长命，而且必然的会反映其国内诸种矛盾，发生许多波折，甚至又为他人所代，这原是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必然命运。但必须弄明的是，这次日本军人内阁的出现，是日寇大冒险行动的信号，不论新阁是否属于法西斯一派，或是否全部属于军人，他的冒险行动，非遭到碰壁的失败，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倒台是决不会停止的。日本的现状维持派虽也有若干的潜伏力量，虽也曾极力企图和缓一面，进攻一面，以避免多面作战的危险，但他们本身力量既敌不过法西斯军人派的嚣张，加以他们并不反对侵略的国策，又何能阻止法西斯军人之铤而走险？因此，对内也就无从取得广大反战人民的热诚拥护，对外也就无从取得反侵略国家的真正赞助，这在阵势上也就难以对抗在纳粹德国影响和推动之下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所以日本的现状维持派，在第三近卫内阁中，只能起和缓的作用，并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今后他们如果不改变其侵略立场，他们只有愈益成为法西斯军人的附庸，而与之同归于尽，但也可看出在日本法西斯军人横冲直撞日趋失败之时，日本的现状维持派，也会有或多或少的觉悟分子产生，日益与日本反战人民相结合，与世界反侵略阵线相联系，以求日本的新生。

然而，日寇法西斯军人决不会自甘失败，太平洋的危机也不会自己消失，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在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过去十年，许多国家已经放松了对于日寇的制裁，现在日寇侵略的火焰，快烧到大家的眉毛，太平洋沿岸的任何国家，都不应再存姑息之心，等待之念了。目前是大家一齐动手的时候了！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翰将军说得好：“吾人固不愿对日作战，但日本如坚欲作战，则吾人亦将准备应付。”美国政府派参议员泼贝尔谈话，美国应设法使日本军力无法调动，至少亦应准备实行还击。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拉第称，荷印已准备应付一切意外。我们希望这些意见，都成为英美荷印政府的意见，而将那些企图妥协轴心动摇和破坏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分子肃清出去。我们中国军民，在最高统帅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领导之下，只有加紧目前战斗，加强军事力量，巩固国内团结，积极准备反攻，以牵制和打击日寇任何新的冒险行动，其他任何轻视敌人等待胜利的观点，都不应许其存在。

日本法西斯军人新的冒险目标，当然以西伯利亚为最大可能，尤其是苏联在海滨省及北库页岛，更成为其首先要攻击的对象，但其进攻的究竟日期，则仍要看苏德战争最近的发展。日寇侵苏的战争如果发动，则其在开始时必企图以海陆空军之联合闪击，取得东海滨省，以便英美不及增援，中国不及配合，而战局已定。当然日寇这种妄想，定要遭遇苏联红军致命的打击。但是英美如能加紧准备，及时行动，我国军队如果积极战斗，则日寇慑于包围之势已成，环攻之局已定，纵使德国压力甚大，也未尝不可增加其犹疑顾虑的时间。时间总是有利于反侵略国家的。只要时间一长，欧战的局势会变，英美的准备会强，中国的力量会长，苏联的准备会多，而西伯利亚的严寒虽

不能完全限制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但困难的增加，日寇是可以想到的。所以，太平洋沿岸各国，积极的准备，事前的制裁，虽不足以截止日寇冒险的野心，但却可以延缓日寇冒险的行动，这便于大家有利，而且更有利于苏联集中主力，粉碎纳粹德国的第四次进攻。

目前英美与纳粹的斗争和援苏的行动，实不仅在西线，并已发展到东方，东方与西方的反法西斯阵线，已快联成一片了。现在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国家，胜利则同胜，败则同败，谁要躲避先后，谁将要成为反侵略战线中的罪人。中国独力抗战了四年多，苏联正处在抵抗纳粹德国进攻的主线，英国也打了两年，其他许多国家，亡的亡，降的降，欧洲的地图早已变色，非洲的战火也未熄过，只有美国隔着两洋，暂时尚置身于烽火之外，也就使美国的孤立派，只图私利，感觉不到国家的危急，人类的浩劫，而甘于接受纳粹第五纵队 [10] 的蛊惑，反对援苏援华，主张妥协轴心，表面上则说反对参战。殊不知现在已没有战争以外的世外桃源了。希特勒主义如果统治了全欧，则以其优越的人力物力和技术生产，必然会侵入美洲，这点罗斯福及其领导的美国人民已经知道，但美国的孤立派及不少的大资产者却故作不知。现在日寇又要在太平洋作新的冒险了，如果美国仍然放任不管，则欧亚的烽火连成一片，孤立的美国，决不能在两洋的夹攻之中，再保持其光荣的独立战争的历史了。

我们认为，日阁的改组，应该警醒我们，使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国家，更加团结，更加联合行动起来，而不应该让东西法西斯国家联成一片，将侵略烽火烧遍世界，贻祸无穷。

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一切反侵略国家，要对文明的世界负责，要对人类的子子孙孙负责，群起扑灭人类的公敌——东西法西斯蒂，现在是时候了。

注释

[1]近卫，即近卫文麿。参见本书《二期抗战的重心》一文注[1]。

[2]东条英机（一八八四～一九四八）日本法西斯首领。一九三六年三月任关东军参谋长，残酷镇压中国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七六”事变后，率领兵团侵入中国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一九三八年五月任陆军次官，积极扩大侵华战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任第二、第三届近卫内阁陆军大臣。一九四一年十月组阁，兼任陆相、内相。十二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又曾兼任外相、文相、商工相、参谋总长等职，后因战局不利，引起重臣和海军等不满，一九四四年七月内阁垮台，日本投降后，美占领军以其为甲级战犯前往逮捕时自杀未遂，一九四八年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3]松冈，即松冈洋右，参见本书《论时局中之暗流》一文注[8]。

[4]维希政府，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1]。

[5]平沼，即平沼骐太郎，参见本书《论敌寇两面政策》一文注[4]。

[6]中野正刚，参见本书《论敌寇两面政策》一文注[7]。

[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奴役亚洲各国、建立殖民大帝国的侵略扩张计划。一九四一年八月，近卫文麿内阁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正式提出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同年八月外相松冈洋右首次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被列入“共荣圈”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以及太平洋的许多岛屿等。中国和亚洲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这一

计划。

[8]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3] [9]ABCD 的南洋封锁。A=America（美国）、B=Briltain（英国）、C=china（中国）、D=Dutch（荷兰），即美英中荷四国。封锁，具体地指一九四一年日本强行武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北部后，美国谴责日本的这一行动，同时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及限制以至禁止对日石油出口等措施。

[10]第五纵队是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期间隐藏在后方的反共和政府的间谍、叛徒等内奸的总称。一九三六年十月，西班牙和德、意干涉军联合进攻马德里时，叛军将领摩拉在广播中扬言，现有四个纵队正在进攻，并有一个第五纵队在马德里等着，以后，“第五纵队”便成为帝国主义在其他国家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

悼张淮南先生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

淮南[1]先生逝世将三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2]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内波之险，谣啄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这种至死不息的卫道精神，淮南先生也是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淮南先生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日待人接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这种动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淮南先生也是守之至死不渝的。综合先生生平，蒋委员长挽之为“赴义至勇，秉节有力”，可谓深知其人。在我印象中的张淮南先生，尚可续上“临事有恒，持躬至谨”两语，以为之赞。

两年来，我与友党人士相识，无虑数百，惟因工作关系，始终安危与共的淮南先生实为其最。今逢开会追悼之日，怆痛之表，不能自抑我对于往事的回忆。

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还，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先生这种忠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精神，直贯注到他临终前致某先生书及我的谈话中，犹殷殷以两党团结为念，可见他在一开始奔走团结时所表现出的忠诚，并非偶然了。

其后，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七七”变作，“八一三”继之，先生不仅忙于团结，且复奔走坛坫，未几，即出国赴苏，完成树立强援使命，而国内团结少先生参加者却近半年。接替之人意至一翻成议，肇成以后纠纷不解之局。迫先生归来，虽一再图谋挽救，终因事态已成，难于根本改变，居常引为憾事。然亦正因先生归，武汉之局，得以开展。于此，亦可见先生一身关系之重，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

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

由武汉而重庆，淮南先生更是辛劳备至，一方面既忙于国际团结，另一方面又忙于国内团结。其时，国内一部分人士转移其眼光对内，而先生独持正义，力主以团结御侮为尚。民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复北返延安，均赖先生助其成，不幸，抵延后，我因臂出国就医，不与先生共安危者几及一年。此一年中，国内风波迭起，赖先生斡旋其间，得使局势未臻恶化，而我则养伤国外，真觉愧对先生。

去岁夏初来渝，复与淮南先生往还，而团结之局，亦日入险境，但先生努力不稍懈。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事[3]随之，三月为参政会[4]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5]，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六月苏德战争起，方冀先生不得施展于国内者，将偿志于国际之活动，不意竟先一日而病倒。病榻相慰，初尚以纳粹第五纵队作祟戏语先生，孰料一病缠绵，竟致不起。数次视先生病，辄蒙以两党关系为问，临末一面，犹殷殷嘱我与某先生保持联络。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

然而，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再求一如淮南先生者出而继任巨艰，赓续前功，应早在国民党贤明当局的选择之中了。可是，淮南先生已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已不负于蒋委员长特达之知，即在吾党，亦深痛丧此良朋，何况国民党失此忠贞，其损失何可计算？！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尽多英才，尤多关心团结致力御侮之人，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必有许多继起者补其岗位，替其职守，这是我们最所企祷，也是全中国人民最所热望的了。

目前形势正如吾党毛泽东同志所说：“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而民族领袖蒋委员长更号召全世界反侵略各国联合奋斗，团结制敌。在这种国际团结的任务面前，我们国内团结，如不加紧，如再恶化，不仅无以兴奋世界反侵略各国的联合奋斗，抑且无以对前方将士被难同胞的流血牺牲，更无以继淮南先生五年来奔走团结戮力御侮的遗志。果如此，追悼又有何用？

但是，淮南先生的精神尚在，这是团结的象征。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我们追悼淮南先生，我们便应踏着淮南先生的道路前进。淮南先生的道路，就是团结的道路！

张淮南先生精神不死！

国际与国内团结万岁！

注释

[1]张淮南，即张冲。参见本书《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致蒋介石》一文注[2]

[2]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 this 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

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3]从“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迫害《新华日报》，报纸上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新闻全被扣押，以致每天的报纸都无法出版：他们还又按照国民党中央的特种会议对《新华日报》作出的“只准印，不准卖”的决定，扣留报纸，殴打报童。《新华日报》不得不在二月一日发表《本报重要启事》：“本报因命令免登之稿件过多，难于编排，苦勉强维持原有篇幅，既虚耗同人之精力，亦难副读者之雅望、因此，特定二月一日起改出一半张，诸希鉴谅是幸！”二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派殴捕报社的四名报童，无理没收报纸，五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法纪何在！本报横遭压迫》的新闻和《我们的抗议！》的时评，但都被禁止刊登，只剩下标题。经过报社在三、五两日的抗议，才迫使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在两份批件上分别签出了“已分令宪警机关严加制止”和“已分警宪查究，并对该报予以保护”的空文。

[4]国民参政会，参见本书《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注[10]。

[5]中条山战役，即晋南战役。参见本书《关于中央社发表谈后的事实真

我要说的话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满二十五年，并庆祝他的五十生辰，我原打算写一篇专文献给他的。这个志愿立了好久，五个月前，我还拿了他的一部分著作，想在乡居期间，读他几本，然后好写出一篇有根据的文章来。不料今年夏天，敌机轰炸的次数特别多，人又病，事又忙，不仅文章没做，书也没读。时间是一天天的过去，书因为别人要读，也还了主人，可是，我的文章却依然没做。时间更一天天的逼紧，许多朋友的纪念诗文，也拿来读了，许多报纸的庆祝诗文，也提前发表了，于是使我志愿要做的文章几乎转成了急待偿还的文债。这一急，直临到郭先生生辰的前夕。这一急，直临到纪念日特刊发稿的最后关头。可是我面前铺着的依然是一张白纸，打破了我一向做文的惯例，然而我却决不能以偿债的心情，来做献给郭先生的纪念文章。

最后关头终于突破了，书既不能读，专文也不能写，但是临着这个日子，我却不愿“无言”，我还是说我平常所常说的话语！

* * *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要并论鲁迅和郭沫若，我以为首先要弄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大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人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说：“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自己愿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虽然他比鲁迅也不过只小了十一岁。我们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虽然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舞文弄墨过一番。

因此，我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从这样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之非常可珍贵的革命传统，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了。要说的是郭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锤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四年多抗战，不论在他的著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着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可是时代究竟不同了，客观的事实不断的教训着我们充满了革命热情的郭先生，于是郭先生有时竟沉默起来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

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虽然有些论据，还值得推敲。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1]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途，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现在郭先生似乎又清闲了，恰好为纪念他的二十五年创作生活，大家主

张集资建立沫若研究所，我想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

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也正因为这样，初期创造社才能为革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才影响了后期创造社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论争。自然后期创造社的争论已多少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秋白语），可是鲁迅先生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同时，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选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章。”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在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入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这些，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注释

[1]卢那察尔斯基（一八六五～一九二三），苏联政治家，文艺评论家。一八九五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三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后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参加一九一五年革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一度接近马赫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至一九二九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三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写了不少有关俄国文学、音乐、戏剧等方面的论文，并著有历史剧和剧本。

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

太平洋战争 [1] 终于爆发了。自去年德日意轴心协定签订以来，日寇久已与德意法西斯东西呼应，遥相声援，今更承九一八的故智，学希特勒的惯技，不顾信义，竟在其大使野村来栖 [2] 会见赫尔 [3] 国务卿之前一小时，空袭英美各国属地，且远及于夏威夷和马来半岛。这种残暴的海盗行为，显然与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相配合，而且行为之无耻和讹诈，实较希特勒力尤甚。我们抗战四年半的中国人民，对此实增无限的愤慨和仇恨，同时，对我英美友邦及其属地的军民以及海外侨胞突受日寇袭击的损害，更寄予最大的同情和怀念。

现在战幕已展开了，英美及其属地的军民在日寇突袭之时，便已立即奋起应战。再没有疑问的，日寇从九一八以来，就是世界侵略战争的戎首，现在又做了太平洋大战的罪魁，他所进行的战争，完全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而英美及其属地今日进行的保卫战，正如中国抗战一样，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立在正义方面的，继着英美对日作战之后，截至昨日止，已有十九个国家对日宣战，四个国家对日绝交，范围之广，已遍及五大洲。这正是正义的洪流，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伟大结合的开始。在侵略者方面，德意法西斯亦继日寇之后，对美宣战，美国乃最后的宣布对德意的战争，于是世界战争的壁垒最后分明了，侵略与反侵略的阵线最后形成了。我中国政府，不仅对日正式宣战，且对德意毅然宣战，这表示我们中国不仅为东方反侵略的先锋，且愿为东西反侵略阵线的枢纽。我政府领袖这种英明果断之举，实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公意；这正如蒋委员长在其告全国军民书中所说：“今日以前，吾人之牺牲奋斗，在于扫除侵入国境之敌寇，而今日以后，且将与英美苏联以及世界上爱好正义自由之各友邦，共同一致，并肩作战，以彻底消灭人类之蠢贼，共奠世界永久之和平。”

诚然，现在世界战争的战场虽有两个，但战争最后的归宿，却只能有一个：不是反侵略国家的全部胜利，便是侵略者的凶焰烧遍世界，中间的可能，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国家妥协并存的可能，是没有的。日寇这次冒险行动，虽是向南，但决非放松中国，亦非忘情北进，而是由于一方面受其轴心伙伴急如星火的催促，另一方面又遇到反侵略国家日益紧密的包围，同时还受到其内部法西斯军人的叫嚣和责难，于是不得不南进，以牵制美英，以声援纳粹，以打开僵局。而德意法西斯，亦正因对苏攻势的失败，急欲阻止英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配合苏联反攻，更欲拆散苏联兵力，以便其得在冬季调动主力补整，准备明春再攻，所以他们在挑起日寇冒险以后，首先便放出暂停对苏攻势的烟幕弹，继着又宣布对美战争。这一方面是在挑动苏联东向，另一方面又在动摇英美对日抗战的部署，这是希特勒的神经战，也正是东西法西斯的配合动作。于此，我们应该认清：东西法西斯早已勾结一起，我们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更应联成一体，休戚相关。要知太平洋的胜利，亦即大西洋的

胜利；欧洲的失败，亦即亚洲的失败。

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分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和平与暴力的对抗，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万众一心，胜利是一定属于正义方面的。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方始一周，全世界正义人士及爱好和平的民族，都深信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抵抗日寇的民族国家，而且也深信这一胜利与欧洲反德意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分的。我们相信这一最后胜利，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有充分根据的。

第一，在民族自卫战争的立场上，只要是一个不甘心沦为法西斯奴隶的民族，都必会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以求解放。只要看中国抗战的长期，苏联作战的彻底，英国的百折不挠，中国及南斯拉夫等国在敌占区域游击战争的发展，波兰、捷克、自由法国等流亡在外的奋斗不息，以及美荷等国今日的奋起作战，都表示了这一宁亡而不降，宁毁而再生的精神。这是人类的正义，有此正义，孰能亡之？反观法西斯国家，侵入国，毁人居，杀人盈野，抢掠一空，将统治放在刺刀之上，这样的局面，只能胜，不能败，只能无止境的流血战争，不容有任何的和平休息，因为只要败下来或者歇下来，内部问题就要发生，所以侵略者的战争，在终极是必败无疑。

第二，轴心国家以优种之说，耸动和驱使其国内人民，投身战争，向外侵略，然这究竟是全人类的最少数，而全人类之最大多数，正如蒋委员长所说十之九几全被认为侵略的对象，应该奴役的民族。以十分之一的人类欲征服十分之九的人类，其势决不可能，何况这十分之一中还充满了被东西法西斯所压迫的本国人民，一旦觉醒，其势必不可当。

第三，轴心国家的资源是贫乏的，即加上其所灭亡的欧亚十五六个国家，其资源也不足与中英美苏荷印及一切反侵略国家对比。从战争的直接需要说，一切主要资源，如煤、铁、汽油、橡皮、粮食、棉花、羊毛，大都握在反侵略国家的手里。单就太平洋上各国对比，日本对于上述一切资源，均大都仰仗于太平洋沿岸各国的输入。以资源贫乏的国家，向外作战，持久便是他最后的致命伤。

第四，轴心国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在德国是向居前列的，加以他又统治了欧洲十四个国家，所以他能支持了两年多的战争，尤其最近五个月的对苏恶战，而尚未达到最后崩溃。但是，如果以英美苏生产力的总和对抗德国，则法西斯德国只有走向死路，这也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希特勒要在罗斯托夫[4]失败之后，极力挑起太平洋战争，以引美国向西，以消耗英美更多的生产，以企图断绝英美对苏的援助。然而，如果单以美日的生产力来对比，只产钢一项，美国便十二倍于日本，更不论汽油及其他了，而生产力的高低。正是决定现代战争胜利与否的主要因素。

第五，军事力量的对比，就现状说，彼此各有短长，而轴心国家，恰恰善于发挥其长处，以致在战争初期，都能有若干收获，但必须指出：反侵略国家潜在的后备力是强大的，只要战争持续下去，两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必然会改变的。如分开来看，在欧洲战场上，苏德军事力量的对比，现在正

处在转换的关头；而在太平洋上，美国是海空军占优势，日本是陆军占优势，可是太平洋战争，主要的正依靠海空军。

第六，在世界的联系上，轴心国家是处在被隔断和封锁的境况中，而反侵略国家，则握有海上空中及大陆三方面的可能交通，这也是客观上一个致胜的要素。

第七，反侵略的国家民族，是站在民族自卫，民主自由和人类和平的立场上的结合，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团结到底的。轴心国家，是由于一时利害而相互勾结，而且都要向外侵占，一旦利害相反，冲突必起。故全世界一切反侵略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便是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政治保证。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的发展，将保证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和民族，走向最后的全部的彻底的胜利，走向人类的和平。

三

然而必须指出：这一胜利与和平，只是前途的瞻望。由今天争取到前途的实现，还须要经过若干过程，才能由漫漫长夜中渡过黑暗，走向光明。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民主国家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大家的长处，还没有能发挥尽致，而轴心国家的弱点，也还未全部暴露。简单的说，即是各民主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力，还未能全部动员，使用尽当，也还没有做到完全团结和信赖无间；这就给轴心国家以各个击破和挑拨分化之机。如果分开来看，我们首先要指出，各民主国家内部，还不够坚固一致，而战争的动员也还做得不够，特别在我们友邦美国，孤立派的组织直到战争开始后，方表面宣告解散，德日意第五纵队〔5〕的活动，不论在美国本土，在夏威夷、菲律宾以及在中南美，都值得严重注意，而人民习于和平的精神，更须迅速转变。在这里，苏联内部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战志，应该成为大家的模范。

次之，全世界许多反侵略国家的人力，还没有完全动员起来，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国及其属地的民族，乃至印度、非洲、近东各民族，都未能大大动员起来，既未信赖他们去武装自卫，也未依靠他们去组织国防生产，更未团结他们结成巩固的反法西斯战线。这就使反侵略国家的广大后备军，置于闲散无用之地，转易为敌人所挑拨利用。

再次，有些反侵略国家的资源，还未完全开发，而有些地方，如荷印、马来、菲律宾，又有被侵入危险。在生产力发展国家如美国，开战之前，也还未能高度的使用于国防生产（如福特公司仅以百分之二十生产力制造坦克），这就使他目前军事生产大大落后于军事需要。

又次，世界运输联络，客观上虽利于反侵略国家，但主观的弱点还很多（如美国到新西兰的航空，去年才建立，两大陆北部的航线也未建立），现在太平洋东西大门（夏威夷和新加坡）又有被封之虞，而大西洋中法属西非洲和巴西的遥遥相对，又正为希特勒垂涎之地，这都是尚未克服的困难。

更次，反侵略国家在军事上的弱点，也是存在的。苏联正以其全部力量对付世界上最顽强的法西斯德国，而欧陆上尚没有第二条战线出现。美国是太平洋上抗日的主角，但他的两洋舰队，距初步完成尚差一年，而空军分布，也未达到压倒的多数，陆军更有待于训练。英国则受制于两面作战。中国的陆上反攻能力，亦有待于加强。特别值得提醒的是维希法国〔6〕所保有的海

军，仍有被纳粹德国占用的危险。

这一切弱点和困难，都不容我们忽视和盲目乐观，而应联合友邦，奋起急追，全力以赴，共同去克服这些弱点，解决这些困难，以担负太平洋上伟大艰苦的抗日任务。

四

我们还须指出：太平洋战争，在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这正如中日战争，英德战争，苏德战争在初期的一样。这种挫败的可能，无疑问的是由于存在下列的原因：

一，日寇是无耻海盗，惯于乘人准备不周，袭人领土。

二，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随时都在准备挑衅，随时都可发动战争，故战火一起，日寇行动可远及三千海里之外，而继续扩张战果。

三，日寇已全身武装，有了对付战争的长期经验，有了全国上下的战争动员，最近且加紧进行其大规模的临战体制，故其行动的迅速，资材的储存，我们不能作过低的估计。

四，日寇海空军，虽较英美为劣势，但在太平洋上却握有军略的优势。东起夏威夷，西抵马来亚，北自日本海，南抵大洋洲，都为他海空军活动的范围。在这个活动圈内，英美的海空军，显然还处于劣势而且分散。

五，英美虽非全无准备，但究因企图和缓太平洋上的目前冲突，在精神上，物质上，总还准备未周。

这种初期的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而应更加动员起太平洋沿岸的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的不利局面。尤其重要的，必须弄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以免发生不应有的认识和错误的估计。这些特征是：

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日寇所要求的，是迅速的各个击破英美分散的海空军主力，以便囊括上述的太平洋活动圈，掠取其中丰富的资源。而在英、美、澳、荷准备未成，布置未周以前，决不能冒取攻势，自陷错误，这在贤明的英美当局中，亦已说到，毋待解释。

二，解决日本，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必须明白：单单空军的轰炸，即使从阿拉斯加之阿留申群岛，从中国本部乃至从海参崴，不断轰炸日本三岛，而没有海军的配合进攻，这在动摇日本战志，炸坏日本建设的作用上，是不小的，但并不能解决战事，而美国海军，目前即设想远征三岛的计划，还是过早的事。以德国那样强大的空军和陆军，没有海军的登陆协助，虽仅一海峡之隔，亦无奈英伦三岛何，这就是单靠空军和陆军，不能解决拥有海军的岛国的明证。不错，岛国是最怕海上封锁的，但单单肃清太平洋上日本海军活动的力量和范围，便须相当大的力量和相当长的时间。这里必须指出：新华日报九、十两日所载美日海军力量的比较，在日本方面，都是根据旧的材料，而主力舰只十只，最新的还是一九二一年入水，这是不完全的。

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如新加坡、达尔文港、马尼拉等地，同时还须巩固印度、夏威夷及阿拉斯加的根据地，及苏伊士、巴拿马两条主要交通线，然后才能设

想进攻。罗斯福总统曾说世界战争将在一九四三年结束，这句话不是毫无根据的。

四，由于上述客观原因的存在，日寇虽弱于纳粹德国，而所遇的对手，又为 ABCD[7]及太平洋其他各国，但仍能暂时肆虐，这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最后的死命。因此，太平洋反日各国的军事同盟和配合作战，中国的反攻，南洋各要塞的坚守，南洋各民族及华侨的动员和武装组织，太平洋上可能被敌占领区域之资源破坏和游击战争发展的准备，在被日本奴役的民族中以及日本国内人民和军队中的工作，这都是给目前敌人最有利的打击。另一方面，在美国以及一切抗日的国家，必须高度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美国，更须改变全国的生产机构，生产军事工业，以适应全世界兵工厂的需要，好最后发出制日本死命的炮火。必需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决不能再让日寇从南洋取得战争的主要资源，必需百倍的生产最后解决日本的军人，然后再加上人力的运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是一定的！

五

但为了明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认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的特点：

一，是长期性。这由于法西斯侵略国家有了多年的战争准备，但苦于资源缺少，故志在速决，而被侵略各国家各民族，除了苏联以外，都是事前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足够的自卫的准备，但却人多，地大，物博，故必须持久，方能胜利。

二，是不平衡性。这由于被侵略各国家各民族过去对于法西斯战争的威胁的了解，有很大的不同，故易为法西斯国家所分化，致战争的发展极不平衡，这很有碍于目前胜利的争取，但如加以补救，也还能使各方力量做到不断的增长。

三，是全面性。现代战争决定于人力，物力，生产力的总和，没有这三种力量全部的动员，或动员不够，世界法西斯的消灭是不可能的。

四，是一致性，也就是不可分割性。世界各国的反侵略战争，必然会打成一片，变成一体，然后才能阵线扩大，同时也必须坚持最后的全部的胜利，不容中途妥协，单独议和，才能阵线巩固。

五，是阶段性。因为是持久战，所以一般的说来，大致都要经过初期的防御和退却阶段，继之以相持和准备阶段，终之以反攻和胜利阶段，但由于各国和各战场的条件不同，各阶段的时间久暂和变化也将有所不同。

六，是主从性。在世界战局上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对德意须用主力，苏联已付其全力，英国辅之，而对日则有 ABCD 等国联合力量，美国且为其主。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分配上，太平洋已颇不弱，但这也是环境使然。如果能速战解决日本，则移西于东，未尝不可使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部署一时改变，但证之于前段所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必然会中纳粹诡计，使主战场上遭受难于挽救的损失。所以即使日寇敢于同时北进，我们太平洋上现有的联合力量，也应防止这一着，以共同保卫东方反法西斯的阵线。

懂得了以上所说的目前世界战局的规律，我们便能正确的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的分

担上来解决太平洋战争问题。这里就必须从作战任务的分担上，从一切人力的动员上，从世界资源的分配上，从军事生产的加紧和分担上，从国际交通的建立和维护上，经过太平洋各国的会议和决定，以确定共同的计划，只有这样，太平洋的反日战争，才能有组织的，有配合的，有把握的进行。

然而，欲实现这一计划，必须以我们中国来推动英美荷澳及太平洋上其他国家民族的联合，并密切与世界所有反侵略国家和民族的联系。因为只有中国，只有中国的抗战，才能削弱和牵制日寇四年多，才能实行反攻以与英美等国并肩作战，才能影响和推动南洋各地民族和侨胞援助英、美、荷、澳，实行自卫的战争，才能了解苏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而更懂得怎样善用这一主力，以共同消灭世界法西斯蒂。

注释

[1]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军、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大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失败。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宣战。同日，德、意对美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大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

[2]来栖三郎（一八八六～一九四五），日本外交官。一九三九年任驻德国大使，负责同德意日法西斯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受东条英机内阁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委派，作为特使专程赴美，协助野村吉三郎（参见本书《论敌寇两面政策》一文注[8]）大使处理僵持中的日美谈判事宜，实际上的使命是，以加强谈判为幌子，掩盖日本加紧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活动，同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

[3]赫尔（一八七一～一九五五），美国国务卿（一九三三～一九四四）。民主党人。国务卿任内，缓和保守社会势力对“新政”的不满；对拉丁美洲地区推行“睦邻政策”；主张援助英、法对抗法西斯德国；主持对日谈判，对美国外交有重大影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辞职，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4]罗斯托夫是苏联罗斯托夫州首府，位于顿河下游右岸，十九世纪已成为沙俄南方大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二日，罗斯托夫的进攻战役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一次实施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这次战役将德军坦克第一军团从罗斯托夫向西击退六十至八十公里，制上了德军向高加索的突进，稳定了苏联战场南翼，为苏军一九四一年冬季反攻奠定了基础。

[5]第五纵队，参见本书《太平洋的新危机》一文注[10]。

[6]维希法国，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1]。

[7]ABcD，参见本书《太平洋的新危机》一文注[9]。

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
苏联红军胜利的前进！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在全世界都受着法西斯强盗的侵略和威胁当中，在全人类几乎都卷入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来过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的纪念节，自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苏联红军降生在一九一八年德国侵略者逼近彼得格勒的危难当中。由于工农群众的无比英勇，由于布尔塞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坚强领导，特别由于列宁斯大林的亲自号召和指挥，当时年幼的红军终于阻止了全副武装的德国强盗的攻击。现在，二十四年后，德国法西斯强盗又以其世界上最残酷最无耻的军队，装备了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背信弃义的闯进了苏维埃的领土，逼近了不只是列宁格勒而且是莫斯科和高加索的大门。但是，今天年青的红军，却更以其至大的英勇和流血的牺牲，保卫了苏维埃的每一寸土，击退了希特勒匪徒对于侵占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高加索的一切尝试。战争已这样进行了八个多月，红军在战斗的烈火中已炼成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他的后边有着全苏联人民的动员做后盾，有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类做后援，尤其是领导他的有世界上最坚强最前进的布尔塞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而伟大的斯大林更亲自指挥他向着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难道我们还可以怀疑，我们可以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德国强盗么？”（斯大林语）我想，一点也不用怀疑。便连我们敌人——法西斯强盗也都已承认，他们是估计错了。希特勒匪徒在席卷十四个国家之后，遇到了红军，他那种所向无敌的奇谈，是完全破产了。摧毁世界文明成为人类不共戴天之敌的法西斯强盗，在红军的重击下，实力是日渐削弱，生产是日渐减少，士气是日渐消沉，统治是日渐动摇，而最后则必不免于崩溃。但法西斯德国决不会自行崩溃的，何况他的兵力还未被完全摧毁，他正在高谈春季攻势。可是战争的主动性已经转到红军手里，红军必然会继续把握住这个主动权，节节的进攻敌人，不断的歼灭敌人，不让敌人喘息，不让敌人整顿，不达到最后胜利，绝不罢手。即使希特勒真组织起春季攻势，其力量也要较去年脆弱，其后援也要较去年单薄，只要苏联红军奋其无上的英勇，苏联人民动员其全部力量和生产，则纳粹匪军的春季攻势，不论其向着何方，必再度失败无疑。即使更有其他的侵略者敢于再向苏联挑衅，也必然要遭受到同样的失败。现在，正处在红军纪念节中，英勇机动的红军，想更会以庆贺自己生日的热忱和兴奋；来给纳粹匪军以迎头痛击罢。我们愿在此遥致贺忱，预祝胜利！

苏联红军既担负起世界上歼灭法西斯渠魁的艰巨任务，我们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各民族各国家，便都应各就本位，尽其力之所能，或以物资援助苏联，或加强其本身战斗力量，以配合红军作战，如我中国，则更应加强对当面之敌的战斗，以负起牵制和消灭东方法西斯的主要任务。世界战场虽在两旁，世界战争已属一个，不论在西方在东方，我们都是对法西斯侵略者作战。只要我们努力于反法西斯的战斗，我们便是最好的配合红军作战，最实际的庆贺红军纪念节。

尤其重要的，我们还应从红军的伟大胜利中，学得一些宝训，以争取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苏联红军所遇到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大最强最恶的军队，而且握有全欧（苏联英伦除外）的生产力以闪击苏联，然而红军从没有一秒钟丧失其自信力，也从没有一次放下其武器，停止其斗志。确信最后胜利，确信自力可以歼灭顽敌，这是苏联红军永远不可攻破的信念。

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战，一开始便攻入苏联领土，而苏联红军的保卫战虽处在防御地位，但决未丧失其积极性，亦即是积极防御或攻势防御。消极防御或守势防御在红军的战斗条令中是没有他的地位的。纳粹匪军的胜利是以攻城略地多少为标志，而红军的胜利则以歼灭俘获敌人多少为标志。因此，希特勒去年虽组织了五次攻势，但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红军却拥有雄厚的后备力量，所以在纳粹匪军衰竭之后，便能立即转入主动的攻势。

红军掌握了主动权之后，一直在向敌推进，决没停止过他消灭敌人的战斗。只有战斗，才能使敌人无从稳住他最后的防线。只有战斗，才能继续掌握着战争的主动之权。

红军的英勇，表现出至高无上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从个人的英雄主义长成到群众的英雄主义。红军战士在战斗中，真正实行了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只有毁灭的城市，没有挂起白旗的城市。只有寸土必争的国防，没有不设防的领土，只有拼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口气，没有成千成万的投降和缴械。

苏联红军和人民是彻底遵守了焦土抗战的决策。二十年来苏联人民亲手建设起的繁华都市和美丽乡村，在纳粹匪徒将要侵入之前甚至已经占领之后，都又亲手将他们毁了，决不让纳粹匪徒有任何所得，而只留给他一片焦土，一堆残骸。这是凤凰自焚了而再生的精神，最值得反侵略者效法。

游击战争本是苏联人民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之一，这次经过斯大林的号召，更普遍发展于敌占区域，并深入到被法西斯强盗奴役的各国人民当中。到了将来消灭德国匪军的决定胜利时，必可看出人民游击战争的更大作用。

苏联红军和人民的合作，人民为红军的后盾，已胶结成为不可分解的力量，人民也就成为红军不竭的源泉。苏联的领土虽辽阔，人民的感觉虽有别，但广泛深入的动员，已经使红军的补充不缺，供给适时，运输便利，后方巩固，而现在还要更进一步的动员人力，动员生产，实行竞赛，还要以更多的兵员新工作者，更多的飞机坦克大炮，更多的粮秣服装用具，供给前方。

苏联红军的教育，也是最能使之掌握现代技术的。他的军事政治教育不仅养成于军队或军校中，而且早就培养他的基础于人民的普通教育和日常生活中了。

苏联红军之所以如此坚强的”其基本原因，还由于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深入。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巩固部队的灵魂，而决非是部队中的特务，或是一些装饰品。

最后，苏联红军之所以胜利，所以必能得到完全的胜利，主要的还因为有着红军昨日的创造者和红军今日的指挥者斯大林同志在领导他们。斯大林就是胜利的旗帜。

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之下，苏联红军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烈火中，苏联红军已成为保卫全世界人类自由解放的力量！

庆祝苏联红军纪念节，就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就是庆祝全世

界反法西斯的团结！

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ZSBJ09100821_0403_0/ZSBJ>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几天前，从华北战场上传来了一个哀讯，我英勇忠贞的左权[1] 同志——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在反扫荡战中，悲壮的殉国了。这一哀讯，震动了十八集团军的全体将士，打动了华北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弦，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全国抗战军民的注意和悼念。

在抗战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牺牲在敌人炮火烧杀中的，已不知有多少，更何况左权是抗战军人，身临前线，战死疆场，正是尽了他的天职，也是革命军人之荣，只是左权同志死在壮年，以他的志行才力，经验学识，所能贡献于国家民族，尽力于革命军队者正大，今一旦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尤其是对于十八集团军和敌后人民，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概自抗战军兴，高级将领牺牲于前线者前有郝梦龄、王铭章诸将军，后有张自忠、唐淮源诸将军，今左权同志以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之地位，于敌后支撑抗战，将近五年，终至以身殉国，斯真不愧跻于高级将领之列，且足为高级幕僚争光。

左权同志湘人，早岁习军事于广东湘军讲武堂。时湘军在谭组庵程颂云两先生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故有讲武堂的训练组织，颂云先生实为之长。讲武堂中多二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真所谓相得益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不久，湘军讲武堂归并于黄埔军校[2]，全体学生编为第五队，与前期队同为第一期生毕业。在一期同学中，湖南人特多，知名者如蒋先云（战死于北伐时代河南战役中）、李默庵、宋希濂、贺衷寒、刘云、刘勘、霍揆彰、陈启科、陈赓、赵自选诸同学，而左权同志便为其中之一员。缅怀当年同学，今日同袍，风雨同舟，能无故人之感！？

左权同志毕业黄埔军校后，即参加东征及回师广州诸役。未几，与陈启科同志在广州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遂转往苏联留学。其后左权同志又与刘伯承、刘云、陈启科转入苏联陆军大学攻读。民国十九年毕业归来，刘陈两同志相继牺牲，左权、刘伯承两同志则先后驰抵江西军中。从此时起，整整十一年，左权同志未尝一日离开军队，而抗战五年，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在近二十年的军事生活中，由军校到军队，最后更战死军中，左权同志是真能与革命军队共始终者。他这种革命军人自我牺牲的精神，实无忝于黄埔同学，更配称得起蒋委员长的战部属，革命学生。

* * *

抗战五年了，中经多变，（被略五句）太平洋战争起后，敌人既有事于南洋，亦未放松于北进的准备，但同时却在华中进攻长沙，在华北扫荡山地。缅甸既陷，敌人立即转其凶焰，侵我滇边，同时更用兵于浙赣，转移扫荡于华北平原。可见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我国不能止抗战之火，即敌人亦不能熄侵略毒焰。

又有人想，敌人在中国战场上可以有所选择，即是说有所打，亦有所不打。这种想法，更是有毒素的。固然，敌人时常在想分化中国内部，挑拨中

国内乱。但敌人终究是敌人，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当敌决意进攻之时，他又何尝分别过你是哪类的中国人，我是哪类的中国人，他又是哪类的中国人！？这次晋豫冀边太行南端的战斗，恰发生在缅甸方陷，浙赣战争紧张之际，而战斗激烈直逼至十八集团军总部指挥所在。左权同志就在这九天的战斗中，亲自指挥所部突破敌人的重围，而自己却光荣的牺牲了。左权同志的战死，正足以说明这一真理：在敌人心目中，不论于你属于何党何派，只要你不投降日寇，他就需要消灭你。

敌人既无所选择，我们岂容有所规避，而且岂忍有所规避？（略十一句）五年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的战绩，伤亡及其所遇到的困难，拿左副参谋长五年苦战的功劳和最后殉国的壮烈为印证，就可以例其余了。我们谨在此向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友，向全中国的同胞同袍申明：我们是至死不会离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我们决心要将沦陷的河山从百战中夺回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战胜敌人，我们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争取它，左权同志便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

* * *

左权同志又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他在军中，经常喜欢研究，喜欢译著，同时，他又勤于工作，忠于职守。他习于游击战争，但他也不忘正规战术，所以他在军队正规化的口号下，尽了他最大的责任。沉毅坚忍，是他个性中的特长，也就成为他在党内、在军中、在社会上读书治事，练兵作战，立身处世时的特点。在这方面，足供同志们、战友们追念回忆之事甚多，于此不及备述。

我与左权同志相识近二十年，不幸抗战以还，我因远离前线，不克与其同生死共患难者竟达四年之久。今左权同志殉国了。遥望大河以北，请纓有愿；困处夔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中。

左权同志已作先驱了，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将继着起来，千百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华北抗战已近五年，胜利之期已不在远，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

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中国抗战胜利万岁！

民国卅一年六月廿一日

注释

[1]左权（一九一六~一九四二），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和军长，第一军团参谋长和代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指挥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牺牲。

[2]黄埔军校，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在该校担任过各种职务，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困结”的旨趣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篇》）这是讲个人修养的最好规范。拿现代的语义讲，忠于人，就是忠于团体，忠于阶级，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直到忠于人类。信于友，就是信于同类，信于同志。传习，就是勤于所学，勤于研究。一个人的反省功夫，能时时这样，而且做错了就改，不足的就加，那这个人的修养一定成功。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俄文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页）列宁又说：“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俄文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二六一页）一个合乎时代要求的政党或团体的反省功夫，如果能认真到这样，那这个政党或团体就一定成功。

反过来说；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末，这个人或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

我们国家具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越条件，我们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近百年的民族解放运动经验，而我们这一世又经历了辛亥、北伐特别是目前抗战这三个伟大时期的磨练；在这样基础上生长成的个人、团体或政党，只要他的主张合乎时代要求，他是有着发展前途的。但有一样，有着这种前途的个人、团体或政党，必须善于看出自己力量和自己弱点之所在，痛下反省功夫，那才可以成功，否则，难免失败。

我们的党——中共，是经过廿年以上锻炼的党，我们的报——新华，是经过近五年奋斗的报，我们自信，党的民族革命方针是二十年坚持如一日的，报是在党的方针下，尽了他为团结抗战的号角为人民大众的喉舌的任务的。但毋庸讳言的，党曾在这二十年当中，犯过多次错误，报也曾在这近五年中，存在许多缺点。最近我党中央号召整顿三风，便是要在党的正确路线和巩固基础上，认真的做反省功夫。新华的改革，就是响应这个号召和在事实上执行自己对抗战对人民所负担的义务。

为了适应这一改革，我们特在新华四版出一“团结”副刊，每星期六刊出，做我们自己的反省功夫。反省的中心内容，放在对抗建的认识，政策的解释，工作的检讨，个人的修养乃至学习和研究上面，以期促进全党的团结，全国的团结，文体格式不拘，但求能达到反省和团结的功效。

我们自信是忠于民族国家，信于朋友同志，且愿勤于所学的，但我们愿

认真的检讨自己，我们尤愿接受大众的批评；我们愿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我们尤愿诚恳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愿揭露错误的原因，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尤愿将这些原因和方法提供朋友们读者们做参考做借鉴。

“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决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并坚信成功的个人、团体和事业，必定是从错误的改正中磨练出来的。不犯错误的人或团体，世界上从来不会有而且永不会有的。同时，我们也不因他人批评中含有恶意甚或变成攻击便拒绝批评。“真金不怕火来烧”，我们愿以此自勉，并与大家共勉。

这一切，就是我们编辑“团结”的旨趣。

第十一年的“九一八”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胜利的前夜之时，“九一八”已到了第十一年周年。十一年前，北大营的炮火，证实了法西斯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世界的侵略祸首。十一年后，这个侵略祸首，正在追随其盟兄希特勒之后，亦步亦趋的走向法西斯蒂的穷途末路。

十一年的漫漫长夜，经过东北人民的流血牺牲，经过全中国人民的流血牺牲，经过全世界人民的流血牺牲，方才打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确定的胜利前途。尤其在最近一年，由于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和德意对美宣战，遂造成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联合宣言[1]，在西方，有英苏同盟，美苏协定的成立有丘罗和丘斯的会晤，在东方，有中英美的密切合作，这都是政治上战胜了敌人。军事上，反希特勒战争将要进入决战阶段。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2]，将决定着今年冬季苏军反攻的迟早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但不管怎样，击败希特勒于欧战第四个头，已是民主同盟国家共有的要求。在东方，由于我国抗战的坚持，英美力量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美澳行动的积极，使太平洋各国有了充分前提为准备进攻日寇而奋斗。假使日寇敢于在欧洲战场吃紧时侵犯苏联，则不仅苏联的东方防御力量会给日寇以重大打击，而当着日寇另一泥足陷入北方战场之际，我们其他同盟国家也必会给日寇以更大打击，而促进日寇的崩溃。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胜利的前夜的形势。

如果去年“九一八”，中国在东方还是孤军奋战，东北同胞打回老家去的希望还很渺茫，那末，今年“九一八”，东方的反日战线已经展开，胜利的前途已经确定，东北同胞的希望的实现，便非遥远了。这不能不是东北同胞十一年来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也正是全国同胞所共有的兴奋。

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而目前又正是日寇企图进犯苏联的一个缺口。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这也就更加重了我国“消灭伪满，收复东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九一八的标语）的任务和东北同胞的责任。

但是，胜利的前夜，不是没有困难的，而且黎明前的黑暗，正有着一段最大的困难。在西方，斯大林格勒正处在危急之中、欧洲第二战场还没有开辟。在东方，日寇还有可能进攻苏联或者印澳，对中国，更不会放松进攻和扫荡的机会，而我们内部，又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缺点，都亟待我们克服和改正。即单就东北问题说，如何团结和动员东北同胞和足以收复东北的力量，以及如何打回老家去的过程中，团结起胜利后足以建设东北的力量，便存在着许多还没有解决的困难，不错，东北问题，只是全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有机联系的一部分。全国的困难解决，东北的困难也会跟着解决。全国军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取得最后的胜利，东北亦必会得到最后的解放。但是，东北究竟是首先沦陷而且是沦陷了十一年之久的省区，与其他各沦陷区终有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别。这一个差别，决定了“消灭伪满，收复东北”有着比其他沦陷区更多的困难，而且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

请不要忘记或忽视目前这些实际情形：东北流亡人士与关外的联系已一天天减少，东北青年流亡到关内来的尤其到大后方来的更一天天困难，关内的东北健儿正在各战线上为国血战，关外的义勇军处境日艰，且更难得到内地的接济和联系，而日寇又正以重兵控制东北，对人民肆行镇压和剥削，在人民中间悲观失望的和受其欺骗而生幻想的并非无人。这一切，固不应作过分的估计，并且在胜利到来时，有些弱点也会因之消灭。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弱点和困难的存在，对于打回老家去和胜利后的建设，总有着若干障碍。克服这些困难，固有赖于中央的领导和协助，但尤赖于东北流亡人士自己的努力和团结。

我们中共党人，八路健儿，最大多数都坚持抗战在华北敌后，有些，更游击在长城内外，在热河地区，那已经接近东北的原野了。我们愿向东北同胞重述去年今日的誓言：“我们誓愿和你们肩并肩的抗战下去，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寇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

三十一年九一八纪念日

注释

[1]二十六国的联合宣言，即《联合国宣言》。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波兰、印度和加拿大等二十六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止，法国、墨西哥和菲律宾等二十一国陆续表示赞同这一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一）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二）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2]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利用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集中了一百五十万人的兵力、发动夏季攻势。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切断伏尔加河交通，夺取高加索石油，然后向北包抄莫斯科。七月十七日德军迫近斯大林格勒，苏军与敌军在克列特斯卡雅和苏罗文基诺要冲展开首次战。九月十三日德军窜入市内，双方展开巷战。斯大林发出“决不后退一步”的号召。参加保卫战的红军和全市人民，浴血奋战。在防御战期间，消灭敌人十八万二千人，改变了力量对比。十一月十九—二十日，苏军从南北两翼转入反攻。二十三日会师卡拉奇，包围了鲍卢斯指挥的德军主力三十三万人。次年二月二日将其彻底歼灭。这次会战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追念张荃忱上将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

张荃忱[1]上将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在襄樊战役[2]中殉国，至今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每当前线战况紧张，部队流血奋战之际，便很易联想到抗战以来的殉国将士，而尤易怀念到举世景仰的张荃忱上将。去年六月，当我撰文追悼左权将军时，也曾提到张上将。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3]，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4]，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力。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5]，更成为台儿庄大捷[6]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7]将军的两封遗书[8]，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我们不仅仅是拿枪炮子弹和敌人作战，而且是拿中华民族的爱国儿女，拿中华民族的军人之魂，和敌人作战。在这里，人的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张上将就是这种对于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人。现在战争的胜利前途，业已确定。但是，只有打，只有苦打，只有拼命的打，才能胜利。尤其在今天，日寇到处向我进攻，不论在正面，在敌后，我们都需要打仗，需要打仗的人，尤其需要像张上将这样的将领，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奋斗。现在，张上将殉国虽已三年，但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相信，全国军人定能踏着他的血迹，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胜利的康庄大道！

张上将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中国历史上，多少伟人名将，在抵抗外族侵略时，杀身成仁，见危授命。张上将之殉国，便是发扬了这种民族气节的传统。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尤其在抗战接近胜利而艰危过于往常之时，更需要这种精神，不动摇不妥协的来咬紧牙根，牺牲一切，以渡过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

而我们在这一段行程中，确如大公报所说：还要有伟大的爱和恨。爱抗日的同志，恨那般杀死我们抗日同志的敌人。爱我们抗日的张上将，恨那般杀死张上将的日本强盗。只有爱恨彻底，恩怨分明，我们才能不调和，不妥协，一直打到最后的胜利。

注释

[1]张荃忱（一八九一～一九四一），即张自忠，国民党高级抗日爱国将领。一九一六年起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任营长。团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一度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五十九军军长，率部队转战沙场，屡建战功。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襄樊战役中壮烈殉国，张自忠将军在抗战时期的光辉战绩和英勇牺牲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国共两党部给予了高度评价。

[2]襄樊战役，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寇集十万之众进攻湖北襄樊、南阳。张自忠奉命率右翼兵团迎战。敌人进攻五昼夜毫无所获，掉头北窜唐河。张自忠率兵追击，沿途

歼敌五六万之众，迫敌回窜。张自忠亲率二千人紧追不放，遇敌反扑，即被优势之敌所围，于南瓜店之役弹尽援绝，死伤殆尽，张自忠以身殉国。[3]一九三三年中旬，张自忠率三十八师在长城喜峰口英勇抗击优势装备的日军，连续七昼夜，毙伤敌近三千人，挫伤了日军骄傲之焰，极大地激励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4]一九三六年张自忠曾任天津市长。

[5] 一九三八年初，日军板垣师团进迫临沂，张自忠奉命增援，他率五十九军强行军向临沂疾进，于三月十二日夜暗渡沂水，激战五日，将武装精锐的板垣师团击溃。

[6] 台儿庄大捷，参见本书《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一文注[3]。

[7]冯治安，(一八九五~一九五四)，曾任冯玉祥卫队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师长、军长。“七七”事变后，指挥所部在北平近郊抗击日军，后升任第七十七军军长兼陆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8]一九四一年五月，张自忠殉国前几日，曾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下烂，决不半点改变。”后又在致冯治安副总司令遗书中表示誓死与敌一拼，“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1]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2]，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3]，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4]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5]，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6]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7]，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8]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市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9]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10]；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11]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12]，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13]，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

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14]，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15]，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口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末，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16]，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哪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哪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哪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哪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17]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18]），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19]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

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像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20]、张国焘[21]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俊，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国民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备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注释

[1] 法兰西投降，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1]。

[2]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片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始了卫国战争。[3] 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参见本书《太平洋战与世界战局》一文注

[1]。

[4]法西斯第五纵队：参见本书《太平洋的新危机》一文注[10]。[5]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参见本书《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一文注[2]。

[6]大西洋宪章，参见本书《九一八十年》一文注[1]。

[7]苏英同盟，全称《苏英战时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并在战后合作互助同盟条约》，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伦敦签订。主要内容是：苏英两国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结成互助同盟；战后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德国重新侵略；双方决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同盟或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参加了北大西洋集团和北大西洋成员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苏联宣布废除这个同盟条约。

苏美协定，亦称苏美贸易协定。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苏、美以互换照会的办法签订，并规定每年展延有效期。一九四二年苏、美双方达成协议，将协定的效力一直维持到它被更广泛的协定所代替或一方声明希望停止生效时为止。根据这个协定，两国在有关货物输出输入各项问题上享有无条件的和无限的最惠国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宣布一九三七年的协定无效，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断美、苏原来的互惠贸易关系。[8]二十六国公约，参见本书《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一文注[1]。

[9]一九四一年六月，法西斯德国侵占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法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从组织总工、罢工到建立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游击队已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戴高乐将军在国外组织自由法国运动，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九四三年一月法国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合作协定，六月三日统一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宣告成立，法共议员密台尔、法戎以个人名义参加。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第二次改组，法国共产党正式派代表参加。

[10]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国外的德国人建立的反法西斯组织。一九四三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的有德国反法西斯的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科学家、工程师和德国战俘营代表，正式成立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通过了宣言，选举出著名作家怀尔纳特为委员会主席。

[11]冈野进，即野坂参三，生于一八九二年。一九四一年三月到延安，组织和领导了“日本在华士兵反战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任日共主席。

[12]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垮台；墨逃到意大利北部，充当德占区傀儡政权头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

[13]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华北的日军和汉奸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在游击区实行“大检举”，在敌占区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

[14]吴开先，追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官员，一九四三年五月带着日本招降蒋介石的条件，由南京到重庆，蒋介石曾亲自接见。

[15]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日本大本营报道部部长谷萩那华雄发表对蒋介石的诱降谈话，内容是：倘同意停止抵抗，参加反美英之战线，则日军将由中国撤退，承认中国之独立。

[16]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人员

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为“三三制”。

[17]皖南事变，参见本书《为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18]一九四三年六月，在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胡宗甫从担任河防的三个军中调出两个军，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发动内战。延安人民举行大会，动员保卫边区。毛泽东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历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揭露其进攻边区的阴谋。蒋介石被迫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19]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宣布解散。

[20]陈独秀（一八八 ~ 一九四二），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六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否认无产阶级应继续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和托派组织相结合，一九三一年五月曾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力总书记。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

[21]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曾先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党籍，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新专制主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的[1]。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2]，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內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3]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

这是一个报告提纲，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本文的第五部分有删节。

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4]。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下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否有它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呢？我们回答：有的。下面，我们就分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5]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6]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于是他要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7]的样子，很沉痛地说“不解决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8]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

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9]，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要人民盲从他不抗日而安内。抗战初期，要人盲从他片面抗战。现在，又要人民盲从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实，他在内战时，早夸下海口：“剿共失败，必将自杀以谢国人。”

可是从来也没见过他实行过。失败时要实行连坐法[10]，但也没“坐”到他头上。抗战前，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六十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六十万，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11] 如出一辙！

蒋介石在心理建设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其实，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强调诚，但他是绝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对苏对共对人民，也就是对革命对抗战，他都没有诚意。并且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12] 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谈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那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变，这那能说到和平！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在《中国之命运》中，有所谓“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年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的话，故《皇朝经世文编》及陈弘谋《五种遗规》两书[13]乃得大用。

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14]和拿破仑[15] 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他公开说：“（日本）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哪一个地方，西边不仅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到梧州、邕宁。”“他（指日本）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哪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国家作战呢？”

因此，他的抗战国策，早就定在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的上头。但现在日本既未征服俄罗斯，又不能吃下美国，反倒压在中国头上，于是他便着急起来，一方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便内战，另一方面便要与中国勾勾搭搭了。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他统治十八年，从一九二六年“三二”事变[16]直到今天，他几乎无一年不在战争中，而且无一时不在打内战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北伐后有宁汉分家，宁汉合作[17]。内战中有党内战争，党外战争。抗战中又有削除异己，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公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故“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这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不要说中共及其领导的武力和边区是抗战的，是革命的组织、武力和政权，就连其他党派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政权，为什么也是一点自由没有，而且到处受压迫，更不要说“发展和成功”了。甚至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真正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孙夫人，还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压迫么？所以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好，都是蒋记的，早已不是孙中山改组时的国民党，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国民党的了。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最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他一方面侈谈工业化的经济，另一方面又憧憬于《礼运》大同之篇[18]，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民生主义的幌子下，存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经济买办经济的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他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地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

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三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他们的历史来源的。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我们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来看，蒋出身于封建家庭，辛亥革命[19]，他一出手便在军阀张宗昌[20]之下当排长，奉陈其美[21]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22]，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这时，孙中山是以革命党和新军、会党的结合而成功，而陈其美、蒋介石却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蒋介石、戴季陶[23]、陈果夫[24]结帮卷入交易所的投机浪潮中，后来这种传统，更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发展。于是，这一买集团，遂成为统治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虽然蒋介石在广东也反对广东的英国买办，可是戴、陈留在上海，一开始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蒋介石一到长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首先揭旗反苏、反共、反工农。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

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在办黄埔之初，他是反对苏联顾问的，等到得到苏联军火帮助，他又高叫第三国际[25]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围攻苏联顾问在广州的东山住宅的，也就是他。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26]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他领兵东征，便与许崇智发生地盘的争执。他赶走汪精卫，更是军阀行为。他率兵北伐，对待各军，更是排除异己，拥兵自私。所以，不待宁汉分裂，他已经发展起新军阀的思想和行为了。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为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而他所领导的集团，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十年内战，便是他这个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具体表演。不论是对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党内战争还是“剿共”，他都用了这一套手法，并且从德、意、日那里学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新法宝。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去学，并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务人员直接来教。

从西安事变[27]到抗战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这一套手法。不要忘记蒋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革命性一面，但更不要忘记他那反动性的另一面，而且这一面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抗战当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内战，同时又能见风使舵，故作悬崖勒马的惊人之举。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 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28]，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我们可以为它归纳成为十二项：

- 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
- 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
- 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
- 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
- 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
- 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
- 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
- 八、滥发法币[29]，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
- 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
- 十、放任贪污，强征捐税，纵容走私，任意检查；
- 十一、焚书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诱，斫丧人格；
- 十二、紊乱法纪，败坏道德，摧残文化，毁灭民族。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这十二条纲领，当然不是公开宣布的，也永不会公开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它是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在实行，而且只有比这多，不会比这少。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软弱处，也正是它的无耻和卑怯处。蒋介石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

我们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进步的，我们决不容许抗战失败。我们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加强领导权的争取，这首先就必须壮大和巩固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有力地领导别人，制止中间分子的动摇，孤立顽固分子，而坚决地实行我们的抗战十大纲领[30]和“三三制”[31]的施政纲领。

讲到策略，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的。

如对口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

如对英美的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内战。

如对苏的冷冷热热，以冀达到为它牵制日本，便其解决内争的目的。

如对地方势力、各小党派威迫利诱，以图达到离间我们、孤立我们便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对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元老时好时坏，来看他们是否对统治者怀有贰心。

如对进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明压暗勾，以逼其离开我们，反对我们。

如对工农劳动大众监视侦察，隔断其与我们的一切来往。

最后，对待我们，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而其策略亦时软时硬。不

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决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论时期，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消共产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

五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它的组织的。它的组织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夺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这就是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 CC[32]。他胚胎于一九二六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 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着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国民党经费，一九四三年度预算为二万万八千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务的党务活动上，而特别费并不在内。

第二个系统是在三青团内。那就是以复兴社为前身而转成今日三青团内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胚胎于孙文主义学会[33]和黄埔军校同学会[34]，创始于“九一八”后之力行社，后改复兴社，至抗战初并入三青团，而康泽[35]所领导之别动队及特训班加入进来，成为三青团的特务灵魂。

第三个系统是在军事系统内，那就是政训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贺衷寒的政训处有一批军队特务，连军官都厌恨他们。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是戴笠一手组成的，创始于一九三二年，初期为戴笠复兴社之特务组，现在羽毛丰满自成一系了。军统局的组织最庞大，人、钱均多。军统局本身分处，下分区、站、组、队。他的组织触角最广，军队中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各级情报参谋，军事机关中有调统专员，边区有军事督导组，保安团队中从保安处长、第三科长直到下层情报人员，全国的整个警宪系统除少数几省外，都在其控制之下。全国整个税收系统，有其缉私队和检查处来管。全国交通机关，有其监察处和检查站来管。国内外外交系统乃至武官情报人员，都归其管辖派遣。全国经济系统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员。敌伪沦陷区作归其管理。破坏我军、我区的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也归其布置。与 CC 平行进行。

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一特务统治的世界，而且国民党特务还与日特、伪特勾结在一起。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

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注释

[1]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262页）。

[2]见《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文是：“法西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猖狂的进攻；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旧的译文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本文引用的是旧译文——编者注）；法西斯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最恶毒的敌人！”（《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45~46页）。

[3]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藩部”，历代都有职专管或兼管民族事务，例如清代专设了理藩院，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事务。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主要是用镇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对待边疆各少数民族。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继承了这种政策，甚至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的大小宗支。

[4]见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566页。

[5]见古文《尚书·大禹谟》。这段引文是书中舜教导禹的几句话。意思是：民心很危险，危则难安；道心很幽微，幽则难明；要专心致志地研究，以掌握其中的奥妙。

[6]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05页。

[7]见《礼记·中庸》。原文是：“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中庸》把“诚”说成是人人具有的天赋道德，同时又是客观事物的总规律。有了诚，才会有万物的存在；如果不诚，就没有客观事物。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文中的“无物不诚”、“有物不诚”是引申“不诚无物”，一语，用唯物主义观点对蒋介石进行揭露与讽刺。蒋介石否认共产党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妄想消灭共产党，所以说他是“无物不诚”。人民革命力量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公开承认了边区存在的客观事实，但他仍然想一手取消，所以说他是“有物不诚”。

[8]庐山谈话会，指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

[9]蒋介石鼓吹的力行哲学，是割裂知行关系，孤立强调“行”的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愚民哲学，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哲学。

[10]连坐法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人民的一种法律。它规定一人有罪，家属、亲友甚至邻居也连带给予治罪。《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蒋介石为巩固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二、一九三二年分别在地方和军队中推行连坐法。

[11]希特勒，参见本书《论目前战局》一文注[6]。[12]四维八德，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规范。四维，指礼、义、廉、耻；八德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3]《皇朝经世文编》，清贺长龄编，共一百二十卷，选辑清初至道光以前的官

方文书、论著、奏疏、书札等，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部分。[14]曾，即曾国藩（一八一二～一八七二），晚清官僚，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主将。一八五二年为镇压太平军，开始在湖南招募、训练地主武装——团练。因士兵和将领大多用其家乡湘乡人，故名湘军。湘军自上而下有严密的封建隶属关系，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统领。中国近代军阀军队从湘军开始，以后袁世凯、段祺瑞直到蒋介石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胡，即胡林翼（一八一二～一八六一），在贵州任知府期间镇压苗民起义，一八五四年后到湖北、江苏等地镇压太平军，是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首领。

左，即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一八六一年任湖南巡抚的幕僚时，招募人马组成左系湘军，又叫楚军，在江西、安徽镇压太平军。一八六六年后又连续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成为著名的湘军军阀。

李，即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淮军军阀。一八六一年受曾国藩之命，回安徽原籍将淮南团练按湘军方式加以改编，组成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5]拿破仑·波拿巴，参见本书《华府会议中之英法战略》（一）一文注[4]。

[16]三二 事件，即中山舰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蒋介石担任了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为排挤共产党人，进一步篡夺第一军的军权，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抵达黄埔后，随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擅入黄埔，共产党阴谋暴动，并以此为借口于二十日晨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了中山舰舰长，随后又强迫在第一军中工作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17]“宁”，指南京政府；“汉”，指武汉政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革命群众运动的声势，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推动下，采取了“联共反蒋”的态度。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罢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全部职务，并申讨蒋介石。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并通过“清党”等反革命决议案，通缉共产党员，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及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这时出现的南京与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称为“宁汉分家”。

同年五月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公开走上反共的道路。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公开屠杀共产党员。从此“宁汉合作”，蒋汪反革命合流。

[18]《礼运》大同篇，指《礼记·礼运》篇中对于“大同”之治的论述。“大同”是儒家宣传的理想社会，是小生产者的空想。

[19]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20]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统治山东的军阀，早在上海陈其美部下当团长。一九一三年投靠直系军阀，后投靠奉系军阀。

[21]陈其美（一八七八～一九一六），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江浙一带策动反清革命运动，同时在上海加入青帮为大头目。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一九一二年年初，指使蒋介石刺杀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

[22]陶成章（一八六八～一九一二），一九〇四年在上海参加组织光复会，是该会领导人之一。一九〇六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后，发动上海、浙江等地的反清起义。一九一二年一月被陈其美、蒋介石暗杀于上海。

[23]戴季陶（一八九〇～一九四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

思想上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忠实追随蒋介石。

[24]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组织部代部长。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与其弟陈立夫一起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特务系统。

[25]第三国际，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19]。

[26]《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编辑的曾国藩、胡林翼关于治兵言论的小册子。

[27]西安事变，参见本书《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注[2]。

[28]抗战建国纲领，参见本书《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一文注[4]。

[29]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规定由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加上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称为法币。

[30]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抗战斗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31]“三三制”，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16]。

[32]CC，参见本文注[24]。

[33]孙文学会，是国民党内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黄埔军校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组织。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

[34]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后，蒋介石为加强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控制，四月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也取消了孙文主义学会），七月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自任会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个同学会成为蒋介石笼络和控制嫡系军事骨干的组织。

[35]廉泽（一九一六～一九六七），原国民党特务头子。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战役中被我俘虏，一九六三年被特赦后，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

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去年十一月，我曾和赫尔利将军[1]由延飞渝，彼时我奉党中央之命，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不幸竟被拒绝，致无结果而回。现又经过月余，时局日趋严重，为着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为挽救当前危机起见，急需与政府及各方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具体步骤。此次来渝，即系本此方针，代表我党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2]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我认为除此并无别途可以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也并无别途可以挽救目前的危机。至于其他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无补于事。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等，甚望政府当局速加采纳。

注释

[1]赫尔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国共和党人。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驻新西兰公使等职。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中国，年底任驻华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坚决谴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离职。[2]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今名。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重建组织。同年五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

这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抵渝时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原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论统一战线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同志们：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着重讲国共关系，一个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合起来说，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

一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党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1]；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2]、福建人民政府[3]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4]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们东渡黄河抗日[5]，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6]，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7]。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8]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9]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10]来了，蒋鼎文[11]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12]、杨虎城将军[13]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14]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15]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16]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关的，因为红军

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17]、冯玉祥[18]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19]，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20]，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21]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22]、博古同志[23]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24]。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25]、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26]，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 Q 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

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拚，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27]，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拚掉了，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28]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29]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一方面还是

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像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宣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

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石友三[30]、高树勋[31]、汤恩伯[32]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33]发生了，竹沟惨案[34]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35]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36]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

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37]。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往北送，这真是“投界有北”[38]。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干，来了一个何白《皓电》[39]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40]，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一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41]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那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同志[42]的错误。陈毅同志[43]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44]就到顾祝同[45]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46]，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47]，德苏战争[48]，太平洋战争[49]，以及新疆问题[50]。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将军[51]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 and 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52]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同志[53]邓颖超同志[54]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

叶挺将军被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专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55]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去见张治中[56]，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57]，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正值宪政运动[58]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从这三次反共高潮和三次国共谈判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继续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在第四个阶段中特别明显，所以谈判时他们充满着反共思想，反共高潮时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内战。虽然这样，文章还没有了结，还有新文章：不是再来第四次反共高潮，就是再来第四次谈判。结果，不是反共高潮而是继续谈判。这个谈判不仅有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而且有外国人参加；同时，谈判又公开的。这是和过去谈判不同之点，是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斗争，就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正因为这样，所以谈判也就继续下去，于是有了赫尔利[59]到延安以及我的两次出去[60]。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定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内容主要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

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这五条他承认了，所以我到了重庆，就是为实现这个方针——联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又拒绝了。我回延安以后，赫尔利又继续邀请，我就又出去一次，提出为实现联合政府，办法可以采取一个准备的步骤，先开一个各党各派的会议，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61]三方面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来讨论如何改组国民政府成为联合政府，如何起草共同纲领，如何废止一党专政。这一次谈判国民党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反而叫嚷什么“你们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完全把我们的主张抹杀了。他还是要继续原来的方针。从《根绝赤祸案》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这从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上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62]。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他这条方针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

今天除了抗战这点上还可说是相同之处，至于如何抗战，完全是两套。我们是要胜利——彻底的胜利，要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团结——民主的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要国际的团结。国民党是另外一套，不是要彻底的胜利而是企图妥协投降，将来能用日本的资本和武器来打内战，把伪军收编过来打内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维持独裁，不是要团结而是要分裂，在国际上是挑拨离间，企图英美帮助来一个“斯科比”[63]，国民党就是这一条路线。

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我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反动的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还是留有余地，不关谈判之门。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民主，为了团结，这样的谈判才有作用，否则那真是谈话会了，那就不会有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情形。

二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谈到经验教训，不能不联系到十年内战时期，甚至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

误问题。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入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我们才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看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现在先说敌人方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这样，我们要认清敌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成了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敌人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例如大革命失败，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即所谓“宁汉合作”[64]的时候，帝国主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致地压迫革命。但是这种情形在整个二十多年当中并不很多，许多时候敌人是分开的。“九一八”以后就很明显，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他们就分开了。抗战以后更加明显，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所以帝国主义是有分有合，分开的时间还是长的。从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说，北伐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时候，南方就有些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到革命阵线里来投机，夺取领导权。十年内战时候，敌人对红军的进攻也是不一致的。抗战时期，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翻过来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但同时又和日本勾结。这样，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蒋介石在大革命初期，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但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65]以后，很快地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汪精卫[66]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总之，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变动很大，尤其以抗战时期为最。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思想，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错误。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蒋介石在江西杀了陈赞贤[67]，向共产党开了刀以后，一天天地走向反动，很清楚的是要走到敌人方面去，但是那时候我们党内像陈独秀[68]这样的人，还主张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就没有认识这个转变关头的变动。“左”

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内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是我们的朋友，特别在“九一八”以后，就是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朋友，而“左”倾观点认为他们是敌人，并且是最危险的敌人，竟错到这样的度。

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倾观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比如一九三五年在瓦窑堡会议[69]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估计到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大资产阶级，有转向抗战的可能，那时候“左”倾观点的同志就不相信，不懂得联合他们来推动抗战。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例如刚才说的第一次武汉时期的汪精卫，以前他的确是代表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的，但是到了武汉以后，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还认为他是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例如“九一八”以前，十九路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江西进攻我们，但是到了“九一八”以后，民族革命高潮来到了，在福建和我们合作。有“左”倾观点的同志还把他們当作敌人，反对他们。这些都说明了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再说队伍方面。

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

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依靠一个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的主要力量，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五个指头占四个。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打不好仗。北伐战争[70]时，军队本身也好，军队以外的配合力量也好，最大多数是农民。内战时候更清楚，完全依靠农民。抗战时期还是一样。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恰恰都是不认识农民，忘记了农民。“左”倾的错误是不依靠农民，只凭无产阶

级打冲锋，结果使自己孤立。右倾的错误是依靠资产阶级，甚至依靠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期，在武汉时期，认为资产阶级可靠，甚至把唐生智[71]、冯玉祥[72]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当成依靠，而下去依靠农民。第二个武汉时期，抗战初期，有一部分同志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大资产阶级，以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胜仗，把主要的力量农民忘记了。这种依靠法很危险，不仅要打败仗，还会被人家俘虏。第二个武汉时期，由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我们主要的力量在华北，所以没有像第一次大革命时候那样失败，但是危险还是有的。后来，大后方工作存在一个弱点，就是民主运动没有深入到农村。

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革命取胜。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不对的。“左”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大革命失败前后，曾经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譬如广州起义[73]，只把城市工人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教导团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也没有打算退到农村中去，所以广州起义失败了。上海起义[74]也是如此，想依靠城市的工人和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在敌人力量最强的上海硬坚持，结果失败。现在我们又到了要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力军是在农村。做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同志应该认识，要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队伍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右的观点忘记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当时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有叶挺[75]的二十四师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从广东到武汉，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有了武装，这是我们的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76]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当然还有土地革命问题，不过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这在当时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武汉

时期，以为国民党军队不改造也可以同他很好地合作，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析了这个队伍，把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右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第二个武汉时期重复了这个错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以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77]。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左”的观点是只相信无产阶级，只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脱离一切群众，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去联合。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分析，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结果孤立了自己。这是我们对统一战线队伍的分析，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犯错误。

但是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样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以外，有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就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都同无产阶级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假如不区别，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一定受人家的影响。“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有的错误是受了大资产阶级的影响。

因为和他合作，就容易受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好一点，请我们作客，吃茶吃饭，就不去区别了，就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右的错误，一般他说，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的呢？一般他说，在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在我们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也这样指出了。同时，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容易有“左”倾情绪。这些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再说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78]，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分了家，成了两个队伍。一直到现在还是两个队伍。一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发展到今天有了解放区，有了人民的武装。另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十八年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这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像和友军的关系一样。大革命初期、中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当然，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不但实质上可以领导，而且形式上也可以领导。如在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是不是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呢？从历史的经验看，一时的或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他说，当他们的力量小的时候可以受我们领导。譬如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就不愿受我们的领导了，但他没有力量北伐，就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这时还受我们领导，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又如那一天朱德同志报告中讲的，当华北敌人九路围攻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就要我们朱总司令领导。但那是一时的，一旦他和他的后方打通，就要跑掉，反而来打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

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仅在不得已时、在某一个问题上能受我们领导，他们一旦有了力量，有了外援，就会立刻和我们分裂。所以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他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

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二些县政权是归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第二个武汉时期的错误也是不懂得这个领导权问题。那时有一种解释，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是统一的政府，蒋介石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但当时党中央是很强调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这两点的。武汉时期放弃领导权，还表现在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假若这个统一战线是我们领导的，当然很好。但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承认我们的领导。他所承认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队伍统一到他的军令、政令里去。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那时提出了七个统一[79]，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不是都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令吗？还不是都统一给他吗？又如提出晋察冀边区也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才能成立。这还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吗？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80]，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81]。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就是争取领导权上犯的右倾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简单说来，就是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为已经越过俄国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阶段，急于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政策“左”了，不仅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脱离了工农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以上是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哪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注释

[1]西安事变，参见本书《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注[2]。

[2]察北同盟军，即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还有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同盟军在张北、沽源等地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把日伪军完全逐出察哈尔省。由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同盟军的抗战活动于同年十月失败。

[3]福建人民政府，是国民党内同蒋介石分裂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年十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福建人民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失败。

[4]这封信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的反动方针，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国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5]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前，应以实现全国抗战为根本，不愿和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将抗日东征军撤回黄河西岸。

[6]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7]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一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两个团，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战。

[8]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也称“七君子”。

[9]潘汉年（一九〇六～一九七七），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任我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香港等地我党情报、统战部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五五年被错定为“内奸”，受到判刑、关押，在“文革”中又受到迫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含冤而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为他彻底平反。

[10]陈诚（一八九六～一九六五），一九二二年在粤军任连长。一九三三年第四

次“围剿”时任国民党军第二路军总指挥。西安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等职。

[11]蒋鼎文（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准备调他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

[12]张学良，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致张学良》一文注[1]。

[13]杨虎城，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一文注[3]。

[14]王以哲，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致张学良》一文注[6]。

[15]宋子文，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致蒋介石》一文注[5]。

[16]这个报告，指毛泽东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文内所说毛泽东在五月代表会上作的报告，也是指这篇文章。

[17]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

[18]冯玉祥，参见本书《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注[11]。

[19]这篇文章指《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

[20]庐山谈话会，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8]。

[21]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22]林伯渠，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23]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一七～一九四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同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犯过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一九三八年起先后任中共民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起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代表。同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24]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谈判，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改编为一个军四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谈判中周恩来还提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复职授权等问题。因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无结果，最后只达成了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的协议。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安谈判后周恩来来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再次重申了我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蒋介石则提出收编红军等无理要求。周恩来严正予以拒绝，同时仍坚持继续谈判。

一九三七年六月周恩来来到庐山同蒋介石、宋子文谈判。在设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人事任命问题上，双方争论很久来得解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十七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

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八一三”以后，蒋介石被迫在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上述宣言并同意八路军设立总部。

[25]顾祝同一八九二年生，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皖南事变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26]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八路军的三个师先后开抵山西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板垣师团一部约三千人。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27]这个协定，指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28]徐向前（一九二〇~一九九〇），一九三九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任第一纵队司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29]鹿钟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和八路军进行摩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不断制造摩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30]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军长。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二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彻底击败。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于军团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31]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八路军长。曾奉蒋介石命令在河北一带同八路军摩擦。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32]汤恩伯（一八九八~一九五九），当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军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

[33]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杆铭等六人，这就是平江惨案。

[34]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十二两日，河南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修杀新四军伤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群众共二百余人，这就是竹沟惨案。

[35]《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

[36]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晋军进攻。这次进攻被晋军的反击所粉碎。同时，阎军又在山西东南部进攻晋军，摧残阳城、晋城、长治、沁水等地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团体，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37]这次谈判是指一九四〇年六月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

[38]参看《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谮，进谗言，说人的坏话；畀，给予；北，指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

[39]“皓电”是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到黄河以北。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

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以外，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40]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十月十九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皓电”中将所谓“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向我党提出。

[41]两个军，指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苏鲁皖游击总队总指挥李明扬的部队和李守维的八十九军。

[42]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化名江钧。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八月任长江局书记。同年十二月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历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

[43]陈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代理军长。

[44]王懋功，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卫戍总司令，一九二六年二月被蒋介石免职，后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45]顾祝同，参见本文注[25]。

[46]皖南事变；参见本书《为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47]日苏协定，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废除这一条约。

[48]德苏战争，参见本书《纳粹德国反苏战争爆发！》一文注[2]。

[49]太平洋战争，参见本书《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一文注[1]。

[50]新疆问题，指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间，新疆独裁统治者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抛弃革命伪装，大肆逮捕和杀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事件。

[51]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字希夷，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率部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斗中获胜，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一九二六年十月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十二月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出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一九三七年底到延安，后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出狱，七日由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

[52]张群，从一九四一年起任国民党军成都行辕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53]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

[54]邓颖超，一九一四年生，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

[55]林彪（一九一七～一九七一），一九三一年一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六六年后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叛国出逃，机毁丧命。

[56]张治中（一八九一～一九六九），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任国民党军西北

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一九四六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留住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土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57]共产国际解散，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19]。

[58]一九四四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

[59]赫尔利，参见本书《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一文注[1]。

[60]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两次由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61]民主同盟，参见本书《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一文注[2]。

[62]国民党政府曾决定在一九三六年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了“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并规定自七月起选举国大代表，十一月十二日开会。但这次大会没有开成。

[63]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驻希腊盟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军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向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64]“宁汉合作”，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17]。

[65]中山舰事件，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16]。

[66]汪精卫，参见本书《二期抗战的重心》一文注[2]。

[67]陈赞贤（一八九四～一九二七），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一月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和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三月六日在赣州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

[68]陈独秀，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0]。

[69]瓦窑堡会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

[70]北伐战争，参见本书《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注[8]。

[71]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72]冯玉祥，参见本书《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注[11]。

[73]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代英、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主力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部队曾占据市内绝大部分地区，一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起义武装中的一部分与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起义武装会合：一部分转移到广西，以后参加了左、右江的农民武装起义；一部分参加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了井冈山。

[7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上海工人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上

海市民代表政府。

[75]叶挺，参见本文注[51]。

[76]张国焘，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1]。

[77]这是针对王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中的错误观点的批评。

[78]彭述之，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一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任《新青年》、《向导》编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主义分子：采取了托洛茨基的反动立场，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79]七个统一，是王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提出的主张。

[80]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进步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蚁社。

[81]皖南事变，参见本书《为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